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口述
徐秀丽◎撰写

见证中国重大历史变革的个人记忆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口述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年轻时

一个深度参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美国人
以独特的视角、罕有的诚实与宽广的胸怀
讲述他一生执着追求理想、跌宕起伏乃至惊心动魄的命运历程
并直白表达他深入的思考和见解

在无数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与碎片中
折射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真实历史境况和纹理


上架建议：口述历史
ISBN 978-7-5108-29
9 787510 829116 >
定价：38.00元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口述
徐秀丽◎撰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 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108-2911-6

Ⅰ.①我… Ⅱ.①李… ②徐… Ⅲ.①李敦白－回忆录 Ⅳ.①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4678 号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作　　者　李敦白 口述　徐秀丽 撰写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911-6
定　　价　38.00 元

致中国读者

李敦白

我是一个美国人，今年九十二岁。我热爱自己的美国人民。同时，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五年，并且，从1946年到1980年回国为止，我参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中国共产党。我热爱美国人民，我也热爱中国人民。可以说，我是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人”。

中国革命对我的熏陶，中国人民对我的关爱，是我没齿难忘的。尤有幸者，我找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王玉琳作为终身伴侣，得到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和最好的工作伙伴。

我深信，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地球上最大并最强的国家，将来一定能逐渐地相互了解，共同合作，在世界上形成一股强大无比的和平稳定力量。当然，正如老话说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在，要在中国出版我的口述历史，作者让我对亲爱的中国读者说几句话。在下面，我冒昧地提出我经常考虑而最想讲的三个问题，作为抛出去的“三块砖”。

第一，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这是异常重要的。有中国梦，也有美国梦。有什么不同呢？美国梦基本上是个“我”梦，而中国梦更多地是个“咱们”梦。

中国人民在解放后摆脱了宿命论的精神枷锁，认识到要翻身不是没办法，而是有办法，并认为国富才能民强，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同时，也认识到只有不断改善民生，国力才能增强。

中国共产党把这种思想归纳为“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无数普通的人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事迹，使得中国三十多年以来的发展，成为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但是，有所动必有所反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复杂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反潮流。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光顾自己小利，不顾大家大利；甚至于放弃社会主义合作精神，拼命地想通过损害别人来发展自己。

这样，不但对社会主义教育不利，而且，我深信，自私自利的人，是得不到真正的人类幸福的。一天到晚患得患失，今天成功了，兴高采烈，明天碰壁，垂头丧气，忐忐忑忑，焦虑不安，可能外表装得很得意，实际上内心是空虚的，茫然的。

我殷切希望看到中国克服这股逆流，在实现中国梦的号召下，大力发扬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团结起来，战胜各种困难，继续创造新的奇迹，对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我本人坚信辩证唯物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我早已抛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一些已经失败的老教条。我曾经在中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被误会，被单独监禁了十六年之久。因为相信并熟悉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我才能够利用那个时间，认真学习，取经于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样杰出无比的哲学著作，来研究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并努力运用于自己的情况。我还取经于毛泽东树立的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的光辉的国际主义形象。最后，我觉得自己

并没有吃亏，而是有相当可贵的收获。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教育人民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何在，是领导人民提高觉悟，组织起来，形成最大可能的团结合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进行有效的斗争。

要使这样的团结斗争获得胜利，就要排除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等干扰。这种精神优势，只能通过辩论和说服教育的手段来建立，不能依靠压制和窒息舆论来建立。

既然要形成最广泛最坚强的团结，才能取得胜利，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针之一，在于顽强地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人民。发扬民族意识、民族团结、民族主义，比较容易；提高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却需要做更大得多的努力。但是，没有国际主义，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无法实现。这也意味着，在同别国错误的领导人做斗争的同时，要十分注意对别国的人民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如果为了眼前的局部政治利益而忽略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甚至于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煽动或者纵容对于别国人民的仇恨和歧视，那只能说是彻底的机会主义，连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都没有。这样做，最后是要失败的。

我认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件可以不管的小事，而是可能干扰和扭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事。我殷切期望中国的领导重视国际主义教育的问题。不扼其萌芽，后果可悲。因为狭隘民族主义，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963 年 8 月 7 日，毛泽东主席曾在中南海会见了非洲十八国反

殖民主义战士的代表团。出乎意外地，毛主席特别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见，尽管我同非洲事务无关。他请我参加，是为了给非洲朋友们一个活的教材，说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错误的方针。他对非洲朋友们详细讲过：你们看李敦白，他是白人，是美帝国主义那个国家来的，但他是我们的朋友，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而蒋介石呢，他跟我一样是黄种人，但他是我们的敌人。他说，英法的人民，不是你们的敌人，只有英法的殖民主义者，才是你们的敌人。要注意团结英法的人民，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我衷心希望，不能让狭隘民族主义由于未被重视而泛滥成灾。

第三，中华民族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大民族，这个民族具有它生存发展繁荣的条件，具有进行自我淘汰、自我改正、不断创新、不断“重新发明自己”的本事。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的最大法宝，是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及分析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曾经要求做官的都学一点哲学。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并实际动手动口，领导人民广泛地学一点哲学，掌握自己的命运。毛泽东经常对国际朋友包括对我本人讲，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一个“小学教员”。不管毛泽东在晚年出了什么偏差，这一点，即由大国的最高领导带领老百姓学哲学，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大家想一想，解放战争是怎么打胜的？全面内战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在人数上好几倍于解放军，它装备有现代的飞机、坦克、大炮，而共产党的军队只有一些老步枪、红缨枪、大棍子。全国关内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全在国民党手里。加上国民党有巨大的外援，主要是美国的支援——金钱、装备、外交上的支持——总之，解放军处在明显的劣势地位。但在不到三年半以后，蒋介石的

军队惨败了，幸存者仓皇逃到台湾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

为什么那么明显的劣势地位，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可以转化为绝对优势呢？回答在于中国人民的头号宝贝—— 一个比国民党更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些，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提出满足人民急切要求的政策（包括土地改革政策），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根据这些，中国共产党又能够拟出制胜的战略策略，把自己的军事劣势，很快变为优势。

我想，中国人民有这么一种独特的宝贝，不会把它丢到一边吧，不会不用很大的努力来学习它、掌握它、发展它吧。我敢冒昧地讲，每一个爱国的、有志气的中国人，都会关心自己的历史遗产，尤其是关心并发展自己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哲学遗产。

不忘为人民服务，不忘国际主义的精神，不忘中国的科学观点和哲学思想，则中国这个大国一定会繁荣、富强、稳定、民主，从而进一步造福于全人类。

2013 年 12 月 30 日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早年岁月

我出生于1921年8月，老家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大约在1680年，这个地方就已经设市，时间在波士顿、纽约之前。我家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不缺吃不愁穿，但也不是很富裕。在我十三四岁前，都是租房住，买不起自己的房。后来买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最老的部分建于17世纪，当时还是殖民地，还没有美国。这房子现在还在，成古迹了。我爷爷当过州议员，现在查尔斯顿有一条大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叫Sam Rittenberg Boulevard，山姆李敦白大道。我父亲是个律师。他本来没有钱上大学，在当地一家报纸当记者时，自己省钱买了二手的法律书，晚上自学，通过考试成了律师。他是个很老实的人。我上学的时候，我妈妈老是督促我的学习，要求成绩好，只能五分，不能四分，如果考了四分，她就要问，为什么只有四分。我爸会说，我也希望你分数高，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己做功课，不要抄别人的。当时抄、骗的情况普遍，他担心我不老实。

我妈妈出生在一个进步家庭。我的外祖父是俄国人，在俄国曾参加革命。他是孟什维克，当时专门有一个派别，叫俄国犹太人社会民主劳动党（Russian Jewish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他就属于这个派别。他十月革命前就移民到美国了，我妈生在美国。外祖父家

是犹太人，但不信教；他们拥护列宁，却反对布尔什维克。虽然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而且她的三个妹妹都是进步的，但我妈嫁给南方人，搬到南方，就成了南方太太。南方是相对保守落后的。我妈老跟我爸闹矛盾，老是吵架，所以我的儿童时代是很不幸福的，我老是担心他们会离婚。妈妈物质方面要求高，要最好的衣服，最好的家具，花钱多，给父亲造成很大的负担。他们经常为这个事情吵架。我只有一个姐姐，比我大四岁。我第一次“革命行动”发生在十四岁的时候。我家有两个佣人，都是黑人，一个做饭，一个打扫卫生。一天，我妈要打做饭的佣人，我抓着她不让打，我妈简直惊呆了。另一次我妈要打我姐姐，我也抓着不让打。所以我和妈妈的感情并不好，我到中国来时，父亲卧病在床，不久就去世了，家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我在中国从来不想家。

我父亲有很长时间是市参议会议长，也经常代理市长，有时代理时间长达一年多。大概 1933 年，我当时十二岁，罗斯福当选总统不久，他到查尔斯顿来了，我爸爸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让我去见罗斯福总统，他跟我谈了几句话，印象很深。此后，我开始宣传罗斯福的新政，一家一家敲门，说服住户把宣传品广告贴在朝外的窗户上，为罗斯福新政造势。这是我最早的政治活动。那个时候我就领会了一个经济学方面的道理，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这就是：要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老百姓购买力的提高，如果没有购买力，老百姓买不起，你的产品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必然会发生危机。

后来遇到一些事情，对我震动比较大，特别是我十三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对我一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你有多少钱，就可以买多少公道

一天晚上我出去看朋友，回家比较晚了，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个年轻黑人在人行道上走，后面跟着一个喝醉酒的白人，胖胖的，个子很大。那个白人走到黑人背后不断推搡他，骂他，黑人不理他，继续往前走。那个时候，美国南方对黑人的歧视是现在想象不到的，在南卡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白人因为杀害黑人、强奸黑人被判罪的，从来没有。黑人看电影也好，吃饭也好，坐火车也好，都不能跟白人在一起。譬如看电影，有一个专门分隔开的三层楼，可以上那儿看，连楼梯都是单独的。公共厕所，都写着只供白人使用。警察打死黑人根本不算什么事。这是1930年代了，美国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但实际上没有变化，到了1960年代才开始变。甚至美国首都华盛顿都是这样，种族歧视很严重，黑人不能进白人的餐馆。我有黑人小朋友，但到十来岁的时候，就不能在一起了。我知道黑白的不同，但小孩子还不会认真考虑这些事情。那天晚上碰到醉鬼白人欺负年轻黑人，我脑子里也没有怎么想到黑白的问题，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太不公道了，我就跟着他们走。后来黑人转进一个小胡同，要回家，白人跑上去狠狠地抓住他，使劲摇晃，黑人从容不迫地把外套脱下来，折好，放在一边，然后轻轻地推了白人两下，这个醉鬼就倒下了。黑人走进路对面一个黑黑的没有灯光的院子里头，回到他的破板房。我以为这事就完了，没想到那个醉鬼爬起来跟着他，也进到那个黑屋子里去了。我想不好，要出事。这时正好过来一辆警察的巡逻车，我就叫住了。我父亲那个时候也是警察管理委员会（Police Commission）的成员，他能管到警察。我的姓名跟我父亲一样，我是Junior，小李

敦白，我就跟警察说我是某某人，详细地跟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强调是那个醉鬼捣乱，黑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很客气，说噢噢噢，小先生，我们知道了，没有问题，我们管，你回家吧。但我不回家，我站在路对过看着。两个警察进去了，一会儿，他们拉着黑人青年出来，其中一人不断地用棍子砸黑人脑袋，黑人已经满脸鲜血，还在不断地砸。白人醉鬼跟在他们后面，嘴里继续骂骂咧咧。警察把黑人拉上了警车，一个警察跟他一起坐在后面，车开走时，我可以从车窗看到，警察还在继续打。我特别吃惊。那天我父母正在郊区跟一对朋友打桥牌，我拼命跑，拼命跑，大概有四五英里吧，跑到郊区。推门进去时，我满头大汗，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四个人正围坐在一起打牌，吃惊地抬头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喘着粗气跟他们讲了这件事情，结果，四个人里头有三个哈哈大笑，包括我的母亲，说这个傻孩子，为了一个黑人挨打的事，急成这样。只有我父亲没有笑，他站起来，打电话给负责值勤的警官，说这个事情你们搞错了，我儿子都看见了，你们好好照顾那个黑人，我明天早上来警察局解决。第二天早上，父亲带着我去了警察局。那是一个阴森森的楼，他以前从来不让我进去，这次他让我进去了。他说，那个黑人你们抓错了，他完全没有问题，你们马上放了他。警局把黑人放了，我看见他整个头都包着绷带，只眼睛那儿露出一点点，走路也不稳，就这么摇摇晃晃地出去走了。我不知道这件事的下文。

那天下午，我跟姑姑一起去市中心。她是一个小秘书，打字员。我跟她叙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问她，怎么可能有这么不公道的事情？她说，告诉你吧，实际上没有什么公道，你有多少钱，你就可以买多少公道，你没有钱，你就没有公道。我想，嘿，怎么会这样呢？

我看的童话、故事，都不是这样，正义总是最后胜利，怎么世界上会没有公道呢？那个时候我就起了个念头，就是不能接受“没有公道”的事实，总要找一个讲公道的地方，但还没有具体想法。

二、有一些人，他们最像基督徒，他们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四年级一直到中学毕业，上的都是“军校”，穿军装，搞军训。当时很多私立学校都是这样的，公立学校不军训。我们平常都穿军装，当然也不是正式的军服，而是一种跟西点军校学生装类似的服装。我自己也很喜欢穿，挺神气，觉得小姑娘都喜欢穿军装的男孩。我们这个学校是教会学校，属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是新教里面最接近天主教的教派。我们每天上课以前都要祈祷半小时，有一次换了一个年轻的牧师，也是南方人，他讲道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在我们美国南方，有些人尽管每个礼拜天都上教堂，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是真的按基督的教导行事；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行为非常符合基督的教导，但是并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这些人就是共产党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个名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牧师说这些共产党员存在于秘密的细胞（cell）里，为正义事业而努力。我当时十二三岁，听了这些话也没多考虑，但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

发生黑人青年挨打事件的同年夏天，我到新泽西的外祖父家，打了一个假期的小工。外公在新泽西州租下一块地，办了个高尔夫球场，同时出租房间，可以住宿。纽约和别的城市的一些医生、律师、

新闻编辑什么的夏天会到那儿休假，打高尔夫球，游泳，住上几天。我外婆负责做饭，她做得特别好吃，俄国饭，特别香。她是一个非常劳苦的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身体也不大好。我在那儿做小球童，挺高兴。客人中有共产党，有社会党，有自由派，也有的什么都不是，吃饭的时候，他们老在那儿辩论。他们还逗我，说你这个小南方包子，你们老欺负黑人。听他们说这样的话，我觉得挺害羞的，也跟他们辩，说我并不欺负黑人。他们就审问我，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开始意识到，黑人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黑人青年挨打事件发生时，我并没怎么考虑黑人白人问题，看到的就是一个醉鬼在欺负人，觉得太不公平，受不了。听那些客人辩论，这才有了点理论知识，才开始考虑黑人受压迫的问题、犹太人受歧视的问题。那时即使在美国北方，如新泽西，歧视犹太人也很普遍，譬如避暑地的酒店门前会有NJA（No Jews Allowed，犹太人不准入内）的牌子，种族歧视非常严重，二战前都是这样。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我们查尔斯顿的地下党开始给我们家送材料，悄悄塞到门底下，用的是群众组织名义。我就开始看这些材料，但也没想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到北卡上大学之后，才跟共产党有了直接接触，而且不久就成为美共地下党的一员。

三、参加美共

我学习成绩很好，中学毕业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那是美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而且获得全额奖学金。上大学之前，有个北卡罗来

纳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来找我姐姐玩，我坐在旁边听。他说，北卡州立大学校长是一个很开明的民主人士，该校有许多良好的校规，如规定高年级学生不能欺侮新生。这是很特别的，一般美国新生都要受欺侮，又打又骂，乱搞恶作剧，英文还有个专门名称叫 haze。北卡大学校长不但不让高年级学生欺侮新生，反而规定前者要关心照顾后者。另外呢，考试的时候老师不在课堂里监考，也不许有什么别的监视人，学生可以把考卷拿回家、拿回宿舍去做，信任学生不会偷看。嗨，我觉得这个学校太棒了！我问我爸爸，如果我不去普林斯顿，去北卡上大学，你付得起钱吗？他说，有些困难，但你愿意去北卡，我也赞成。他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不过，我爸赞成我去北卡大学，还有一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子承父业，希望我以后也当律师，而我上南方的学校可以在当地建立一些人脉。但我从小就说我不要当律师。有一次，他给客户起草文件，我看后问他："为什么律师非要写这么复杂？为什么不写一般老百姓的话？"我爸说："如果律师写一般老百姓的话，还要律师干什么？"这就更让我不愿做律师了。北卡是公立大学，如果是外州人，要交学费，我是南卡人，需要交学费，但没有私立大学贵。现在公私立大学的学费已经差不多了。

北卡大学的老师中，有一位哲学教授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极大。他主要教黑格尔辩证法，他告诉我们要看事物的性质是什么，会怎样发展，要解剖它，要认识事物内部的矛盾，看发展的动力，怎样从量变到质变。这对我的思想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我在中国坐牢，还常想起这位教授，用他教授的方法分析自己的处境，寻找解脱的方法。除了教哲学、逻辑，这个教授还是一位高等数学的专家，但他在美国学术史上没什么名气。在美国，哲学往往是个贬义词。哈利·

波特第一卷在英国叫做《哈里·波特与哲学家的石头》(*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但在美国出版时，就不能叫哲学家，叫*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哈里·波特与魔术师的石头》，魔术可以，哲学就不行。美国人认为哲学是空洞的东西，会影响销售。听说在中国叫《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看来和美国差不多。我有时候觉得，“文革”中林彪讲的东西也有点道理，研究哲学要带着问题学，带着问题去分析，“活学活用”，不然确实会陷于空洞。我的哲学老师是非常反对共产党的，我参加共产党后，告诉了他，他很失望，他说：愿意牺牲自己，是不合理的想法。意思是不符合理性。

大学一年级时，我没有过问政治，只参加了一些一般的辩论会和社会活动。但是有件事情让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我和一个舍友自告奋勇地参加了州政府委托学校的一个项目，到纺织工厂开识字班，教纺织工人识字。当时的纺织工人大部分是文盲。我们两人晚上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开始教工人ABCD。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两个真相：第一，什么是扫盲？扫盲的标准是什么？我发现所谓“扫盲”，目标只是能写出自己的姓名。我了解到，只要能写名字，人口普查的时候他就不算文盲，这样州政府就有政绩，完全是个表面文章。第二件事，我在给一个中年纺织女工教字母时，她的三个小孩找来了，三个都没上学。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赔本的买卖，我们教母亲识字，而她的孩子又不上学，教了有什么用？我跟舍友就都不干了。

不干以后，我们参加了一个左派学生会，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在我们学校的分会。我们参加后，就开始接触黑白和平权的问题。当时南方最突出的是选举权问题。南方十一个州，投票要交人头税，叫Poll Tax。后来我在中国读到白居易的《买花》诗，深有感触：“有一田舍

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跟当时美国南方很相似，什么都要交税，税还很重，黑人肯定没有钱，白人也不一定交得起。一个佃农，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为了投票付一大笔钱，他不会干。美国国会最反动的参议员、众议员都是南方人，他们一辈子也不会被选掉，因为当地绝大部分人没有投票权，只要 20% 有投票权的人投他的票，就万事大吉了。左派学生会要求取消 Poll Tax.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在第一阶段，希特勒开始攻打英法，苏联还没有参战，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美国逐渐趋向参战。我们都反战，要求美国不要卷入欧洲的事情。后来苏联入侵芬兰，跟小小的芬兰打起来了，美国人同情芬兰，学生会里面出现反共的人，我就积极跟反共分子斗争，因此被选为学生会会长。后来我发现，随着苏芬战争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反共，而且很奇怪，这些人原来跟共产党学生一起争取平权，争取一般人权，一反共，连这些也都不讲了，彻底变化。我想，我要是不参加共产党，不抛下锚，扎下根，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我不想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人，我主动找了共产党的联络人，要求入党。我是 1940 年加入美共的。

我不但自己入了党，还拉我的舍友入了党。这件事说起来还有个故事。美国麦卡锡主义有个前身，就是 30 年代的戴斯（Dies）委员会——戴斯是德州的众议员。该委员会派了两个人调查我们校长，说他有共产党嫌疑。我和舍友早上起来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很生气，我就说，他们要共产党，我们就给他共产党吧，我们俩就参加了共产党，表示抗议。我们的校长是个个子矮小的南方人，很了不起。

刚到学校时，我出麻疹，住在校医院隔离病房。校长来看我们，他对我说，我看到病历，你姓 Rittenberg，来自查尔斯顿，跟我的老朋友 Sam Rittenberg 有什么关系吗？我说那是我爷爷。这个校长谁都认识。出麻疹认识后，校长请我参加每星期天下午在他家里举行的茶话会，这是专门招待学生的聚会，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有一次聚会，校长讲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为什么南方的纺织工人做同样的工作，工资却比北方的纺织工人低三分之一？原因在于南方的黑人拿的工资还要低，资本家利用黑白矛盾把大家的工资都压低了。南方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先解决对黑人的歧视问题。这些思想，我都吸收了。但校长不是共产党，相反，他反对共产党，不过呢，他认为每个党派、每种政见都有存在的权利。那为什么会被怀疑为共产党呢？我们的英语文学教授埃里森是共产党，大选时，共产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是个黑人，他到北卡罗来纳州州府罗利市来做竞选宣传，住在一个黑人开的小饭馆里，埃里森教授过去跟他吃了顿晚饭，结果被记者发现了，州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学校开除埃里森教授。校长说，可以开除他，条件是，你得先开除我。

当时美国南方共产党是“地下党”，只有一个人是公开的，他是南卡北卡两个州的书记，是公开合法的，但他自己并不参加活动，只在背后指挥。这是个品质非常高尚的老电工，因为从事共产党活动在阿拉巴马州坐了几年牢，在牢里得了肺病，身体不好，穷得叮当响，家里总吃野菜。纽约共产党总部给他津贴，指挥他。我们知道他是书记，他知道谁是党员，他有我们的名单，我们都直接跟他联络。我们对他特别尊敬。美共的组织是很松散的，后来我去各地搞工人运动，如果当地只有我一个党员，那就一切自作主张，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有小组，在固定的地方，比如在大学，就有小组。小组上面就是书记。后来我们有个党委，我还做过党委的教育书记，管南卡北卡两个州。所谓党委，也比较空，我负责宣传教育，另外一个人负责工会活动，联系黑人。党员的人数，两个州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百人。不过连查尔斯顿都有秘密党员，我妈要是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准会吓一跳。从我们家出来，把口的地方有个食品店，是一个希腊人开的，店主的儿子就是秘密党员。有一些贵族也是秘密党员。书记有党员名单，我下去收党费，书记告诉我谁是党员。南卡北卡的党员，对个人品德要求很高，男女关系不能随便。这都是书记要求的。有些地方，譬如纽约，就比较随便。我到纽约开会，或者去募捐，发现那儿的党员跟我们根本不一样。纽约的党员中有许多艺术家，他们喝酒，个人生活随便，我们都看不惯。相互之间怎么联络呢？打电话不行，写信也不好，容易暴露，联系的话，我们得找书记，或者他找我们。他有个破车，到处跑，找我们，好像也没有管不过来的情况。我也会去纽约找一些大富翁筹钱，有些大富翁同情共产党。1940 年春天，我到纽约参加了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然后我们几个南方人一起到一个农场去参加党的培训班，培训了几个月，主要是学苏联的、斯大林的东西，我们都崇拜斯大林。我们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斯大林宗教。我们也学联共（布）党史，跟后来在中国学的一模一样。很奇怪，当时好像所有的坏蛋都是托派。在北卡德姆市（Durham）有一个我管的小组，有一次我们到一个黑人木匠的家里开会，他不在家，我们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钟，他才回来。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有轨电车上，他跟人吵起来了，他告诉我们："有个托派王八蛋踩了我一脚。"在他的脑子里，托派就是坏蛋，坏蛋就是托派，因为他在党内就是这么学的。他

不会骂别的。老木匠是非常好的老党员。

后来我到延安，跟陆定一说起我们美国地下党的情况，他哈哈大笑，说你们那算什么地下党。确实，跟中共地下党处境凶险、组织严密比起来，我们确实算不得地下党。回想起来，我们那些人里头有没有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呢？很难想象没有，但也想不出是谁。个别人我们当时就有怀疑，我们怀疑的是那些经常在工人面前吹嘘自己如何了不起，如何自我牺牲的人。有个基督教牧师，也是党员，经常在党的会议上讲有人收买他，但他不出卖党。老讲，别人就说，你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自己出卖了，然后把钱交给党。他体会不到，能够参加就是幸运。

但从我母亲的角度看，这一定是一种牺牲。我下面会讲到，从事劳工运动也确实有各种危险。我的父亲比较能够理解。他跟我说了两个观点：第一，你信奉社会主义我赞成，资本主义制度太坏，不过我家庭的利益已经跟资本主义紧扣在一起了，我本人没有办法。第二，我觉得谁也还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来。他不认为苏联有什么好。但是，我没钱最穷的时候，他偷偷给我钱，五十块钱，一百块钱，表示支持。他说，你选择的道路，我只能支持你。我妈妈反对得很厉害。对我参加共产党这件事，我估计我妈一定猜到了几分，但不确定。刚开始参加工人运动时，跟妈妈发生过一次争论，妈妈说：就算你的革命是对的，为什么要牺牲我的儿子？我说：妈，你根本不知道，不存在牺牲我的问题，他们容许我参加，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个道理跟我妈说不清，但确实是这样的，一般工人对大学生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能够接受我，我觉得很幸运。我很注意不说那些大词，不让他们觉得我是大学生，自以为了不起。

我的那些党员同志都是扎扎实实的，一心做好党的工作。你问我他们的追求是什么？是不是想把美国建成像苏联那样的国家？恐怕那样想的人不多。我自己反正没有这么想，真正在美国搞革命是很遥远的事。我自己就是坚决争取黑白平权，男女平等，劳工权益，学术自由，都是这些事。

四、权利是你以为你有的东西

我原来参加了一个联谊会，会友都是富人子弟。参加左派活动后，就带着四个同学退出了。我们开始到附近的烟草厂、织袜厂、纺织厂，帮工会出小报，有时给他们写文章，让工人拥护工会。后来学生和黑白工人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这在南方是很大胆的，当时白人和黑人参加不同的工会，如烟草工会以黑人为主，纺织工会没有黑人，各有各的工会。只有先进分子能接受黑白一起开会。当地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有一个进步的负责人，把会场借给我们使用。

因为参加这些活动，教务主任勒令我退学，但我的学分已经够毕业了，后来拿到文凭，我就走了，全部时间用来搞工会组织工作。

我们组织工会时候，要跟两面的敌人斗，一面是老板，一面是工会骗子，即工贼。许多大工会是由职业工贼控制的，这些人吃工人的会费，跟老板勾结，所以我们就跟他们斗，另行组织民主的工会。当时一些大工会，它的地方分会开会时，一般只有八九个人参加，投票通过就完事，其他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的工会是全体参加投票，开大会，进行大辩论，最后投票决定，很民主。我们的活动自然

遭到两方面的反对。我的一个朋友是佃农出身，叫何马·派克（Homer Pike），他在一个采石厂组织工会，当时我在组织政府和学校公务人员工会。有一天，他来我家找我，说，我去乡下采石场找工人开会，老板已经扬言要打死我，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两个人去总比一个人好。正好有一个学生在我家，他也是党员，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这是个挺远的山区，开会倒没出什么事。回来的路上，我们发现后面有一辆大车拼命追赶，开得很快。何马估计要出事，他把车停下来，高声喊，你们赶快跳车。后座的学生卧低身子，没有跳车，我坐在副驾位置，打开车门纵身跳了出去，跑上一个山坡，我们俩都没事。何马一条腿刚跨出车门，后面的大车就撞了上来，把他抛出去二十来米，两个肾脏都碎了。原来是老板的儿子和一帮打手故意撞我们。这时正好过来一辆大巴士，司机把何马扶上车送到医院。第二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老婆和三个孩子围着他，都是红头发，现在回想起来，这四个红头发的脑袋好像就在眼前。何马身上插着各种管子，肾脏已经停止工作，医生跟我说，他只有几分钟了。他用最后一口气跟我说："不要让那个大骗子掌握我的工会"，"不要出卖我的工人"。那个大骗子是指这个州负责工会的人，名叫桑德福（Sandefur）。他一句没提照顾我的家人，照顾我的孩子。他有人寿保险，但保险公司枉判他酒后驾车，不给赔偿。老板势力大，不可能到法院去打官司，没办法，我们几个人只能自己凑钱接济他的家人。他对工会的忠心，到最后还关心他组织的工人，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那个时候组织民主工会，确实是有生命危险的。

大概在 1940 年 5 月，我们在女青年会组织了一个黑白一起交流讨论的会议，会后我收到一封信，是从北卡北部一个小镇来的。这个

小镇叫 Roanoke Rapids，罗阿诺克拉匹兹，是马海德的家乡。那封信上说，在 1935 年的大罢工中，大工会的组织员拿了我们的钱，欺负了我们的老婆，然后走了，罢工垮台，我们十二个罢工领导人全部失业，而且难以再找到工作，其中有一个成了县政府的收税小官，一个开了加油站，有几个打零工的，还有几个就失业了，什么收入也没有，靠救济生活。他们说，我们听说了你在女青年会的讲话，我们信任你，你能不能来帮我们重新组织自己的工会。你来的话，我们每周可以付给你六块钱，做你的生活费。这六块钱是怎么来的呢？自从失业之后，他们每个人每个月放一块钱到一个雪茄盒中，储蓄起来，等着有人来帮他们组织工会。他们还说，我可以住在一个苏格兰老太太那里，她提供住宿，也供应伙食，正好六块钱一周。我就去了。那个老太太开一个工人住所，里面的情况现在不能想象。我睡的屋子放六张床，三班倒，共十八个人住，因为住的是纺织工人，他们工作三班倒，宿舍的床也就三班倒，你起床我睡觉，我起床他睡觉。人多，也不能每天洗澡，整个房子只有一个莲蓬头，那个气味真是难闻啊，空气坏透了。我到后，当地的报纸发表社论，说“有一个异国人来我们这儿散布阶级斗争的种子，想挑拨我们，破坏我们的社会稳定”，等等。我找到报纸编辑，说，你说我是异国人，我们比比谁的祖先先来美国。

那些工会的人也都了不起。有个大个子的老头，原来是纺织工人，后来因参加工会被开除了，一直打零工。我每周一次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政治经济学，用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昂捷夫写的，后来在中国也用。我就结合本地情况，给他们讲为什么工人受剥削。我说，好比几块木头，并不值钱，经过木工的劳动，做成桌

子，就值很多钱，为什么？因为劳动创造了价值。这个老头站起来激动地说，嘿，没想到原来我就是共产党！他没想到这个道理。后来他跟我讲了他老婆的事。他老婆在床垫厂做了二十七年工，受工作环境影响得了肺病，结果呢，自己做了半辈子床垫，躺在床上竟然没有垫子。老婆死后，老头去找棺材店老板要棺材，这个老板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司老板的小走狗，这个工人本来就对他生气。老工人走进去，说，我太太死了，我要给她找个棺材。他个子很大，老板看着有点害怕，就说好好，这件事交给我，找了个杉木的棺材给他。老工人说，不行，我要最好的木材，最好的雕刻，最好的金属，你找店里最好的给我，而且我一个钱也不给你。她劳动了一辈子，最后连个垫子都没有！老板吓坏了，只好给了他一具好棺材。

另外一个老工人，有七个孩子，我到他们家吃过饭。家里很穷，主食是一种玉米面饼子，叫做“锄头饼”，hoecake，因为有时候就放在锄头上烤。这种玉米饼没什么味道。另外就吃一点点猪油，再就是吃野菜。七个孩子每人都会一种乐器，饭后一起演奏，唱歌，非常优美，简直是天籁之音，说和谐，那是真的和谐。这个老头住得离我们上课的地方很远，有三四里路，但他从不缺课，即使下大雨也走来上课，对学习非常有热情。

在 Roanoke Rapids 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乡下一个警察开车来找我。我还以为来抓我。他说，他们那儿有些农民在农闲季节到锯木厂工作，农忙要回家，但老板不给钱，来找我组织工会。警察怎么会来找我组织工会呢？而且木工工会是左派共产党领导的——当然这个他不知道。原来，警察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深山老林里的村庄，村里有个杂货铺，店主是地方的推事，就是最低级别的法

官。那些锯木工人向杂货铺赊账，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领不到工钱，也就还不了账。这样，锯木厂老板、工人、推事就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警察其实是为了推事的利益。警察把我拉到一片森林里的一个开阔地方，放下我就走了。锯木厂老板来了，很高，很壮，还带着同样块头的三个儿子。我当时十九岁，而且特别瘦小。老板看了看我，问：工会就你？我说是。他有些不好意思，对儿子说：哼，就这么个瘦小伙子，那就算了。后来在推事的压力下，还了工钱，我们组织了工会，老板还给办了执照。

我在这个地方组织的工会刚起来，就被调到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去了。

在伯明翰，我遇到了一件对日后影响重大的事情。有天晚上，党组织派人来找我，说城市日报馆的打字员、记者罢工了，这些人都是白领，体质比较文弱，不会打斗，恐怕不是工贼的对手，让我动员煤矿工人和炼钢工人支援他们。美国三班倒，早上七点煤矿工人从矿井上来，我就站在一个木头凳子上讲话，说报馆的工会兄弟们罢工了，他们需要援助。然后又到炼钢厂动员。这些干体力活的工人块头大，肌肉发达，都是勇敢好战的，特别会打。他们一听很高兴，有好几十人跳上汽车跟着走了。到报馆门口一看，情势紧张：报馆大门紧闭，门前人行道中间拉着一条警戒线，线内供行人通过，线外停着几辆警车。人行道外侧的马路上，站着一大群工人，我带来的工人也站在那儿，大家都不说话。我站到了报馆的门口，也就是人行道的内侧，那里原来站着一位老太太，她穿着黑色的衣服，手里拿把黑色的雨伞做武器，一个人守着大门。我就站在她的身边。过了一会，扑通扑通走过来一个很踿的大家伙。他穿得很漂亮，头上戴顶意大利式小帽，长

得像个武士，身高体壮，一脸横肉，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这是个工贼，明显是冲我来的。我看他走过来，首先想到我要死在这儿了。他那么粗壮，而我特别瘦小，对付我根本就不需要枪，一拳就能把我砸倒。但我明白，我不能逃走，如果我临阵脱逃，那么我在这些工人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就是以后照镜子，都会羞于看到自己的脸。所以我就站着不动。这个人慢吞吞地一摇一摆向我靠近，在大约距离六七米的时候，忽然从工人群中跳出一个矿工，越过警车，照着那个大个子的后脖根狠狠打了一拳，我们叫做“兔子拳”，Rabbit Punch, 他一下子瘫软在地上了。打人者又迅速穿过警车，回到工人群中。整个过程兔起鹘落，一气呵成，人群始终静悄悄不出一声。从警车上下来几个警察，问：谁，谁，谁干的？工人们谁都不吭声。后来那个工贼慢慢爬起来，摸摸自己的脖子，溜走了。

一个年长的警察走到我和老太太跟前，对我说，你不是工人，你马上离开。我说，纠察线拉在路中间，一半供行人通行，这是你们自己规定的，我不是工人，我是行人，我有权站在这儿，I have the right。警察看着我，一脸轻蔑：“Right？”他说，权利？我告诉你吧，权利是你以为你有的东西，其实你并没有什么权利。他拿出他的大怀表，说，给你一分钟，一分钟内你不走，我就逮捕你。一分钟一到，警察就把我拉上了一辆警车。这是辆囚车，里面还隔成两间，我被关在后面的空间。很奇怪，警察把车往森林里开，停下来，两个警察下车，打开前面的隔间，把关在里面的一个妓女拉下车，带着她走到林中，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才回来。

我被拉到市政府监狱，又是照相又是押指纹，煞有介事。美国监狱往往是让犯人管犯人，犯人头目对我说：小伙子，你真有胆，你

这么个小孩子竟敢偷警车！什么？我怎么成了偷警车的？我后来才知道，警察这么做是故意的，偷警车是严重的行为，属于联邦罪，以此入罪，我在FBI（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案底了。但在法庭上他们并没提偷车的话，只说不听警告，让我走不走。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工会又从纽约请了个大律师给我辩护，因此只交了十四块钱罚金就把我放了。而上法庭前，还得先保释，这需交三十块保金。我没有钱，这也好办，警察局的对面就是保金经纪人的办公室，借三十块钱，大概需要还五十块。高利贷，很黑。

这个事件，对于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从小就很怕死。我是一个经常生病的孩子。十二岁时，我患了第四次肺炎，病得挺厉害，而医生竟当着我的面告诉我母亲，"这个孩子活不到二十岁——肺部太弱。"开始在美国搞工人运动后，经过几次风险，意志力逐渐增长，伯明翰的这次事件，更让我坚定了一点：对于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使害怕，也要去做。不过，我并没有真正解决心理恐惧的问题，这种恐惧心理在延安撤离遭遇敌机轰炸时有过一次集中爆发，直到1949年把我长期监禁以后，通过学习和思考，我才彻底体认这个道理。从这一点看，我在狱中才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多少年以后，大约在1967年，我看到了一首打油诗，体现了我的想法："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方自由。"

伯明翰事件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直接卷入战争，我也动了当兵打仗的念头。

五、从反战到入伍

前面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美国共产党是坚决反战的，认为那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但到194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苏联开始卫国战争，我们认为战争的性质变了，变成反法西斯战争了，反战的态度也随之变化。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人都很愤怒，民众参战热情空前高涨。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我跟一个同志一起去报名参军。结果，他被接受了，我却被拒绝了，因为视力太差。征兵的人说，你以后也当不了兵，还是做点别的事吧。

这样，我又重新回到工人运动中。我在美国从事工人运动的最后一个任务，是组织骆驼牌香烟公司的工会。骆驼香烟公司在北卡州的温斯顿—塞勒姆市（Winston-Salem），这是家大工厂，却没有工会，工人待遇特别差。1932年，共产党曾在那里发起过一次工人运动，但失败了。我找到了一个当年积极分子的家，是一个黑人，我一进门，说我想重新组织左派工会，老人便对家人说：我告诉过你们，我就知道他们会回来。他儿子成了工会运动的第一个核心成员。

我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工人，就想到通过教堂进行宣传动员。那里的工人都参加基督教小教堂，类似中国的家庭教堂，他们不承认大教堂是真的基督教。他们相信神灵附体，然后又唱又跳，又喊又叫，有人打滚，有人晕倒，很热闹。小教堂的牧师依靠工人给点钱生活，都很穷。我跟他说，能不能在做礼拜之前让我讲五分钟，他同意了。要是工人拿钱多了，给教堂的捐献也会增加。就这样联系了一些烟草工人，形成了工会的核心。我们当时有四个组织员一起工作，有黑有

白，有男有女，进展很快。

我接触的烟草工人中有个大个子黑人，他的工作是把一条条香烟装进大箱子，然后把箱子举起来，抛到墙根，在那儿摞成堆。他抛得很准，烟箱码得整整齐齐。有一天他跟我说，他们最近抽掉了一部分尼古丁，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抛了几次，都没抛准。原来是重量减轻影响了他的瞄准。

骆驼牌香烟公司的大老板就是温斯顿市的市长，也是征兵委员会主席，所以，他很快就把我征兵了，不但视力没关系了，所有一切都没关系了。我能到中国来，还得感谢他。

家人没有反对我当兵。美国没有独子不征兵的规定，当时我父亲已经重病在床，家里其他人也不会反对，因为当时普遍的情绪是拥护参战。一入伍，我和美共的正式关系就告终结了，党员当兵入伍就得退党，这是共产党的一个规定，以防受到渗透军队的指控。但我和美共的关系还有余绪。因为我在FBI有案底，所以一直受到监视。有两件事让我知道自己被监视。第一件是发信的“特殊待遇”。对于一个军人，尤其是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在枯燥而危险的军营生活中，收到家人朋友的信无疑是一件激动人心的重要事情，发信的时候，全连人集合，由连长或者上士挨个叫收信人的名字，但我的信从来不在这个场合给我，而需要我到连长那里去拿。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特别照顾我？他说：你是不是以前参加过什么组织？这些信大概已经被人看过了吧，不过我也没有几封信。第二件事是，有两个战友分别告诉我，说上级交待他们注意我，包括看什么书，与什么人来往。我也没有停止作为共产党员的个人活动。我每次去军营的图书馆，都很仔细地翻检书籍，所有含有反共内容的书，我都悄悄藏在大衣里面偷走，销毁

掉，力所能及地清洗一下，不让其流毒。倒是一直没有被发现。我还组织了一个有四五个好朋友参加的学习小组，跟他们讲社会主义，也讲我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们都很同情。

后来到印度，因水土不服拉痢疾住院，一个卫生员给我拿便盆，一看，原来是我们的州书记。他已经不年轻了，大概四十多岁，但这个年龄也可以当兵。他没有来中国。听说他后来退党了，主要是对美共失望了，美共当苏联的尾巴，不是真正把美国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员都很失望。三十多年后我回美国，老书记已经去世了。

我参加革命，是从基层工作开始的，这也是我擅长做喜欢做的工作。我来中国后，却始终没有机会做群众工作。有人问我，我参加中国革命有没有什么遗憾。我说，能参加中国革命我感到非常幸福，要说遗憾，有一件事可以算得上，那就是，我在美国直接做群众工作，而在中国我没有办法深入群众，在中国，我是个文字工作者，我接触的人多是上层，这让我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隔膜。不久前还有个记者问我，解放后领导层慢慢变化了，为什么您没感觉到？我说，主要是因为我过得太好了，我本人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感觉不到别人会有什么问题。

在讲下一段故事之前，我得补叙与中国的渊源。

六、你到花园里挖个洞，对面就是中国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在厨房里闹，妈妈给我一个小桶一把小铲子，说：“你到前面的花园里去挖洞，挖得够深的话，对面就是中

国。”我就在花园里挖挖挖，结果挖出一大滩水，宣告“发现中国”的失败。

五六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查尔斯顿的一家华人洗衣房解决了一个什么法律问题，他们送来一大包东西，记得有茶叶，有荔枝干，还有鞭炮。当时查尔斯顿有几家华人洗衣房，都是广东台山人办的，他们雇佣黑人妇女洗衣服，全是手洗。但当时我们那儿没有中餐馆。我看到包装盒上的中国字，就问我妈怎么回事。妈妈说这是中国的东西，她还说，中国是个很奇怪的国家，在中国女人种地，男人看家，女人穿裤子，男人穿裙子。另外，我妈妈每个星期三下午和朋友一起打麻将，麻将牌上有花，也有字，我妈她们并不认识这些中国字，她们有自己的叫法，但我记得“风”还是叫做 feng。我就觉得这些字很美，有一种陌生的美感。

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跟共产党书记聊天，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美国或英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到印度去或者到中国去，印度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永远不会相信他，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间太长，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来的人，他们都不会相信。但我不信这句话，而且我的经历也证明这不是事实。他们认为你这个人的历史背景应该查清楚，这一点是事实，但不被信任则不是事实，相反，我倒觉得很容易被信任。印度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来中国以前，我们在印度驻军，印共领导人给我们介绍印度革命的历史，讲了很多他们的情况。

对于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我曾经在北卡一个纺织工会的墙上看到过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的像，应该是斯诺在保安给毛拍的，大概是从《红星照耀中国》上复制放大的。



印象中，在北卡一个纺织工会的墙上看到的就是这张照片。斯诺摄，1936 年于保安。

西柏坡整党时，我谈自己的历史，其中提到这件事，胡乔木和黄华表示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在 40 年代初的美国挂毛主席像，并因此怀疑我的诚实。这太不公道，有什么不可能呢？这本书 1937 年在英国出版，次年在美国出版了修订本，获得书中照片很容易。美共当时对中国土地革命的评价确实不高，认为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中国的革命者毕竟是我们的同道，我们对他们是尊敬的。

我参加工会工作之后，在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看过关于中国、关于毛泽东和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几篇文章，《工人日报》还连载了萧军《八月的乡村》，好像是连环画，或者其中有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其中文书名《西行漫记》无疑更为知名）在美国影响很大。卡尔逊上校写的《中国的双星》是他对中国各个战场考察的实录，在美国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卡尔逊上校对八路军非常称赞，美国参战后，他模仿八路军建立了一支突袭队，袭击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他在训练和作战中吸收运用八路军的战术，特别是思想工作方

法，让士兵明白为什么而战。这支部队战术灵活，士兵勇敢顽强，战斗力非常强，卡尔逊也因此成为太平洋海战中的传奇英雄，这个突击营的英雄行为，还被拍成电影留传后世，现在还有这支部队。我也看过史沫特莱的一些著作。这些作品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基本上限于“有所知道”的层面，印象不是很深刻。当时有个感觉，认为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和苏联的革命很不一样。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都是一头钻在美国的政治里，关注美国国内的问题，对中国不大关心。当时胡适大使、宋美龄、国民政府在美国的宣传、演讲等，也没有太注意。当然我知道中国在抗日，认为那是好的。我参加了反对把废铁卖给日本的运动。记得美国西海岸的码头工人（他们的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拒绝给运往日本的物资装船，旧金山唐人街的孩子们排队游行，唱着歌，表示感谢。这是我从新闻纪录片看到的。当时没有电视，了解新闻主要通过看报纸，还有就是电影，放故事片之前会放映新闻纪录片，其中就有中国。记得看



1936 年 6 月，刘良模在上海教唱救亡歌曲。

过溥仪当傀儡皇帝的片子，也看到过蒋介石。很奇怪，蒋介石的形象好像是没有形象，他的脸没有什么特征，记不住，只有一个光头的印象，难怪史迪威叫他“花生米”。后来到斯坦福受训，课程里有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我都兴趣很大，这才开始了解中国。

我第一次对中国产生感情和兴趣，是由《义勇军进行曲》引起的。我那时刚入伍，有一天忽然在广播里听到中国歌曲，是由刘良模[①]指挥的纽约市华人洗衣所合唱团（New York City Chinese Laundrymen's Chorus）的演唱。我的感受可以用“震撼”来表达，就像被人猛击了一下。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我深受感动。他们的演唱用中英双语，先唱中文后唱英文。我完全不懂中文，但觉得它是那么美，那么令人激动，直让我热血沸腾。我找来了这张唱片，反复听，感动和受到激励的情绪经久不散。唱片里面还有《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太阳出来一片红》，以及现在已经听不到的《锄头歌》：

① 刘良模（1909—1988），浙江镇海人，193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从1934年开始，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此年冬天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1935年5月，《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被灌成唱片，开始发行，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1940年夏，刘良模被基督教青年会派赴美国求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美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团体组成了一个联合援华机构，刘良模被邀担任该机构的正式“讲员”，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2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和刘良模合作，灌制了一套中国革命歌曲唱片，片名叫《起来》（*Chee Lai: Songs of New China*），收入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一组中国进步歌曲（李敦白先生听到的，应该就是这张唱片）。1949年，刘良模应邀回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解放后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市侨联副主席等职。

手把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
五千年古国要出头，锄头底下有自由。
天生孙公做救星，唤醒锄头来革命。
革命成功靠锄头，锄头锄头要奋斗！

很幸运，后来我到上海去见宋庆龄，在她那儿，不但认识了刘良模，而且见到了这首歌的作曲者陶行知。

这些歌我到现在都会唱！正是这些陌生而美妙动听的音乐，让我对这个本来和我毫无关系的国家产生了最初的心动，种下了热爱这个国家的幼嫩的根苗。我想，到斯坦福之后，我之所以放弃日语改修中文，除了理性的选择之外，潜意识中，以上提到的这些有关中国的书籍文章，尤其是华人合唱团演唱的这些歌曲，一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后来一直想，如果人生是一条河，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这条河就进入了一个急拐弯，拐向一个我未知的地方——中国，而本来打算一生奉献的事业——为美国普通民众争取平等和自由，则从此告别。等我再回美国，不但青春不再，连中年也已经过尽。站在九十多岁的下游，回望二十一岁的自己，感慨万千。经过千回百转，风雨淘洗，这两个自己，似乎很难说是同一个人，但我分明觉得，他们最核心的部分并没有变化，他们确实还是同一个人。

七、斯坦福受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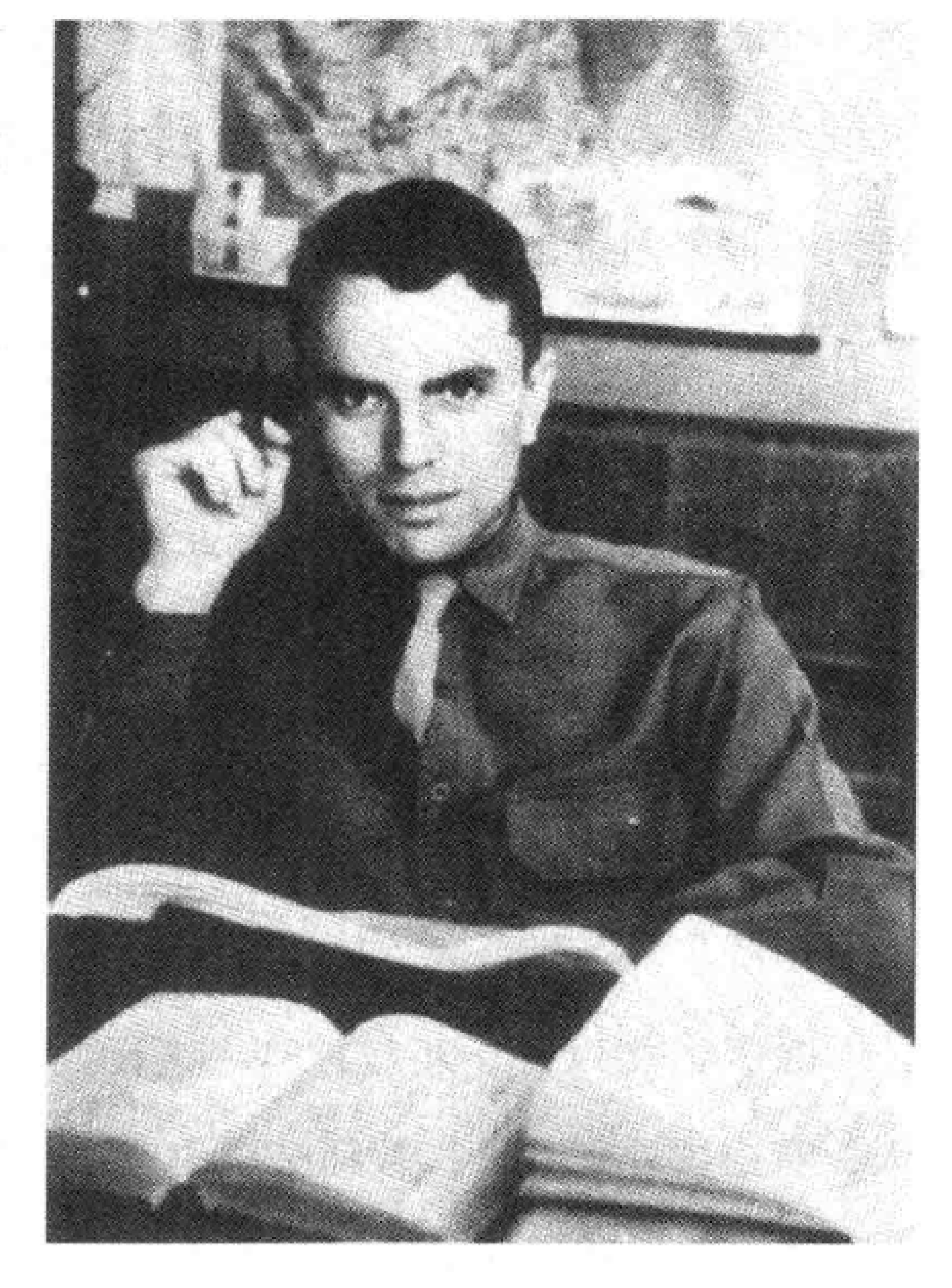
1942 年我入伍当了步兵，我们的部队番号是九十一步兵师三六二

团，然后一下子从南方到了西北部的俄勒冈州。入伍后，首先进行基本训练。我视力不好，到练枪的时候，看不清靶心，但我学会了那些动作，怎么屏气，怎么举枪，怎么瞄准，怎么不紧张，然后根据上下左右距离，估计靶心位置，结果怎么着？全中，成了次等神枪手，胸前还挂了个牌牌。基本训练结束后，我们就进行演习。那是在冬天，天气非常冷，我们有几个礼拜睡在雪地里，就一个睡袋，吃饭是拿个小盆，站在外面吃。非常艰苦。有一天，突然通知我去师部。我以为自己犯了什么规，要受惩罚。我经常犯规。有时候，指挥是个十足的笨蛋，还得每句话都服从，我心里不服，就犯规。

结果是一件预料不到的事。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年，美国的空军海军和日本的空军海军对峙，美国人要传什么信息，都得先转成密码，收到后还要解密，很慢。而日本人根本不需要密码，直接说日语，方便得很。美国没有人懂日语——其实也有人懂，就是美生的日本人，但这些人一股脑儿都被弄到集中营去了。美国人没办法，艾森豪威尔就发起了一个语言培训计划，由一些大学给军队培训亚洲语言人才，后来也培训欧洲语言。凡是上过大学的兵，都要进行测验。测验的办法是这样，拿给你看一种虚拟的语言，词语都是虚构的，再告诉你一套虚构的语法，然后让你翻译，让你念，看你的语言天赋。我就是被叫去参加测试了。我的语言能力不错，测试后一个礼拜，就让我到斯坦福去上学了。嗨，我真是从冰天雪地里爬出来去的斯坦福，感觉上天了。这是在 1943 年春天，三四月份。

原计划是让我学日语。到斯坦福一看，日文系主任是个 FBI 的老教授，阴森森的，令人讨厌。而且我也不想学日语，学了日语，一旦美国占领日本，就得长期在日本服务，而我还要回家继续我们的革命

事业呢。我就动了换语言的念头。正好中文系（或许没有系，只是个部门）负责人陈受永（音，粤语发音是 Chan Shau Wing) 出了个新课本，价格是四美元，这在当时还算个钱，我去书店买了课本，去拜访作者，表示对日文没兴趣，想学中文。这个老教授人很好，他接受了我，后来他说我是他最好的学生。这样我就转学中文了。



1943 年，李敦白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

开课第一天，我就爱上了中文。它跟美国人所能想象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一样，根本是另外一套。现在研究解剖学的学者发现，看汉字的大脑中心和看字母的大脑中心不在同一个部位，看汉字是从形象到意思，不需要通过发音。我一下子被中文迷住了。学中文的方法我觉得很先进，着重讲话，锻炼对话的能力。老师主要是讲句子，语法基本不讲。Situational Education，情景教育。有一定词汇后，三四个学生一起练习，设置一定的场景，如甲是跳伞的美国军人，乙是农民，丙是村长，让他们即席演出，事先没什么设计，只分配角色，就这样锻炼你对话的能力。我们一天学二三十个字，然后组词，然后用这些词进行练习。譬如有一场练习是这样的：先学会牛、羊、山、草、上、下等字，然后组

词，牛羊、上山、下山、吃草，等等，然后就说：牛羊上山吃草，人上山不吃草。都是这老教授编的，我们觉得挺傻，但是有用。学中文当然有很多困难，如早和草，我听不出有什么区别。“吃”、“是”这些音怎么也发不出来，老念成“希、希”，西方人一般很难发出卷舌音。就慢慢练，慢慢练，硬练。

开始几周，老师教了我们一些汉字，既认又写，但很快取消，决定光教速成对话。用的是老拼音系统，即 Wade-Giles 拼音。所以，同学们一般既不会认也不会写汉字，有几个同学是华侨的孩子，本来就会一些汉字，但也不太多，除他们之外，只有我学了汉字，我请了旧金山的华侨青年帮我练，练练练练练练，越练越喜欢。

除了语文以外，还教地理。老师是位地理专家，是个干巴巴的人，有中国地理专著，教师中就他保守，反共，我们也不欢迎他。还教了人类学，讲中国、东南亚的人种和社会。中国的历史也讲，但很简单。还经常请一些了解中国的人来讲课，介绍中国的情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讲了两次。她是美共的秘密党员，这是个很聪明的人，她不讲不跟国民党好，她讲为什么美国要跟共产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说因为他们抗战最积极，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和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只能和苏联好，那样的话美国在战后就会处在不利地位。讲得非常策略。

我们中文班共三十个同学，同一个连队中还有学马来亚文的，学泰国文的，学日文的最多。我们的宿舍是普通的学生宿舍，但不和普通学生住一起，我们有连队的组织，单独上课。图书馆、校园活动当然和普通大学生在一起。

上课的内容比较自由，军方并不限制讲什么不讲什么，譬如我们

的参考书里面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节选，但并没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尽管这本书正在美国进行宣传。陈受永教授可以决定请谁来讲课。

斯坦福培训班的老师和学生，思想倾向比较偏左，大部分人喜欢共产党，不喜欢国民党。陈受永教授是个广东华裔，跛脚很厉害，是小时候摔坏的。他妈妈信佛，见儿子受伤，只烧香拜佛，并不带他看医生，落下残疾。他是主要的中文教授，教中文之外他还教莎士比亚。他的政治态度应该属于中间派，谁也不骂。有一次，国民党的人请他到旧金山参加翻译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周后，他就气冲冲地回来了，对我们说：他们要的不是翻译，是粉饰，是怎样让美国人接受，我不干了。他有个哥哥，在加利福尼亚的名校 Pomona College（波莫那学院）教书。他哥哥来给我们讲过课，讲中国历史，有个同学问他，你是赞成国民党还是赞成共产党。他说我无党无派，什么都不参加，但如果必须参加一个，我就参加共产党。问他为什么？他说共产党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而国民党已经把它抛弃。

我的同学里，只有三个人支持国民党，其余都对共产党有好感。我们都知道解放区村子里用黑豆白豆投票的故事，知道八路军里战士可以开民主会批评军官，知道他们官兵平等。这些主要是从斯诺和卡尔逊的书中读到的。当然也有别的消息来源。美国有个著名记者叫 Theodore White（白修德），他写过许多揭露国民党腐败的文章，批评蒋政府的裙带关系，登在美国大报大刊上，影响很大。我后来认识了白修德，我们回美国初期还曾得到他的帮助。

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1]是由共产党创办的，它不但召唤了众多华侨儿女回国抗战，对美国人也有影响。我正在学汉语，这份报纸就成了我的学习资料，他们免费给我寄送。我对两位作者的文章特别感兴趣，他们是徐大年和朱唐，真名叫徐永煐[2]和唐明照[3]。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当年的引路人，在五六十年代都和我发生了直接而紧密的工作关系。

总之，当时很多美国人都认为国民党不行，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国民党腐败透了，认为共产党抗战积极，讲民主，八路军在关心亚洲问题的人里面名声尤其响亮。

学了九个月之后，其他语言班都肄业了，唯独中文班延长了三个月。三十个人中刷掉了十个人，最后只剩二十人。我考了第一。

我们也肄业了。在学校时天天告诉我们，我们是急需的，迫切需要我们到中国去，为军队服务。但一年学完之后，就完了。第二天上

---

① 《美洲华侨日报》创刊于1940年7月8日，终刊于1989年7月29日，前后共49年，是美国存续时间最长的华文报纸之一。

② 徐永煐（1902—1968），江西龙南人。1925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斯坦福大学学习，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美共旧金山市委委员，美共中央中国局委员、书记。1946年回国。后任中央军委外事组编译处处长，天津市、上海市外事处副处长。1951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负责人、美澳司司长，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③ 唐明照（1910—1998），广东恩平人，193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委委员、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1933年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历史系研读西方近代史，转入美国共产党并相继担任美共加州大学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书记，1939年10月起任美共中国局书记，1940年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并任社长、总编辑。1941年参加美国政府纽约新闻处工作，任翻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联部副秘书长，是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火车，一下子被拉到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来接我们的上士在火车边上就宣布，把你们学过的什么中国话、日本话统统忘记，没这个事，现在你们就是当兵的。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学会了爬电线杆子，当通信兵，天天挂电线、修电线，搞野外用的电话总机，跟我们学了一年的中文根本不沾边。而且美国爬电线杆非常不合理。拿一条铁棍靠在小腿内侧，绑紧了，底下露出一寸长的钉子，爬杆的时候就弯起膝盖，把钉子插进木电杆，徒手爬，还不许用安全带。这样非常容易摔跤，钉子插的角度稍有不对，或者小腿没有傍紧电杆，就“哧溜”一下掉下来。每天都摔跤。这个爬电杆的办法，比国民党的还落后，他们脚上套一个带弯的金属，双脚交替往上爬，不容易摔跤。我们二十个人都觉得很冤，我学了中文，我是专家，干吗让我爬电线杆！我们的士官入伍前都是电信公司的专家，对士兵挺狠的，谁要是拒绝爬，就把他带到车库里头打。我手脚比较笨，很不容易学这东西，不断地摔。最后要考试，拿着架电线的横梁，爬到电杆顶上，固定好，接上电线，就算考过了。我好不容易才通过。二十个人里头有一个把两条腿都摔折了，送到医院，我去看他，准备慰问他。一看，虽然两条腿都打着厚厚的石膏，他却咧着嘴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完了，我可以退伍了。他很高兴不必再爬电线杆，他最后参加 OSS① 去重庆了，后来一直在 CIA 的研究部门工作，我直到四十年后才再见到他，那时他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个人神经出了问题，退伍了。最后十八个人通过考试，去中国了。

---

① 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略情报局），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旨在协调美国军队的敌后间谍活动，它是CIA即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前身。

为什么还能去中国呢？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来自旧金山，家庭有些背景。他到华盛顿找了美国军队的检察总长，告军队浪费我们这些语言人才，我们这才从爬电线杆的苦役中解放出来。1945 年 4 月，我们去了印度加尔各答，准备到中国去。到那儿后，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印度连小村子里都有共产党的办事处，五一节的时候挂着红旗，都是公开的。我们在美国南方参加共产党搞活动，都是秘密的，一看到公开的共产党，难免好奇。英国人不镇压印共，因为它支持战争。甘地、尼赫鲁那派则对战争态度消极，他们在争独立。

对印度的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贫穷。后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也非常穷，但还不如印度严重。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在地里干活，瘦得呀，真正的皮包骨头，胳膊上的皮一拉就可以拉很长，可他还在干活，背沉重的东西。还有一个印象是英国人的蛮横。我曾经和一个英国士兵一起坐火车，一个印度人站在车厢门口对外张望，那个英国兵走过去，一脚就把他踢了下去。没有人说话。

但是，对印度最难忘的感受，是老百姓的友善，勤恳，以及民间文艺的极端丰富。这种文化遗产，普遍地活在人民的心中，无论是歌曲、戏曲，还是舞蹈、说书，许多人都会一些，而且特别愿意听民间艺人的演唱表演。我们驻地附近的农村，有回教村，有印度教村，而各村老百姓之间，看不出什么大隔阂，彼此都很友好。只有当一些民族主义政客挑拨时，才出现摩擦和冲突。

我们在印度呆了五个多月，就是吃饭，玩，没什么事干，天天吵着去中国。在印度实在无聊，暑热和水土不服又让我们接二连三地生病。但上级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这一等，就等到了日本投降。

第二部分 | 中国经历

1945年8月初，我们进入戒备状态，打起背包，戴上钢盔，也发了枪，准备到中国去。一天，我们终于上了军用运输机。有位上士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降落伞包，让我们交一块钱押金给他。他说：不用担心，如果到时伞没有打开，我会把一块钱退给你们。我们坐在飞机上等了几个钟头，突然又打开门让我们下来了。原来日本投降了。

我们原来的任务，是到雷州半岛修建军用机场，那里有个老堡垒，需要在附近修个机场，供美军飞机起降。日本投降，当然不必再修机场了。

我这个二战老兵虽然没有打过一天仗，但终于还是来到了中国，那是1945年9月15日，我们坐飞机飞越驼峰，来到了昆明。战争结束，美国兵开始退伍，许多人急着回家，而我们的服役期还没满，就让我们来中国顶替一部分老兵。过驼峰是非常危险的飞行，二战中有许多美国飞机坠毁在喜马拉雅山的深谷中。我们也遇到了惊险。起飞不久，我就发现左边的螺旋桨停止转动了，这时刚好有个人从驾驶舱走出来要到机尾上厕所，我指了指外面，问他怎么回事。他看了一眼，说声嗯，就继续去他的厕所，过了一会，螺旋桨重新转动起来。在我们飞到驼峰之前，又出了一档事：一股冒着烟的浓稠的液体缓缓地从驾驶舱流出来，那个人刚好从厕所回来，我们指了指地上，他

说：噢，没事，电池。不知为什么电池会冒出这么多水来。看来他是见怪不怪了。我们是深夜飞越驼峰的，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也许是因为太紧张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飞到了昆明上空，也许是刚刚经历过危险的飞行吧，那层层梯田覆盖的红土盆地是多么的美丽，那依傍着一个大湖的昆明城是多么的亲切，让人终生难忘。

当时我的同学们最强烈的感觉是：用中文的机会终于来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在中国一呆三十五年，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中国。

一、木仙之死

李木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昆明小姑娘，她的生命在我来到中国之前的几个月，就永远定格在了十二岁。她死在一辆由一个醉酒的美国大兵驾驶的大卡车的车轮下。她自然不会知道，她的命运会对另外一个美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我的头脑中，木仙是面目模糊的，但她又可能是每一个头发枯黄、身材细瘦、看上去最多八九岁的中国小姑娘。每当我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木仙，还有那个挨打的美国黑人青年，总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与那些我认为能够给他们公平正义的人站在一起。

我们仍属于通信兵编制，但在中国，美国兵根本不用爬电杆、拉电线，这些事情统统由中国人做，美国兵实际上常常无所事事。我们就到外面到处找人说话，练口语。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个五六岁的可爱男孩，就与他谈了起来。我问他，中国话的四声怎么区别，譬

如说买和卖，发音完全相同，就是音调不同，结果意思相反。小男孩云南口音很重，他不知道什么叫“四声”，偏着小脑袋，反复说“买—卖，买—卖”，然后说，“好像是有点像噢”。他的语言是“天成”，不会注意这些差别，也不会弄错，与我们作为“外语”感觉完全不同。小男孩邀请我去他们家，因此认识了他的父亲李志。李志对我非常热情，他自我介绍是云南省的一个特务队长。一听这话，我马上离开他家，但他一直纠缠我，后来成为甩都甩不掉的大麻烦。与昆明中共地下党接上头后，有一次我带地下党的李国华去听戏，我开着吉普车，李志在背后拼命叫，拼命追，因是上坡，车的动力又小，差点闯祸。几年后我在监牢里读报纸，还在肃反被镇压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

我们通信兵住的是美军第八招待所，在一个名叫黑土乡的小村子里，另外还有空军和其他部队，一共有十二个招待所。我不清楚昆明有多少美国驻军，他们闯的祸可着实不少。我们到达不久，我和另外一两个中文比较好的同学就被抽调到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这个部门共有五六位同事。

美军闯祸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刚到中国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两个美国兵从军医院的精神病房跑出去，跑到一片农田，看到一个老太太正赶着水牛干活，这两个家伙就想抢水牛过来玩，老太太不让，结果被打死了。这件事民愤极大，当地的中国报纸也报道了。这两个美国兵上了军事法庭，被判了十几年徒刑。他们回到美国后，其家乡马里兰州的一个参议员泰鼎斯（Millard Tydings）提出反对，说，就因为一个中国农妇，把两个好端端的美国兵判了重刑，这不行。结果把这两人给放了，真是极端不合理。

我们的部门不管刑事案件，我们只负责民事赔偿。许多案件都是

汽车惹的祸。这些美国兵开着卡车在昆明的小街小巷横冲直撞，而且司机常常是喝醉了酒的。昆明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车，那里的马身材比较小，跟毛驴差不多，后面拉一个胶轮车，一个避让不及，不是马被撞，就是车被压，案件很多。老百姓通过地方官员到军法处投诉，要求赔偿，我们就要出去调查落实。就这样，我碰上了李瑞山投诉的案件。

李瑞山是个贫穷的人力车夫，木仙是他唯一的女儿，她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撞死在一辆疯狂的美国军车的车轮下，开车人是一个空军上士，喝得烂醉，想吓唬小姑娘取乐。我们受理了这个案件，我开车到现场核实。木仙的家一贫如洗，她妈妈痛不欲生，已经精神崩溃，不久就去世了，她的父亲神情木讷，愁苦写在脸上。我提交了报告，负责赔偿的上校判了二十六美元的赔偿。我气坏了，强烈抗议。上校拿出赔偿条例，说，他的判决有充分依据，似乎这二十六块钱里面还包含他的人道在内。他说，赔偿的依据是被撞人的赚钱能力和丧葬费用，李木仙是个小孩，不会赚钱，她的死不会给家庭收入造成影响，而一个小杉木棺材值不了多少钱。我说，我前不久处理的一个马匹被撞案，赔偿金额也比这高得多。上校说，马匹有市场价格，我们当然得按市价赔偿。这是什么道理？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人根本就不是人！我肺都气炸了！我的中国同事周彤芬（不久前才在美国去世，他的父亲名叫周震云，是昆明一家法国医院的有名大夫）气得拿起一本大书猛地摔到地上，强烈抗议。

抗议也没有用，我拿着二十六美元，再次到了木仙的家。让我更震惊的是木仙父亲的态度。我把钱给他，跟他说很对不起，只有这么点钱，我也无能为力。他接过钱，一声不吭，脸色平静，好像这一切

都是天经地义的，好像他生来就该吃苦受罪。他的沉默和麻木深深地刺痛了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我吃惊和欲哭无泪。

我送钱给他的当天下午，李瑞山跋涉几里路（或许是十几里或几十里，我们的军营在郊区），通过层层岗哨，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把一个自己糊的信封放到我的面前，里面是六美元。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因为我帮助了他，这些钱表示他的感谢。我的心难受得抽搐，胸闷得无法呼吸。无疑，我也在无意中成了他的压迫者中间的一员，而且被他平静地认可和接受了。我知道他的案件是通过甲长、保长层层上报的，便问他是不是也给甲长保长送了钱，他说是的。我把钱还给他，他接过，仍然一脸平静地走了。后来我在监牢里常对自己说：不要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功劳之一，就是解除了这些老百姓的宿命论，使他们起来为掌握自己命运而奋斗。为了像李瑞山、李木仙这样的人，我受冤屈没关系，只要整个事业是正义的，只要能帮到这些可怜而麻木的人，个人的牺牲不算什么。

二、上海印象

到昆明两个月之后，我就接到了退伍的命令，我的服役期已满。那时我已经和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头，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国华曾告诉我，毛主席正在学英文，他没有好的英文老师，建议我到延安去教毛主席学英语。昆明地下党中有些人在延安呆过，向我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如男女平等、幼儿园、周末舞会，等等，我很向往这片新天地。而且我想，我所尊敬的一些美国作家，像斯诺、卡尔逊上校、安

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他们都到过陕北，与中共领袖有过亲密接触，看来去延安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不愿意离开。我找到负责本部门工作的上校，对他说：很多人都急着走，而我愿意留下来继续服务，我的中文技能看来也派得上用场。他回答：嗨，命令就是命令。我不甘心。那天晚上路过司令部，见还亮着灯，就闯了进去，向司令官亨利·欧雷德将军（General Henry Aurand）介绍了自己，表示愿意在中国再服务一段时间。他说：你把命令撕了，而且任何别的命令都不用理会，除了把你调到上海陆军总部的命令。真棒！

欧雷德将军是个很不错的人。我到昆明不久，杜聿明的第五军和龙云的部队打起来了，[①]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开打。欧雷德将军的儿子是他的副官，小欧雷德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两条：第一，我们认为，美孚石油公司的利益不值得一滴美国军人的血；第二，你们开车出去，如果有人抢你们的车，不管是哪一边的，你一句话不要说，乖乖把车交给他，人回来就行。小欧雷德后来成了美国在越南的陆军最高指挥官，也升为将军。

为什么又会牵连美孚石油公司呢？许多美国人认为打仗是为了大资本家的利益（美孚公司是其代表），而他们不值得军人的牺牲。我当兵第一天，刚开始基本训练，带我们的上士就说：我们努力想做到两条，第一，战争是安全的，第二，战争是赚钱的，可惜我们只做到

---

① 1945年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免去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此事经过长期谋划，因担心云龙抗命，蒋介石事先部署了“军事解决”方案，由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负责执行。政府命令下达之后，杜按计而行，一方面将国民政府命令送交云龙，一方面出动军队，控制昆明各要地。在部队行动过程中，与未得龙云换防命令的龙部发生冲突，致有死伤，伤者包括三名美军。但龙部很快被制服，武装冲突规模不大。

了第二条。他是讽刺。

再说我自己。跟欧雷德将军谈话不久，我就被调到了上海陆军总部，还是做赔偿损失的工作。但上海负责这项事务的上校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开明，同情受害者，赔偿尽量合理。工作是一样的，因为有个好官，气氛就不一样了。我原来的同事都退伍回美国了，上海的赔偿工作，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上士，他是个摩门教徒，为人很好，很同情人，后来我们回到美国还有联系。要说美军的军纪，则跟昆明没有什么不同，很差，或者说根本没有军纪。举一个例子，我住的大房间，有四十套上下铺，住八十个人，每天晚上，除了我这张床就我一个人睡，其他人都带妓女回来住宿，很不像话。军官不但不管，反而喜欢他们这样，这些兵喝酒，玩女人，胡闹，就不会苦恼，减少生病，也好管理。军队免费提供避孕设施，还经常放电影、讲课，以防他们染上性病。由于战乱和饥荒，上海到处是妓女。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不把中国人当人，美国大兵有一个专门的词称呼中国人，叫 slopy，它的原意是倾斜，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词，总之是贬称。

到上海，我发现有两个情况与昆明不同。一是上海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死尸，行人都绕着走，没人管。有一次我问警察，为什么人们都不管这事，他说，谁要是动了，就得负责埋葬，这年头生活这么难，谁愿意多管闲事呢。另一件事是上海的富人很厉害，或许昆明也一样，但我没有见过。我亲眼看到这么一件事：有一个衣着考究的富人，招呼一个相当年老的人力车夫拉他，车夫解释，他已经很累了，要回家休息，他二话不说，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老头痛得在地上打滚，同样没有人管。另外，昆明妓女、吉普车女郎也很多，但上海更让我震惊，一个外国兵在南京路上行走，几乎走不过去，一路都是拉

客妓女和男的皮条客。

上海让人苦闷极了，但我通过李国华的介绍信，找到了徐迈进[①]，通过他，又见到了廖梦醒、宋庆龄、陶行知等人，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喜欢逛书店。说起书店，我的中文名字“李敦白”就是昆明一家开明书店的老板给我起的。我的中文名字原来是“李登堡”，是我那个姓的标准中译，开明老板说这名字不好，一看就是个外国人，不如在“李白”的中间加个“敦”，意为厚道，意思好，而且是个地道的中国名字。我真得谢谢这位我至今不知其名的先生，他让我拥有一个人人称赞的好名字。在上海的开明书店，我和一个正直敢言的店员小伙子交了朋友，我对徐迈进说，这个人可能是共产党。徐提醒我小心，他说，上海的情况很复杂，任何讲话“左倾”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相反，讲话反动的人倒可能是共产党。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些工人摇着小旗到市政府请愿，徐迈进说，这些是黄色工会的人，不过，上海所有的工会，包括黄色工会，背后都是共产党领导，因为别人不会这么卖力气。

徐迈进托我办过一些事。最危险的一次，是托我买一台大功率的收音机，这是违禁品。我们在公共汽车上交接，我把包好的收音机放

---

① 徐迈进(1907—1987)，江苏省吴县人，192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共青团和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7月被捕，1933年秋释放。1934年，奉命到上海《立报》社担任本市新闻版编辑，1937年10月，在南京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此后，他辗转于武汉、重庆等地，一直从事新闻文化工作。后赴延安，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新华通讯社总社社委，中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委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办公厅主任兼国家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新闻广播处处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党委副书记、文化部顾问等职务。

李敦白先生见到徐迈进时，徐的公开身份应是《立报》编辑；他到延安的时间比李稍后。无论在延安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北京，他们都是同事。

在座位上，他上车后坐在收音机的另一边，下一站抱着下车，我仍留在车上。车开动后，我看到一个警察走近徐迈进，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觉得这下完了。回到住处不久，接到徐迈进的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警察向他借火。虚惊一场。我在军人福利社给夏衍买过许多次香烟，他喜欢的骆驼牌，一条一条地送，但我没见过他，是徐迈进托我买的。解放后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我还开玩笑说他欠我好多骆驼。文学方面，我没有读过鲁迅的书——不过给他儿子买过无线电爱好者手册，也是徐迈进托我的——读了茅盾的《子夜》、《腐蚀》和一些短篇小说，特别喜欢。"第三条道路"的著名人物，跟章伯钧谈过一次；没见过罗隆基但特别佩服他，觉得他特别会造词造句，像形容国共关系的"谈不下就打，打不下就谈"，很传神。

三、宣化店"告密"

我是1945年11月调到上海的，只过了差不多三个月，我又一次面临退伍回国。这一次，如果我想留在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当地找到合法的工作，这样的话，军方将准许我就地退伍。宋庆龄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①]卫生部的副主任撒克斯（Dr.Mike Sachs）写信介

---

①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英文简称UNRRA，中文简称"联总"）创立于1943年，发起人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其名称内之"联合国"并非后来在旧金山组成的联合国组织，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这一福利机构旨在战后统筹重建在战争中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其中，受害最严重的中国成为最主要被帮助国家，而施予帮助者则为美国、英国及加拿大。

绍我的情况，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工作。这是位相当不错的左派人士，后来曾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他给我安排了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职位。

我的工作是监督联合国提供的救济物资（主要是粮食）的分发工作，及时发现并向总部报告其中的贪污腐败和不公行为。担任这个职位后的第一次出差，是到湖南分发救济物资。这一趟行程中，中国农村的贫穷，灾民的悲惨绝望，国民党中下级官员与地方势力相互勾结中饱舞弊、欺压灾民的黑暗，触目惊心。从湖南回来不到一个月，我接到了新的任命，这一次，是到共产党李先念部驻扎的湖北省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担任救济总署的驻地代表。

我于 1946 年 4 月初到达宣化店，[①]5 月底离开，没有想到，我在无意中进入了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漩涡中心，而且做了一点揭发美国政府代表阴谋的事，对中共有一点帮助，这既是我后来被接受的重要原因，也让我一生引以为自豪。

进宣化店之前，我先到汉口接头。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②]湖北分署的署长是周苍柏[③]，就是著名歌唱家周小燕的父亲，副署长是杨

---

① 李敦白先生回忆，到宣化店当天，适逢当地举行“四八烈士”追悼会。1946年4月8日，在重庆参加政协活动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新四军前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邓发，教育家黄齐生等人，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称为 “四八烈士”。“四八烈士”遗体于4月18日运回延安，延安、重庆和中原解放区举行追悼会的时间均为19日。

② 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英文缩写为CNRRA）成立于1945年1月，代表政府作为联总的对应机构，负责接受和分配联总提供的救济物资。行总的总部初在重庆，后迁南京，在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设立有15个分署。

③ 周苍柏（1888—1970），湖北武昌人。1917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经济系，曾任汉口上海银行经理，湖北省银行总经理，重庆华中化工厂、汉中制革厂董事长。1945年后，任行总湖北分署署长。解放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显东[1]，他在解放后担任过农业部副部长，后来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在他们的领导下，湖北分署严格执行联合国提出的战后救济"不分政治、不分地域、不分宗教"，"只要有难，就要帮助"的原则，冲破阻力，曾向中原解放区运送了奶粉、罐头、服装等物资，部分缓解了李先念部的困难，但据我所知，由我押运的面粉是进入中原解放区的第一批粮食。

联合国救济总署原来有一位代表驻宣化店，我在汉口见到了这位同事。这是位年轻的法国人，刚结婚，他的太太也在那儿。他充满感情地对我说，新四军真好，对老百姓好，没有贪污，接着叹了口气，说：可是这些人很可怕。我问为什么呢？他说，我怕待的时间长了，他们会说服我参加共产党，而我没有办法拒绝。他告诉我，中原解放区负责救济的部门有个代表住在汉口，叫庄果[2]。我就去找了他。这是个小个子，留小胡子，不爱讲话，很严肃，孤零零地住在一个旅馆

---

① 杨显东（1902—1998），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棉花专家、农学家、农业行政管理专家、社会活动家。1923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主攻棉花和蚕桑专业，1934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同年离美，途经苏联考察后回国。1945年10月，杨显东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副署长、代署长，他与中国共产党派驻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董必武合作，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制定的"救济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政治党派，只要有困难，应一视同仁，给予救济"的原则，对中原解放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建国后先后担任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荣誉委员等职。

② 庄果（1912—2000），福建省福州市人，1942年9月至1946年2月任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总行副行长;1946年2月至6月任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原解放区分会秘书。解放后先后担任湖北省人民银行行长，湖北省财委副主任，湖北省计委副主任、主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等职。据时任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原解放区分会驻武汉代表的李实回忆，庄果当时的职务为翻译，他们所住的小饭店名为红绿饭店。（李实：《粮食》，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中原突围》（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51页。）

里。他给我开了去宣化店的介绍信。

一到宣化店，我感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好像来到另一个中国，这里的人的精神面貌，与昆明和上海完全不同，他们相互之间的亲切，他们严肃认真的举动中体现了出来的庄严感，让我起敬，也让我有一种回家般的舒适感觉。当时中原解放区被国民党大军包围，吃的东西很困难，战士每天喝两顿粥，而且很稀薄，称为“月亮粥”。他们给我一个勤务员，称“小鬼”，小鬼每天钓鱼给我吃。我去定远店视察、分配救济物资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小鬼一宿未睡，做烙饼作为我们路上的干粮，天一亮就跟我出发，毫无怨言。这在解放区是普遍的，不是特例。老百姓在路边看到新四军，都是很羡慕的神色，完全不怕，不像国统区民众见到官和当兵的都很害怕，站到一边，躬着身，令人压抑。这种感觉不是我所独有，同时到过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都有类似体会。后来我到张家口，第一天就碰到一个姓麦当劳的美国上校，他是美军联络处的负责人，他跟我讲这些人多好多好，跟南京完全不同，没有贪污，关心老百姓，尽力帮助他们生产。停了一会，他说：可是我们还是得消灭他们。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他们掌权了，会跟苏联结合在一起，反过来打我们。

我在宣化店如鱼得水，救济物资的分配公平合理，中原解放区的领导李先念、王震等人朴实亲切，我跟李师长和王震将军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经常出入他们的司令部，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与王震将军尤其性情相投。这是个直率威猛的军人，真诚热情，重视友谊。

但我也能感觉到，战争的阴云正在向宣化店的上空聚拢，军事冲突的消息时有所闻。5 月初，我听到一个消息，周恩来副主席将与

马歇尔将军的代表、北平军调部[1]执行处处长白鲁德将军（General Henry Byroade）以及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将军一起到宣化店视察。

周副主席，这个昆明和上海地下党口中神一般的人物，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会给宣化店和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呢？我充满期待。

5月8日，听说他们终于要到达了，宣化店的人们做好了欢迎的准备，神色紧张而兴奋，聚集在村口迎候三方视察小组成员以及随行的庞大记者团。我同样兴奋难耐，然而不巧的是，他们到达的时候，我却在一个茅厕里。

我刚要从厕所出来，一个佩戴准将军衔的美国人走了进来。我们都怔了一下，我问道，你一定是白鲁德将军吧？突然在一个中国共产党占领区的简陋茅厕里迎面碰上一个美国人，可以想象他的惊奇。他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作了自我介绍，并给他看了我的工作证，随后表示，我正感到为难，我带着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到这里，但看起来这里像要打仗，我是应该离开呢，还是运送更多的物资进来？很显然，这些被围困的人很需要粮食和其他物资。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告诉你吧，我刚从满洲（东北）回来。在那儿，共产党占了

---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中国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局势，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10月底派已经退休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军事调停，并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由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为避免军事冲突，在军事三人小组的领导下，随即在北平着手筹备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设委员三人，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各派一人组成，美方委员饶伯逊，共产党委员叶剑英，国民党委员郑介民，由美方委员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12月初，军调部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协和医院，下设三十八个执行小组。这些小组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以后，马歇尔宣布调停失败，军事三人小组随即解散。

压倒的优势，国军对他们没有办法。但在这个地方，国军占了优势，我们准备让他们消灭共军。

我非常吃惊。我大概知道中原解放区面临的局面，李先念部大约有六万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家属、学生、伤病员等非战斗人员，包围他们的国民党军队却有三十多万人。共产党方面对国民党围歼中原部队的图谋时有揭露，中原冲突也引起军调小组的高度关注，三位重要人物和记者团的到来就是明证。我原来以为，军事调处能够解决问题，现在看来，这恐怕是一种幻想，更可怕的是，中原局的领导人中间恐怕也有人相信军事调处能够收到实效。

我得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李师长，但难以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于这一天的具体经过和细节，时隔近七十年，我已经有些模糊了。我记得，当天晚上，在一个漆黑的祠堂里举行了由三方代表和一些干部参加的会议，我也在场，陪我坐在一起的是新四军派给我的翻译骆叔平（音）[①]，他曾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作过。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发出昏暗光亮的豆油灯。李先念最先发言，他列举了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的种种事实，然后是王天鸣发言，他说新四军是我们的兄弟部队，政府方面绝对没有围歼共产党中原部队的意图，周恩来马上抓住他的话，说我们欢迎王将军的发言，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见证。

散会之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碰到李师长提着灯笼送周恩来回住处，他把我介绍给周，我们交谈了几句。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三人视察组离开后，我才到师部将白鲁德将军的话告诉了李先念。他当时没

① 中原突围时，第三十二调停小组共方翻译名叫“罗叔平”，应该就是李敦白先生说的“骆叔平”。但李先生肯定地说这位翻译姓“骆”，因为他第一次知道有这个姓氏，印象深刻。

说什么，但几个月后我们都到了延安，他对我说，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情况，虽然我们对国民党的意图已有防备，但有的同志，如中原局的代理书记郑位三，对美国抱有幻想，认为美国人不会让国民党发动内战，我的“告密”不但让他们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增加了一点底气，而且有利于说服自己的同志，取得一致。①

---

① 李敦白先生对1946年5月8日宣化店军事调处活动细节的回忆，与其他史料有所出入。第一，关于三人视察组在宣化店的日程。据李先生回忆，三人小组黄昏时到达，当天晚上开三方会议；而《李先念传》、《周恩来传》以及关于中原突围的几种著作中的记述均为上午11时或12时许到达，下午举行会议，晚上举行文艺晚会，第二天早晨李先念、王震召开记者招待会，随后送行。第二，关于李敦白先生的“告密”时间。李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发生在8号晚上路遇周李返回住处时，这次访谈时，经反复回忆，认为应该是第二天周恩来等人离开之后，在李的司令部报告。《李先念传》则说发生在下午的会议之后、晚上的文艺演出之前，并说李敦白的“告密”，是他在群众大会上致词“简明透彻、击中要害”的“天机”。第三，关于当晚会议的性质和地点。李敦白先生回忆是谈判会议，地点在一个祠堂，好像叫“曹家祠堂”，其他资料说晚上的会议是“文艺演出”或“欢迎会”，地点在中原军区礼堂，这是一座清末民初就有的房子，原为一个商户的住宅，两层楼，东西各四间房，中间有天井，二层主要用来住人，开会在一层，大约可容纳一百人左右。这座房子并不黑暗沉闷。

或许双方的记忆各有正误。如关于地点，李敦白先生虽然对阴森的室内环境和昏黄的油灯记忆深刻，但显然《李先念传》等记述的资料更为可靠，目前该处为宣化店纪念馆的组成部分。也许在一个美国人的眼中，即使是当地较好的建筑，仍然是昏暗陈旧的，这并不奇怪。周恩来等到达的时间，当时媒体有明确记载，《新华日报》据“汉口八日电”，报道“周、白、王三氏，始于今午十一时抵宣化店，所有随员记者仍在（黄陂）姚家集候车待运”（原载1946年5月9日《新华日报》，转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原突围前后》，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页。）但李先念的记忆同样有不可靠的地方，他说李敦白是“随团记者”，作为在宣化店活动了近两个月之久并时常相处的美国人，这样的记忆误差显然比较醒目。还有些记忆误差的情形，现在难以判定哪方更正确，如李先念说，在李敦白到宣化店之前，他们在汉口见过面，而且举出了介绍他们认识的人——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署长周苍柏老先生，还说一起听过周小燕唱歌，而李敦白说在宣化店“四八烈士”追悼会上第一次见到李先念，他也提供了细节：在追悼会过程中，他心里一直在猜测台上的人哪一个是李师长，结果自己以为最不可能的那个人却是李先念。

尽管有这些记忆的分叉，李敦白向李先念“告密”一事确凿无疑。据《李先念传》，

对于这件事，我想特别声明我的观点。有些自以为爱国的美国人，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美国的“背叛”。这完全是不了解美国人民真正的优良传统。按照这种传统，不是简单地说，“不管国家做得对不对，我都得跟着拥护”；而是说，“我应该尽力使我的国家做得对”。我认为，我当时竭力支持中国人民来推翻最腐败反动的制度，正是美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所要求的，而背叛这种传统的，正是企图支撑中国黑暗统治的少数美国人。

他在当天晚上文艺演出前的讲话之所以引起听众的强烈反响，“除了他自身的非凡胆略和革命气魄外，还有一个不可泄漏的‘天机’就是当时随团来宣化店采访的记者中，有一位名叫李敦白的美国记者利用其特殊身份，从美方代表白鲁德那里弄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准确情报。会前，李敦白将国民党决意歼灭中原部队的机密告诉了李先念。”直到晚年，李先念对此事仍印象深刻，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宣化店谈判时，李敦白作为随团记者来到宣化店。他听到美方代表白鲁德说，华北动手一时比较困难，但中原这五六万人，非收拾掉不可。李敦白把这个消息和阴谋告诉我，我当时就更加清醒了。”（李先念回忆的相关内容，见《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第十五章“宣化店谈判”小节，第569—582页。）

对于“告密”事件产生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第一，共产党固然对中原解放区面临的局面和发展的方向有充分了解和正确预判，公开发表过大量报道、呼吁、声明、谴责，而且已经决定了“立足于打”的应对方针，但李敦白的情报让他们直接获知了对方的企图，白鲁德的态度又表明美方无意阻止国民党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意图，这与根据外在表象作出研判当然不同，所以李先念在谈判和发言中能“有的放矢”、“击中要害”。第二，李敦白提供的内部情报打消了一些人对和平谈判的幻想，有利于达成一致意见，这对不久之后的中原突围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网上流传甚广的胡志伟先生对抗战名将孙元良的访问中，孙将军谈到国民党在大陆失利的原因时，根据《李先念传》的上述描写作出以下判断：“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谍、美国人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机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所指事实和推演是不能成立的。李敦白为前美共党员，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不是“共谍”；他并未“窃取”什么情报，获得的只是美方人员无意间露出的事实，难称“机密情报”；他也不可能起那么大的作用。

周恩来他们走后，派了一个驻地的和谈小组[1]到宣化店来。美方代表是何柱坚上校（Colonel Hodgkins），他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个董事。何柱坚上校当过马歇尔的副官，这是个比较正派的人，做事认真，但对中国没有多少经验。他在宣化店住一个院子，他入住后的第一件事，是让给他开车的上士把五十加仑备用汽油搬到他住的房间里。我故意问他：你睡觉时喜欢闻着汽油味啊？他说，哎，你不知道，我们在南京，如果不看牢，什么东西都会被偷走。我说，这样好了，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丢了一个东西，我给你赔两个。他将信将疑，但还是把汽油放院子里了。这个地方不可能丢东西，你想扔东西，人家还可能追着送回来。说到这儿我讲几件相关的事。我在昆明的时候，有一天到红十字会招待士兵的娱乐中心玩，上完厕所洗手时把手表摘下来放旁边，转身擦手，转回身来手表已经不翼而飞了，那还是一个美国人经营的场所。在解放区的经验则相反。后来我在张家口碰到一位美军联络处的麦当劳上校，他说他有一次去看戏，把照相机拉下了，回到旅馆才想起，心想：算了，丢就丢了，别想了。正在这时，有人敲门，把他的相机送回来了。偷窃的事情，在解放后“文革”前的北京也很少见。有个美国人来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临走时把一双皮鞋扔了，随后去东北，他在那儿一住下，就有人把他扔掉的皮鞋送来了，说你在北京落了东西了。他想扔还扔不掉，社会风气完全不同。宣化店有个小银行，钱就堆在桌上，也没有任何警卫，但从来没有抢钱的事。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

① 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亦称光山小组）是第九执行小组的附属小组，常驻光山、宣化店一带监督停战，三方代表分别为：共方任士舜中校，国方陈谦上校，美方何柱坚上校（后有变动）。这个小组直到中原部队突围后才离开。

上海市的一位副市长刘振远对我们说，上海现在很现代化了，都有抢银行的了。

解放前，我到共产党掌权的地方，无论是宣化店，还是后来的张家口和延安，都觉得到了天堂，起码是“另一个中国”。不过，我在宣化店也看到了负面的事情，印象特别坏的一件事，是刘子久的婚礼。刘是中原局委员，当地的领导人之一，年纪很大了，看上去五十多岁吧，很干瘪。有一天，小鬼说李师长让我到司令部参加刘子久的婚礼。就在婚礼开始前大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的时候，新娘把我拉到一边，哭着向我诉说，说她是被强迫的，党组织说为了照顾老首长的生活，让她嫁给他，但她很不愿意，好像是让我帮助她，但我不好插手。新娘是女学生模样，二十岁上下，长得很漂亮。对这件事，我很反感，怎么可以牺牲一个青年，强迫她结婚。

何柱坚上校是个认真的军人，我想他确实想执行停战协议。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陈谦上校，原来是汉口的公安局长。他第一次见我，就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高度的统一，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而共产党与苏联勾结，想分裂中国。我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震。

结果，第一次谈判就不欢而散。何柱坚上校不会讲中文，他也未带翻译到宣化店，而国共双方各有翻译，所以，在正式谈判前，先为翻译的事情吵起来了。王震的翻译就是骆叔平，陈谦的翻译是一个油腔滑调的小军官。陈谦不接受骆叔平，说他不是翻译，是共产党的特务，王震也不接受那个小官儿，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双方吵吵嚷嚷。何柱坚上校只好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能为翻译的事情吵上一整天，碰巧我们有个中立者在这里，他是联合国的职员，是个美国人，

会讲中文，就让他做我们三方的翻译好了。我就这样作为大家接受的翻译坐到了谈判桌边，在三位代表和两位被罢职的翻译的注视下开始战战兢兢地为他们翻译，但我的任务并没有持续多久，便跟另外两个翻译一样“失业”了。何柱坚上校先发言，说和谈小组接到了许多违反停战协定的投诉，他的任务是保证周围地区的安定，所以将对这些投诉展开逐项调查，分清责任，做出处理。陈谦上校接着发言，表示政府对破坏和平的行为保持极度的克制和耐心，而新四军不断进攻。他讲得很具体，列举新四军某个部队在什么时候攻击了什么地方，占领了什么山头。他还没讲完，王震就猛拍桌子，说再也不能忍受国民党代表的无耻“谰言”。[①]我听不懂这个词，尴尬地问王震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就翻译成“胡说”好了。说完这句话，他把桌子一掀就走了。

会后，跟陈谦来的一个姓毛的参谋对我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头脑发热的人，共产党像王震，国民党像陈诚，这样的人都不适合谈判。这个毛参谋给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头脑冷静，处事公平，方法灵活。后来有一次我开车带宣化店医院的女大夫栗秀真[②]，新四军驻汉口的代表庄果以及毛参谋到汉口，回来经过国民党封锁线的时候，哨兵想把栗、庄两人扣下，不让回宣化店。毛参谋下车向指挥官敬礼，客客气气地说服他放这些人回去。

---

① 我的同事胡永恒先生认为，以王震的个性和当时的场景推论，“谰言”很可能是湖南话“卵话”，意为胡说、扯淡。

② 栗秀真（1915—2011），河南泌阳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应城县抗日游击司令部军医院院长，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纵队野战医院院长，新四军第五师卫生部部长，中原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卫生防疫司副司长、妇幼卫生司司长，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顾问等职务。

后来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换成任士舜中校[①]，调停工作得以继续。任年纪不大，头脑冷静，善于谈判。

不久刘家河口发生枪战，调停小组就到了现场。关于这次调停的情况，我是听骆叔平回来讲的。多年以后，张体学本人也向我提到过这件事。骆很激动，详细描述了谈判的戏剧性场面。参加谈判的除国、共、美三方代表外，还有冲突双方的代表，新四军方面是鄂东独立二旅政委张体学，国民党方面是一个团长。谈判开始后，一言不合，张体学（在先）和那个团长（回敬）都拿起桌上的茶壶砸对方，但都没有砸到，随后拂袖而去，把三位调停人员晾在那儿。后来我跟张体学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他和对方都愿意谈，但不愿美国人在场，认为中国人的事应该自己解决，所以事先设了这个计。他们砸完茶壶，出去单独谈。

张体学还说，他跟对方讲，你是川军的，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你在这儿卖命，如果输了，就被我们消灭，如果赢了，蒋介石会升你的职，把你调到东北，那里我们的力量强，你只好当俘虏，不如我们谁也别犯谁。后来张体学在完成中原大部队突围的掩护任务之后率部撤离，跟对方约好，他在前面跑，对方在后面追，晚上宿营时相隔一个山头，就这样跑了一个多月，后来张体学被自己的一个参谋出卖，他

① 任士舜(1915—1978)，湖北黄陂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离开上海赴延安，不久，被派到东北军张学良部工作，1938年回黄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初，李先念、陈少敏率部挺进（黄）陂孝（感）北，以“宪政促进会”的名义，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成立黄陂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任士舜任中共黄陂县工委书记。1941年3月，重组中共黄陂县委，任士舜任县委书记。1946年，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原解放区，任以军调代表的身份参加宣化店谈判，后随突围大军奔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孝感专署专员、中共丹江市委副书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党委书记。

的队伍被打散，损失惨重。[①]张体学带领残部突出重围，坚持在大别山区打游击战。几个月后，张化装成商人，一路艰辛跋涉，于腊月初十秘密到达南京中共办事处，经董必武周密安排，从上海到北平，转赴延安。

我多次要求留在宣化店帮助谈判工作，跟部队一起突围，但始终未被接受，只好回到上海。我是5月底离开宣化店的，离开前，已经明显感到李师长他们在做撤离的准备。

做了一段时间的联合国救济总署视察员之后，我觉得很苦闷。国民党统治区的事情太黑，又找不到去解放区工作的办法，除此之外，我所担任的职位也让我感觉不妙。去湖南出差那次，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个视察员，一个刚从美国海军退役，原来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工作，很年轻，另一个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OSS有关系，为人阴沉。这两个人只对一件事感兴趣：买卖金条。由于交通阻隔，当时各地金价差别很大，只要带上一小袋金条，就可以发大财。这两个同事一站一站买卖金条，很兴奋，完全不管我在做什么，所以写的报告都是我一个人独断专行。去中原解放区之前，给我交代任务的首席视察员——刚从陆军情报部门退伍的一位上校——装作漫不经心地说起，如果我在解放区“碰巧”发现中共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的话，他会乐意听一听。我提交了宣化店的工作报告之后，我的一位上司邀我去他的寓所谈一谈。他是位非常友善健谈的美国籍联合国高级官员，他表扬了我的工作，说我的两份报告都写得非常好。然后问，看起来你喜欢解放区？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为了奖赏我，将让我连升

① 此段叙述未得文献资料证实。据有关中原突围的各种资料，张部突围十分艰难。

两级，并派我到共产党力量强大的东北工作。我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又说有两件事得请我帮忙，不过不是什么大事，相信不成问题。第一件，他让我修改湖南之行的报告，只需改得比较“技巧”而已。他请我删除其中涉及的美国官员强奸其女秘书的事——这是那位女秘书亲自向我控告的。第二件，关于我的工资。他说，他很好奇为什么我一直没有领取生活津贴。联合国发给我们的工资非常丰厚，月薪六百美元，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的单身男人来说，这笔钱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需要。我们还享受免费住宿、交通以及日常用品，此外还有每天十六美元的补贴。在遍地饿殍的中国，领这些钱真的让我于心不安，我觉得至少不应该再领津贴，把这些钱节省下来，可以救助更多的中国灾民。我如实说了自己的想法。我的上司说，我们很敬佩你的理想，不过，我要提醒你想一想，你这样做会让别人感到为难。纽约的会计师来中国查账时会想，既然有人可以不要这笔津贴，那别的人应该也不需要，所以我劝你还是把你的津贴领了吧。

我二话没说，转身就走，第二天我就辞职了。

看来只能回美国去了。我订了船票，去跟宋庆龄、廖梦醒告别，宋庆龄却建议我去南京与周恩来道别，说既然你们已经在宣化店认识，就去告个别吧。我去了南京，在梅园新村见到周副主席和小超大姐，周恩来说，你不要急着走，等我设法让你去延安，亲自去见毛主席，看看我们老区的建设和学校，这样你回美国就有丰富的材料可讲可写了。我对他说，如果有机会留在延安工作，我很愿意，他说这个到时候再说。他告诉我，有一个叫普莱士（Mildred Price）的美国人正在上海，她要去延安，可以设法带我前往。普莱士女士我本来就认识，她是北卡人，也是美共党员，她在纽约组织了一个“援华委员

会”，实际上是援助中共的，她的丈夫也是个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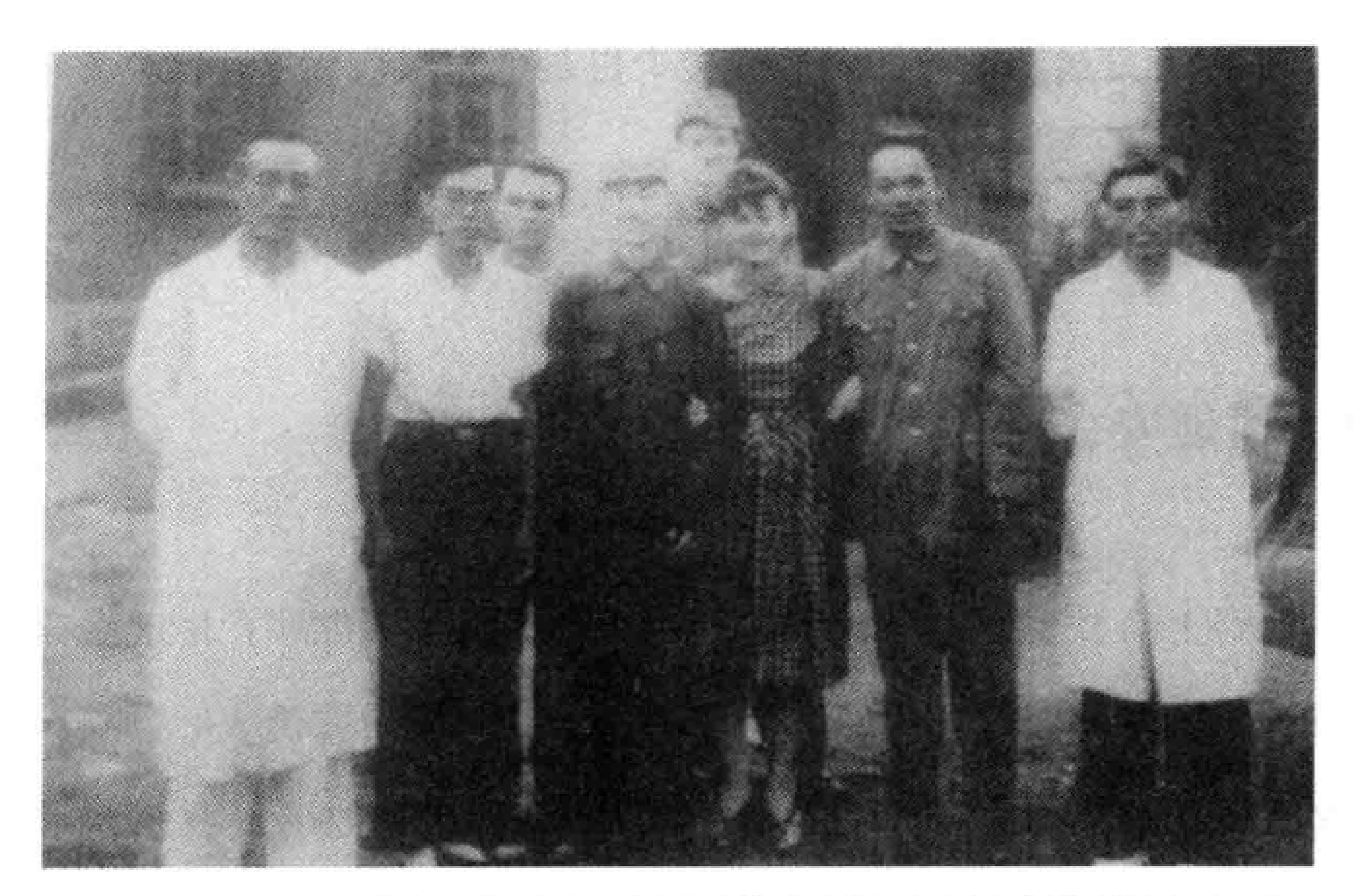
我当然求之不得。

四、到延安去

我到上海找到了普莱士，一起坐国民党的飞机到了北京南苑机场，再到协和医院（北平军调部的办公地点）找中方代表叶剑英，然后又找了美方代表饶伯森（Walter Roberson），请他准许我搭机赴延安。这个人后来当过美国的助理国务卿，特别反动。饶伯森说什么也不让我搭乘美军飞机。当时美军飞机每周六飞延安，周一飞回，到张家口也有飞机。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被拒绝的美国人。斯特朗是红色人物，普莱士是红色人物，她们都被允许搭机去延安，只有我不行，叶剑英亲自跟他交涉也不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猜测是我揭发的湖南救济分署的美籍负责人跟他说了什么。

叶剑英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坐火车去张家口。车到八达岭附近的青龙桥站就停住了，国民党军队在此设了封锁线。旅客全部下车，宣布当天谁也不能过去。有位二十岁左右的妇女走过来，说她的丈夫在张家口，她急着去他那儿，我是外国人，国民党不会拦我，她想装成我的佣人过关。她提着我的箱子，我俩走近封锁线，站岗的士兵不让我们过去，我装作听不懂中文，手拿美国护照，跺着脚骂他。结果他的营长出来了，把我俩都放了行。

走到康庄，我们上了解放区的火车。一上“自己的”火车，就像到宣化店那样，我觉得进了天堂。车上的乘务员都很热情，过来跟我



1946年7月，李敦白（左三）和晋察冀边区卫生部的领导在张家口。

拉话，也跟我带的妇女拉话，原来她从东北来，她丈夫在张家口做工人。到张家口下了火车，过来几个年轻的军人，厉声叫我站住，问你是什么人，谁让你来的，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还带了个女的，是你什么人？非常严厉。我刚在青龙桥拿洋大爷脾气吓住了国民党官兵，这套在这儿当然用不上，我也不会用，相反，我心里真高兴，这里的人不会因为你的鼻子高就对你另眼相看，我觉得他们很有尊严。正说话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臂将军蔡树藩带人来了，隆重欢迎我。

我在张家口待了一个星期，采访、参观、座谈，然后他们安排我回北平。我已经联系好了美军飞机。那个麦当劳上校很通情达理，所以没问题。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聂荣臻司令员设宴招待我和普莱士（她是否先去了延安，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曾在张家口陪她参观，给她翻译。）在餐桌上，聂司令员问我：我要是把你扣下来，你觉得怎么样？我问：我留下来干什么？他说：我们需要工程师。我说我不

是工程师。他解释道：我们需要架桥的工程师，这座桥梁将架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原来，张家口正准备开通面向美国的英语口语广播，需要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校对和润饰工作。一听这话，我很高兴，马上答应留下来。我的东西都还在上海，那也不管了。

从此，我加入了中国革命的队伍，而且与新闻广播事业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我在张家口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朱总司令亲自发电报调我去延安新华社工作。1946 年 10 月 19 日，经过长途跋涉，我终于到达了延安。关于延安岁月的种种，我在回忆录中已经有所叙述，不再详谈，但我想特别讲一讲我的入党问题。

聂司令员问我留下来有什么条件，我说，如果我留下来参加中国革命，我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如果留在根据地，意味着我将跟外界隔绝，若不入党，则内部情况也将被隔绝。不久，军区有位领导找我谈了话，说他们已经向上级请示，并获得李先念、王震的介绍，决定让我参加支部的学习会，但不参加生活会。这样，我就成为“半截”党员。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找我谈话。他说，中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外籍人士加入中共，需要得到书记处五位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批准，我已经获得批准了。他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这个人，按中国的标准，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但我愿意学习。他有点意外，我怎么会说自己不是好党员。但我确实是真心话，我就是比他们差远了。

我被批准入党了，但我这个党员不同于一般党员，安子文让我跟新华社干部科副科长丁拓联系，没有公开宣布我的党员身份，但实际上清凉山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我参加党支部会议，但不参加与运动有

关的会议，也不参加更高级别的党员大会，至于阅读党内文件，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党内文件这种东西。我想我是被看作候补党员，或者连候补党员都不如，只是一种特殊安排。我的党龄从 1946 年算起。入党时我写了个自传，不记得填过什么表。

另外补充一点解放区文艺的情况。中国的革命文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还在宣化店的时候，我看到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红花》、《模范妯娌》，禁不住流眼泪，因为我觉得基本精神同我们美国的革命歌曲是完全一致的。延安的文艺活动很丰富，其中又以演戏比较多，话剧、京剧都有，印象深的，话剧像《保卫和平》、《保卫延安》。毛主席喜欢看京剧，喜欢《棒打薄情郎》、《捉放曹》这些剧目。电影很少，除了美军观察组放的美国电影外，我在延安没有看过别的片子。后来在太行山，看过老百姓演“翻身戏”，演得可好了，都不是专业演员，但演得真好，可以从天黑演到天亮，然后就下地。当然演戏和看戏的人可能都是轮替的。滹沱河边的老百姓演戏，不但有念白，还有唱腔，边说边唱。部队也演戏，记得演过四大家族的戏，先是陈立夫出场，唱“蒋家的天下，我陈家的党”，然后孔祥熙出来，唱“滚滚黄金滚进来”。还演过一个苏联的戏，其中有个记者惯说大话，叫“客里空”。新华社搞过反“客里空”的运动。我也演过戏，演马歇尔。在延安还演过《兄妹开荒》，我是第一个出场的，演公鸡，公鸡一叫，他们就起来开荒了。说起这个戏，还有个故事。戏里有句歌词“学习那英雄吴满有”，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吴满有叛变了，后来歌词就改成“学习那英雄杨步浩”。

五、“特殊任务”

我一生中领受过两次通向监狱的“特殊任务”，第一次是1949年初在东柏坡。

我在东柏坡是突然被抓的，那应该是1949年2月中下旬。[①] 当时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我们正期待着早日前往北平。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廖承志处报到。我兴冲冲地到达后，他给我看了一份由刘少奇签署的命令，让我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我以为，即将承担的任务一定与处理中共跟美国的关系有关，很可能是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沟通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我很激动，我终将承担历史赋予我的重要使命，终将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留下自己身影。我匆匆忙忙地回宿舍收拾了几件衣服和盥洗用具。没时间跟妻子魏琳告别了，我留了一张纸条给她，说我先走一步，我们很快就会在人民的新北平见面。

与我同行的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师哲。我上了师哲的吉普车。他穿着军装，好像还穿了一双小短靴，是个出远门的样子。我很高兴与他同行，我们原来就认识，我的印象中，他是位很和气的老革命。事后回想，有两件事比较特别。第一件，出发前，我正跟廖承志聊天时，新华社记者丁明拿着一个塔斯社的电报跑进来，说“臭名远扬的美国特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另

---

① 李敦白先生在回忆录中记述他被捕的时间是1949年1月21日，这个时间与几个方面不能吻合。第一，李被捕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后，而米高扬1月30日到达，2月8日离开；第二，李被捕当天，新华社刚刚获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捕的消息，斯特朗2月14日在莫斯科被捕，被关五天后驱逐出境。照此推算，李先生的被捕时间应该是2月20日前后。

一件是告别时廖承志拥抱我，说小洋鬼子，不要太担心，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你可不要像“刘备进荆州”那样。按说这两件事都是非同寻常的，斯特朗我那么熟悉，怎么可能是美国特务？而我虽然看了《三国演义》，刘备进荆州是怎么回事却毫无印象。照常理，这两件事我都应该问一下，但我正沉浸在高度兴奋中，脑子自动屏蔽了这些疑问。

车上还有一个年轻的干部，后来知道他姓徐，别人叫他徐科长。师哲坐后排，年轻干部开车，我坐副驾位。我们的吉普车越过滹沱河，往北开了一段，车上还聊起刚刚听到的斯特朗被驱逐出境的事，师哲显得很吃惊的样子问我“真的吗”？走了一会，年轻干部突然说：糟糕，我忘了拿暖壶，路上没有茶喝。师哲说：路途很远，还是回去拿吧。吉普车调了个头，再次越过滹沱河，到了一个听起来叫“怀社”[①]的村子的一个地主大院门口，他们俩走了进去，让我坐在车里等。过了一会，年轻人出来对我说：师哲同志有点事，要耽搁几分钟，你不如进来喝茶吧。

我下车，走进这个大院。院里有东西两个耳房，他把我带到左边的耳房，让我坐在桌边，说他去拿茶。这时，外面石板地上传来“笃、笃、笃、笃”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什么。正猜疑间，门忽然被推开，进来一个杵拐杖的人，他戴着很厚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像铜

① 查平山县地图，发音相近的地名有“东回舍”、“西回舍”两村，都在滹沱河以南，距东柏坡三十公里左右。

铃。我以前从未见过此人，后来听说好像是刘少文[①]——我就见过他这么一次。他两眼瞪着我，说：李敦白，我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逮捕你，你受美帝国主义的指派前来破坏中国革命！

好像头上被狠狠打了一棍，顿时天旋地转，只觉得整个屋子飞速转动，眼前星星乱飞，还感觉脑子里被什么东西使劲拽了一下。不，我没觉得他在开玩笑，我不认识他，而且他的态度非常严厉。马上上来几个士兵，把我衣服都扒了，有一个还扒开我的嘴检查，发现有个补过的牙，我很怕他们会把那颗牙挖出来，幸好没有，士兵只报告了这个情况。他们让我穿上黑色的衣裤，把我推到右边的耳房。这间屋子的窗户被木板钉得严严实实，里边一团漆黑。

在哨兵把我推过院子时，我哭了起来。哨兵对我说：没有关系嘛，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不会解决吗？他的话给了我另外的信息，震惊之中又添加了迷惑。

几分钟后，又把我带回左边的屋子，开始审讯。一起乘车的那个年轻军官主审，师哲在场。师哲说，我们对你的情况一清二楚，现

---

① 刘少文（1905—1987），原名刘国章，河南信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入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任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翻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翻译科科长，中央巡视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军委秘书长兼《革命与战争》军事杂志编辑，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中共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组织部主任秘书、情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处处长，华东纺织工业部部长，军委四部代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刘少文于1948年10月从上海撤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他在李敦白案件中的出现与他在平山县的时间及社会部副部长的身份均相符。

在就看你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以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政策当时就有。我心里想，好像天下的审讯者都一样，伯明翰的警察抓我时，说，我们对你清楚得很，比你妈还清楚。然后问，你的全名怎么拼写？我对师哲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这样的人。他大发脾气，说你把我们看成乡下佬，笨蛋，把自己看得很高明，你以为我们没事干呢！他还说，你是敌人对准我们的一把刀，我们现在要把刀口转过来指向敌人，如果你痛痛快快地交代，把你的特务关系都说清楚，我们上车继续去北平，这个小屋子里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是第一条道路，你还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就是拒绝交代，不过，我们有办法让你讲，你最后一定会讲。说到这儿，他拍拍自己的身子，接着说：但是，你会受不了！我立即抓住了这句话，说：你们威胁我，要给我上酷刑。他马上退缩了，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即使我们想这么做，毛主席也不会允许。

后来我说，我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毫无保留。师哲说，我们不需要你长篇大论胡说八道，你只要交代你的特务关系就行了。他还说，我们知道你到解放区以后没有干过坏事，有些特务来了，受到感化，或者出于胆怯，没有干原来想干的事，我们只要你交代你的关系。我巴不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但没办法，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关系”。后来我在美国讲演，还跟听众开玩笑，说最好大家事先准备好可以交代的材料，万一哪天被捕就有得说了。就这么翻来覆去地审问了一天。中间师哲还用很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们美国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生命，另外就是女人、美酒。我不同意他的话，我说我们美国人同样可以为正义事业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争夺太平洋岛屿的战争，美国人多么勇敢，多么不怕牺牲。师哲听后没

有反驳。他只参加了第一天的审讯，后来都是那个年轻人审。他不让我交代问题，只反复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两句话，叫我端正态度，说只要态度端正了，接下去的事很容易办。

端正态度花了几个星期，没什么效果。徐科长就说，你说你要交代，那好吧，你说，我给你记下来，但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开始讲，从头讲起，特别是自己认为可疑的事情，我都提了，怕日后查出来更说不清。比如我有个表兄，其实我们没见过几次面，他是个律师，也是个FBI。我还讲了跟斯特朗的关系，他装作没兴趣。

先后大概讲了两三个星期，也不是每天讲。我当时思想上有很大的迷惑，一直摇来摆去，摇来摆去，一会儿觉得他们搞错了，一会儿又觉得他们是在考验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整风。我在新华社的朋友和熟人，几乎都在整风运动中挨过整，有的神经衰弱，有的不再能够写作，只能改行摄影之类的工作，有的战战兢兢什么都怕。我对自己说，他们搞错了，但我不能埋怨党，那样的话我这个人就变了，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也不能被整垮，那样的话离开这里之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也想到，把我搞错的事传出去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影响不好。

反复摇摆中，我决定来一个假自首。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承认是特务，他们会判我十年二十年刑，把我送到某一个荒僻的地方劳动改造，我会表现得很好，他们最终会发现我不是特务。这样，我的嫌疑最终能够洗刷，而党也不受损失。

我确实没干坏事，但编造假自首，也能找到一些“根据”。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时候，CIA的前身OSS的前身SSU（Strategic Services Unit，战略服务部）曾到我们班上挑选志愿者，准备把他们

空投到中国的敌后，跟八路军取得联络。我很高兴地报了名，但没被挑上，我的两个同学挑上了。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被空投，大概没有吧，听说他们后来到了桂林，搞解密工作。另外，我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时候，我们视察部的主任，这个人原来是陆军情报部的上校，还有我们的副署长，发现我喜欢解放区，都说过希望我留意有关的情况。我把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串连起来，编了一个故事，说我答应了上校的要求，就到解放区来了。这样编，不涉及解放区的任何人，不会连累别人。

我跟哨兵说，我准备自首。第二天上午，师哲来了，他让我坐下，说你准备坦白？我说是。他两眼瞪着我，问：你是特务？我看着他的眼睛，突然呜呜呜呜地哭了，边哭边说我不是我不是。师哲很生气地来回走动，说，咳，你不相信我们，你也没有理解我们，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隐瞒是犯罪，夸大也是犯罪，谁让你说假话？看来这个事情我们还得重来。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应该经得起这个考验。听了这句话，我如获至宝，看来确实是考验，是整风。事实证明，这种摇摆对我的精神产生的破坏作用很大，如果能够始终面对现实，后来的情况可能不会那么糟。他让我回去好好考虑交代，说你是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

回去坐了两天，徐科长又提审了我。这一次，他满面笑容，说，师哲同志批评了我，说我对你帮助教育不够，以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就提出来，我来帮你。

又过了两三天，还是这个徐科长提审我，这次又变脸了，特别厉害。他说，李敦白，你以为你很聪明，以为骗得了我们，我告诉你，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然后把我放了几天没理。我坐在黑屋子里，觉得非常苦闷，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徐科长为什么翻云覆雨，脑子高度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哨兵拿了两片白色的小药片给我吃，说我们发现你最近感冒了，这是给你的药，我说我没感冒，他说反正你得吃药，不吃就灌。此后，每天三次、每次两片让我吃药。记不清吃了多长时间，因为脑子乱了之后就不知道是否继续吃了。这个哨兵姓白，后来到北京对我的看管松下来后，已经成为看守的老白拿了另一种药给我，说这种药是为了解除以前那种药的药效。关于这种小药片，我后来问过曾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大夫，据他讲，当时给俘虏营的部分战俘吃过一种药，其作用是刺激神经，让人紧张，睡不好觉，倒没有别的坏作用。我吃的可能就是这种药。

我确实觉得精神极度紧张。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同志，没穿军装，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他开始态度很和蔼，问我，李敦白，你觉得最近身体怎么样，情况怎么样？我说我觉得没有问题。突然，他也变脸了，说，我们发现你很相信美帝国主义，你也很怕美帝国主义，比怕我们还要怕，你应该怕我们，再不交代，有你好看！他们这样变脸，也大大增加了我精神紧张的程度。

关我的黑屋子很小，四分之三被土炕占据，炕前面一块小空间可供移动，但熄灯之后，必须躺着，连坐在坑上都不行。墙上凿一个洞，里面放一个小灯盏，点的是豆油，发出小小的黄色的火焰。有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看着那个小火苗，看着看着，那个火苗就变成了一个跳舞的小人，我觉得自己仿佛跟着那个小人，越走越远，直到睡过去。一会儿，又突然惊醒过来，觉得非常紧张。我意识到自己不对头，很害怕，我请哨兵允许我下炕走一走，他说“不行”。我又请求

他把徐科长叫来，他说过我有问题可以叫他帮助，我现在实在需要帮助。他还是不允许，让我睡觉，别捣乱。我开始大叫："徐科长，徐科长！"我并不知道他是否住在院里，看来是，他一会儿就过来了，打开门，抖着手里的手铐，说：李敦白，如果你不遵守纪律，我们就会用纪律来制裁你。我说你不是答应帮助我吗？我不是装的，我真的很紧张。他说，我没说你是装的，我说的是你要遵守纪律。然后"砰"地关上门，走了。那天我整晚未睡，很怕自己精神要垮台。

第二天上午又提审，徐科长笑嘻嘻的，说，李敦白，昨天晚上你给我们唱洋戏，你还会唱什么戏，唱给我们听。哨兵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小馒头，说，最近你吃得少，吃一个馒头吧。我拿过来，刚咬了一口，就一头晕倒在地。我醒过来时，几个哨兵正在把我抬回牢房。他们把我放在炕上，我大概精神失常，乱踢乱闹，他们用我的军大衣捂住我的脸，我窒息过去。再次醒来，脑子就完全乱了。

这一乱，就乱了几个月。出现种种幻觉。幻觉中，我的好朋友彭迪来了，说周副主席很关心你，要你好，钱行（她的丈夫）也要你好。毛主席手里拿着把刀子，旁边是缩成一团的马海德，马海德哀求我赶快交代，不然他要受苦。我吃虫子，吃泥土，什么都吃，我还乱闹，闹得厉害时他们就给我上手铐，越挣扎手铐越收紧，我便昏死过去，等醒来，手铐已去掉，手腕上鲜血淋漓。可是，在头脑混乱中，我仍然有一种非常悲痛的感觉，每天晚上都觉得第二天不会再醒来。那段时间，可以说和死神同寝。

夏天，我被装上一辆盖着毡布的日本卡车，运到北京，关进北京

市第二监狱[①]。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到了北京。

六、从牢房的糊窗纸上，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换到新地方后，有段时间和看守同住一院。小院有两间屋子，一间给我住，窗上仍然钉着木板，但并不严实，哨兵就拿报纸糊住缝隙，另一间给哨兵住——专门有一队哨兵看管我。那时我已经有所好转，但还有幻觉，有一次我在幻觉中成了苏联的一个元帅——确有这个人，列宁则像个皮影似地出现在墙上，他跟我说：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鼓励我。

哨兵有时换糊窗户的报纸，我从来没有留意过上面写着什么，一是我的精神状况很糟糕，注意不到些事，另外我的视力很差。本来视力就差，按要求的话当兵是不合格的。关在平山县的时候，有个哨兵很坏，干了很多坏事。有一天他让我裸眼看太阳，结果双眼视网膜受损，视力减退得很厉害，左眼几乎失明，而且老是觉得眼前的东西晃动不停，聚焦困难，所以根本看不清报纸上的小字。大概到了 1949 年年底或者 1950 年春天吧，我突然注意到窗户纸上红色的大标题，凑近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

① 根据李敦白先生的叙述，其关押地点应是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这个监狱始建于清末，民国时期称为北平“第二模范监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改称北京战犯管理处，成为关押和改造国民党战犯的一座监狱，杜聿明、宋希濂、陈长捷等原国民党将领均关押在此。

看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高兴。我没有觉得委屈，没有想自己为这个事业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现在却被关在牢里。即使有这种情绪的话，也不明显。我努力地与各种负面情绪作战，一出现苗头，就给自己做工作，把它化解，不让它泛滥。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业成功了，个人受冤枉算得了什么呢？

也是在这前后，监狱长姚伦到我的房间，跟我握手，哨兵拿来两把椅子，他让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对面。他说，我们现在对你了解了，你最好把我们以前说的话都忘记。但是你也明白，现在还不能让你出去工作或学习，得等你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才能让你出去。不过，如果你想回美国，你马上可以走，你就永远忘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我根本没想过回美国。我说我愿意学习、等待。即使在头脑混乱中，我也老喊"我要学习，我要学习"。他说可以满足我的愿望，给我提供学习条件，我需要什么学习材料就提出来。当时老白和一个一直很和气的王科长在场，姚伦说我有事可以找他们帮忙。他们马上拆掉了封窗户的木板，给我送来了桌子、凳子、纸、笔——我从来没用过的毛笔——还有墨。哨兵也换了。原来的哨兵是从东北来的，很坏，老欺负我，新换的则很和气，帮助我，这对我很有好处。

老白帮助我慢慢恢复健康。他先让我洗袜子，抹地板，干些力所能及的事。人就是这样，发现自己还有点用，精神上就受到鼓励。学习和劳动，让我逐渐好起来。

我在那儿还住了五年。我认真学习，想象自己是个中世纪的僧侣，一年一年地自愿保持缄默，孜孜矻矻地翻译着古希腊的典籍。我想他们能够做到，我也应该可以。监狱图书馆的藏书还不少，他们先给我看了清单，让我挑选。很奇怪，我最先看的是1936年、1937年

毛主席在延安作的一系列关于哲学问题的报告，这些内容后来整理成《矛盾论》、《实践论》发表，当时还是党内文件的形式。我还看了向来想看但没时间看的《资本论》三大卷，看了《反杜林论》，看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看了列宁的不少著作，看了一些戏剧、小说，如俄国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唐吉诃德》。我还看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两大卷。我上大学时就对黑格尔哲学很感兴趣，总想完整地读一读这部书，但总没有时间，因为黑格尔的书很难读，非有专门时间读不可。现在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就一句一句地仔细抠。我还发现，读黑格尔的书，读中文比读英文好懂。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看《人民日报》，是两三个月之前的旧报纸，老白一拿就拿一大叠，看完了再换。我在上面读到抗美援朝的消息，读到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读到邱少云的事迹，这些报道让我很感动，也让我受到极大的鼓舞。

书是看完一本换一本。你难以想象，我每次拿到书，先不看，像抱着一个宝贝似地把它抱在怀里，在屋里走来走去，那个高兴啊！然后才打开慢慢地看。

刚开始看书时，发现很难领会，也很难把意思连贯起来，只能一句一句慢慢地读，一段时间后，阅读能力就恢复了。这段读书的时间，我觉得让我一生受益匪浅。

我还可以随便走到小院子里去。空地上种着些庄稼，那些哨兵教我这是倭瓜、那是角瓜什么的。可惜的是，不久我就离开了这个独处一角的小院，搬到里面的普通牢房去了，也不能出来了。那时候，政府正打击一贯道，我从监视孔偷偷地往外看，看到这些人在走廊扫地、糊火柴盒。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和隔壁牢房的犯人通过敲打流行

歌曲节拍，知道了彼此的身份——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

王科长每隔一个来月来看我一次，问我有什么问题。冬天，牢房没有暖气，他们给我安了一个煤火炉，我弄不好，老灭火，经常要叫看守帮忙。我很怕他们说我，但他们一直很耐心。

在这前后，我的身体出了问题，老腹泻，止不住。他们把我送到公安医院彻底检查，做了钡造影，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他们还给我照了肺部X光，结果原来的肺病完全好了，只留下病灶。这真是怪事。从医院回来之后，肚子好了一段时间，接着又拉。监狱里的年轻医生对我很好，他给我开药，让我吃流食，跟看守说白天也应该允许我躺下。但就是不好。有一天，我正躺着，医生进来看我，我问他，老不好怎么办。他说，我告诉你，你有两个办法可以选择。第一，你就像现在这样，吃流食，吃药，爱躺躺着；第二，你就起来活动，吃正常的东西，因为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我一听，既然医生说可以起来，我就起来吧。结果怎么着？病很快就好了。可见大脑对身体的作用很大。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哭了，觉得世界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毛泽东跟苏联有什么分歧，我还觉得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担心中国跟苏联没跟紧。

就这样，我身心两方面都基本恢复了健康，但时不时地还有恐惧感袭来，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觉得有人要抓我，头晕，紧张，恐慌。这些症状，直到第二次坐牢才彻底消失。

关到第六年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年纪较大的看守到牢房里来看我，问我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我对他说，如果我死了，你们把我的心挖出来，切成碎片，会看到每一片都是红色，没有一点别的颜色。

他说好好好，不要激动，我们了解你，说完就赶紧离开了。过了不久，看守打开我的牢门，说有人找我谈话。我跟着他出了门，我知道，审讯室在右边，但他却带我往左走，那儿有扇从不打开的门，这时却打开了，我跨出去，走进一间小屋，里面坐着公安部七局局长凌云——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他开口就说，我代表人民政府向你道歉，我们错误地关押了你。他说，我们愿意采取任何办法尽量予以弥补，你要回美国，我们可以提供资金让你开始事业，我们可以送你到欧洲旅行，如果你选择留在中国，我们会在南方给你提供一个别墅，你用不着工作。嗨，用不着工作？我最需要的就是工作！我说我最不愿意的是不工作，而且希望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他说好，组织部门的同志会跟我谈工作的事。

除了工作，我只问了一件事：魏琳怎么样了？我曾经问过多次，他们一直告诉我她很好，她在等我，这一次，他们告诉我，三年前魏琳就跟我离婚了，现在已经再婚。

谈完事，我要回牢房拿我的汉英大词典——这是从斯坦福大学起就跟着我的好朋友，我却不记得是怎么带到监狱里的了——老白说，你不用再进去了，我给你拿出来。

这一天，是1955年4月4日。我在监牢里，已经度过了六年多的光阴。

我在一个女看守的家里住了一天。他们家就在监狱的大院子里。她丈夫是审讯科的科长，他们有两个小孩，叫我美国叔叔，一家人都待我很好。他们鼓励孩子们跟我玩，说这是一位很好的美国叔叔。我觉得，虽然我在他们家里只住了一天，但他们的善意对我回归正常社会起了很好的作用。我还觉得，虽然当时的工作制度并不完善，但公

安人员个人的品质是很不错的。

老白说你可以出去玩，我真的出去了，一走竟走进了北京展览馆，在一个画展上看到了正在凝神赏画的邓拓。

猛然惊觉，我又回到了人间。

第二天，我搬到了华北饭店。监狱管理科的王科长先带我到中组部恢复组织关系。万万没有想到，中组部办公厅主任是在张家口曾同住一室的朋友韩劲草，他一看到我就流泪，走过来拥抱我，说真糟糕，把你关了这么久。接着谈我的工作，我被一阵悲观情绪席卷，说，我已经成了个老古董，还能干什么呢？老韩显得很难受，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我不应该发牢骚，我可以学习。并表示愿意回新华社。他说，现在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分开了，从工作考虑的话，广播电台更需要你，因为新华社原来有一些外国专家，但魏琳在电台，恐怕你会觉得不方便。我说没关系。中宣部负责人事工作的同志找我谈具体工作，然后新华社的吴冷西也找我，广播电台的梅益也找我，都想让我到他们的单位工作，这些都是老新华社的朋友，我并无偏爱，最后还是选择了更需要我的广播电台，成为广播事业局唯一的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外国专家。

五一节那天，电台负责对外广播的副局长金照接我到天安门观礼。我在观礼台上见到郝建秀，我知道她的事迹，就主动邀请她来电台接受采访，对外广播。我当时不知道，我的做法是违规的，这样的事必须事先报批。

第二天，我到梅益的办公室报到，就在这一天，我遇到了王玉琳，从而找到了十二分忠实可靠的、诚恳开朗、什么都能干、把坚强和温柔集于一身的终身伴侣。她是中华民族给我的优秀女儿，我的生

命因她的出现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生活就这样朝我扑面而来，从开始的跌跌撞撞，到后来的如鱼得水，再到重入牢房，生命还将进入下一个轮回。

王玉琳老说我，无论讲话还是写文章，我对监牢里的苦难岁月都轻描淡写，有时候还笑出来。确实，我现在已经难以体会当时的心情。但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第一次放出来后，想起那些事，我心里会很痛。后来就完全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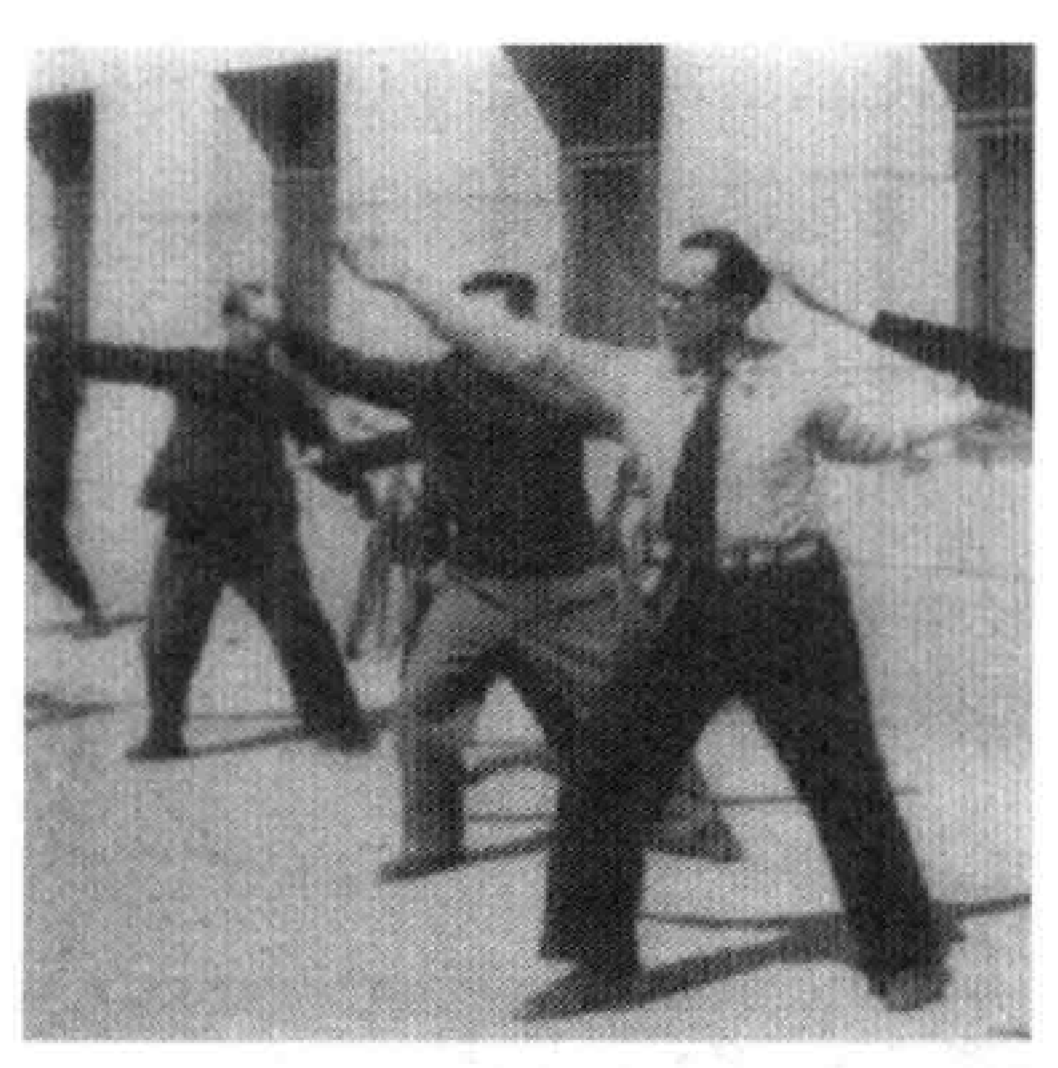


"大跃进"期间，李敦白（第二排中间）和广播事业局同事在京郊植树。

七、外国专家

说起外国专家，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最多的是苏联专家，他们对新中国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苏联专家总人数有几万人，当时北京比较大的单位都有苏联专家，在全国各地分布也较广，重要建

设项目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苏联专家不同于后来一般所称的像我这样的“外国专家”，其角色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是全面的指导者，是“顾问”。他们自成体系，跟别国的专家不相往来。



五六十年代，在单位每天都要做广播体操。

苏联专家无疑享有崇高权威，受到最高礼遇，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像在东欧那样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我第一天到单位报到，梅益局长就跟我讲，你是中共党员，是我们的同志，苏联专家当然也是我们的同志，但你跟他们不一样。他说，苏联专家要求参加我们的党委会、编委会，我不能同意，我说会后我会传达相关内容，但你们不能参加会议。这件事恐怕引起苏联顾问的极大不满。我所在的广播事业局，首席苏联顾问名叫巴宾克（Babinko）。我后来听玉琳讲，巴宾克要求参加党委会，被拒绝后大发脾气，因怕激怒他，开党委会时只好悄悄通知，不让他知道。玉琳是通知会议的人，她觉得我们太过忍让，心里很有意见，但不敢说。

他们在生活上也跟其他专家隔离。友谊宾馆一位姓宋的副总经理告诉我们，友谊宾馆主楼的大餐厅特别讲究，苏联专家在那儿用餐，其他专家只能到副楼餐厅。宋曾跟他们的领导说，我们觉得很难为情，都是从兄弟国家来的专家，都是我们的客人，不让他们进主楼餐厅用餐不好交待。对方告诉他，这是他们国家安全的需要。说明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兄弟国家的同志。苏联专家的生活待遇也高人一等，

各单位要配备会做俄国菜的厨师；办公室宽敞讲究，如巴宾克的办公室铺地毯，连梅益局长也比不上；坐车必须一人一辆，而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国家的专家只能拼车。这种情况既让别国专家不满，也使中国方面为难。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专家总人数不多，大概几百人吧，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有零星分布，如阳早和寒春一直在西安郊区的农场，“文革”前才调到北京；而他们走后，西安仍有外国专家。“文革”中有两张外国专家写的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批示，第一张大字报很著名，是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汤反帝）等人于1966年8月31日写的，他们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自己及子女获得政治参与权，同时取消生活上的特权。几天之后毛就作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①] 另一张获得毛主席批示的大字报不那么有名，它是由一位在西安外语学院工作的澳大利亚专家大卫·库普于1967年3月10日写的。当时社会秩序失控，打砸抢之风蔓延全国，大卫对于暴力行为，对于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之类的“左倾机会主义”表示担忧。西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高智曾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将这张大字报抄给了毛。毛泽东阅后作了批示，认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大卫·库普是英语教师，他所在的学校应该还有教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外语的外教。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肯定有外国专家。

---

① 关于这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笔者参考了何蜀《“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文史精华》2001年第6期）一文。

这些外国专家的国籍分布很广，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智利、委内瑞拉等等国家，还有一些非洲专家。外国专家到中国来的情况也有各种不同。有一些 1949 年前就来中国，他们大多怀抱革命理想，参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经历了战争岁月，受到各种程度的考验。如马海德 1936 年就跟斯诺一起到保安，他是医疗专家，是根据地特别急需的人才，所以当时就留在了陕北，为了保护他，斯诺书中未透露他的行踪。马海德深获中共高层信任，毛本人对他也特别亲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到过广州，国共分裂后与鲍罗廷等人一起坐吉普车经蒙古返回苏联，后来又几次来中国，1958 年以七十二岁高龄来到新中国定居，是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三 S”中唯一一位终老中国的“S”，她是广义上的外国专家，主要工作是写作。路易・艾黎 1927 年来中国，抗日战争中积极倡导工业合作运动，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爱泼斯坦两岁时就随父母从波兰到天津定居，抗日战争中积极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他和后来成为其夫人的英国人邱茉莉都被日本人关过香港的集中营。德国大夫汉斯・米勒 1939 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阳早是位美国农学家，他 1946 年到延安，在中共最早的农场工作。他的妻子寒春在美国学习核物理学，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工作，她于 1948 年到中国，次年春在延安的窑洞与阳早结婚，转型成为农业机械和畜牧业专家。寒春的哥哥韩丁 1945 年到中国，当时他是美国战争情报处的分析员，国共重庆谈判时他在当地，与毛泽东结识。1947 年韩丁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再次到中国，在河北冀县为解放区培养出第一代农机人才，并曾执教于北方大学，1948 年以观察员身份随学校的土改工作队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

村亲历土改，写出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这本书1966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1980年在中国出版中文版，在美国和中国都很有名。韩丁于1953年返回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1971年后再度往来于中美之间。大卫·柯鲁克是英国人，1940年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伊莎贝尔相识相恋，1947年两人到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调查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农民中间生活了半年，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离开十里店之后，他们应邀留在石家庄附近的一个外事学校帮中共培养外语人才，这个学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他们收集的资料后来写成了学术价值很高的一本书——《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

早期来中国的外国人中，有的是本国的共产党员，其中又以英共党员为多。露丝·史密斯早在1920年就参与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文革”前以七十一岁的高龄来到中国工作。大卫·柯鲁克是英共党员，后来他又介绍他的妻子加入了英共。夏庇若也是英共党员。柯弗兰是由冀朝鼎介绍加入美共的，艾德勒原为英共党员，二战期间在美国财政部工作，转而加入美共。

有些外国专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数量很少。马海德是外国专家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1937年就入党了。我1946年入党，也算比较早的。让外国人入党，应该是战争年代的特殊处理吧。解放后也在外国专家中发展了几个党员，据我所知，米勒大夫于1953年入党，爱泼斯坦（艾培）1964年入党。艾培即使在入党之前也很受信任，实际上把他当党员看待。其实这个时候不应该再把马大夫、米勒大夫、艾培称为“外国专家”，因为他们已经加入中国籍。马海德在延安就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得到的答复是一旦中共建国，即接受他入

籍，果然，新中国成立当天，马海德就成为中国公民。米勒大夫 1950 年入籍，艾培 1957 年入籍，都是先入籍后入党。尽管如此，他们仍被当作外国专家，由国家外专局管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而且享受外国专家的待遇。我出狱后也曾提出入籍要求，被周总理劝止。

党员的政治消息灵通，有关方面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党员把其中不属秘密的内容传达给外国专家，因此，在相对封闭的外国专家圈中，我们这几个党员特别受欢迎。米勒大夫好像不太热衷政治活动，在“文革”前，我和马海德比较活跃。许多外国专家住在友谊宾馆，中午常常一起吃饭，周末则有聚会，我们俩特别受欢迎，谁都拉我们一桌吃饭。我在宣传部门工作，廖承志等人又托我多做外事工作，本人还特别热衷政治，所以更引人注目，成为这些聚会中的明星人物，总是自觉宣传党的政策，传播相关信息，尽力释疑解惑。

在中共中央机构中，中联部负责对兄弟党和左翼政党、社团的工作，与从事对外宣传的外国专家关系密切，“文革”前一段时间内，中联部曾设立一个外国专家学习小组，不公开，成员有我、艾培、柯弗兰、艾德勒，好像还有夏庇若。在这个学习小组上，中联部领导给我们讲政策，讲情况，邀请我们听内部报告，我们也参加中联部的一些活动，如伍修权副部长做报告，我几次给他做翻译。

解放后来中国的专家，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是由本国党派到中国来的；有的想在本国革命，到中国来取经，如委内瑞拉的专家；有的因为在国内待不下去逃到中国来避难，像智利闹独裁时的情况；有的是为了理想，认为苏联不行，中国是最有希望的；也有的是为自己找出路，发挥某一方面的专才，其中又以语言专家为多。他们中很多是本国的党员。我没听说过这些人中有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外国专家享受极高的生活待遇，超过本单位的领导，生活上无忧无虑，他们的苦闷是与中国社会相对隔绝。中国同事如果要在办公室之外的地方因私人原因见外国专家，必须向单位党组织事先请示事后报告，我是党员，跟我见面不必报告，但这只能算是例外，一般外国专家显然不能随意接触中国同事。这些外国专家的工作单位很分散，如新华社、国家广播事业局、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建设》杂志社、外文局、外文出版社、高校、医院、科研机构，个别的如阳早、寒春在郊区农场，所以，这些人的孤独感是很深刻的。为了克服孤独感，了解中国社会和建设发展情况，也为了相互沟通获得友谊，这些外国人组织了各自的学习小组，共同探讨政治理论，提出问题，交流信息。这些学习小组每星期聚会一次，一般在周六下午，这也正是中国同事政治学习的时间。我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学习小组，在英国医生洪若思家，成员还有柯鲁克夫妇等人。这个学习小组非常有吸引力。



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会见李敦白（左一）、爱波斯坦（左二）、斯特朗（右一）等外国专家。

斯特朗回到中国之后，她办的《中国通讯》成为唯一一项吸收不

同单位外国专家共同参与的工作。《中国通讯》由她一个人撰写，艾培帮她编辑，我则组织一些左派外国专家翻译和发行。这个小刊物办得非常成功，到后期，共翻译成十来种语言，参加的外国专家都很自觉，很积极，很高兴。

这些活动，尽管有很大的好处，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说个别人始终无法融入任何群体，如杨宪益夫妇不被信任，苦闷得整天喝酒，也请一些敢于去的中国人到家里喝酒，因此更引起怀疑，就是一般的外国专家，也明显感觉到在他们和他们所服务的国家的人民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高墙。阳早他们写的那张大字报，后来宣传的主要是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强烈愿望和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但其实他们想表达的主要是对被隔离的不满，认为这种隔离把外国人"推上修正主义道路"。他们在大字报中说，在中国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是指，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兵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是指，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产生以下四种结果：一、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二、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三、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四，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字报提出八项要求：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四、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六、我们的孩

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八、取消特殊化。[1]

隔离与特权，是一体两面，如果把两者都取消，也将产生新的问题。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外国专家（包括已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专家"）受冲击，其中被投入监牢的，除我之外，据我所知，还有艾培夫妇和柯鲁克，1973年三八节周总理向外国专家道歉时，除我之外，其他人都已被释放，而我也始终没有受到体罚。可见，与中国人民比较，外国专家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要轻得多，如果没有特殊化政策的保护，后果肯定更加严重。

我注意到，这些外国专家作为群体来说，有一个特点引人注目，这就是犹太人的比例极高。我本人，艾培，夏庇若，沙博里，艾德勒，米勒，奥地利大夫弗莱，都是犹太人。歧视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很普遍，有的犹太人为保护自己，不敢公开民族身份。我们电台有位智利专家，负责西班牙文的翻译工作。他来之前，我跟一位智利朋友聊天，说从姓氏来看，将要到来的这位专家是个犹太人，对方说不是不是，我认识他们全家，他们家信基督教，不是犹太人。在中国工作两年之后，这位专家要回国了，他在一家新疆饭店请客，站起来敬酒时说，我现在要发表一个声明，我的智利朋友一定会大出意外：我是犹太人。我以前在哪儿也没说过这个事，现在来到一个对犹太人没有歧视的地方，我就敢于说出这个事实。原来，他们家是为了躲避希特勒的迫害，从奥地利移民到智利的，到智利后，装作信基督教，没有公开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们家族在智利经营五金店，很成功。

---

① 具体内容转引自何蜀《"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文史精华》2001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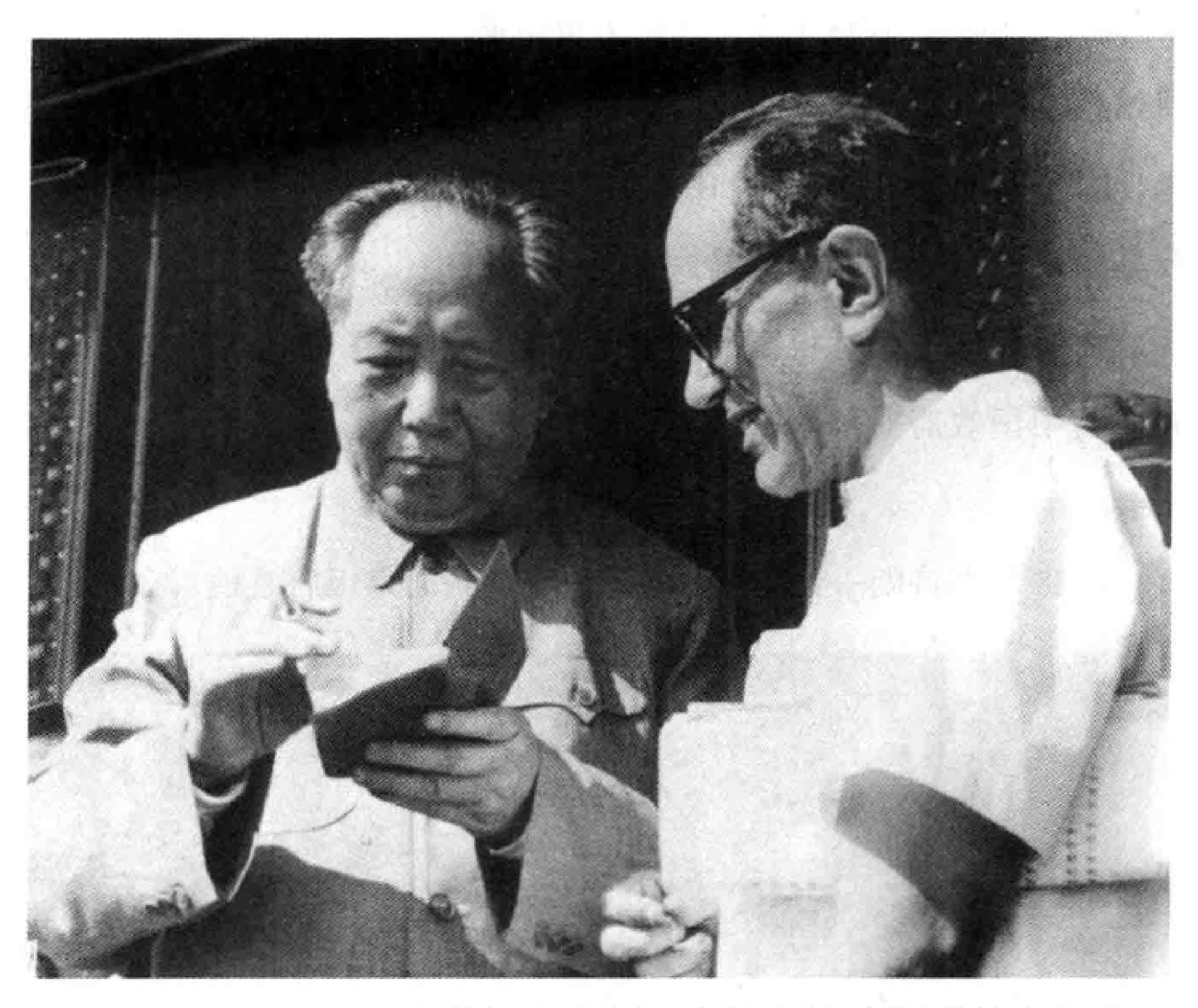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不歧视犹太人。中国完全没有这种观念，这是很特别的。我在向王玉琳求婚时，就跟她讲我不但是美国人，而且是犹太人，她问犹太人是什么？为什么外国专家中犹太人的比例这么高？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觉得，一是犹太人四海为家，国家观念比较弱，二是他们历来被压迫，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较深。

中苏分裂时，在华外国专家内部也发生分裂。意大利人、英国人、法国人都分裂了，主要问题是跟苏联还是跟中国，听赫鲁晓夫的还是听毛泽东的。智利党分裂了，成立了一个反修党，叫马列主义共产党，亲华，老的共产党则反华。各国出现了亲华的共产党小派别。在中国的外国党党员支持中国的多，在各国内部恐怕还是支持苏联的多。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在“文革”后大多有反省，认识到过于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中国身上，以为中国可以一下子建立高度发达的民主，每个机关可以组织起来，选举自己的领导，出版自己的报纸，每个人都可以谈自己的意见，可以罢免不喜欢的领导，所以对“文革”满腔热情，即使看出有问题也要坚持，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就能达到理想的彼岸。“文革”时我也知道危险，我跟玉琳讲，我得支持这些青年，我自己可能是浑身泥巴，完了，但是值得。后来在监狱十年，我一直认为“文革”是对的。个别哨兵敢跟我说两句话，我说在报纸上看到小学生黄帅敢于斗老师，觉得这小孩了不起，哨兵说你住嘴，你懂什么。我当时不了解，还觉得奇怪。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我才慢慢醒悟过来。

八、"黄金十年"

1967 年我被软禁后，有外国专家在友谊宾馆贴出大字报，说李某人"爬得高，摔得重"，话虽伤人，却是实情。我是所有外国专家中介入中国政治最深的人，也是受到惩罚最重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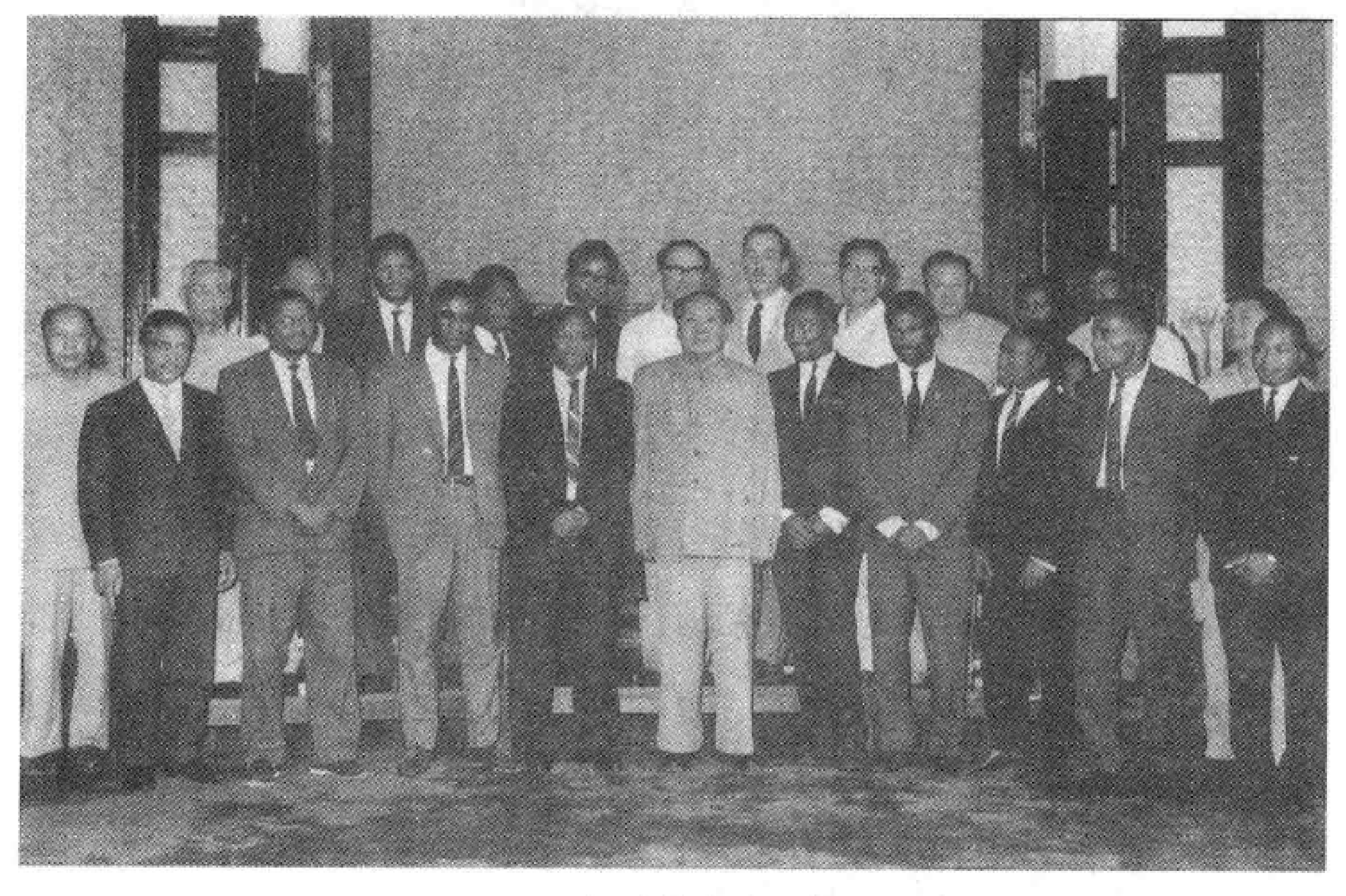
1966 年国庆典礼上，毛泽东主席为李敦白的"红宝书"签名。

从 1958 年斯特朗回到中国前后，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俩，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是这种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

从客观上说，"文革"前的政治舞台上，我已经是一个符号式的"通

天”人物，具备相当的政治能量。我的符号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这是毛主席亲自给我的封号，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姓名前面冠以国籍“美国”，以突显文章的国际性。我想这正是中国政府劝我保留美国国籍的原因，我显然获得了中共最高层的信任。早在 1955 年，也就是我出狱之前一年，苏联就公开承认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案”是一个错案，我这个受牵连的人也就清白了。几乎同样重要的是，我始终没有抱怨过中国，而且仍然非常热爱中国，工作努力，为人诚恳，因此我又是一个经受得住严酷考验的“老干部”。更不可多得的，我是延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是外国专家中仅有的几个中共党员之一，而且显然，我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也熟谙工作技巧。就这样，我成为中国政府对外联络的某种管道，也获得了与上层接近的良好机会。

1958 年斯特朗一到北京，我就带玉琳到北京饭店看她，在那儿，



1963 年，李敦白（第二排中间）参加毛主席接见非洲代表团。



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

美国　李敦白

李敦白赞扬“文化大革命”的文章。(1967 年 4 月 8 日《人民日报》)

我碰到周总理，他向我道歉。这是解放之后第一次跟周总理——曾经非常亲密的周副主席——面对面谈话。1963 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十八个非洲国家游击队的领袖，他请我和柯弗兰润色一篇应美国民权斗士、黑人牧师威廉（Robert F. Williams）要求撰写的声明，即《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我们俩参加了这次会谈，毛主席还以我为例，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此后，每年均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如 1964 年 1 月，参加《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工作的一些外国专家，还有斯特朗，应邀到中南海做客，毛承认在我的案子里犯了很大的错误，冤枉了我，还向我们介绍了“空话部部长”康生。1965 年底斯特朗八十大寿时，毛主席在上海，我和一些外国专家坐专机到上海举行寿宴，连身怀六甲的玉琳也参加了。这一次，毛跟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跟苏联之间的争论。这两次宴请，江青均作为优雅得体的女主人出场。1966 年国庆和 1967 年五一，我获得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庆祝观礼的殊荣。

1967年6月9日，我参加了由亚非作家常设局（Afro-Asian Writers' Bureau）召开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讨论会，与会者有来自三十二个国家的八十位作家，当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等中央领导接受与会人员，在一起拍了一张大合影。

另一件增强我政治身份的事，是参加中共重要文献的英译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选集》以及与苏联论战大文章的英文定稿工作。《毛选》第四卷英译定稿工作从1960年开始，参加的外国专家除我之外有柯弗兰、艾德勒、艾培和夏庇若，而中苏论战中的“九评”，我通常是唯一的英文定稿人。“九评”文章参与者众多，修改不计其数，我在感受信任和重用的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在紧急情况下，我还亲自进行国际电台的英文口播，有一次，竟然直接拿着中文稿播英文（记得是一个需要立即广播的声明），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后怕，这是多么危险的举动！中国高层如果对我没有完全的信任，也不可能让我做这种事，要知道，要是我喊出一句什么反动口号，全世界立即就知道了。

我的舞台甚至扩展到中国之外，扮演真正的“国际主义”角色。1963年，我作为美国人民代表团的一员，赴河内出席一个重要国际会议，支持越南人民的独立战争，因此认识了胡志明。一年之后，我又和斯特朗一起前往越南探望美国战俘，试图安排他们通过中国与家人通信，但越方没有同意。

所以，在“文革”初期炙手可热之前，我事实上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当我觉得单位的造反派受到压制时，我很方便地利用了与高层的关系。1966年12月18日，

工人体育场举行庆祝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六周年大会，有十万多人参加，周总理、康生、江青均出席了会议。会前，我抓住机会向周总理报告，说广播事业局的局长丁莱夫利用军队镇压民主，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会议期间，我看见江青坐在我前面两排的位置，给她递了一张纸条，说广播事业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正在镇压“文化大革命”，请求她的帮助。结果，当天晚上，江青就把我和一些造反派头头请到人民大会堂，一边吃包子一边布置夺权行动，她还让我推荐两位本单位的造反派代表人物一同前往。这样一来，我不但“通天”，而且简直可以决定同事的官运。


人民日报

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援越抗美最根本的战备

1966年12月18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庆祝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六周年”大会，有十万多人参加。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下，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在1966年的最后一天就夺了权。所以，我之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势之必至”。

再说说主观上又是如何“理所当然”。

我当时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左”，二是开始有所独立思考。

“左”的原因，又可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我二十岁前参加美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本身就是极左行动。纯洁的理想主义与苏式教条相结合，“左”成为我的思想底色。其次，我在中国已经坐过六年监牢，我害怕再犯错误。如何才能避免

再犯错误？那就是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不断革命思想指引下，解放之后中国政治运动可谓马不停蹄，如果以左右来分，当然绝对往左，不断往左，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第三，我是个美国人，又是个中共党员，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中共身上的弱点，不能让敌人通过我攻击中共，所以我又成为左道上的左。我后来常自问，如果我是个中国人，我会不会这么左？我觉得起码在程度上会有区别。

到60年代，我又获得了某些独立思考的能力。说起来令人奇怪，这种能力竟然是以翻译《毛泽东选集》为契机获得的。我亲历了解放战争，对毛主席，对其他中共领袖，佩服得五体投地，对毛泽东思想当然服膺崇拜。不过，翻译让我对毛泽东思想有了远比以往深入透彻的理解，我发现，毛主席的思想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不盲从，凡事问个为什么，甚至可以说，没有独立思考，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这种思考方式对我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回单位之后竟敢违背领导的意志拒绝参加某些政治运动，这一点也成为日后积极参加夺权斗争的思想基础。

显然，我的所谓“独立思考”是十分有限的，远非彻底通透，对毛主席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我就绝没有想过进行独立思考。由于长期生活在上层，做的又是文字工作，我对中国的情况也并不真正了解。这样，当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狂飙突起时，我由衷地欢呼一个大民主的新时代的来临，即使看出了一些问题，也认为是为了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和应当付出的代价，甚至悲壮地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充当中国前进的铺路石。当然，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也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1967年2月，我甚至成为广播事

业局三人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幸运的是，这一次，我保留了一点残存的理智，我要求，三人小组实际上由一位姓康的中国同事负责，而且，由于我坚持联合新旧造反派，在广播事业局实行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几乎在上任伊始就被剥夺了发言权。还好，“一个叫李敦白的美国人几乎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无线电广播大权”的指控只看到了表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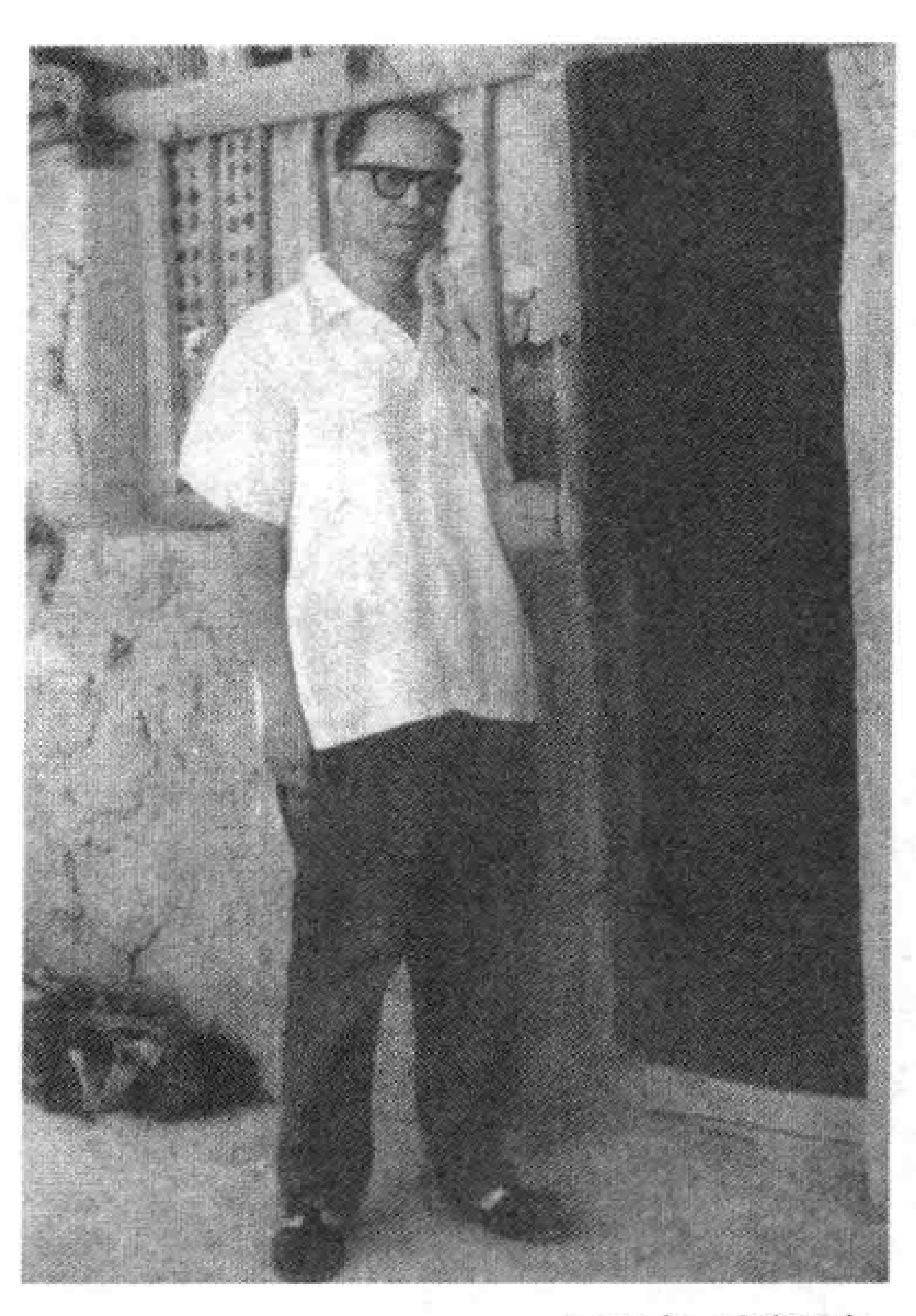


“文革”造反派名人李敦白在天安门广场演讲。

我被捕前在家软禁过近两个月，由单位的造反派审问我。他们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要搞“文革”？

我怎么“知道”？我当然不知道！除了毛主席本人，谁知道要搞“文革”呢？但他们这么问也有“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就在“文革”前，我的行为发生反常，标志性的事件是放弃优厚待遇，并处理了收藏数年的古董家具。第二，我对红卫兵谈了越南“内幕”，而有些情况应该只有政治局成员才有可能获得。

我的行为“反常”，就发生在1966年上半年，而且是在3、4月份之后，已经挨着“文革”的边了。表现是，搬出个人办公室，在大


1966年,重访延安。

办公室安放我的桌子，与部门同事一起工作；不坐小汽车，骑自行车上下班；参加义务劳动；节食减肥，体重急剧减轻；要求减少工资。更引人注目的是，把一直视作宝贝引为自豪的古董家具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可是审问我的人不知道，我的行为不是因为知道“文革”要发生，而是因为读了焦裕禄的报道，深受感动，深感自愧。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穆青等人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读完这篇文章，我泪流满面。焦裕禄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身患重病，坚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可我呢？养尊处优，大腹便便，简直亵渎了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我马上采取上述措施，作为向焦裕禄学习的实际行动。

说到捐献家具，除了学习焦裕禄这个契机之外，还有远因。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并没有高深修养的外国人，怎么会热衷中国的古代家具呢？这就要说到跟冀朝鼎冀老的交往。我们在“毛选”定稿小组相识相交，他是一个多面手，对中国文化无比热爱，是出色的艺术鉴赏家。他担心中国的古董家具随着外国使领馆人员的回国大量流失，在没有完善的文物保护制度的情况下，展开个人收藏。他还动员身边有

第七、八期　（副刊）
上海市中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李敦白同志在与上海革命造反派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编者按）：李敦白同志是美国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共党员，一九四五年来华到延安参加革命，现为省部广播事业造反派负责人。

发表在 1967 年 7 月《中教造反报》上的李敦白讲话节录。

经济能力的朋友一起来做这件事，就我所知，艾德勒、柯弗兰这两位冀老的老朋友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我们约定，在适当的时机，将各自的收藏捐给国家博物馆。冀老在 1963 年突发脑溢血去世，我也早就有了捐献家具的打算，还曾跟玉琳讨论过。“换家具”成为我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关于越南的“内幕”，则是我不谨慎、信口开河的结果，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幕。

我成为“文革”红人之后，虽然在单位并无实权，但全国影响很大。我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视野比较开阔，又擅长宣传鼓动，还是个“国际战士”，看起来很适合充当“发言人”角色。我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出席各种高层活动，应邀到各单位做报告，接受



各國革命人民熱烈歡呼
中國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他們和我們并肩战斗

在京外国友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1966 年 10 月 9 日《人民日报》)

采访，俨然权威人士。1967 年 5 月的一天，我一进单位，就被一群武汉红卫兵包围，他们非得让我谈谈国际形势。在取得不对外泄漏的保证后，我开始畅谈世界各国的革命形势，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越南。我说，越南劳动党两次宣布要解散，结果没有解散，欺骗自己的老百姓就是不讲信义。我还说了越南劳动党对中国的态度，等等。更要命的是，我谈到了以下问题。我说，南越抵抗军最高领导人最近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前越南驻中国大使也于近日死于心脏病，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们两位都是亲近中国而不接受苏联调停计划的。结果，第二天一早我就发现闯了大祸，我的讲话被登在了武汉红卫兵报纸的头条，听说“中央文革”的王力在头天晚上就命令卡车出动，四下搜寻销毁这些报纸，以免造成国际事端。

还有一件事需要作个交代。1968 年入狱时，对我的指控是美国特务，CIA，还说我在中国建立了一个特务网，在延安发展王光美，又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这种荒谬的指控，似乎也有迹可寻，就像上一次指控我是斯特朗国际间谍网成员也找到了“证据”一样。这一牵连有三根线。一根是上述关于越南的谈话，误以为我的胡说八道来源于上层消息。第二根，是在延安与王光美一起吃过两次回锅肉。还有一根，我都记不清细节了。从延安撤退途中，王光美曾托我带一封信到河北某地，说到时会有人来取。审问人说是给她的资本家哥哥王光英带信。这下牵连的范围就更大了。中国有句成语叫“欲加之罪，何患

无辞”，太对了。

这些，可以说是“事有巧合”吧。

九、又一次“特殊任务”

1968年2月21日，我第二次被捕。这一次，和第一次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我在承担“特殊使命”的兴奋期待中突然被抓，就像遭遇晴天霹雳，就像一个人正走向美丽的风景，突然一脚踩空，掉入万丈深渊。第二次不同，我知道为什么抓我，而且心理上有所准备。还有一个不同是，第一次，我跟中共领袖有亲密接触，有个人感情，而且被关一年多后就说已经了解我了，监管条件也随之改善，我对出狱比较有信心。第二次，我知道自己“获罪于天”，重获自由的希望渺茫。所以，第二次入狱，我面临新的考验。不过，第一次坐牢的经历对于度过第二次劫难仍然有很大帮助。

1967年圣诞节，我被软禁在家。在此之前，挨整的迹象已经逐渐显现。该年8月份，我们的三人小组下台，另外两人都被安排了新职务，对我则说将调离广播局，另有特别任务。我并未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虽然不像第一次那样毫不怀疑，但没料到会受到如此严酷的惩罚，当时觉得今后不会被重用了，但仍会给我工作。我的一些好朋友则觉得不妙。“照片事件”一出来，就想到要受处分了。6月份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召开的纪念“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时，曾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合影，某个报刊登出这张照片时，上面没有我，把我抹掉了，但是呢，《工人日报》或是别的报纸登的这张照片中又有我。

我倒不认为是技术问题，而是觉得上层对我的看法有分歧，意识到会对我作一定的处理。但我没想到还会被投入监狱单独监禁，原以为这种残忍的监禁方法早就不存在了。



1967年6月9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参加由亚非作家常设局召开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讨论会，毛泽东和林彪坐在前排正中位置，前排右四周恩来，左二江青，左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四排右二李敦白。与会者来自三十二个国家，共八十人。此照片为局部。

被软禁后，一般情况下不许出门，但有一件事例外：每星期二中午仍然到斯特朗那儿吃中饭。他们知道，要是突然看不到我，老太太会闹情绪。我的第一次被捕，是受斯特朗案牵连——当然与她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此后她把我当儿子看待。软禁期间，由电台保卫处的人负责审我，我去斯特朗家，他们也派人暗中跟随。这时我知道我会被捕，中联部有个朋友给我透露，说软禁两个半月内就会抓捕。我也想过，是不是到西方国家的大使馆避难，但那样的话，一大家人怎么办？我没有想过向斯特朗求助，相反，装作一切正常。老太太八十多岁了，我不愿意惊动她，给她增加压力。我开始做准备，最怕的是他们不给我书看，我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让刚上小学的老三帮我背

熟了“老三篇”。[①] 果然，过了差不多两个月，1968 年 2 月 21 日深夜十一点，我家的门被敲响了。电台保卫处的人进来，说王寿仁副局长找你谈工作。我说好。我跟玉琳告别，亲吻了孩子们，在那个特别寒冷的冬夜走出家门。我上了车，被两个解放军战士夹在中间，单位的保卫干部没有上车。

我心里大概有数了，但也还残存一丝侥幸。车从复兴门往西单方向开，我想，到西单路口，如果继续往前开，那就真的是谈工作；如果左转，那就是进监狱。

车向左转。我直接进了秦城监狱。狱方正式宣布我被捕了，我只说了一声“是”，他以为我没听清楚。他们让我看了逮捕证，上面有十三位中央领导的签名。最让我震惊的事，是发现竟然还有单独监禁，原以为这种精神酷刑早不存在了。单独监禁在美国用得最多，现在正在受到猛烈抨击，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制度。看到过道两边一间间大铁锁背后的牢门，我感觉那是一个个大冰箱，里面的人正在悄没声息地被冷冻，被活埋。这种感觉非常可怕。

第二次被抓的原因，没有正式宣布过，我自己分析有几件事。有一件是明显的。1967 年 2 月，我被指定为电台三人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一时出尽风头，到处做报告，接受采访。言多必失，尤其是关于越南的谈话，几乎酿成政治事件。但更深更远的原因，我觉得首先是得罪了江青。江青到电台来讲话时，明显是支持老造反派的，我却说老造反派压制对方，不民主，已经成为新的压迫者，不应该再支持。这就直接与她顶撞了。惹了江青，对“身体健康”不利。

---

① 毛泽东所写的三篇短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合称，是“文革”时期普及程度最高的毛泽东著作。

我第二次出狱以后，原来专案组的一个成员来看我，他当时是电台的政治部主任，是从部队来的。他说我被软禁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给上面打了报告，说这个人说的是实话，确实没什么问题。江青把报告打回来，说我们知道他有罪，你的任务是让他讲出来。

审讯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很厉害，但我不像第一次那么害怕。他们指控我是美国特务（我也因此知道了自己的罪名），说上一次被你溜过去了，这次休想，你知道，坐牢的滋味可不好受，这次只会更难受。我说大话，说我准备把上次见过的鬼统统再见一次。审讯人有时威胁我，说你今天不交代，明天早上就把你拉出去枪毙。我引用了美国独立战争中一位英雄的话，他在被英军吊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条命贡献给国家。我说，我遗憾的是只有一条命献给“文化大革命”。

我想，刺激是别人的事，怎么反应是自己的事，若对他们的刺激做出激烈反应，自己受害。我也不能挑衅，必须服服帖帖，但有些事情，明显不合理，我也不听。如他们让我不否认，那我不能干，我不能不否认特务指控。有一个哨兵让我把眼镜交给他，我不给，把他气得拿一根长竹竿从监视孔捅我——哨兵没有牢门钥匙，我只好躲在角落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要求，想整人吧，有些人就是坏。有时候晚上刚一睡着，就有人重重敲门，大概是哨兵，没什么事，就是不让我好好睡，捣乱。被吵醒后，我接着再睡，尽量少受影响。牢房大铁门的关门声，那个响啊，我到现在还有严重的耳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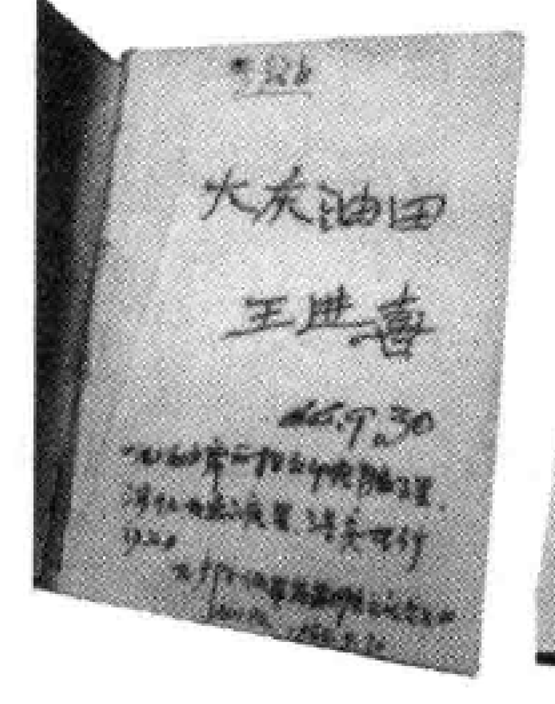
我觉得还有个情况与第一次不同。第一次，我想审讯我的人真的相信我是美国特务，第二次，我觉得他们并不真的相信，有时候明显是在演戏。审讯的负责人还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无产

阶级司令部？如果真把我当作美国特务、反革命，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人非常像以前的徐科长。他有时候还跟我发牢骚，说你晚上能睡觉，我们还得搞资料，累得很。

我知道我的案件跟王光美有关系，是因为王光美的专案组老找我，问我跟她的关系，问延安吃回锅肉的事。说我发展王光美加入CIA，她又发展了刘少奇，那都是后来听说的，审讯时不会说出这么明确的线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是他们想整刘少奇，后来想整周恩来。他们问我和周相识的过程，在南京的见面，特别留意他跟外国人的关系。

前面讲过，第一次坐牢时，我的幻觉和梦境都没有出现美国，这次却梦到了美国。我梦见自己在纽约一个大礼堂做报告，讲了一会儿，听众没有一点反应，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在讲中文。我说：对不起，我刚才讲的是中文，但中文是毛泽东的语言。这个梦重复了好几次。我做梦不多，但一般都是好梦，醒过来，哎呀，还在这地方，心情就很糟糕。每天早上醒来，慢慢意识到还被关在监狱，好像自己都不能相信，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那么沉重。后来我编了一套说词，每天早上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背这套词，把情绪调整过来：我是谁，我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干，还有要好好学习之类。

学习仍然至关重要。抓我时，就允许我带“红宝书”，我带了毛主席亲笔给我签名的那本《毛主席语录》，入狱第一年，只能看这本书，大拇





右为毛泽东在“红宝书”上的签名手迹，左为“铁人”王进喜在前一页的留言和签名。

指翻动的一角都被汗水渍黄了。这本书现在还在。一年后，我可以看书看报。让我看报听说还是周总理特批的，我听送报人的声音判断，刚开始我们那个楼层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看报。后来慢慢扩大，直到所有犯人都可以看报，而且看的是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我不怕枪毙，怕不给看报。看书是从监狱图书馆借，先在书单上选择，好像每隔一周，管理员推着小车送书。大概 1972 年或者 1973 年，让我开书单，他们派人从我自己的藏书中取书。我要了莎士比亚戏剧，旧圣经等等。看到自己的藏书，我是多么的激动啊，可惜，我想在里面寻找家人信息的愿望落了空。心里是很钝的痛，令人窒息，但我知道必须忍住，要想再见到她们，我就不能思念她们。

这一次，我的精神没有崩溃。首先我是清醒的，不抱“考验”的幻想。其次，“文革”这样的疯狂中，眼见过多少离奇古怪的事，多少人被打倒，多少人冤屈而死，我的遭遇在当时很“正常”。第三，我得做好万一能够出狱的准备，否则，机会来时成了废人就太悲惨了。第四，即使不能出去，我还活着，每活一天，都要活得有意思，不然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我老想着女拖拉机手梁军的一句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心里没有恨，如果恨，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

我对“文革”也没有怀疑，我的唯一信息来源是《人民日报》，我以为一切都很好。直到出狱之后，我才对这段历史有所认识。后知后觉。我出狱一两天后，我们一家在友谊宾馆散步，王玉琳突然骂起康生来了，我很震动，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中央领导。我儿子说，爸爸，你说话跟“四人帮”差不多。我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劝我，说你就听你爱人的吧。

第三部分 | 智慧疗法

从 1945 年 9 月来中国，到 1980 年 3 月回美国定居，我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半，度过了我的青壮年时代。在这三十四年半中，两次坐牢，第一次从 1949 年 2 月至 1955 年 4 月，六年多；第二次从 1968 年 2 月至 1977 年 11 月，差不多十年。加起来十六年。而且都是处于最无人道的单独监禁中。两三年前，《纽约时报》有位著名作家发表文章，说一个人若处于孤立状态，过不了多久就会精神崩溃，单独监禁的犯人没有不陷于精神分裂的。我给他写信，说这不符合事实，我曾被单独监禁十六年，在美国做过多次精神健康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精神方面的后遗症，而且，在中国，我的情况不是特例，“文革”中坐牢而出狱后仍然能够正常工作的人很多。他很惊奇，建议我就此写一本书。为了准确评估自己的精神状况，排除健康隐患，我咨询过好几位有名的精神科医生，应他们要求，我详细叙述了在监狱里的心理状况以及自我解脱的方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著名心理治疗专家感叹：这个人在牢里自己摸索出了一套智慧疗法（Cognitive Therapy，即“认知疗法”），这套疗法，我们这些专家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

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这些方法也并不是我的创造发明，有许多都是在中国学的，或者是在中国的思

想指导下获得的。不过，要是没有这一套“疗法”，要度过那漫长的十六年确实是不可想象的，我想，这些方法对于我们战胜日常生活的困难、获得人生意义也有帮助，所以我准备第一次对此做完整的叙述。

有一点需要事先说明，在目前安宁自由的环境中叙述这些往事，当然可以比较有条理有系统，但在当时，以下想法和做法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出现一点，我就拼命抓住，尽量扩充，慢慢地拼凑成比较完整有效的体系。这个过程也经常被我自己打断，有时候，愤怒、伤心、绝望的情绪会把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脆弱防线冲垮，这个时候，又得重新来过。幸运的是，总的来看，我为自己修筑的防线越来越牢固，最终得以保护自己，直到回到正常人的世界。出狱之后，到今日，差不多三十六年即将过去了，如果我没有在监狱里保护好自己，不能想象会有重新创业和美好生活的晚年。有时候，我甚至想，如果没有那十六年，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我不可能想做并做成后来的那些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牢又成为造就我的所在。人生真是难说得很。

这套“智慧疗法”，首先是认识层面的，明确自己的处境，分析自己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学会理解和接受现实；其次是行为层面的，尽量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第三是当出现负面情绪时，自我消解的一些方法。

一、理解和爱让我宽容

我的两次被捕，都是在“执行特殊任务”的名义下被带走的，如

果说第二次我多少有些心理准备的话，第一次完全是晴天霹雳。那一天，廖承志向我宣读了一项由刘少奇签署的任命，让我前往北平执行特殊任务。1949 年 2 月，解放战争正在顺利推进，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执行特殊任务”正当其时。我在宣化店和张家口都亲耳听到而且亲自翻译了中共高层对美国代表传达的信息，即中共掌权之后希望与美国友好相处，从美国贷款进行建设。聂荣臻司令员让我充当“架桥”的“工程师”，我一直在新华社做英语翻译、校对和润色工作，我这个“工程师”对于架设中美之间的空中桥梁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以为，我的忠诚、贡献和能力得到肯定，他们需要我架更宽的桥，而且是在现实中。我的心飞了起来，恨不得一步跨到北平。

当然我不会飞。我和师哲一起坐上一辆吉普车，在早春的严寒中上路。过了一会，随行的军人借口忘带热水瓶，我们转回到一个名叫“回舍”的村庄，进入一个高墙中的院落，在我等着喝茶的时候，突然宣布我这个“美国特务”被捕了！

我像被打了一闷棍，眼前直冒金星，站立不稳，几乎晕倒。美国特务，怎么可能？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个感觉是不相信，不相信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搞错了，一种是考验。我的应激反应是“考验”，为了试验我是否具备执行特殊任务的能力，他们需要通过特别的方法加以考验。“考验”这种念头，不是基于我的美国生活，而是从延安经验中得来的。我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但我的新华社同事，许多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不少人落下了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后遗症，所以我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师哲和其他人的审讯中，一直让我“端正态度”、“坦白交代”。我的态度没有问题，但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实在逼不过，有一天，我自作聪明地想到了“诈降”的办法：承认我

是个美国特务，受美国政府指派打入中共，收集情报。我不想牵连任何人，即使已经离开的美国人也不行，因为他们总会有些中国熟人朋友，所以，我把自己编造成一个“独行侠”，不但从来不需要别人配合，连把收集到的机密传回美国，也是独自通过特别渠道完成的。我想，我认了罪，他们会把我判刑，我会到一个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服刑，我一定好好干，让他们重新认识我，最终意识到冤枉我了，把我放出来重新工作。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悲情英雄，但这个悲情英雄经不起经验丰富的师哲的追问，只问了一句，他就知道我是编造的，而我也开始放声大哭。师哲很生气，他一边快速地来回踱步，一边说：看来我们高估了你的觉悟，我们得重新来过。他的话，更让我误会成这是对我的考验，而这种误会，严重地妨害我面对现实，实际上起了非常消极的作用。我以前说过，1949 年被关起来的第一年，我的精神崩溃了，出现各种幻觉，做出各种怪异行为，包括吃墙粉，吃蛆虫，甚至吃自己的大便，幸好我心底始终保留了一线清明，那就是我知道我病了，我是不正常的，我需要恢复，我不能就这样毁了。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最混乱的时候，还不到完全失控的地步。

后来终于认定不是考验，认识到他们搞错了，他们把我误会成美国特务了。我说我不是，但他们不相信。怎么办？我一点一点慢慢理解并接受他们的误会。

首先，我认识到这种误会确实是有原因的。我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我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以美国军人的身份来到中国，积极主动地接近共产党，最后到达中共中央的核心地区而且承担非常重要的工作，与中共领袖近距离接触。他们知道我什么呢？他们所知道的无非是我自己讲述的，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信息来源，而我所讲

述的，在他们看来也不是没有漏洞，如在北卡州一个纺织工会的会议室挂毛主席像的事，就受到质疑。说到底，我们曾经处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彼此隔膜是非常正常的事。北卡的共产党书记不是说过吗，印度的共产党员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永远也不会相信一个美国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太深了，而美国，正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我在太行山和魏琳结婚时，支部书记曾经私下告诫过她，让她慎重，说除了我自己所说的，党对我一无所知。因此，我被弄错，实在“情有可原”。

第二，我这个人不是没有缺点，这些缺点导致他们怀疑我，同样可以理解。在接受我入党时，我就对安子文表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标准，我并不是一个好党员，但我愿意学习。这个说法让他有些吃惊，在我，则是由衷之言。特别是从延安撤离途中和到东柏坡之后，我的缺点暴露得非常充分。

国民党对延安的轰炸让我吓破了胆。我虽然是军人出身，但并没有亲历过战场。我惊恐万状，好像身不由己，一有风吹草动就拼命跑，到处躲，经常不跟队伍一起走。想想看，我的同事们简直把这些炸弹当作礼花，三个多月的转移途中，新华社广播一天没有中断，出版工作也一直以各种方式继续，在轰炸的间隙，我的同事们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立即进入工作状态，我的惊慌失措，确实让自己变成白天鹅群中那只唯一的黑天鹅。

到达太行山后，我与魏琳结婚，沉浸在巨大的新婚快乐中，为了个人幸福，甚至置组织纪律于不顾。新华社各部门分散在多个村子里，我所在的部门和播音室不在一处，按规定，已婚夫妇周末才能团聚，而我无法忍受新婚的别离，每天都到播音员妻子那儿去过夜。电

台的领导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播音室是个严格保密的地方，一旦被破坏，后果难以设想，尤其像我这样外貌惹眼的外国人，在周围来来去去，危险万分。而且，这是组织纪律，谁都得遵守，如果我不遵守，同志们不但会对我生气，而且会对组织不满。但我听不进去，我去找廖承志，说我需要在晚上辅导魏琳英语。他一言未发，我就当他默认了，照去不误。

还有一件严重违反纪律的事。1948 年，我发现自己传染上了肺病，进医院疗养了一个月。一天，我在外面散步，碰到医院政委，发现他情绪兴奋，便问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中央军委刚刚召开了一次会议，制定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并详细描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支部队的作战计划。我激动万分：我们朝思暮想的最后胜利看来终于要到来了！一回到新华社，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同事。我不知道，我泄漏了重大军事机密。支部书记批评了我，让我在英语组做了检查。

我的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源自中美文化的差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做得不够好。我让他们失望了。

经过一段时间，我终于想明白，我被怀疑，被弄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会不时感到愤怒，我这个人是很直白的，他们应该知道我，我从来不撒谎，了解我并不难，为什么他们还会弄错呢？在监狱里，愤怒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情绪，它会导致精神失常。慢慢地，特别是在第二次坐牢时，我把愤怒的情绪也控制得很好。在这方面，我的方法是“宽容”，是“爱”。

我被误解了，坐牢了，而且投诉无门，谁碰到这样的事，都会生气、愤怒、绝望。毫无疑问，他们犯了错误。不过，是不是因为犯

了这个错误，他们就是些恶人、坏人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邪恶的呢？答案当然是“不”。这个时候，需要把自己缩小，同时把自己放大。把自己缩小，就是把自己放到整个事业中来衡量，把自己作为一个特别的个案来处理，这个个案错了，但他们的事业没有错，我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我明白，即使在第二次入狱时，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依然贫困，但是，我问自己，如果小木仙活在现在，她会被一个美国大兵撞死吗？她的生命会牛马不如吗？不会的，虽然我对中国民众的疾苦是有隔膜的，但我知道新中国的这些基本事实：人均寿命大大延长，医疗保障大幅改善，普通民众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所以，我没有理由怀疑整个事业的伟大和崇高。好吧，他们对我这个人搞错了，但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犯点错误不可避免，这个错误犯在我的身上，让我痛苦，让我受难，确实倒霉，但既然这些错误在发生，为什么就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呢？这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我既然自认为是他们中间的一员，那不是意味着分享他们的光荣，同时分担他们的苦难吗？如果我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高尚的。

这种把自己作为整个事业一员的想法不但安慰了我，而且鼓舞了我，让我在缩小自己的同时，又把自己放大了，放大到能够包容那些迫害我的人。不过，我发现，有些事情完全靠理性解决不了问题，制服一种强烈的情绪，得用另一种更加强烈的情绪才行。我曾经想求助于宗教，无奈我从小就不信教，宗教帮不了我。有一天，头脑中突然出现一首诗，它极大地帮助了我。真奇怪，我并没有刻意去寻找它，我的头脑中就像有一个 google 搜索引擎，我需要寻找帮自己脱困的资

料，可我不知道搜索关键词，只好模糊搜索，很幸运，我需要的资料自己蹦了出来。

这其实是一首儿歌，小时候生病，我的姑姑和姐姐都给我读过：

他画了一个圈把我排除——
说我是可笑之人，是异端、叛徒。
但爱给了我反败为胜的智慧：
我画个更大的圈把他围住。

是的，他们错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错了；我知道他们错了，所以我应该原谅他们。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要用我的爱画一个更大的圈包括他们，把我们重新包围在一起。

就这样，我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重新获得了与中国共产党事业的一体感。这种一体感是我能够度过漫长监禁生涯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担心：不能让外界知道他们把我弄错了，这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所以，1955 年公安部七局局长凌云向我宣读无罪释放的通知、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向我道歉时，我反而受不了。我天天提醒自己，党审查我是正义的，接受审查是我的革命任务，现在突然说“错了”，让我无法接受。我一下子放声大哭，我连说：不要道歉，不要道歉……我想别人不能理解，我的感受是，我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因为我而蒙受一丝一毫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他们需要向我道歉，那就说明在我和他们之间有一条界线，我们并没有被完全画在一个圈内，这样的话，我的一切痛苦，一切忍受，一切牺牲，一切屈辱，最终都会变得无足轻重。

二、辩证法帮了大忙

一旦平静下来，我就能够对自己的处境做出理性的判断，并寻找活下去的办法。这时候，以前学习过、思考过的东西一下子涌现出来，从各个方向上提供帮助。

其中帮助最大的，是辩证法思想，尤其是分析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然后运用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的方法。

大学里的哲学课对我影响很大，从黑格尔的辩证法，我第一次知道事物内部存在矛盾，矛盾双方还能够相互转化，这在我的思想上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终身受用。但对我影响更大的，是中共领袖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前者帮我解决总的问题，包括人生的目标、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后者提供具体分析问题的范例和方法。

对刘少奇这本书，我一开始并不认同，在宣化店的时候，我就请教过位老郑位三，他给我讲了三天。延安时期，还曾当面与作者谈过。主要是不认同党的利益与党员个人利益有矛盾的说法，我认为没有矛盾。没想到，在监牢中它成了我逃生的有力武器。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认识到确实存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也认识到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这本书教我辩证地看待两者关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则一读之下就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作者惊为天人，他对中日战争所做的预测，后来大致一一成为现实，包括战争三阶段及各自特点，中日双方各自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甚至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参战，等等，只有少部分如日本国内将发生革命未曾出现。

我曾经问过陆定一，这篇文章是否在抗战胜利后经过修改，据他说，毛主席的许多著作后来都做过修改，甚至大改，但这篇文章则基本未动。我在牢里用得最多的自救方法，就是寻找自己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争取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我的有利因素有三方面。第一，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目标，这从十八岁之后就没有改变过，到中国以后，这一信仰和目标已经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第二，对方不了解我，而我了解对方；第三，我懂得哲学，对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化已经有一定的了解，有学习能力。这些东西，即使我失去自由，别人也无法剥夺。下面我分别来谈这三个有利因素。

首先，坐牢并不能改变我的人生目标。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人生目的这个问题，“从何处来，到哪里去？”这是一切哲学和宗教都要回答的问题。美国有个说法，Life hard ,then you die——生活艰辛，然后死灭。这样看来，人生真是无趣得很。人总要在这无意义中找出意义，才有生活的勇气，才有前进和向上的动力，而人只有在超越自我价值和利益时才会获得最充盈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就是最高的人生意义。所以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始终抱有信心。不是吗？向善，助人，公益，才会使个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安宁，即使为了“利己”，你也得“利他”。

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遭遇了严重的“人生危机”，其实就是青春期忧郁症，这在美国很常见。过完懵懂的童年，一个真实的世界慢慢在你眼前展露轮廓，你紧张，你害怕，你不安，看看你周围的成年人，大多庸庸碌碌，好的辛勤养家，坏的喝酒生事，你会对人生产生

第一次大的怀疑：我的一生也会这样度过吗？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艰辛一生，然后死，与现在就死，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很怕我会自杀，但我又非常讨厌自杀的念头，心里挣扎得很厉害。

我开始和小姑娘约会，从中感受生活的甜蜜和幸福。我想，找一个理想的爱人，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养育自己的儿女，这就是我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然而，这样的甜蜜和幸福始终无法填满心中巨大的空虚，“人生无味”的感受挥之不去。上大学后，学哲学，学辩证法，知道人的理性的力量，思想的威力，这有助于减轻人生的虚无感，但直到找到共产党，投身劳工运动，这种虚无感才最终离我远去，而且一去不返。参加共产党以后，我就像一支火箭被送到很高很高的天空，轰然爆炸，倏忽间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多么广阔多么美丽的世界，我感到幸福极了。所以，我的幸福感，是跟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是不可能放弃的。这种幸福，就是我的人生可以为别人带来改变，为别人带来幸福，或者也可以说，可以为别人减少不幸。你看，我在美国组织工会，为劳工讨回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学习，使他们自觉追求权益，反抗不合理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我脱离了我出身的阶层，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且面临危险，但我确实非常充实，非常幸福。到中国之后，我这个前美共党员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一见如故，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可亲，从昆明的李国华、程白澄，到上海的徐迈进、蒋建忠，从宣化店的李先念、王震，到南京的周恩来、章文晋，从张家口的聂荣臻、蔡树藩，到延安的众多中共领袖，我热爱他们，尊敬他们，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与腐败的国民党不同，他们在为民众幸福而不是个人私利奋斗，我毫不犹豫地认同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全心全意地投入中国革命，在共产党掌权

的地方，我由衷地感到幸福，到这些地方，就像到了天堂。我多次说过这句话，可见我的感受之深。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美国，在精神失常的一年中也没有出现过美国的场景和亲人，我是真的爱中国。说到底，我的幸福观就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奋斗，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精神。这个人生观一旦形成，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动摇。每当我怀疑自己的时候，查尔斯顿那个挨毒打的黑人青年和昆明的小姑娘李木仙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为了他们这样的人，我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现在我坐牢了，我的自由和尊严被剥夺了，但是，我的人生观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相反，我要更加维护我的理想和信念，我不能让坏人把我摧毁，决不能出现以下这种情况：万一将来能够出狱，而我已经变成一个傻瓜。我知道夏明翰烈士的故事，会背诵“砍头不在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主义真”，对我来说同样具有超越生命的意义。

其次，他们不了解我，但我了解他们。

我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曾经是一个美国军人，到中国后热情地寻找中国共产党，一年之后就到了延安，中国革命的心脏地带，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地位重要，私交众多，离中共核心这么近，然而他们却无法了解我的底细，除了我的自我介绍，除了我的表现，他们还知道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在延安非常受尊重的斯特朗女士已经在莫斯科被捕，罪名是美国间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传来情报，说我和斯特朗是一伙的。怎么可能不信老大哥的话！即使不信，万一我真的是坏蛋呢？多么危险！抓起来审问清楚总不是多此一举吧？所以，事实上我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了解他们，明白他们的动机，也理解

他们对我的粗暴和不公，他们则对我不摸底。

第三，我有较好的知识基础，有学习的能力。

我所拥有的知识中，最最重要的是我学过哲学，我会思考，会分析。第二次坐牢期间，我的隔壁曾经关过一个人，成天又叫又闹，显然精神分裂，从他经常骂“觉悟号”、“B52”可知，这是林彪集团的一个成员，而且是个武将。我有点得意地想：你这叫有勇无谋，在战场上我恐怕不是你的对手，坐牢你就不行了，因为你不会思想。

对于单独监禁的犯人来说，允许阅读、写作是一个极大的恩惠。在中国坐牢，阅读外文书报当然不现实，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在第一次坐牢时，我也已经有比较好的中文阅读能力，在刘少奇的建议下背过许多中国成语，读过几部古典文学名著。第二次坐牢时，我的中文更加熟练，不但现代汉语没有障碍，古文也专请老师教过，有相当的基础，学习的能力是具备的。尽管如此，当我从精神分裂边缘刚走回来时，我的学习能力也非常薄弱。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小哨兵在门外自言自语：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学习，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听到这话，我猛然一怔，觉得他是对我说的。我想，对，我必须学习。我要求给我报纸书籍以及纸笔。这些要求在我被押送到北京市监狱、各方面条件有所改善之后，得到了满足。他们先是给我送来三个月之前的旧报纸，后来慢慢可以看近期的报纸，也可以借书，看完一本，再借另一本。由于受过极深的打击和刺激，刚开始的时候，我的阅读变得非常困难，每一句话都要看好几遍，才能理解意思，而且每一遍都极慢极慢，句子和句子，段落和段落，也难以连贯。但终于逐渐恢复了阅读能力。在北京的监狱，我还获得了写字台，以及毛笔和纸张，我开始学习写毛笔字，当然写得极难看。单独监禁

的极大问题，是说话能力下降，舌头好像变得很大很重。有的哨兵同情我，值班时偷偷地跟我说会儿话。

第二次坐牢，我随身带着毛主席亲笔签名的《毛主席语录》，一进去，我就要求看书看报，这次很快就看到了报纸，当然只能看《人民日报》，先是看旧报，后来可以看当天的报纸，所以对外面发生的事情有个大致的了解。林彪事件之后，我在监狱的待遇得到改善，不但伙食大为好转，而且允许我开书单从自己的藏书中拿书，我要来了黑格尔的书，康德的书，莎士比亚的书，还有英文版的《资本论》，这些书让我与这些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有了对话的机会，我觉得这些人就生活在我的囚室中，时时与我说话，跟我讨论，帮我分析，他们给了我无穷的智慧，帮助我忍受铁窗生活的煎熬。除了他们之外，我的牢房里还不时出现我所认识的英雄人物，包括美国的和中国的，他们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力量，坚持，期待，准备。

尽管有以上几个有利因素，但我的不利因素是压倒性的。显而易见，首先，我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自由，更可怕的是，两次坐牢，都没有经过法院审判，也没有宣布刑期。我完全不知道，我有没有出来的可能；如果可能，什么时候？这种不确定性让我的煎熬成倍放大。其次，我被误会了，被冤枉了，而且孤立无援，申诉无门。除了审问我的人，我无法接触别人，没有上诉渠道，而审讯人显然认为我是一个拒不交代的坏蛋，他们有时说：你比蒋介石还坏，蒋介石还承认自己的失败，你连自己干的坏事都不肯承认。

怎么办？

我得想办法尽量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哪一方面垮了，我就完了；我还得想办法让监管我的人以及他们的上级慢慢了解我。这两个

方面，我都找到了一些方法。

三、尽可能保持身体健康

精神方面的健康，主要通过学习、思考来保持。身体方面的问题同样严重。第一次入狱，当头一棒，把我从天堂直接打入地狱，晕晕乎乎间，接连受到严厉的审问，威胁、恫吓、引诱、辱骂接踵而来。我没有挨过打，但在情绪失控时，多次被上手铐，我在挣扎中昏死过去，醒来发现手腕上满是割破的伤痕。牢房很小，一大半地方还被土炕占据，余下的空间只能走三四步；窗户被木板钉死，成天黑乎乎的，晚上有一盏昏黄的小油灯。审问时充满恐惧，留在小黑屋时则像被整个世界抛弃，不，比抛弃更坏，在荒原上我总还可以到处走走看看，寻寻觅觅，在这个小黑屋里，就像被活埋，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同情，没有友爱。真是生不如死啊！我第一次出狱之后，巨大的精神创伤给我留下恐慌后遗症。这种病美国退伍军人中很常见。说不准什么时候，可能你在路上，可能你在开会，可能你只是静坐着，突然就出汗、心慌、紧张，头上像戴了个紧箍咒，勒得生疼，十分恐惧，好像曾经使你疯狂的那些感觉紧紧追赶着你，要把你抓住。这些症状也就持续一分钟的样子，随即消失，但我害怕极了，怕自己再次发疯。我谁都不敢说，连家人也不敢说，因为怕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我从谵妄中慢慢醒过来，大概在一年之后，那时我已经被移到北京的监狱了。有一段时间，我待在一个小院子里，旁边是看守的宿舍。这些看守待人比较好，他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蔬菜花草，在春夏

季节里生长得蓬蓬勃勃。我也慢慢回到了人间。一天，我从一盆水里照见了自己的面容，着实吓了一跳。这是我吗？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吗？脸色灰暗，皮肉松弛，神情沮丧，眼光绝望。这副样子连我自己都讨厌。看守说，你得动起来。他给了我一块抹布，让我打扫卫生。一开始，我的头脑和手脚根本不懂得配合，拿起抹布却忘了要干什么，接好水又弄湿了床。我慢慢地理出动作的次序，先拿抹布，再拿水，然后将抹布浸到水里面，拧干，擦床凳小桌，擦墙，先低处，后尽量伸长身子往上够。每天重复，动作和脑子都慢慢条理化，也懂得相互配合了。后来又增加了擦地一项。看守每周一次把墩布递进来，让我拖地，但我听出来，墩布是在马桶里洗的，得有多脏！我把小抹布撕下一半擦地，看守来送墩布时，告诉他我的地很干净，不用拖。他不信，用手抹了抹，果然干净，从此就不再给我墩布。

我在做清洁时，告诉自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小片国土，现在由我负责保护，我得保持清洁，不让它被玷污。所以我的牢房是最干净的。第二次坐牢时也一样。

我还自创了一套运动方法，每天坚持锻炼。先在小小的空间里跑步，顺着跑几步，再掉转方面跑几步。再做自编的体操，伸腰，扭胯，跳跃。第一次做时，受到看守的训斥：你在干什么！大概他以为我又发疯了吧。我说，犯人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允许进行对身体有利的活动。后来就没再管我。第二次坐牢时，我已经学会广播体操，以前在机关常和同事在工间做，这套东西在牢里也派上了用场。

既然我申诉无门，如何让别人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呢？关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监视孔其实可以成为我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管道。

四、监视孔成为我与世界沟通的重要管道

所有的牢房都有监视孔，秦城监狱则除了门上的那个之外，便池处还有一个。我特别讨厌这些监视孔，我是个美国人，有比较强烈的privacy（隐私）观念，我坐牢，与这个世界隔绝，我是孤独的，同时又是毫无隐私的；我没有自由，连不被看的自由也没有。我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我就像个透明人。这种感觉让我抓狂，但我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后来有一天，应该是第二次在秦城坐牢的时候，突然福至心灵：既然我不能让监视孔消失，既然外面的人想知道我在干什么，何不利用它作为沟通外部世界的管道呢？我的一举一动，看守必须看，而且肯定会向上反映，我不是可以用它来“展示”自己吗？我不正好投诉无门吗？权当它是一个“门”吧。我让他们看到我认真学习，看到我把牢房打扫得非常干净，看到我不浪费一粒粮食，看到我循规蹈矩……这一切，本来也不是作伪，我本来也是这么做的，现在只是留意让外面的人看到罢了。

效果很快显露。哨兵的态度转好。有一次，一个哨兵悄悄站在我的门边说：我看你不像个坏人，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有人跟你说话，我在这个点得值勤一段时间，我会每天过来跟你说会儿话，但一旦有人出现，我得马上离开。这真让我欣喜若狂，受到极大的鼓舞，好像晚上昏暗的灯光都变得明亮起来。后来，其他哨兵也偶尔跟我说几句话。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也深深感受到哨兵和狱方的善意。地震开始时，我正在睡梦里，感觉到床摇得厉害，我迷迷糊糊地想：谁这么讨厌，老摇晃我的床！后来意识到是地震，又觉得没道理震这么久

啊。此时，走廊上的一阵脚步声让我彻底清醒。旁边囚室里一个犯人大叫：他们都跑了，他们把我们扔下了！事实上，他们是在往里跑。我在三楼，我们一个一个地被带到一楼，当天夜里，狱方就在楼前的空地上搭起了一片防震棚，第二天我们就被移到防震棚里，一人一个，各有一个哨兵把守。傍晚，我的那个哨兵跟我拉话，说他们得到消息，当天晚上会有更强烈的地震，而且震中心就在我们这里。到了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害怕，翻来覆去，担心前面的楼塌下来，把我们压在下面。哨兵对我说，不必担心，你看见那边的小门没有？门外停着一些卡车，如果地震，我们马上把你们带上车，送到石家庄去。但我还是睡不着，看起来不远的那扇小门，地震来袭时应该遥不可及吧。他又安慰我：你看，我站在你和楼房的中间，如果房子塌下来，也是先压着我，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一听这话，我很感动，并一下子安心下来，结果，那天晚上，睡得像个孩子似的沉。

还有那个给我看牙的女大夫，不但和颜悦色，而且把家人的照片拿给我看，甚至在治疗的时候给我一个收音机，让我听到了久违的音乐。这样的人情味，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觉得，那个小小的监视孔，正在扩大，扩大，慢慢照进阳光，慢慢让我走回正常人的世界。

当然，这个过程不但是漫长的，而且是看不到尽头的。在与孤独、沮丧、绝望斗争中，我也并不总能取胜，相反，我时时被打败。我知道，如果任负面情绪泛滥，我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所以我得寻找对付坏情绪的方法。

五、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第一次坐牢两三年之后，一天，我坐在床上，想到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不能离开监牢、回到正常人的世界，即使最后解决问题出去了，很可能已经变成一个不会与人交流、不会工作的傻瓜，心情非常灰暗。就在这时，好像脑后出现一个小声音，对我说：嗨，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情绪坏，是一关进来就开始的吗？不是，是从你自己给自己说了这个“不能正常”的故事之后，你自己编的故事把你吓着了，并不是现实。这个小人说的话，好像“啪”的一声打通了我脑中的某个关节，再不被自怨自伤的情绪支配。我就想到，这可能是一种工具，一种方法，可以帮助自己战胜不良情绪。当情绪波动的时候，你要分析、要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找到那个最初的原因，就能够解决问题。有时候，真正的原因并不是你以为的那一个，有时候你已经把真正的原因忘记了，那就得认真思考，仔细寻找，找到了，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我发现，引起情绪波动的往往是自己给自己编的故事，而不是现实。这样，我就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小心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另外还有一条经验，就是找到最主要的那条思路。我们的脑子里面，往往同时有许多条思路，但你只能注意其中的一两条。在遇到挑战的时候，究竟哪一条思路是最现实的、最合理的，你得善于辨别。过去发生的许多错事，仔细回想，其实当时我都有所感觉，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我没有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往往跟着领导走，我对自己说我懂什么，他们比我高明多了。没有听从合理的声音，听不到，盲从。那个最合理的声音，并不一定是声音最大的，你得学会仔

细听，仔细辨别。每个人都有他本来的聪明，都会对现实做出反应，偏见、自私会阻挡真实的声音，会让我们下意识地选择那个大的声音跟随。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天，我上下午和晚上都被提审，审问人说的是同样的话：只要你老实交代，你的生活条件会改善，你可以到花园里劳动，可以参加集体学习，但你永远不可能出去。你曾经逃脱过一次，这一次，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说这些话，按说这很不利于交代问题。晚上回到牢房后，我躺在床上，熄灯，整个人被悲哀淹没：要是一辈子被关在牢里，这算什么人生，有什么价值！这时候，那个小声音又出现了：哎，你这个人，我看麻烦了，你不是宣称能够以为他人谋取幸福自由为自己的幸福自由吗？现在你只想到自己，你忘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里头，比你遭遇惨的大有人在，不说中国，你想想过去你在美国南方碰到的人，比你难的还少吗？你把他们全忘了，只记得你自己。这么一想，我不但情绪恢复了，而且判断能力也恢复了，我马上明白，他们说的是假话，是吓唬人。我相信，这套东西在中国不会长久，只要我保持身体健康，活下去，我一定能够回到人间。从中我又悟出一个道理，你的立场、你的观点严重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如果从一个比较狭隘的立场出发，对事物的判断就容易出现偏差；如果抱着大公无私的立场，对形势的判断就能够比较正确。所以我经常问自己：你现在考虑的是谁，是从什么立场出发的？这一条，在单独监禁、孤立无援的情形下是非常管用的。

第二次坐牢的初期，我的“恐慌后综合症”还没有完全克服。一天晚上，我听到他们拷打一个女犯人的声音，什么东西打在肉体上的

“啪啪”声，被拷打者的呼痛和求饶声，行凶者的斥骂声，让人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周围的四堵墙好像全朝着我挤压过来，心脏“咚咚咚咚”狂跳，冷汗直流。头上的帽子好紧！一伸手，却根本没有什么帽子。这时候，后脑勺的那个小人又跳出来，对我说：等一等，你先掂掂到底在发生什么事，你精神紧张，所以在出汗，心跳加速，觉得压力大，就是这么些现象，根本没有什么人来抓你。又是“啪”的一下，恐惧消失了，而且以后不再有类似症状。我觉得这个声音很有力量，让我想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鬼，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就这样，勇气慢慢回来了，我觉得自己能够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也开始学习，还写东西，这同样有帮助。

最严峻的考验是最后一年，那时候江青已经关进来了，我听到了她的叫嚷声，也从报纸上知道外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明白自己就要被放出去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这时候，反而需要比以前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但也熬过来了。

我回美国后，至少与四位精神科大夫谈起以上的方法，他们说我自己摸索出了一套精神治疗的方法。美国患抑郁症的人很多，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打开心结，认清现实，不被假象蒙蔽。

六、对“不朽”的理解

当然，我在中国坐牢，最大的现实是我失去了自由，而且不知道今后是否能重获自由，如果能，什么时候。不过，牢狱生活让我对生

命的意义也有了新的认知。

我前面讲过，我把牢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块领土来爱护；哨兵如果跟我说话，我就给他讲个故事，帮他丰富知识；我也认真学习，提高自我。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事情微不足道，而且没有人知道，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后来我也想通了。爱因斯坦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真是了不起，大科学家。可是一万年以后，谁还会知道爱因斯坦？或者还有人知道，但在一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不会显得像现在这么大。所以，大小都是相对而言的。他大我小，但是性质都是一样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大小，而在于生活的性质，在于你是否为人类做出了贡献。我还想起了年轻时在美国接触并学会的一些革命文艺作品，如美国革命歌曲《周希二》(Joe Hill)，唱出了这么一条道理：对人类的任何贡献，都是常存的，而人的真正的“不朽”，就在这点上。因此，彻底的革命者，应该是无所畏惧的。

没有人知道也无所谓。人类历史就像一条长河，你在里面加进几滴水，别人不知道，或者你不在了，你不知道这几滴水怎么样了，都没有关系，你加进去的东西还在起作用，它不会因为是否有人知道而有区别。你要操心的不是知道不知道，而是怎样做贡献。后来我还形成了这么一个看法：自然界有智慧的生物只有人类，人的本质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做出对策，利用世界的客观规律，影响和改造一部分世界，我们是自然界自觉的代表，自然界要得到改造，只能靠我们人类。所以，人类的地位很有意义，很崇高。我想，不管关没关你，贡献大小，你都是人类的一部分，你的生存是有意义的。这个世界观奠定以后，我的情绪一直比较稳定，不容易发生大的波动。

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强很厉害的人，之所以能够坚持下

来，世界观起了根本的作用。

我在报纸上读到过一个报道，广州医院的一个年轻女大夫癌症晚期，活不了多少时间了，但她情绪正常，她说，生活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只要活一天，我就要活得好。我很赞同她的话，不管最后能不能出来，只要活一天，我就要活得像个样子。万一能够出来，我得有准备，不然到时已经成为废物。

第四部分 我的天使

在认识王玉琳之前，我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参军前跟我的美国女友。少年浪漫，曾经非常幸福，但她很快爱上了别人，我驻印度期间，我们就解除了夫妻关系。第二次是在太行山区，跟在张家口带过的学生魏琳，我曾经多么渴望她，多么迷恋她，新婚的日子，我置严格纪律于不顾，每天到她播音的村子看她，共度良宵。第一次坐牢时，妻子是我最大的牵挂，我经常问起她，答复总是她很好，她在等我。一直到宣布释放我的那一天，凌云才告诉我魏琳已于三年前跟我解除夫妻关系，并且已经再婚。正因为如此，中宣部干部处的负责人王匡在找我谈工作时，以为我不会选择广播事业局，因为魏琳在那儿，而我的老朋友们几乎全在新华社。但听说广播局比新华社更需要我，我选择了广播局。我觉得，曾经的夫妻关系没有理由影响我们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出狱时，我没有再结婚的念头。我已经三十四岁了，开始秃顶，六年的牢狱生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身体虚弱，与人沟通困难，我的话别人难以听懂，别人的话我也反应迟钝，往往第一句听懂了，第二句就跟不上，听懂一整段话很困难。我想我面临的问题，一是恢复健康，二是好好工作。

没想到，我的另一半在我到单位报到的那一天，就站在了我

的面前。

一、就这样认识她



梅益局长的机要秘书王玉琳。

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是1955年5月2日。前一天我到天安门广场观看了五一节游行。我在梅益局长的办公室谈工作，他的机要秘书王玉琳进来给我们倒茶，离开时没有把门关严——她到现在还有这毛病——我听到了她和同事的对话，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很特别。他们几个秘书聊天的声音飘进来，显然是在议论我。一个年轻的女声——我能肯定是刚才进门倒茶的女秘书——比较高，只听她说："你要是爱他，别说六年，十年二十年又有什么关系，爱他你就等嘛。"对话的声音没听清，又听她说："哦，你连自己的爱人是不是敌人都不知道，不是太笨了吗？"

玉琳是梅益的机要秘书，梅益交给她一个任务，让她帮助我恢复身体，重新适应社会生活。她陪我买衣服，陪我逛街，很关心我。第一个周末下班的时候，我已经与一些干部一起坐在小面包车里，她过来趴在车门口喊："李敦白，明天别出门，我过去帮你整理一下。"车里的人又起哄，又说怪话，但她是个大胆的姑娘，不怕这些。第二天，她到护国寺附近麻花胡同的单位宿舍，帮我重新布置了房间。那天稍后，一对同事夫妇来请我们到北海划船，划到一处岸边，他俩突然跳上岸跑了，把我们留在船上。那个年月的同事，喜欢拿单身男女取乐，这也没什么。我们感受到了彼此相处的融洽和快乐。我们俩都经常加班，晚上下班后喜欢一起散散步，一起去吃夜宵，我们都爱吃小摊，也一起去看戏看电影，老争论，因为我们的看法差距很大。如看完京剧《搜孤救孤》，我说，这小皇帝也是个压迫者，管他干吗？为什么要以他为中心演这个戏。她不同意，认为这个戏体现了诚实、守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有些地方跟共产党的精神也可以相通。我们喜欢辩论，并不因此伤和气，但确实没有超乎友谊的想法。我还晕晕乎乎，没想找对象，她更不想，一心想的是到苏联留学，然后成为工程师。

一天晚上，我还没有下班，我的老朋友温济泽把我叫到一边，说，我看出来了，你对王玉琳有意思，我得提醒你，千万小心，不要急于向她表白，她对追求者的态度是断绝关系。你们美国人喜欢写情书，千万别写，你得耐心等待。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就是交朋友。他刚转身，我心里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哎，好像我确实有这个意思，我确实挺喜欢她，跟她结婚？这个念头不错。没想到，他倒提醒我了。


李敦白与王玉琳新婚次日在颐和园。

我仔细想了想，除了喜欢她爽利直率带点泼辣的性格，她的正直无疑是吸引我的主要因素，我也喜欢她质朴清新的外表，我觉得她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很耐看，我以前只顾漂亮，吃了大亏，这次得改正这个毛病。而且，她是工人阶级出身，十几岁就入了党，根红苗正，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有助于我政治上的正确。我马上回到办公室，给玉琳写了一封信。我写道，很高兴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我们应该从友情发展到爱情，然后组织一个国际主义的小家庭。我把信放在她的办公桌上。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就听到走廊里传来“咚、咚、咚、咚”的脚步声，玉琳气冲冲地进来，沉着脸，把一张叠成方胜的纸条“啪”地放在我面前，一句话不说，转过身，又“咚、咚、咚、咚”地走了，看上去气坏了。我打开一看，“李敦白同志”，坏了，“你所说的那种关系，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今后也不可能，既然你这么想，我们只好断绝一切来往，祝你一切顺利。”可奇妙的是，她在后面又加了一句附言：我既然已经答应今天晚上陪你去中山公园，当然会履行诺

言。晚上，中山公园，她答应了我的求婚。怎么回事呢？以后请她自己讲吧。

她虽然答应嫁给我，但一直不肯确定具体时间，总是说，放心吧，我一定跟你结婚。但她特别照顾我，天一下雨，她就把雨衣雨伞拿到我面前。我们还是一起看电影，散步，吃夜宵。我特意带她去看了一个日本电影《混血儿》，是讲占领日本的美国黑人大兵跟日本女人生下孩子，这些半黑的孩子受歧视、受侮辱的悲惨故事。她说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心里怪不舒服的，我说，这是最坏的情形，如果你能受得了，我们的前途就光明。我还告诉她，我是个犹太人，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的婚姻就没问题。她问犹太人是什么？中国人真好，根本没有歧视犹太人的观念。



李敦白和王玉琳的结婚照。



1966年，儿子晓明出生。

年底，她被派到南方搞外调。临近过年，我们单位的副局长兼党委书记说，你跟小王过年就结婚吧，大

家乐呵乐呵。他自作主张给玉琳打电报，说家里有急事，赶快回来。她一直怀疑是我搞的鬼，事实上确实不是。她一回来，婚礼都布置好了，也就没说什么，我们俩就简单而热闹地举行了婚礼。那天是1956年2月11日，大年三十。

对于玉琳，我的感情是逐渐加深的，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有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我很庆幸，我为自己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但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有多么聪明，我们的“合二为一”经过了漫长岁月的考验。

二、我做了炒饭，你来吃吧

结婚了，有了孩子了，我们像所有中国夫妻那样，甜甜蜜蜜，也吵吵闹闹，如果没有那些令人发疯的政治运动，我们大概会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文革”初期，我曾经大出风头，是单位里的当权派，受到江青支持，大红大紫。但我所在的造反派组织上台后很快沾染了自己所反对的习气，打压对立面，压制内部不同意见，甚至搞特务政治，我提出批评。有一天，我和他们进行公开辩论，受到围攻。一刹那，我从一个万人敬仰的群众领袖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天，我忐忑不安地回家，玉琳听我叙述经过后，只说了句：“我做了炒饭，你来吃吧。”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下来，像靠在大地上那样安稳宁静。这一句普通的话，我记了一辈子，直到现在，她说话时的神态表情还历历在目。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丈夫得意时不张狂，丈夫失意时不懊丧，始

终平和、质朴，不改本色，就像大地山川，宠辱不惊。

这个人有大山一样的力量，像巨石那样的坚强。我从监狱出来后，老同事老朋友都跟我讲，你的爱人真了不起，在漫长的十年中，她克服一切困难，教养孩子，保护家庭，而且维护你的名声，你一定要珍惜她。我知道，“文革”中像她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聪明一点的妻子，在丈夫被判为坏蛋后，会与当权者有所合作，交代一些小事，以保全家庭，她不是这样，她一直说我丈夫是个好人，你们一定搞错了。这种硬脾气让她挨打受气，吃够了苦。

三、初到美国的王玉琳

到美国初期，玉琳人生地不熟，但她从来没有发过怵，适应得非常快。1979 年我们回美国探亲，好莱坞有个电影制片厂请我们去做客，隆重招待了一星期。他们想把我的故事拍成电影，但我想，他们没法真正理解我以及我的人生，所以没有合作。电影厂的年轻演员是在麦卡锡时代成长起来的，从小听惯了关于红色中国的恐怖宣传，有个演员对我说：很难想象你妻子是从红色中国来的，她好像是这儿的主人，跟我们说说笑笑，一点儿都不见外。

第二年搬到了美国，没钱，在一个老战友家中住了几个月。有的美国朋友劝我们，你们年纪大了，在美国没有就业的经验，还是回中国算了吧。但玉琳到美国很快就适应了，她只提了两个要求，第一，要有自己的厨房，不寄人篱下；第二，要有工作，不做家庭主妇。说如果满足她这两个要求，她在美国待一辈子也没有意见。

我们搬到纽约，在皇后区租了一个老旧的房子，开始在美国谋生。说起这个房子，还有个故事。我们在报上看到一则出租信息，觉得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我们的需要，而且房东特意注明房客得是中国人。我打电话过去，对方说你不是中国人，不租。我听出来他也不是中国人——后来知道他是希腊人，原来是一艘商船的船长——问他为什么一定得是中国人。他说，中国人住房子没有麻烦，按时交房租，不搞破坏，也不吵闹。我说我太太和孩子是中国人可以吗，他说行。他还有一个奇怪的要求，我们每次回中国得给他带万金油，他有头痛病。

这个房子真够旧的，晚上起来，不但发出“刷，刷”的怪声，而且总是看见一地的蟑螂，带翅膀，差不多有一寸长，在中国从没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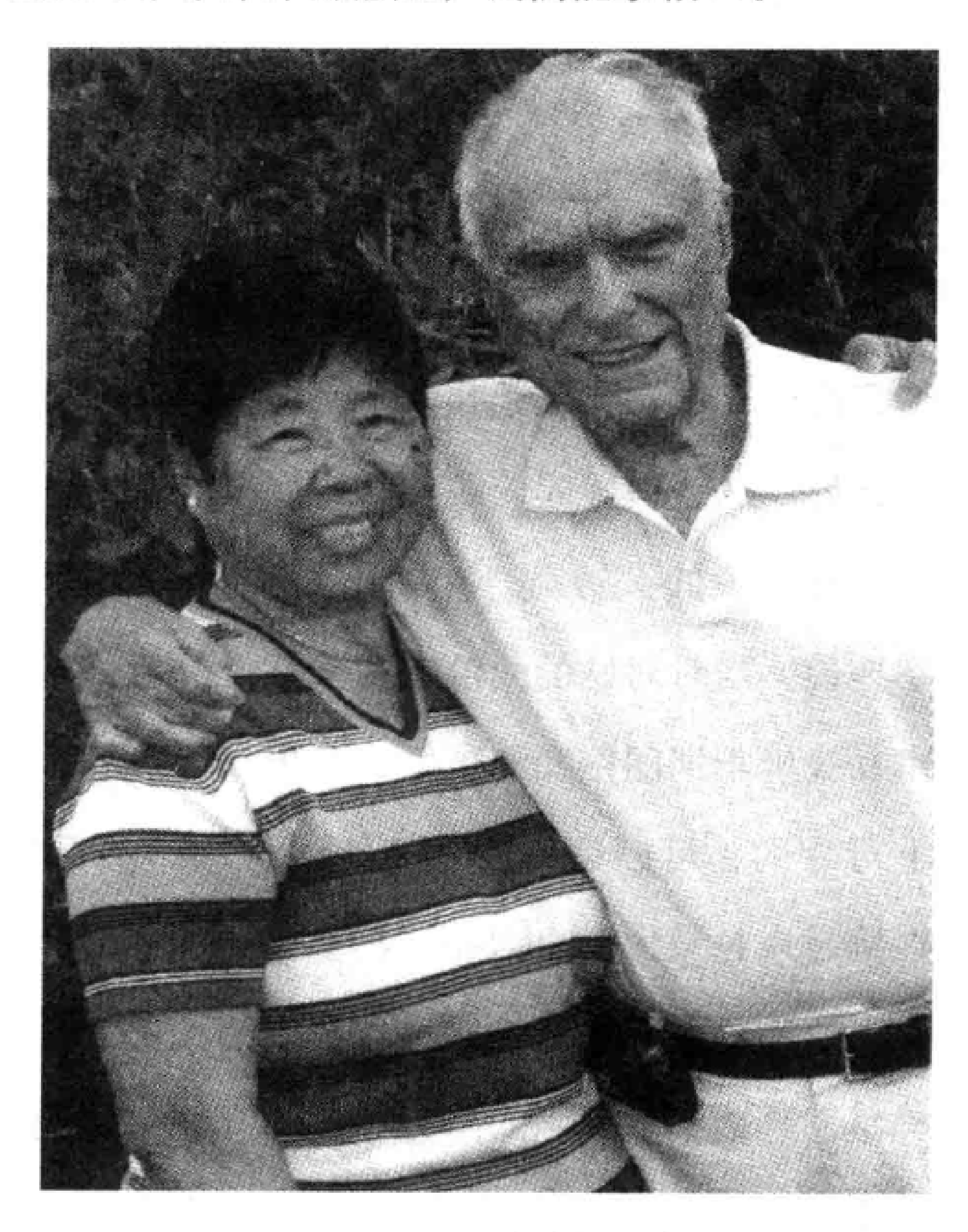
更严重的是，我们没有钱，经常是这周不知下周的饭钱在哪里。

就是这样，也没见她怕过，而且从来不发牢骚，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倒有些忧愁，晚上睡觉前常表露出来，她拉着我的手说，怕什么，我们一起干呗，还怕吃不上饭？她马上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外语学校找了份工作，又在长岛的一个中学教中国烹饪，非常成功，许多人要求学，不久就开了第二堂课，每周两次。她会做饭，但不会讲，因为中餐没有明确的数量概念，这个放“一点”，那个放“少许”，美国人搞不明白。我们俩就合作，她说“一点”，我就问多少，反复试验，定量以后记下来，整理成菜谱。我们住在纽约皇后区，离长岛很远，每次去上课，玉琳得背着砧板、菜刀、当天菜谱用到的主辅料、调料，等等，转好几趟车。她的烹饪课吸引了许多人，为了品尝她的新菜品，长岛一个管教育的官员每课必到。她会织毛衣，想不

到，这也成了在美国谋生的手段，百货公司来料加工，她织得飞快，有时一天能织一件。那时，中国刚刚时兴机织毛衣，美国则手工制品已很稀缺，因此就很值钱。她织过毛衣时装，非常漂亮，记得有单肩的礼服裙，风雅极了。这样的“高级定制服装”每件能赚几百美元。雇主还把她的花样介绍给妇女杂志，她又成了“设计师”，登载她的设计图的杂志我们现在还保存着。这事引来一大批毛线，因为设计图需要说明是用哪个公司哪个编号的毛线织成的，所以生产毛线的公司都往我们家寄送毛线。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当年的她的“工余产品”，多有设计感！家里还有好多件。我在她教烹饪的中学教成人课程，讲中国。另外还有些杂七杂八零零碎碎的活儿，我们能够糊口。

之后我们在美国创业，都是两个人一起干，所有的成功都有她的功劳。相关情况，我将在叙述回美创业部分详细讲。在这里，我想对我们的婚姻说点总结性的话。

有一种狗，只认一个主人，别人再引诱它，给它好吃的，它也不动心，美国人叫做 one man



李敦白 85 岁生日与妻子合影。



李敦白夫妇近照。

dog，我跟王玉琳好了之后，就是典型的 one man dog。

我的一生，如果要算个总账，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而幸运的很大成分，是因为我的妻子。我在美国常讲，王玉琳是天上下来的天使，这个天使化妆成了凡人，化装成一个中国人，而且化装得也并不怎么好。从认识她起，我就觉得这个人好，正直，善良，坚定，就像我们孙女说的，奶奶“有一种大自然的力量”，而且性格活泼，但坦率地说，当时对她的爱没有后来那么浓烈。那时我刚从监狱出来，魏琳在我坐牢期间跟我离了婚，我想，再找的话我要找品德好的，政治上可靠的，可以帮助我不犯错误的，而不要找漂亮的。奇怪，我现在倒越来越觉得玉琳漂亮，甚至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没事的时候，我爱坐在一边看她。也许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事，我已经很清楚地了解了她的内心吧。80 年代后期我们刚开始做咨询不久，有个合伙人是位非常漂亮极有风度的女士，有一次，我和她两人从纽

约坐火车去华盛顿找汪道涵，当时玉琳在中国，这位合伙人跟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很自由，可以一起喝喝酒什么的。我跟她说，你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对我的妻子有点 crazy，有点“疯”。甚至我对客户的选择，都有一条秘而不宣的标准：如果客户只重视我，不重视玉琳，我就不把这个客户看得很重要；如果他很重视玉琳，我会比重视我更慎重地对待他。

玉琳拥有宽广的心胸。我举个例子，我在美国结过婚，回美国后，因为保险的事，前妻跟我通信，如果是一般的女子，大概会多心，她完全不介意。有一次我到旧金山做报告，前妻带着她的大女儿来见面，玉琳马上过去拥抱她，很亲热。

对于婚姻，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结婚成双，夫妻要共同建设，才会有好的结果，它不会自然而然地好。

附：我与李敦白

王玉琳

一、十七岁才第一次吃水果

我是个苦孩子。我出生于1933年，老家在北京通县，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家开始逃难，先到山西，后在石家庄安顿下来。我妈妈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到石家庄解放时，只剩下四个，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最小。

这样的家庭，养家糊口很困难，我从小捡煤核，捡破烂，做童工，帮助家用。这样的家庭，按理没法让一个女孩子上学，我唯一的哥哥也只读了四年书，但我妈妈很想让小女儿识字。为这事，爹妈争执很厉害，我妈最后决定去日本医院照顾伤兵，挣点钱让我上学。她在医院挨打受气，一直供我上完了小学。小学毕业后，当然无力升学，我到一家轧棉花厂当了童工。这家工厂白天用的是成年工，晚班则是老人和儿童，我爸爸正失业，我们俩都成了这家工厂的夜班工人，一直干到天亮。孩子们熬整宿很困难，老打瞌睡，所以经常出事故。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一个女孩子的手被轧花机压断。回家跟我妈一说，她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去工厂了，说一个女孩子压断了手，一辈子怎么办。我们家离铁路近，我又开始捡煤核。

1947年底，石家庄解放，解放军一个连住在我家附近，知道我家

是工人，连长便问长问短，问我有没有上学，我说家里没钱，上不起学。他说，哎呀，你们不知道，现在解放了，上学不要钱。一听这话，我真高兴啊，所以我们这辈人，还有我妈妈那一辈人，对共产党的感情是深到心底里的。第二年，我就上了石家庄女子中学，觉得一下子进了天堂，不但不交学费，食宿还免费。我们的伙食是窝头小米饭，菜就是黄豆芽炒黄豆芽，但我觉得特别香，每顿吃得干干净净，连菜汤都不剩一滴。要知道，我几乎从来都没吃饱过，连本是肥料的豆饼也曾成为我们的粮食。我觉得特别满足，特别幸福。

我从小爱学习，而且好强，做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所以功课很好，数学尤其棒。我的理想是当工程师或者医生。我们班上的同学参差不齐，从老区来的学生，年纪大，程度低，我就帮助她们学习。1948 年 12 月 26 日——后来知道这是毛主席的生日——我入了团，成为学生会主席。当时解放战争如火如荼，每解放一个地方，我就带同学们上街庆祝游行。我体育也很好，跑步常得冠军。我还擅长唱歌，老师说我可以考音乐学院。所以我在学校的生活真是如鱼得水，快乐无比，真正体会到“解放”的感觉。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得了严重的肠炎。我们家是赤贫，从来没有生病上医院的概念，只弄点草药让我吃。学校发现我几天没有上学，派老师来看望，这时我已经奄奄一息了。老师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好不容易才抢救回来。

我在学校功课好，表现积极，工作能力强，所以 1950 年我才十七岁，就入了党，而且成了石家庄中苏友好协会的副会长，团市委组织青年培训班，我便协助团市委书记做组织工作，在石家庄青年中算是小有名气了。柯庆施市长还请我们这些学生干部吃过几次饭。

我跟李敦白认识之前，我们的人生轨迹似乎离得很远，但实际上也有过两次小小的交集，一是我们都认识柯庆施。据老李说，柯庆施绰号柯大鼻，是个非常诙谐的人，他们在张家口就认识，柯当时是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民政处处长。老李他们从涉县转移到东柏坡时经过石家庄，柯市长请他们吃冰淇淋。那时他已经随身带一个酒瓶，喝酒不少，他说是因为有病，后来却成为酒鬼。解放后柯当南京市长的时候，我大姐曾在她家里当保姆。二是1948年10月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广播发射台迁到了井陉县的窑窿峰村，老李熟悉的这个地方，将成为我的第一个工作地点。

就在这一年，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被选拔进了广播事业局。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尤其是党员，对于党的安排，只有两个字：服从，决不会想到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连这样的念头也不会有。广播局从石家庄选了三个人，除我之外，男一中、男二中各选了一名男生。

就这样，我来到了井陉的广播转播台。我们被告知，工作属保密性质，不能跟当地老百姓接触，不能公开自己身份。电台的机器以及我们这个转播台的三十多个工作人员都住在山洞里，我们开始学电机知识。同事关系特别亲密，他们都把我当成小妹妹，就像一家人。

第一个月发津贴，好像也就五斤小米折合的钱，同事们委托我偷偷出去买吃的，我买了一包花生，一些柿子。这个柿子是我十七年来第一次吃到的水果，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我本来就好强，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同事的爱护更激发了我的上进心，所以努力钻研技术，同时还想着以后有机会上大学。

过了不久，我被调到了北京广播事业局总部机关，先在干部处做

统计工作，后到团委，最后成了梅益局长的机要秘书。在广播事业局，我是个名声在外的“厉害丫头”，有的人觉得我像个刺猬似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对工作要求严，公事公办，毫不通融。譬如我在做统计工作的时候，各部门送来的材料，不合格的统统打回去重来。第二，我拒绝所有追求者。从窑窿峰到北京，对所有示好的人都顶回去，从来不看求爱信，这难免让人觉得不好接近。我觉得自己还小，而且还想继续上学，不准备马上考虑恋爱婚姻的事。

老李见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我。他来后，我陪他做各种事情，那是因为这是局长交待的任务，对工作，我向来是一丝不苟的。

二、我妈说，你为什么非要嫁一个外国老头

认识李敦白时，我二十二岁。

李敦白 1955 年 4 月 4 日出狱，5 月 2 日到广播事业局上班。他受“间谍”嫌疑，在牢里被单独监禁六年。刚上班时，他说话还不利索，听别人的话也跟不上，跟他说一两句话还行，如果是一段话，他理解就很难。身体也不好，走路都有些颤颤抖抖。梅益局长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帮李敦白适应环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照顾他。

李敦白报到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来上班之前，局里都在谈论这个人，说是被关了六年，期间妻子提出离婚，他出来后却对中国毫无抱怨，等等。我心里对他有些佩服，一个人被圈起来，被冤枉，或许坚持几天可以，但他坚持了六年，不说瞎话，这个很难。他被冤枉，连周总理都当面道了歉，但他没有说一句对中国、对共产党不好的话，对人、对工作还是那么热情，还是那么爱中国。我就觉得这个人老实可靠，忠诚。另一方面，我想，他是一个外国人，对他的有些

情况不了解，被关起来也可以理解。不过，我作为一个党员，多少有些觉得过意不去，所以内心深处好像也有代党、代中国尽量弥补的意思在里面。还有，他的前妻魏琳，她也是广播事业局的同事，在他被关期间与他离婚，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爱一个人，怎么可能连他是不是好人都不知道？这不是太笨了吗？如果爱一个人，等他十年八年又何妨？这正是我们几个秘书在外屋议论的话题。

总之，佩服，同情，以及想要有所弥补的心情，使我成为他出狱之后接触最多的人。还有，我这个人对任何工作都全心全意投入，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既然领导给了我照顾他的任务，我就尽可能帮助他。从整理房间，买衣服日用品，到散步聊天，看电影，游公园，总之，努力让他回归正常生活。我的工作很忙，广播事业局正在迅速扩展，招考播音员、选调干部、处理各地方台事务，忙得团团转。当时各种运动不断，每次运动，我都是运动办公室的成员，最忙的时候得在办公室打地铺过夜。而且，我还在上夜校补习高中课程。梅益承诺过段时间送我去苏联学习音响技术，培养我当音响工程师，所以还在跟一对苏联夫妻学俄语。我每天下班都很晚。李敦白工作认真，广播局任何部门、任何人，只要提出问题，他都认真解决，所以他下班也很晚。我忙完要回宿舍的时候，经常发现他在等我。我们就一起走走路，在街头吃点小吃。一来二去，就这样熟悉起来。

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月后会跟他结婚。

我记得还在那年夏天，大概是8月份，他来上班并不很久。有天早上，一上班就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是李敦白写给我的。他说，我们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很高兴，我希望这种友谊可以慢慢发展为爱情，最后建立一个国际主义的小家庭。这可把我气坏了，

我马上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他发展那种关系，以后也不可能，我们只是同事和朋友，现在你这么想了，那好，我们以后就中止一切个人来往。然后直接去他的办公室，“啪”的一声放在他面前。

我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想不到这倒反而加速了事情的进展。人生有时候真的充满了戏剧性。

问题出在，我们本来约好那天晚上一起去中山公园玩。我是一个做事一板一眼的人，所以在纸条上加了句附言，说，既然我已经答应今天晚上陪你去中山公园，我当然还是会履行自己的诺言。他老说，我的这句话说明我其实是喜欢他的，给他提供了机会。其实真没这个意思。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比较单纯，我尤其直来直往，不会转弯抹角，确实只是遵守诺言而已。

但那天晚上我又确实答应了他的求婚。读他回忆录的读者，都对此很好奇，我想可能连他自己都有点莫名其妙。直到一年前我才告诉他真相。8 月的北京，正是夏末秋初，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那天晚上，月色明亮，白天的喧闹渐渐散去，残存的暑气也一丝一丝地蒸腾到高远处，四周的景色那么美，美得有点让人感动，连我这个并不多情善感的人也受到了感染。那天晚上他吻了我。对于那个时代满脑子传统加革命的姑娘来说，被一个男人吻了，就意味着嫁给他。

那个时候，涉外婚姻很少。但我在单位和朋友圈中，都没有受到多大压力，大家觉得很自然。好像大家都没当他是外国人。他讲中文，喜欢中国文化，工作认真，对人热情真诚，有什么问题都是自己检讨自己。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所以都没把他当外人。

问题出在我的家庭。我出身社会底层，父亲只有一些传统文化，

母亲目不识丁，对他们来说，接受一个外国女婿很困难。我妈说，中国七亿人，你就找不到一个丈夫，非要嫁给一个外国老头！

“外国”和“老头”，对我倒不成问题。我说过，我们都没把他当作外国人，我也从来没想过以后要跟他去美国。总之和嫁一个中国人没什么两样。至于“老头”，他当时三十四岁，确实有点老了，头发也掉了不少。但那时的政府机关里，老干部和年轻姑娘结婚很常见，最早追求我的人也比我大十多岁，而且我一向不怎么注重外表。后来看到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才知道他原来也这么帅过。

总之，1956年春节，我们认识才八个多月，我就嫁给了他。那时我正在杭州郊区做外调，冒着江南的严寒在旅馆里写材料，接到让我回单位的电报，真以为有急事。到单位才知道第二天就是我的婚礼，我大吃一惊，跟秘书长说，我连件新衣裳都没买，怎么结婚？他说，买什么新衣裳，你穿平时的衣服就行了呗。

三、革命年代的生活

结婚就是两个人共同生活，似乎改变也并不大，仍然各忙各的，有时候反而觉得聊天谈心的时间比以前少了。李敦白慢慢恢复后，事情越来越多，除了单位的事务，廖承志希望他多做外事工作，因此他总去友谊宾馆跟外国专家吃饭，讲政策。我不再担任梅益的秘书，调到音响组搞录音。开始是做机要录音，中央开会的时候我们去会场工作，录音资料交给中央办公厅，不能带回电台。后来就参加各种录音工作。天安门前的大游行我就录过几次，站在城楼前那根旗杆下工作，录播游行实况，主席台下面还有我们的录音室，负责录中央首长的讲话。当时我们跟苏联有节目交换，每周各播对方一小时节目。我



坐在明代古董家具上的一家五口。

参加了送苏节目的制作工作，负责录音合成，譬如说一个广播剧里有风声、马蹄声、音乐声、歌声、鸟鸣声，等等，得从各个录音机把声音放出来，调配好前后高低，灌到一张胶片上。那时候技术水平低，设备落后，合成时前面放六个大录音机，我得哈着腰，张开手臂在各个机器上挥舞，恨不得变成千手观音。四班倒，工作很卖力，经常忙到天亮，赶飞机送往苏联。他也不特别注意我，我也不特别注意他，这样倒也相安无事。我们也没有什么文化冲突，一是那个年代生活简单，二是他喜欢中国的东西，简直喜欢一切。

但孩子出生后，情况就有了变化。我们一周上六天班，只有周日休息一天。这一天有多少事要忙啊，可他总不在家，去友谊宾馆给外国专家讲中国的政策，联络感情。家里虽有保姆，许多事还得自己做，而且孩子们老见不到他很不高兴。星期天上公园玩，别人都和爸爸在一起，她们的爸爸总不在，偶尔有一两次全家一起出去，孩子们

就特别高兴。时间长了我也有意见了。我也上六天班，而且老上晚班，我工作也很卖力，可星期天我总在家做个好妈妈，他为什么就不能在家？就觉得生气。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很不高兴。1960年，领导突然通知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当时我都二十八岁了，有三个孩子，老三才八个月，还在喂奶，真没条件上大学。但我们那个年代讲服从，组织上决定的事，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我就成了北外的“大姐”，连老师都比我小，叫我大姐。从ABC开始学习，很困难。星期天回家，我想让李敦白给我补习补习，他是英语专家，指导我这个初学者，还不是小菜一碟。没想到，他对谁都很和气，对同事的任何问题，无论是深夜还是周末，都仔细解答，唯独对自己的老婆，没有丝毫耐心。他还对我发脾气，说我不虚心，其实是他压根不想花这个时间。那好，我也不求他了，自己慢慢学。

这些事，也没什么特别，任何夫妻都会吵架生气，我们也跟别人一样。想不到的是，因为嫁给他，会有这么大的磨难等在我的前面。

北外的本科学制五年，我又延迟了一年，所以“文革”初期，我还在那儿读书，和几个年纪较大的党员同学都成了“保皇派”。之所以“保皇”，根源还在于我相信党，觉得党的干部是好的，而那些造反派的言论，很像“反右”前夕“大鸣大放”时的“右派”，在我看来是在向党进攻，我们应该维护党的利益。有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从魏公村步行到中南海，向中央办公厅反映情况，说应当制止对党的进攻，接待的人说我们反映的问题很好，他会向上面报告。我们很受鼓舞，又连夜走回了魏公村。接着我们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叫“抗大战斗团”，我是头头，随后跟西班牙语系同观点的组织结合，成为

保守派的代表。对方造反派人多势众，我们是少数派。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带队的工作组到外语学院时，我们特别高兴，因为我们是支持原来的党组织、支持老干部的，以为工作组一定会支持我们，兴冲冲地去找他们，结果人家根本不理我们。这下子，我们好像成为地下组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就写检讨，说自己跟不上革命小将的步伐，犯了错误，实际上也说不出犯了什么错误。这些检讨写成大字报贴出来，但总是通不过。

“串联”风起来后，我们想，干脆我们也出去串联吧，就到了重庆。我们这些人在北京是批判对象，到了外地，只是听、看，不敢说什么话。我们还看了渣滓洞和泥塑“收租院”展览。看渣滓洞，让我想起小时候石家庄抓共产党的情形，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遍恐怖。我爸爸是个老实人，我入党的事都瞒着他，有一天，同学在外面喊我“开党会”，被他听到，他拿起一把菜刀就追出来，要砍了我，说不能因为我而被满门抄斩。

这年年底我回到单位，在英语组工作，处理听众来信。当时，李敦白他们的造反夺权斗争搞得轰轰烈烈，但我没怎么参与。过了不久，1967 年 8 月，老李他们的三人小组就下台了，他被没收了办公楼的出入证，处于半软禁状态。他可以外出，每周像往常那样到斯特朗老太太那儿吃一次饭，不让她感觉异样，但不能再去办公室。因为来信组有些“保密”性质，我也被调离，到新闻组，但还可以去单位，可以看大字报，向他转达一些信息。这年的圣诞节，正式宣布李敦白被软禁，同时也收了我的工作证。这样，我也不能去单位了。两个人都在家里待着。

我们终于有时间在一起了。我跟他说，一定要坚持一条，就是什

么情况下都不说谎，只说真话。我知道他是个老实人，他没有办法用后一个谎言掩盖前一个谎言，说谎会给自己造成大麻烦。那段时间，曾经有几个年轻人来家里索要他的资料，我只得用英语讲，别给他们。他们骂我无耻，卖国贼，不讲自己国家的语言。我觉得这些历史资料不能随便给人，应该交给组织。

四、“美国特务”老婆

老李是1967年2月21日深夜11点被带走的。他后来一直说，他觉得最幸运的一件事，是他不知道那天晚上随后发生的事，他要知道了，会增加多少折磨！事实上，才过了半小时，敲门声再次响起，来了几个穿军装的人，让我马上叫醒孩子，也不让收拾东西，把我们带上了两辆车。我对北京很熟，心想，如果往郊区走，就是跟老李在一起，去监狱；往城里走呢，就不知道了，但一定不是监狱。

结果我们往城里走，被带到一个楼房的三层，最靠里一间。房间有两个窗户，一个朝向大街，被木板钉死了，另一个朝院子，装着纱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后来得知这是前门饭店），里面的人都穿白色工作服，看上去像服务员，后来发现他们里面穿着军装。就一间房，放着五张床，我带着四个孩子，还有保姆，非常逼仄。我提出辞掉保姆，但不被允许。给我宣布规矩：不许出门，不许关门，不许开窗户，三顿饭有人送来，开水由阿姨出去打，交代问题在对面房间。

他们每天让我交代问题，就是交代李敦白的特务问题。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坏事，我也决不相信他是特务，他们骂我是民族败类，不揭发美国特务，我说我不能撒谎，我没有做过的事，我不会承认，我

没有看见的事，也不会捏造。所以总是僵持，老挨训。

就这样被关了八个月。这年10月份，把我们送回了电台。等待我的是李敦白专案组的人，对我很凶，说王玉琳你甭想回原来的宿舍，给了我们一间十四平米的房子，里面只有一张大床。他还说，你必须接着交代李敦白的特务活动，不能随便出去，每天去单位交代问题，别想蒙混过关。我被放到单位女厕所的门外，有一个桌子，一个小方凳，厕所门上贴一副对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横批："美国狗特务的老婆"。老挨斗。

最不能忘记那年冬天的寒冷。我坐在走廊上，风很大，而我连棉鞋都没有。我们被赶出家门时，不允许收拾东西，说以后再回去拿。但后来我要求了几次，他们始终不同意我回去取任何东西。老李后来说，1973年他在监狱的情况有所好转，允许他开书单从自己的藏书中拿书，拿到书后，他马上仔细翻检，急切地寻找我们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但什么也没有。他觉得绝望。怎么会有呢？这些书根本不是从我这里拿的，我也压根不知道他取藏书的事，连他是否活着都不知道。他们不但不让我拿东西，还骂我，说我不要脸，那些东西都是用李敦白的钱买的。他们忘记了，我十七岁就参加工作，供给制一改为薪金制，我就是十八级干部。说起这事，还有个玩笑。我始终没有涨过工资，所以自嘲为"部长级（不长级）干部"。我的工作没说的，但每次调级，总有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闹，我就让，梅益还表扬过我风格高。所以说家里的东西都是用李敦白的钱买的，不是事实。

但到哪儿说理去？我就穿着单鞋，在寒风中发抖。后来我要求打扫过道，整天不停地拖地板，这样保持一点体温。这时允许我的母亲来照顾孩子，但我们却不能见面，早上我走后，她才能来，我回家

前，她必须离开。母亲心疼我没有棉鞋，家里也实在没有做鞋的东西，就带着我的儿子到街上捡布条，硬是用捡来的布条给我做了双棉鞋。后来我带儿子外出时，发现他老是东张西望，问他干吗呢，他说找布条。我是一个性格很硬的人，很少哭，唯有想起这件事，想到寒风中白发的母亲带着刚会走路的儿子，在大街上到处找布条，跟乞丐没有两样，到现在还是忍不住落泪。我对不起妈妈。这件事，也让我第一次想起了解放前，捡布条，拾煤核，是我儿童时代贫困生活的一部分，解放带给我的是真正的脱离苦海，我生活得多么幸福，怎么也想不到还会有这样的日子。我的痛苦也不全是因为个人，我老想，为什么还会有这些事？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

我这个美国“特务”的老婆，和电台的“黑帮”们一起干些又脏又累的活。印象最深的是打地毯。办公楼走廊的地毯二三十年没有清洗过，脏得不得了。这些地毯很长，不好清理，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在两棵树中间架一根杆子，把地毯挂在杆子上拍打，但是，一拍打，地毯就往下出溜，只好轮流坐在地上压住。一天，正轮到我坐那儿，被工作组的组长看到，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批评我，说我偷懒。我这人很倔，跟他顶嘴，说这是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事，一拍打，灰尘劈头盖脸地落下来，我的耳朵都烂了，而且坐着不动很冷。谁都不愿干这活，所以我们一小时轮换一次。我还说，不信你去坐坐试试，不用一小时，你就坐十分钟试试。他又骂我态度差。总之，受累，受气，有一次还挨了打，机关总务科的一个人和他做服务员的妻子，把我挤在一个角落里打，肋骨都打坏了。

后来就是下干校。两次，一次房山，一次河南。在房山那次，主要是干农活。劳动我不怕，可我是在城市长大的，不会干农活。我

分不清稻子和稗子，简直整个人趴在地上，也还是挑得很慢，分给我的一大片，好像总也干不完。我们在双桥有个发射台，因为我刚到广播事业局时曾在干部处工作，那儿有个技术员知道我的名字。他同情我，就在对面帮我干。后来翻红薯藤，他又帮我做了带尖头的翻杆。这下可好，管我的头儿是老李的前妻，她说我跟这个技术员谈恋爱，有不正当关系，开会斗争我。其实哪儿跟哪儿，我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第二次到河南淮阳干校就更苦更难了。在房山我也烧过窑，脱坯，每小时能脱四百块，两个年轻小伙子给我铲黄泥。我是唯一干这种活的妇女，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让我屈服。到淮阳后，烧砖是一项大任务。先让我脱坯。为提高效率，我们的技术员搞了个切坯机。这个机器很粗糙，上面拉的用来切坯的钢条老崩。我是技术员出身，就让我操作切坯机，一切十块，哗哗的，很快。有一次，一根钢条崩断，打到我手上，伤着了骨头。管我的人只让我到医务室包扎，不让上医院，还说，你伤了手，肩膀没有问题，你拉车吧。就拉装坯泥的车，有五百多斤重，我就咬牙拉着。儿子还不到六岁，跟在后面，上坡的时候就用小手帮我推一下。在房山干校时，我把孩子们都留给老妈妈，这次我把儿子带去了，他们本来想让我带上所有孩子，我知道他们的用心是想取消我们的北京户口，把我们赶出北京，便死活不同意，只带了儿子。

脱好坯后，又让我背砖装窑。装窑的时候，要把晾干的砖坯一层层码上去，地上留出一条很窄的逐级上升的蛇形小道，背上的东西很沉，一脚踩不稳，撞到砖墙，整个就会塌下来，后果不堪设想。烧三天火，红砖就烧成了。一般讲，砖烧好后得冷却一星期才出窑，但我

们是三天。三天出窑，砖还很烫，放到背上就拼命跑，想早点卸下，一天不知跑多少趟，累得筋疲力尽。就我一个女的，跟小伙子们一起干这重活。后来又烧灰砖，烧灰砖的方法，是烧好红砖后往里面倒水，使它快速冷却。这就需要挑水到窑顶往下倒。砖窑有三层楼高，外面的台阶绕着窑身转，很陡，很窄，冬天还很滑，得非常小心，幸亏我小时候挑过水。

这样变着法地折腾我，想让我屈服，但我是个硬脾气，没有的事决不会承认。

这样的日子，我固然很痛苦，但更痛苦的是，我始终没有李敦白的消息，不知他是死是活。孩子们就更难了。爸爸对他们来说，既有，也没有。没有爸爸的日子，尽受欺侮，但比“没有”更可怕的是“有”。一个“美国特务”的爸爸，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正在一天天长大，以后怎么办呢?

我想，我必须打听李敦白的下落。

五、为了得到李敦白的消息，我要求离婚

李敦白出事后，孩子们在身心两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磨难。

我们被带走时，三个女儿分别是十岁、九岁、八岁，儿子才两岁，还不会说话。一家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不能出门，不能关门，很快就接二连三地病了。

首先是儿子。儿子进去时每天喝三磅奶，很快减为一磅，越来越瘦。我要求给我一个电炉子，给他做点食品，被拒绝。再求他们给几个生鸡蛋，倒是给了。怎么吃呢？我只好把鸡蛋打散了，调到牛奶里，儿子怎么也不肯喝。一尝，腥得要命。为增加营养，便硬灌他。

结果，他长大之后再不能碰鸡蛋。这是一件令我心痛和遗憾的事。

然后是八岁的小女儿。她进去不久就长了湿疹，满身都是，严重到流黄水，奇痒难忍，到处挠，小背心全是窟窿，身上像长满了带着脓血的眼睛。怕女儿留下伤疤，晚上睡觉就把她的手用布条绑起来，固定在沙发腿上。不知一个八岁的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她老是挣开手，全身挠。我就要求带孩子看病，先是不同意，经反复交涉，才同意送医院，但又不让我陪着。不久，老二又发高烧，烧到说胡话，很可怕。也是不同意送医院看病，我火了，说如果孩子出了事，那是你们害死的，我做母亲的不能负责。这才让看了病。

我身上还有点钱，为了给孩子们增加点营养，换换口味，我曾托阿姨帮忙买个蛋糕，结果被告发，看管人员训斥我还想过资产阶级生活。

生活上如此狼狈，让我同样焦心的是孩子们的教育。三个女儿都已上学，都是好学生。这下子全停学了。怎么办？送出去上学显然是痴心妄想，只好想办法自己教。我要求提供课本，不给；继续要求，直到终于争取来三个孩子的教材。这样，我们的复式班教育就开始了。每天早上，先唱《东方红》，再教毛主席语录识字，然后是数学课。我跟她们讲，一定要给爸爸妈妈争气，出去之后，不但跟得上，还要比同学强。结果她们回到学校后，成绩都很好，老三跳级，老大我没让跳。我自己上学时就是好学生，尤其数学很好，教得也用心，所以孩子们都学得很好。而当时的学校成天搞批斗，倒不怎么教文化课。

没有业余生活，我就带孩子们演戏，《沙家浜》啊，《红灯记》啊，一个人扮演一个或几个角色，总之尽量调剂生活，不被突如其来的灾

难打倒。

这八个月里很少有快乐的镜头，所以偶尔的一次就格外印象深刻。时间长后，对面的军人见我守规矩，教孩子学好，孩子们也不调皮捣蛋，慢慢松弛下来。那个对着院子的窗户，偶尔也可以打开纱窗了。孩子们从窗户探头张望外面的世界。院子里有许多穿白色工作服的人，看到孩子们的小脸挤在窗口，就喊：“小洋人，小洋人，下来呀！”几个女儿都像中国人，儿子却像他爸。这个小洋人还不会答话，几个姐姐叫：“我们下不去呀！”有一次，下面逮住了一只麻雀，大叫：“小洋人，小洋人，要不要麻雀？”几个孩子叫：“要啊，要啊！”怎么拿上来呢，最后找了些线头短绳，连在一起从窗户挂下去，拴住麻雀，拉了上来。好家伙，这下子乱了套，他们把麻雀放开，任它飞，几个孩子追呀，叫呀，高兴得发了疯，直到可怜的麻雀被活活累死。孩子们有点快乐，我挺高兴。能怎么办呢？只好慢慢挨过这些日子。

被关了八个月之后，原来押送我们到前门饭店的解放军又出现了，他说，现在外边没那么乱了，你们可以回去。出来之后，生活仍然很难。我的工资八十多块，要给父母亲三十块，实在请不起保姆了，也不够吃。粮食是定量供应，但单位少发给我一个人的粮票，还污蔑我不老实，将儿子报成美国籍。真是天知道，那会儿即使我想报，到哪儿去报呢？我的申辩又被指为不老实，不认错就少一个人的粮食。我是个死硬分子，没做过的事让我认错决不干。缺粮食，我只好自己少吃，几年中我从来不吃早饭。老买一毛钱一大捆的白菜，做包子给她们吃。我在单位要劳动，要挨批斗，下班经常很晚，不敢大声剁馅，只能轻轻切，把第二天的包子做好蒸出来。我还请求一个同

事把他们不吃的猪油渣给我，和进包子馅里，好有点味道，我则帮她做衣服作为交换。

这时三个女儿回学校上学了，但儿子的照看成了问题。我求军管组让我把他送托儿所，却得不到同意，组长说，你可以把他拴在家里。真是没有人性！我说，我的宿舍在五楼，孩子两岁多，什么都不懂，万一他掉下去怎么办，你负责吗？我只好带着儿子到单位劳动、挨斗，经过多次交涉，才把他送到了托儿所。

过了一段时间，孩子们的上学入托问题解决了，母亲也可以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来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了，但又碰到了严重的问题。

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大女儿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我的几个孩子都很懂事，她们不愿增加我的压力，有什么事也不说。我一问，说学校不让她和妹妹上政治课，因为她们是美国小特务，没有上政治课的权利。政治课排在上午第三节，她们还要上第四节课，只好在外面站着挨冻，她们也没有手表，不敢走远。而且，不上政治课，就不能升级。所以我们又在这个怪圈里困住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大，给单位报告了几次，要求解决，但始终没有解决，就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我说，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力，她们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她们以后是爱中国还是恨中国，完全在于教育。她们生在中国，我希望她们爱中国。我把信送去军管组。里面正忙乱，叫我把信搁下，碰巧机要通讯员来了，就把信送走了。总理看到了这封信，作了批示，说对我们的孩子要一视同仁，这才让女儿们上政治课。支部书记训了我一通，说我越级写信，不守纪律。

这段时间，我写给周总理的信不只这一封，我也给毛主席写过几次信，说我爱人是个好人。不知这些信的下落如何。

我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背着美国特务老婆的沉重十字架，跌跌撞撞地朝前走，但又看不到前途。而那个带给我们厄运的人，他又在哪里呢？

我问过无数次，从无回答。审问我时，有时拿出一叠纸，挥着对我喊："李敦白自己都交代了罪行，你为什么还不坦白？"我知道这套把戏，何况我真的没什么可坦白的，就说："那好啊，既然他自己都交代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呢？我又没做特务。"这些话，当然不能作为李敦白还活着的证据。

最后没招了，我只好提出离婚。我做过人事工作，有点经验。我想，如果他死了，他们会告诉我不用离婚了；如果他们拖延不回答，说明老李还活着。我过段时间提一次，还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说，你们让我跟他划清界限，那我要求离婚，彻底断绝关系。但总没有人理我。过了大概七年，有一天北京市中级法院来了三个人找我。我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给法院写过信。他们态度很和气，说，我们看了你的材料，觉得你不必跟李敦白离婚。我说：他是特务，我非得跟他离婚不可。他们说：谁说他是特务？我说：报纸啊，大字报啊，批斗会啊，不是到处都这么说吗？他们说：是吗？这我们不知道。我说：敌我界线一定得分清，我还是要离婚。他们就一直劝我不必离婚，说以后你会知道的。一共谈了两个小时。

那天回到家，我这高兴劲啊，别提了，多少年都没这么高兴了。我悄悄地跟孩子们说，你们爸爸马上要出来了！

这个时候，老李在秦城监狱的待遇也开始好转。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十年含辛茹苦，等待一个不知怎么样的未来。但对李敦白，我从

来没有怀疑过，我从来不相信他是特务。他被捕时，我们结婚刚好十二年。我了解他的为人。首先，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一心想为人类进步事业做贡献，一心扑在工作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单位和别人需要他，他没有二话。他把家人看成自己的一部分，为了工作可以不管孩子，为了照顾别人的感受可以不顾家人的感受。我第一次怀孕时，有一天他正搀着我在外面走，突然他甩开我的手，把我吓一跳，原来对面走来他的前妻，怕她看见难受。我委屈得直哭。第二，这是一个透明的人，很诚实，不会撒谎。我们一起生活的十二年中，从来没听他说过假话，一是一,二是二。我想一个人要掩饰一段时间是可能的，但不相信能够隐瞒这么长时间。还有，他曾经被冤枉过一次，关了六年，他在监狱没说一句瞎话，出来没有一声抱怨。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忠诚可靠的吗?

我能坚持下来，与我本人的性格和思想认识也有关系。老李总说我是块石头，而且是块花岗岩。确实，我是一个个性坚强的人，我也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打死也不会承认，要让我屈服，那不容易。从思想认识来讲，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已经没有党了，起码不是以前的党了，那些小孩子怎么能代表党?“文革”刚开始那会儿，看到造反派的行动，我以为跟“反右”初期一样，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反党行为，我们要保卫党，保卫党的干部，所以才会成为“保皇派”。

至于这十年对我们的影响，事后看也不全是坏的。我们结婚其实是比较仓促的，婚后又忙工作，又忙学习，又忙孩子，夫妻交流并不多，也没顾上好好培养感情。经过这十年，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对方的珍贵，才明白夫妻感情的重要。老李说，他余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让我幸福。这些年我们一直过得很好，之所以八九十岁了还很健康活跃，夫妻和睦是最重要的因素。大夫也说，好的家庭关系，对一个人的健康幸福至关重要，可惜现在好多人没有明白这一点。还有，经过这十年，以后的幸福感就特别强烈。我觉得，所谓幸福，就是和不幸作斗争。你战胜了不幸，就会加倍感受到幸福。十年承受下来，我觉得生活中再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压倒我们，所以我们四五十岁在美国白手起家重新创业，不但事业比较成功，而且过程十分愉快。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第五部分　风雨故人

我在中国三十五年，除了坐牢的十六年，一直在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接触中共上层不少。第一代中共领袖中，我佩服的人很多，感觉亲密的人也有，还有几位是又敬又爱的。这些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毛泽东，他是一位不容易被认识的历史人物，我觉得，大概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具备全面认识毛泽东的主客观条件，所以，我把对他的记忆和评论放在最后讲，作为一种探讨。其他的人物，如周总理，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人了不起，对他很尊敬，也很亲近，不管后来传言他如何如何，包括对我如何如何，我对他的敬爱之心，至今没有丝毫改变。延安时期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我认为他特别实事求是，作风朴实，令人爱戴。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几次带我下乡，给我讲当地的情况，是个可亲可爱的人。还有一位我特别敬爱的人，是陈毅同志，陈老总。以下所谈的这些人物，我都有直接接触，当然，我所谈的，只能是自己了解的侧面，但愿这些回忆，有助于丰富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认识和理解。

一、宋庆龄

从昆明调到上海后，徐迈进给我介绍了廖梦醒。当时她的爱人李少石牺牲不久，所以第一次见到廖梦醒，她就跟我说很寂寞。廖梦醒给宋庆龄做秘书，她介绍我见了宋庆龄。宋是孙中山的夫人，在我心中地位崇高。后来她请我吃饭，还给我介绍了陶行知和刘良模等人。

我对宋庆龄的印象是：大方，美丽。她不健谈，但言辞精辟，时有幽默。这是个非常贤惠的女性，善于交朋友，温雅而有尊严。好像是廖梦醒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抗战刚结束时，宋庆龄在香港，印度总督蒙巴顿伯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给她写信，说要去香港拜访她。她安排请他吃饭，准备了丰富的食物，包括猪肉牛肉等。有人前来传话，说爵士信印度教，不吃牛肉，她就重新准备饭菜。不久，又有人来说，爵士不吃肉，吃素。宋庆龄说："那好，把他放在草坪上吃草吧。"很幽默。

宋庆龄是位坚强的女性。我记得问过她，在上海是不是觉得不安全。她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说不敢碰她。大概是宋美龄对她进行保护吧。她曾说过，她们姐妹感情很不错。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对外友协曾想安排她们姐妹在日内瓦会面，但双方的医生都反对，最后没有见成。她们政治态度不同，但姐妹情谊很深。

二、周恩来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知道周恩来，《西行漫记》和《中国的双星》

都有对他的描述，书中也有他的照片。昆明和上海的地下共产党员一提起周恩来，就像在谈论一个神似的，对他非常佩服。

我在宣化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那时都叫他周副主席。我对他的外表的印象，最突出的就是帅，英气逼人，目光敏锐，看上去精力充沛，一望即知不是常人。他个子不算很高，中等个吧，眉毛特别重，络腮胡子，刮不胜刮，脸上常常露出青灰色的胡茬。周副主席和代表国民党的王天鸣将军以及代表美方的白鲁德将军带着大批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宣化店视察调查，当天晚上开欢迎会，我就在那个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和我的翻译骆叔平坐在最后一排——实际上我的中文水平并不需要翻译。三方都发了言，李先念揭露国民党部队对宣化店的包围攻击，王天鸣说，新四军是我们的兄弟部队，我们不可能跟你们闹摩擦，更不可能围攻你们，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讲得很诚恳。周恩来马上接口，表示非常欢迎王将军的态度，而且说，王将军的话以后能不能兑现，请在座的每一位作见证。他非常敏锐，立即抓住了机会。


赴宣化店途中，因汽车被山洪所阻，周恩来涉水过河。

散会以后，走回招待所的路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碰到李先念提着灯笼送周恩来回宿舍。[1]李先念介绍我们认识。周恩来跟我握

[1] 宣化店被竹竿河分为东西两部分，1946年5月8日下午的军事调停会议在河西的原“湖北会馆”举行，此处也是国际招待所，周等人及李敦白先生均在此住宿；中原军区司令部则在河东，举行欢迎会（兼文艺演出）的礼堂也在东岸，结束后，李先念送周恩来回河西住处。

了握手，没有一句客套，直接就说：“我们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注意你，我讲话之后你拼命鼓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讲话后你坐在那儿不动，这样不行，他们会注意你，你回上海以后会有麻烦。”所以，我跟周总理第一次见面，就挨了一顿批评，但是受他的批评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他丝毫没有居高临下、教训人的姿态，完全是从保护你、关心你的角度出发，让人心悦诚服。周恩来与人沟通的能力真是无与伦比。我心想，奇怪，第一，我坐在最后，会场又很暗，他怎么会看到我，而且注意到我的动作？第二，他身处这么重要的场合，应该高度紧张，怎么会留心别的事情？我记得跟他提了一句我想去延安，他说，等我回到南京再说吧。

我在宣化店还认识了章文晋，他是周恩来的翻译。章的英语非常好，很流利，也没有口音，但周好几次对他说，你翻得不对，应该怎么怎么翻。在这儿顺便说说章文晋，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回美国开始做咨询后得他帮助很多。他非常受人尊敬，只要是他介绍的，就没问题。中美建交后美国第一任驻华大使伍德柯克（Leonard Woodcock）[①]曾对我们说，章文晋是道德的化身。他还说，中美建交谈判最后阶段，如果不是由章替代生病的黄华，可能会困难得多。黄比较教条。章文晋在当驻美大使时，工作方法非常灵活，广交朋友，他甚至专门请那些反华的国会议员吃饭，了解他们的想法。他还当了我们南卡州立大学的名誉董事。这方面李肇星大使也相当不错。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我辗转到了延安。全面内战开始后，中共驻

① 伍德科克（1911—2001），1970—1977年期间曾担任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主席。1977年被卡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代表团团长，1979年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位美国驻华大使，其任期持续到1981年。

南京办事处的人员全部撤回延安，他们搞了一个大会餐，叫做“吃汽车”，因为吃的是南京卖汽车的钱。

延安时期，我跟周恩来有一次特别重要的接触。大概是 1947 年初，有一天小廖（廖承志）来找我，说周副主席叫你马上去，你骑我的马吧。小廖有个小红马，特别棒，可它欺侮我，拼命跑，怎么也勒不住，我只好强逼它跑向一个很陡的山坡，它不得不停下来。我下了马，再不敢骑，牵着它走。结果，到杨家岭周副主席窑洞时，斯特朗已经开始跟他交谈。我的角色是翻译，既然他们已经开始谈，周就让我坐在旁边做他的“活词典”，他表达不出来的时候给他供词。他的英文不算很好，欠流畅，但这个人特别聪明，选词很准，能够运用并不丰富的词汇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只有几次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向我要词，或者求证。那个时候，我对周已经有所了解，所以对此倒也没有觉得很特别。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同时，他还在处理另外两件事情。他的窑洞是一个大房间，左边是小超大姐坐着给国际妇联写信，他们的养女孙维世则走来走去思考着一个什么演出，一会儿邓问他写信的措辞，一会儿孙走来问他某个场景如何处理，周有条不紊，一丝不乱，好像他的脑子可以同时处理许多件事情。我很感慨，这真是一个组织天才。

周这次见斯特朗，主要还不是接受采访，而是代表中共中央拜托她一件事：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翻译成英文，带给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供他们参考。周谈话的大意是，这是我们党主要的革命经验。他说，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按照本国的情况，由本国人来确定本国的战略策略，不能听外国人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听外国人的。这个“外国人”当然主要是指苏联。

让斯特朗送达文件的人士，周一一点了名，包括波兰的贝鲁特，捷克的哥特瓦尔德，东德的乌布里希，南斯拉夫的铁托，等等，还提了法共、意共这两个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并说不用带到莫斯科。斯特朗不懂中文，所以让我跟她一起工作，要求绝对保密。①

---

① 斯特朗翻译并携带《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之事，对中苏两党关系及中国共产党和欧洲共产党关系都极重要，但未从文献资料获得证明。笔者几次请李敦白先生回忆复述，他对此事十分确定，而从整个访谈过程来看，李先生的记忆确实相当可靠。尽管如此，以下问题仍然需要解释：第一，斯特朗对自己从1947年离开延安到1958年返回中国的经历有详细叙述（《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陈裕年译，《斯特朗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未提及带“决议”之事，离开延安之后也没有直接到东欧。她本想直接回美国，后到了北朝鲜，从那儿再到莫斯科。只是在莫斯科出书进展不顺的情况下，稍后去了东欧，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商谈出版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书的计划（最后只有法国出版了，但因斯特朗突然在苏联被捕并被驱逐出境，此书毫无影响），该书的内容是宣传主张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斯特朗《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一书写于1960年代初期，以常理论，已经不存在“保密”的问题。第二，据李先生回忆，周恩来要求“决议”对苏联保密，并显然有意针对苏联。但是，当时全面内战已经开始，美国支持国民党的立场逐渐明朗，中共正在确立向苏联“一边倒”外交方针，此时采取针对苏联的举动，目的何在？而且，事实上也难以“保密”，以东欧共产党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对苏“保密”毫无意义。李先生讲过一个笑话：东德的乌布里希在一个大晴天打着把伞，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莫斯科在下雨。从“决议”本身的形成过程看，似也难以对苏联保密。“决议”的形成过程很长，它的蓝本是毛泽东1942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正式起草工作从1944年5月开始，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1945年4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决议”还曾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很难想象，在延安的苏联代表会完全不知道决议内容，何况苏联记者孙平还参加了七大。第三，当时中共与东欧共产党并无实质性的接触，主动向它们传播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党内文件，难免使人产生突兀之感。

不过，李敦白先生的回忆在斯特朗书中也得到某种印证。斯特朗说，延安告别时，中共领导人告诉她，她应该带着外界需要知道的有关他们所有地区的资料离开，应该把这些情报带给世界，特别是美国。毛泽东特别说到，他不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情况带到莫斯科。斯特朗未明指或暗示是什么资料，比较明确的表述，是“关于延安及其他解放区的资料”。她本来确实打算直接回美国。对于毛泽东“不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情况带到莫斯科”的说法，斯特朗的理解是，毛不过是说美国人民需要知道这些情况，而莫斯科不需要（莫斯科能够通过其他途径了解这些情况），因此，不应该在莫斯科浪费时间，而应该直接回美国。斯特朗稍后发表的著作，主要是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独立性，它确实引起了苏联的不快，也引起了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重视。

这件事发生在1947年初斯特朗将要离开的时候，当时我已经入党。

斯特朗住在美军招待所，他们有自己的发电机，有电灯，各方面都方便，我便每天从清凉山往返，到斯特朗那儿工作。这个文件不同于后来《毛选》附录的文本，对许多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包括周恩来，批评得很严厉，只有对毛主席和刘少奇是完全肯定赞扬的，说一个代表红区的模范路线，一个代表白区的模范路线。除此之外，没有完全肯定的。斯特朗走的时候，把这个文件带走了。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新华社有一个记者叫胡懋德，比较糊涂。他发了一篇文章，说美军一年之内在上海犯了三千八百项兽行。起因是此前有一篇报道，说某月驻上海美军犯了多少项暴行，他把这个数字乘上十二，又将“暴行”上升为“兽行”。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是一家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英文周报，对中共态度友好，连它都公开叫板，说请新华社把三千八百项兽行的清单列出来，我们全文发表。有一天我正在廖承志的窑洞，毛主席给他打来电话，我都听得到话筒中传出来的湖南腔：“你们是中央社吗？你们是《中央日报》吗？你们怎么造谣了？新华社不造谣，中央社才造谣。”第二天，周恩来就到了清凉山，集合全体党员讲话，讲了一整天，但没让我参加。新华社党员的比例很高，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左右，只有少数人不是党员。会后给我传达了周恩来讲话的内容。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反复强调，新华社要讲真话，千万不能造谣，不能主观臆想，不能为了打动读者而捏造新闻。周还跟他们讲，他在南京、上海的时候，做民主党派的工作非常辛苦，跟他们讲形势讲前途，好不容易讲通了，过几天又忘了，得重新来过。之所以能讲通，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报道的准确可信。所以，捏造或任意

扭曲新闻，所起的是坏作用而不是好作用，影响很坏。新华社曾长期保持讲真话的传统。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大概是1960年或者1961年，大跃进刚过去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专稿，写得很零散，主题不鲜明，我就在前面加了一个导语，大意是说：在新中国，与过去的灾荒年头不同，生活虽然艰苦，但不会饿死人了。审稿的副局长把这段导语划掉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说的不够真实，下面许多地方饥荒很严重。我当时确实不知道饿死大量人口的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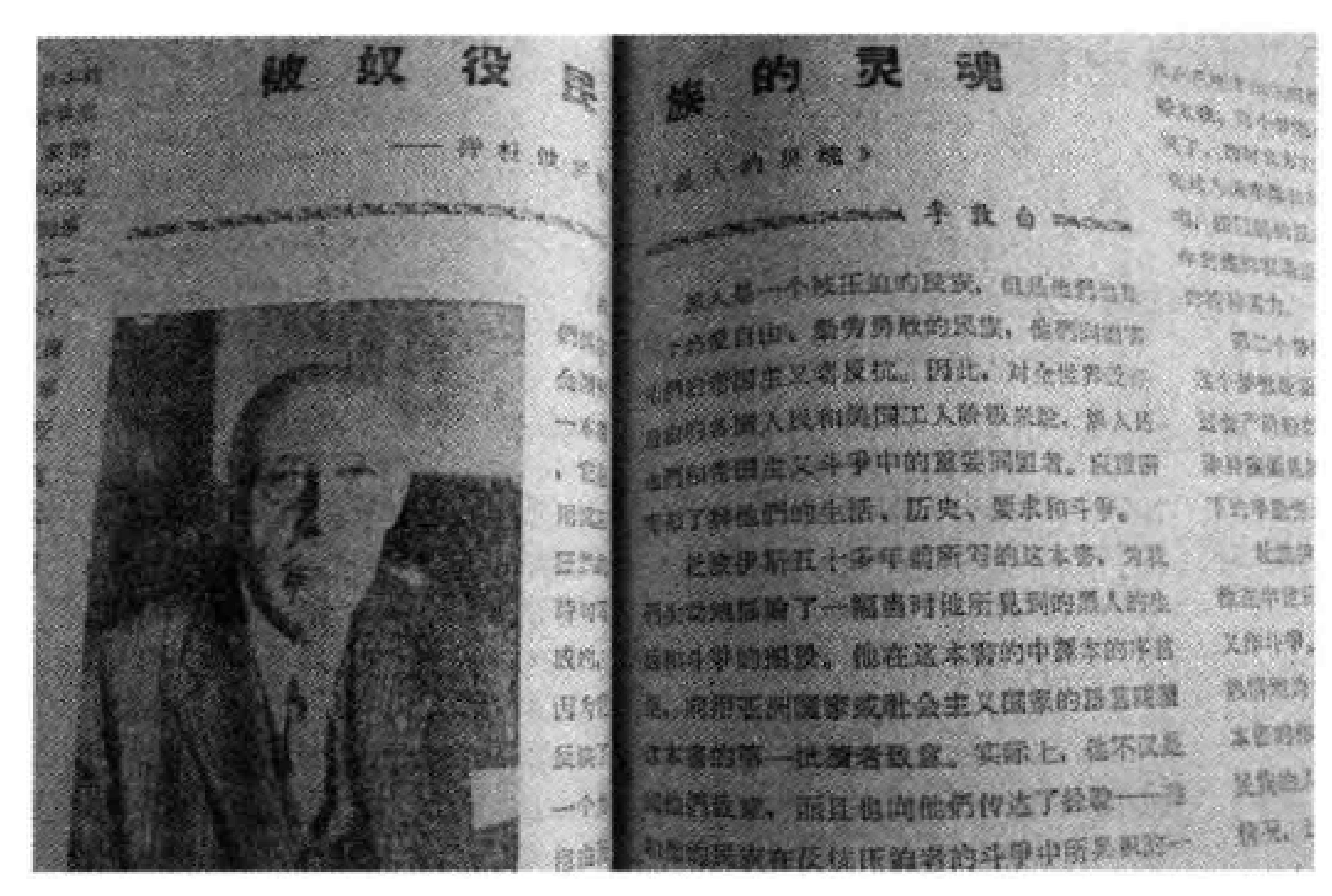
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无人能及。他很喜欢跳舞，每周舞会一般都参加，邓大姐心脏不好，很少参加。

解放以后，有些外事活动，周总理请我参加。1960年斯诺来北京，周总理办了一个小宴会欢迎他，只有两桌人。乔冠华与我同桌，他站起来祝酒，说了这样一段话：唐明照表面上是个中国人，实际上是个美国特务；李敦白表面上是个美国人，实际上是个中国特务。当然他是开玩笑。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①]访华时，所有活动都请我参加了。老挝共产党的总书记来访，周总理请我参加，就我们三个人一起谈话。他请我参加的目的，是想表示，不要搞民族主义，应该以阶级划分敌友，就好比我是一个美国人，但却是自己的同志。

---

① 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1868—1963），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贫苦黑人的家庭，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从19世纪90年代起，投身于美国和非洲黑人的解放运动。他是泛非运动的创始人，也是美国有色人种协会的创建者之一，并任协会的机关刊物《危机》的主编达二十四年之久。1961年加入美共，美共领袖威廉·福斯特称他是“黑人的一个最伟大的代言人”，“黑人的新的杰出领袖”。杜波依斯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美国为中国福利会筹募基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9年和1962年他两次访问中国。他以毕生精力研究美国和非洲的历史和社会，著有《约翰·布朗》（1909）、《黑人的重建》（1935）、《黑人的过去和现在》（1939）、《世界与非洲》（1947）等书。

1965年底斯特朗八十寿诞，因为毛主席在上海，我们从北京乘专机去上海庆祝，中午毛主席宴请，晚上周总理请我们，他还


被奴役民族的灵魂

李敦白

李敦白介绍杜波伊斯著作的文章。(《读书》1959年第16期)

同时宴请了一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宴会期间，东海舰队合唱团演出，周总理让他们演唱《长征组歌》，指挥很年轻，唱到中间，周总理突然叫停，问道：为什么不唱“过雪山草地”一首，这一段是萧华同志亲笔写的，你们为什么不唱？年轻的指挥涨红了脸，轻声说：我们不会。周总理说：我来指挥，你们唱。他过去拿起指挥棒，并放大嗓门唱起来，演员也跟着唱了起来，他们其实知道歌词。[①] 我过去不知道周总理会唱歌，而且唱得挺好听。

后来回想，不论国际局势还是国内政治，当时都充满玄机。毛讲

① 李敦白先生认为当晚演唱《长征组歌》不唱“过雪山草地”一首是故意的，与萧华挨整有关。应该没有这种相关性。第一，《长征组歌》全部12首歌曲，均由萧华上将作词，不限于“过雪山草地”一首；第二，萧华受冲击是在1967年初，1965年“文革”尚未发动，一些前奏曲也未涉及萧华；第三，《长征组歌》歌词写于1964年，同年底到第二年上半年作曲排练，1965年8月1日由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首演，虽随即风行，但11月份上海的合唱团还没有熟练全曲，也在情理之中。周恩来本人特别喜欢《长征组曲》，生前曾经十七次观看排练和演出，还能完整、准确地演唱全部十二首曲子。在《长征组曲》中，周最钟情的又是“过雪山草地”一曲，他曾经跟独唱演员贾世骏学唱该部分。所以，当天晚上周的失控应与他本人当时的心境有关，而与萧华的遭遇无关。（参见杨茵《〈长征组歌〉的创作及演出》，《文史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也是在这个时候。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的态度非常积极，对此我有亲身体会。我们单位的大字报都贴在一个楼里，“闲人免进”，所有外国专家都不许进入。我说我是中共党员，要求看大字报。党委批准了我的要求，但下令所有人都不许贴我的大字报，不许批评我。我自己写了大字报，批判李敦白的错误言行。负责对外广播的副局长金照找我谈话，说我跟造反派跑很危险，以后下场不会好，要求我遵守纪律，服从领导，我没理会。周总理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派了国家外专局的领导傅立群找我谈话，他说周总理让我给你打个招呼，坚决支持你参加造反，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欢迎你鼓励其他左派外国专家参加“文化大革命”。周总理的话对我起了非常大的鼓舞作用。我自我造反的事并不大，他完全可以不管，可是他积极支持，由此可见他在“文革”初期的态度。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11月或者12月，广播事业局造反派夺权之前。

稍后的12月18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大会，支持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成立六周年，越南大使参加了，越南南方的一个高级代表团也来了，我坐在主席台上。周总理、江青、康生、陈伯达他们上台时，挨个跟大家握手。周总理跟我握手时，我趁机对他说，请他关心电台的“文化大革命”，告诉他保守派用承担保卫广播事业局职责的北京卫戍部队的军人镇压广播学院的学生。他一听很急，把等待他的越南大使、越南代表团等人晾在一边，把我拉到一旁问详细情况。我跟他说，我们电台开了一个大会，警卫连的人拦在门口，不许广播学院的学生进入，双方打起来了。他马上大叫：“萧华，萧华”——萧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你们怎么镇压电台的文化大革

命？”萧华连说“没有，没有”，周说“你马上去查”。此后就没有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1967 年，不记得哪里开大会，周总理把我拉一边聊天，非常热情地赞扬大民主，他说，你看，谁都可以写大字报，谁都可以批评，除了毛主席以外。我说那您也不能批评。他说我算什么，我当然可以批评。他还说，约翰逊总统会允许到白宫贴大字报吗？我说不行。这一次可能是我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

但是，不久之后，周总理对“文革”的态度就转向悲观失望。1967 年 8 月底，杜波依斯博士的夫人雪莉（Shirley Graham）来北京，她希望见见周总理。当时杜波依斯博士已经去世，雪莉原来住在加纳，加纳政变后搬到开罗。我给外交部新闻司一个朋友打了电话，转达了雪莉的愿望。结果，30 号还是 31 号深夜，周总理接见了她。第二天一大早，雪莉给我打电话，她说，不管你正在做什么，赶快到我这儿来。我马上去看她，她好像被吓着了，惊惶失措。她说，周总理见她的时候，情绪非常低落，对她说：现在我们搞乱了，中国革命可能失败。不要紧，我们失败了，你们非洲也会革命，也会出现自己的毛泽东，你们会吸取我们的教训，会搞得更好。当时我不知道，那天周总理在外交部被整了一天，都出了心脏病。[①]

---

① 1967年8月底周恩来发心脏病，是由一些造反派在批判陈毅问题上长时间纠缠引起的。8月27日晨，周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无奈，他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造反派置之不理，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在场的保健医生搀扶他离开会场。造反派仍不甘休，称：“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走到门口的周恩来转身怒斥：“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周因病一天半无法工作。（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当时我已经靠边了，正在等待“特殊任务”。年底被捕时，在我的逮捕令上，有十三位中央领导的签字，其中包括周总理，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有个红卫兵领袖后来给我写过信，说周总理找过他们几个头头，想帮助我，怎样能够不被抓，但没有想出办法。1973年三八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了庆祝茶会，周总理到场讲话，对“文革”以来一些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受到的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表示道歉。当时只有我还被关在牢里，周总理提到我，说李敦白的情况不同，他参与了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人道这是周总理对我的否定和抛弃，我却看作对我的保护，要知道，当时对我的指控是“美国特务”，比“参与坏分子破坏活动”严重多了。

个人交往中，有些事印象很深。

1957年前后孙维世排演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青年剧院上演。我们进去时，看到后面空着四五个座位，心想不知哪位首长要来。灯光暗下来、戏开演后，周总理带着几个随行人员进来了。这时候，不知怎么回事，那几个空座中间正好我背后的位置坐了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周总理的警卫员快步跑过来，在他耳边轻声讲了几句话，这个人站起身来，而周总理也快步跑上来，按住他的肩膀，一边说“你坐下，你坐下”。一位随行人员劝他：总理，这是中央的规定，谁也不能违反。周与他来回辩了几句后，大声说：好了，你们看戏吧，我回去了，我的工作多得很！他还生气地说，我当总理不是为了妨碍老百姓看戏！说着就往外走。他们拉住了他，结果就坐在那个工人旁边看了戏。

还有一次，“文革”前，我们家老大老二五六岁的时候，我和玉琳带她俩到空军一个礼堂看京剧，忘了是什么戏，周总理坐在我们前

排。老二先闹起来，说总理伯伯挡住了她，周总理转过身来，把她抱到膝盖上，这下老大不干了，为什么妹妹可以坐在总理伯伯腿上？周总理再次转过身来，把她也抱过去，坐在另一边膝盖上。她俩一直坐在总理身上直到演出结束。

周总理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架子，而且非常有幽默感。美国的名记者白修德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最后一次来中国时，周总理请他吃饭，其中有一道菜是烤乳猪。他说我是犹太人，不吃猪肉，周恩来说这不是猪肉，是鸭子，白坚持说是猪肉，周总理说：我是中国总理，我说鸭子就是鸭子。他们在重庆就认识，很熟，可以开玩笑，不必拘于外交礼仪。周总理的酒量很好，喝酒时爱开玩笑。周和孙维世都喜欢强迫我喝酒，1946 年 12 月在延安给朱老总做六十大寿那次，他们强迫我喝老白干，喝酒我倒没什么事，接着看戏还给斯特朗做翻译，但我不喜欢喝。解放后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次宴会，参加的人都是朋友，周总理举杯祝愿世界和平，他看我拿着桔子水，就说，看来李敦白不赞成世界和平。我只好喝了酒。

1960 年斯特朗七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到她的住地台基厂“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苏交恶后合并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她做寿，周总理、陈毅元帅都去了，也就一桌人。席间，说到“大跃进”期间的一句口号：“人人都是诗人”，周总理就说了，这句话不对，我就不是诗人。我做了一首诗，送给陈老总批评，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给我退回来了：没法批评，因为你写的根本不是

诗。[①] 敬酒的时候，他们俩相互闹：一个说，你是老大，总理，你得敬酒；另一个说，你是元帅，我不是元帅，得你敬酒。相互关系非常亲密。

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严肃。还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开会，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周副主席跟前，跟他说了些奉承的话，周马上严肃地责问：你为什么这样捧我，是不是想从我这里讨什么好处？ 严肃地保护自己不被人拉拢。有一次，周和我还有另外一两个翻译一起谈对斯特朗怎么照顾的问题，我说了一句“这个老太婆惊慌失措”，他马上批评我，说对我们的老朋友不能用这样的措辞，真是一丝不苟。

周恩来的认真严肃与他的亲切可爱浑然天成，结合得天衣无缝，这样的人真不多见。

周恩来、朱德、陈毅这些人的个人关系都很好，经常说说笑笑。我跟周总理、陈老总关系都很亲近，跟朱老总接触不算多。朱老总是个非常可爱的人，总是和和气气的。在延安做六十大寿的时候，我对他说，您的情绪总是这么高，他说，我们天天打胜仗，情绪当然高，

① 周恩来的这首诗写于1958年“大跃进”高潮期间，又逢志愿军归国及以郑振铎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飞机失事事件，周想以此诗体现“忠于人民，提高风格，献身海外，战胜自然诸义”，全诗仅四句：“粉身碎骨英雄气，百炼千锤斗士风。走漠开山留侠迹，上天入地建奇功。”显然，作者所欲彰显的宏大“诸义”不是一首格律严谨的短诗所能阐发，这首诗也确实如他本人所言只是“四句俚语”。送陈批评事，周在给妻子邓颖超的信中曾提及：“……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见冯锡刚《一首“告废”诗——周恩来理性而睿智的选择》，《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第68—69页。）冯锡刚先生推论，“在敬重如师长的周恩来面前，陈毅绝不会‘班门弄斧’”，他的批评，无非“对个别韵脚或用字”之类提点意见。一般而论，这当然言之成理，但周陈两人的情谊介于师友之间，亲密逾常，所以才会留下李敦白先生回忆的这段佳话。

蒋介石天天打败仗，他情绪一定不好。毛泽东则比较拘束，而且他的地位毕竟不一样。后来的问题也许正出在这里。

我在监狱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非常悲伤，断断续续地哭了一个礼拜。监狱的警卫是只在周总理追悼会的当天戴了黑纱，看守则从周去世一直戴到追悼会结束。我从裤腿撕下一圈布戴在手臂上当黑纱，有一个巡视的部队干部从监视孔看到了，指着我责问：你干什么，戴那个东西？ 我一怔，随即哭了，他马上改口：你看马上掉了，赶快弄好。说完掉头就走，大概不好意思吧。

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天大的事，不但是中国的灾难，而且是世界革命的灾难，比周总理去世严重得多。但奇怪的是，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没有那种失去父兄般的痛彻心腑的感受。我当时就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奇怪。我想，这是因为我在政治上、在理性上爱毛，而在情感上不那么爱的缘故吧。

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批评周总理？我知道，有的人觉得他过于顺从，认为即使地位不保，也应抗争。我的看法不同。“文革”的时候，如果他倒了，谁管政府？谁管生产？没有人能管。我觉得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他是出于国家利益，不是为了个人。他尽力保护了很多人，对于毛出的一些不好的主意，尽量缩小它导致的损失。他维持自己的地位真的很有必要。譬如我的案件，他先跟红卫兵头头们讨论是不是可能让我不坐牢，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才在逮捕证上签了字。我从来没有怪过他。

周总理在“文革”中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时候我在监狱，根本没有想到“周公”其实是指他，还以为就是古代的周公。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有一天提审我。审问者是三个过去没



1971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在新年招待会上问候外国专家。

有见过的老干部，他们问我：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我说看了。他们又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我觉得，那些坏人要打解放军，要冲击人民大会堂，把他们收拾了，这是好事。但是有些事情我看不懂，也很不舒服。他们问我什么事？我想，如果我讲了，可能会挨整，可又想，我已经被关了这么久，还怕什么呢？就说，第一，有的文章开口就讲，坏分子借口纪念周恩来云云，这周恩来是谁？既不称同志，也不称总理，连个称呼都没有。讲到这儿，我“呜”的一声哭出来，而且不可抑制。另外我说，说邓小平搞修正主义，这我没有发言权，但说他唆使歹徒殴打解放军，我不相信，邓小平就是在军队成长起来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我以为要挨训，结果发现三个审问者咧嘴笑了。为首的那位说：行了，有些事，你在这儿不可能知道，我们也不方便跟你讲，慢慢你就明白了。

如果要对周总理作一个总体评价，我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天才、组

织天才、外交天才。他特别善于和人沟通，善于做各种各样的人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他很聪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很诚恳，他的言行高度一致，让人觉得非常可靠，可以信赖。他是一个具有强烈个人魅力的人，对周围的人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初次见面，就会被他吸引。有魅力同时特别诚恳的人，这个世界真是太少见了！

周总理是品德非常优美的人。连马歇尔都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平生没有见过道德品质如此高尚的人。他说，国民党代表答应做的事，我都要派人检查，周恩来答应做的事，我从来不检查。非常信任他。我和周总理有些个人的接触，根本不相信他会搞什么阴谋诡计。他是民族英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批判了自己最好的代表人物，那太可惜了。

三、陈毅

第一次见陈老总，是1947年底在太行山区涉县的新华社总部。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有序撤退。新华社不但是中共中央的喉舌，是中共与外界联系最重要的管道，在首脑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情况下，它还是中共存在的标志，因此，早在1946年11月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方针之后，新华社就制定了周密的梯队式撤退方案，以保证播音和出版工作的连续性。后来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撤退转移过程中，新华广播先由陕北子长县史家畔的战备点接替延安的全部广播业务，再由晋冀鲁豫中央局按中央指示在太行山区涉县西戌村组建的新华社临时总社接续广播，直到总社人员到达。期

间，三地电台接力播出，一天都没有中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是3月14日随新华社大队人马撤离的，由社长廖承志带领，先按计划撤到子长县的史家畔，停留几天后，东渡黄河，经晋绥、晋察冀等解放区，经过耗时三个多月、行程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于7月上旬到达涉县西戌村。

陈毅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各解放区之间逐渐打通，军事行动和后勤配给相互支援，华东的陈粟大军在粮食、民工、被服、经费等方面，得到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大力支持。1947年11月上旬，为与薄一波等商讨破袭陇海铁路的大军供应计划，陈毅离开华野司令部前往邯郸，11月底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冶陶在武安县境，但离西戌不远，陈毅同志特意到新华社看望大家，他站在一个百姓院子的露天台阶上做报告，介绍战场情况，鼓舞士气。他告诉我们，毛主席提出不打无把握之仗，得有绝对把握才打。所谓绝对把握，首先是地势有利，其次是粮食弹药充足，我们比敌人多两三倍的兵力，而敌人疲惫不堪，有这个条件就打，否则就走。每一个地方都创造这样的条件，把国民党部队一个一个消灭，让他们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陈总提出要见我。一见这个人，我就觉得亲切。陈总个子不高，比较胖，头发稀少，但是非常精神，很活跃，走路风快，说话声音较低沉，像个唱黑头的，很幽默，很直爽，很可爱。他说话非常风趣。陈总跟我讲了许多话，其中说到，我是野战军，野战军么，就是对敌人野，对自己人不野，对自己人很亲。这个“很亲”的感觉，我保留了一生。当时我和魏琳结婚不久，她也见了陈总。后来到北京，大概1956年或1957年吧，他来电台视察工作，我介绍了玉琳，他说：

哦，原来不是这个夫人。

到北京后，50 年代他来电台视察工作时我们见过，但这些属于工作性会面，印象不深。关于解放初期的陈毅，有两件间接获知的事情值得一说。其一是，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外交文件上提到一件事，上海刚解放的时候，一个名叫周明的人几次找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马康卫（Walter McConaughy），表示陈毅市长愿意跟他会谈，商量改善中美关系的办法。但领事不能确定周明的身份，未敢接触，只向国务院做了报告，1950 年撤走了领馆。上世纪 80 年代周明去世，李先念致悼词，说他是一位模范的地下工作者，才知道美国领事误了事。

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情。美国的一个高级外交官亲口跟我讲，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一开始很僵，大家都有些焦虑。有一天他上厕所，碰到中国的陈毅团长也来厕所，洗完手，陈毅与他握手，很诚恳地说了一些话，但他没有听懂。他一直自责因自己不懂中文误了事。当然，就在这次会议上，陈毅回应了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哈里曼（W.Arerell Harriman）的好意，两人握了手。两国政治家多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握手，引起国际关注。

从以上两件事情可以看出，解放初期中国的外交政策虽是“一边倒”，但并不僵硬，陈总无论是作为地方大员还是中央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都表现出全局观和灵活性。

到 60 年代，我和陈毅开始有比较多的个人接触。看得出来，他显然也比较喜欢我，当然，他对我亲切，更与他的工作有关。他是外交部长，是分管外事工作的副总理，我虽然是中共党员，但同时也是“外国专家”，指导我的工作，关心我的生活，在他可能是“分内之事”吧。

1962 年的一天，我们到北京一个剧院看四川话版的话剧《抓壮

丁》。[①]坐下时，后排还空着几个座位。开演后，有人从背后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陈老总。他说，给你介绍我的朋友。原来是英国代办。陈总道：代办先生的中文很好，但我怕他听不懂四川话，特意来给他做翻译。看戏的时候，他们一直有说有笑。当时，因为香港问题，中英关系紧张，前几天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声讨英帝国主义。老一辈的外交家做工作就是这样灵活，今天做得到吗？所以，有矛盾的时候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要更积极主动地工作。

同年较晚时候，中印发生边界冲突，陈总从前线回来，带回一条大蛇，请我和玉琳去吃蛇肉，只有我们两对夫妇四个人，聊天比较随意。我问他，中国军队从喜马拉雅山下去就是印度阿桑省，再往南二百里就是加尔各答，扑下去很容易就可以占领那些地方，为什么不往前打，反而撤回到原来的边界线呢？他说，嘿，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这么难管，不可能再去管别人的事，我们也不要他的地，也不要负责管。他还说，这些印度兵很可怜，军官贪污了他们的伙食费，他们都吃不饱饭，我们拿馒头给他们吃，嗨，他们恨不得马上跑过来呢。说罢哈哈大笑。后来，中国军队把缴获的汽车给擦干净，修好，还加满汽油，让他们开回去，把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打包整理，全还给他们。对俘虏的优待就更不用说了。真正体现了大国的胸怀和深谋远虑。

陈老总办外交，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得非常好，在坚持立场的同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和浓重的人情味。

---

① 《抓壮丁》1962年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联合演出。网上书店售卖的该剧节目单标注的演出时间是5月20日，此时的英国驻中国代办为施棣华爵士（Sir Michael Stewart），他的后任贾维爵士（Sir Terence Willcocks Garvey）于7月10日向陈毅外长递交委任书。可见，这次观剧也是施棣华代办卸任前的活动。

陈总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战场上的身先士卒精神，在他领导外交工作时也得到体现。印度尼西亚曾是新中国外交的亲密伙伴，但反共排华暗流汹涌。1965 年 9 月 30 日，印尼爆发“九三〇”事件，华侨遭到大规模逮捕和杀戮。中国两年后才与印尼断交。可想而知，这段时间内，中国外交人员的处境险恶。陈毅要求到印度尼西亚当大使，他说：我干革命不是了为当外交部长，我派人出去受气，自己不去，对不起人。他跟我和斯特朗说这些话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毛主席当然不会同意他去。

“文革”初起时，玉琳在外语学院读书，陈毅曾到学校讲话，会前碰到她，很亲热地打招呼，问她学得怎么样，她说不怎么样，年纪大，学校的党团工作多，家里孩子多，忙不过来。陈毅又问孩子谁管，问我怎么样，让玉琳好好学习。玉琳是“保皇派”，我呢，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按说我们俩应该冲突，但我很支持她，为什么？因为她保陈毅。

1966 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见到陈毅，发现他又瘦又苍白。他在前排站着，这次我们没有交谈。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 1967 年 5 月 2 日晚上。那天，我和玉琳到人民大会堂看京戏，应该是样板戏吧，当时不可能演出别的京戏。毛主席、林彪他们全体都去了。演出快结束时，一位军队干部走过来对我们说，陈总请我们演出结束后留下，他要找我们谈话。陈总把我们带到不知哪个省的接待大厅，他自己从墙边拖了两把大椅子到房间中央，我也跟过去拖了一把。我想他是怕“墙中有耳”吧。就我们三个人，坐在大房间的中央。这次谈话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劝我。当时我很“革命”，把自己的工资减少一半，所有的专家待遇都不要了，

搬出了独立的专家办公室，跟大家一起在大办公室办公，汽车也不坐了，改骑自行车。他说，你吃穿住都和我们中国同志一样，工作很辛苦，这都很好，但我的意见是，为了做好外国专家的工作，不要那么突出，你的生活习惯应该像他们那样，不要显得跟中国的无产阶级似的，这样会跟他们疏远，反而不利于工作。他讲得对，但实际上我没有听他的。后来他又分析国际局势，说，美国在越南打仗，不很久的未来是会结束的，结束以后，整个世界格局都会变化，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也会变化，我们应该多考虑，心里要有个估计，将来怎样应付这个局面。玉琳知道他在“文革”中受到攻击，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有些同志对我的作风提了意见。我说，据我了解不光是作风的问题，事实上提了很严重的意见，提了“修正主义”什么的。他笑了，没加评论。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陈老总。

“文革”中，我们都听说过一个传言。当时流行打语录仗，陈毅挨斗时，说：请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翻到第 271 页，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实际上《毛主席语录》只有 270 页。当时我们都相信这是真事，现在大家认为只是一个传言而已。毛主席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不仅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据《陈毅传》，1957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时，毛主席向他介绍陈毅，说他“是多年来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当时陈毅刚从华东调到中央，准备主持外交工作。问题是，被毛主席称为“好同志”的人决不会限于陈毅一人，老干部在“文革”中更是集体受害，为什么这个传言只安到陈毅头上？我觉得，陈毅是勇气、胆量、智慧、幽默的集合体，这个传言，只有在他身上才是可信的。

陈毅同志，他是横扫千军的元帅，他是才情豪迈的诗人，他是痴迷的棋类爱好者，金刚怒目和春风化雨，脾气耿直和生性幽默，领袖风范和文艺气质，那么奇妙地合为一体，让他拥有了巨大的个人魅力，这种个人魅力，在军事家和政治家身上是多么的难得！

四、王震

王震是我最早认识的八路军将领。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上海，是徐迈进带我去见他的。他穿着国民党的将军服，正被一群募捐的学生包围，他给了一点钱，说：我是个八路军的穷将军，没有什么钱。后来我去湖南调查灾情，路过武汉，到德国人开的德明饭店（中原军区在那里设了办事处）去见他，他像看到老朋友似的热情。

王震给我介绍了一个人，姓毛，他说是毛主席的亲戚——恐怕是他编的，让他跟我去湖南，帮助我调查。后来我们到长沙，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湖南分署，女青年会有一个人来告诉我，王震指派的人不能来了。离开长沙后，我们去衡阳，过衡水时坐的是一条木船，在这条船上，我碰到了国民党青年军的一个年轻士兵，叫张德明（音）。他告诉我，他被派到印度时学会了开车，在青年军中做运输工作。他的老家在保定附近，属解放区，家乡搞了土改，生活比过去好了，他还说他很喜欢八路军。我说我要下去调查灾情，调查救济物资的分配情况，但感到很困难。他马上说，他去跟长官请假，陪我去。结果我那两个同事找当地官员了解情况，他在下面跑，收集的材料非常丰富，都是真人真事，我主要根据他的资料写成报告。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这个人是王震安排好的，还是碰巧遇到？巧合的可能性总是有，但这也太巧了。

后来我被派到宣化店工作，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经常与王震一起散步聊天，他说，他要把我带到前线去，看看部队的那些小伙子，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王震跟我讲过他的身世。他小的时候，在铁路上的一个英国人家里当过佣人，整天干粗活，他恨透了这个英国人，有一天打死了主人家的爱犬，跑出去当了红军。他说他的排外主义特别严重，痛恨所有外国人，申请加入青年团时，因此而未被接受。[1]不过，他说，后来他的觉悟提高了，不盲目排外了，也接受了我这个外国朋友。王震是个热情似火、对朋友赤胆忠心的人，一直到最后，他都对我特别亲热。

他对部队的感情很深。他告诉我，有一次一个手榴弹落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的警卫员把他扑倒在地保护了他。

王震脾气比较粗鲁，不过他很怕他爱人王季青。我在张家口给电台的人上英语课时，王季青抱着王之来听课。后来王之担任电子工业部的领导，有一次和美国公司谈判，我们俩吵起来了。我对他说，你别跟我嚷嚷，你这么点大的时候，你妈抱着你听过我的英文课。他马上不吭声了。

中原突围后，王震回到延安。好像是1946年的11月，天气很

---

① 《王震传》上册第一章“从放牛娃到师政委”中提到，少年王震曾在长沙当过铁路长夫，干打扫站台、搬运行李、接送电报之类的杂事，星期天要给养尊处优的英国工程师修草坪，有时还挨打，深感不平。他曾拒绝加入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原因是对入团仪式“挂马列相片、请外国人当导师”很不情愿。（见《王震传》编写组著：《王震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冷。① 我到四十里铺去迎接三五九旅，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这么冷的天气，王震和一些干部穿着布鞋，大部分人穿的是自己编的草鞋，那些战士看上去真小，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一个班里面，可能有一半的人拿步枪，有些人拿红缨枪，还有少数人拿棍子。三五九旅还是最精锐的部队。所以当时毛主席说每个月要消灭国民党十个旅，我真希望能，但觉得不可能。

在延安，王震给过我一袋子苹果，说是南泥湾生产的。

解放以后见面的次数不多，只记得有一次我、王震、还有煤炭工业部的部长高扬文在中山公园见面，我们在一起照了相。还有一次是他转送了几件新疆生产的衬衣，说是王恩茂送给他的。

我们回美国定居前去见王震，当时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说，以前你经常给我们介绍美国的医生、教师、新闻记者，现在不需要介绍这些人了，你回去后介绍些财团人士给我们。我说，我从小是干革命的，最反对财团人士，也不认识他们。他说，我们都要重新学习嘛，你看我一直是当官的，现在也要重新学习。我们带了他的嘱托回去，后来搞咨询、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跟王震的要求有关系。对于另外一些人的要求，我们就没有理睬。有人想让我们假装不爱中国，不说中国的好话，多搜集美方的情况向他们报告。这不是我能干的。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这不好办，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之所以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想，一方面因为我坐过监狱，经受过考验，

① 中原突围后，王震所部于1946年8月31日抵达陕甘宁边区，9月17日晚到延安，10月3日王震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讲话，10月5日中央礼堂举行盛会欢迎中原归来将士及廖承志，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李敦白先生到达延安（1946年10月19日）之前。李先生记忆中的这次迎接或许是另外一次。

可以信任，另一方面，以前我也常给他们反映外国人的情况，以改进工作。我没接受这个要求，也许直到今天，都算我表现不好的事实吧。不过我们确实听了王震的话，介绍了许多美国老板到中国投资。

上世纪90年代初王震还去过一次美国，当时他已发现癌瘤，先到杜克大学医学院治病，然后去洛杉矶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订在上海组装飞机的合同。他在洛杉矶的时候，中国大使馆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孤单，希望我们去看看他。我去看他，陪他上街，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国农民，他觉得很自由，神色得意，说，你看，这些美国人看我，我就是一个中国老头。他老跟我开玩笑，总说“贵国怎么样怎么样”。王震给人的感觉是个粗人，但听说他其实很喜欢做古诗。

最后一次见王震是在北京，他骨折住院。王震有一次去看彭真，两人告别时彭真摔倒了，倒在王震身上，结果王震的腿折了。我们正好在北京，王季青打电话给我们，说老头住在三零一医院，很苦闷，你们有时间就去看看他，聊一聊。这次见面，我们觉得王震思想比较偏激。

我觉得王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英雄人物，赤胆忠心。当然他们也都带着自己生长的社会的烙印。我不赞成他后期的某些政治观点，但作为朋友，对他很欣赏，他对友谊非常忠诚。丁玲遭难时，他把她接到东北，丁玲认为这挽救了自己的生命。我本人也受了他的恩惠。我在“文革”结束后很快获释，要感谢王震。后来王震跟我讲，1977年的时候，他从在押犯人名单上看到我的名字，就去找李先念，说你看，我们的老朋友还关在里面。他们一起去找华国锋，把我放了。所以“文革”后我出狱是比较早的，比丁玲、王光美她们

都早。

五、李先念

我还在上海的时候，就多次听说过李先念的名字，说这个人善于打仗，头脑灵活，日本人和国民党都难以对付。我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李先念手下有一个姓安的干部（解放后在贸促会工作），守着汉水的一个小港口收税，收谁的税？收日本人的税。日本人来往武汉运送军火、粮食、物资得经过这个港口，双方有一个默契，你交税，我就让你通过，你不交税，我的游击队就打你。非常巧妙，也很实事求是，因为新四军要生存，也不可能一下子打下武汉，那就先让日本人交税吧。

我到宣化店那天，他们正在开纪念“四八烈士”的追悼会。木头搭起的台上坐着几个人，我知道李先念一定在台上，心里猜想，哪一个是李先念？轮到他讲话时，坐在最右边那个我认为最不可能是李先念的人站了起来。与随时精力充沛的周恩来相反，李先念总是显得很疲倦。他长得很瘦，说话慢吞吞的，话也不多，但很精辟，而且幽默。我在宣化店工作的那段时间，中原解放区的人都对我特别好。王震不用说了，这是个非常直爽的人，他要拿你当朋友，就什么话都跟你说。李先念也待我很好，他请我到司令部做客，我可以随时进出，警卫员也不拦我，我多次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吃饭。李先念当时是中原军区司令员，他原是新四军五师师长，所以人们大多叫他李师长，我也这么叫，一直到最后都叫他“李师长”。

我在湖北见过李先念的木匠师傅，他说，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做木匠的材料，好像还挺可惜似的。

李先念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但他反应很快，讲话风趣。我在宣化店时，他们曾接待一个记者团。有个国民党报纸的记者问：你们说服从中央的领导，那为什么不交税？李先念接口道：你们的报纸口口声声称我李匪先念，既然是匪，交什么税？

我印象更深的是李先念跟学生的一次讲话。宣化店有一个中原民主建国大学[①]，学生们都是从大城市来的，我曾经到学校给学生讲过话。他们只有一些中央文件，没有课本，我问他们是怎么上课的，学生们说，他们就是用自己的嘴、耳朵、眼睛学习，问老乡当地的情况，收集材料，讨论分析，根据实际需要给乡亲们提供帮助。我参加了一次大会，李师长跟学生们讲如何准备突围。他说国民党一定要消灭我们，他们一进攻，我们就要突围。突围成功的关键是轻装，要跑得快，非急需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带，包括书籍，书是最沉的。学生代表站起来说：李师长，我们不能不带书，书是我们的马列啊。李先念就说：突围的时候，跑路跑得快就是马列。后来我常回想起这句话，当年的共产党领袖，思想多么灵活！

第三十二调停小组的美方代表，何柱坚之后换成了另一个美国上校[②]，这个人实际上是比较露骨地同情国民党的。他离开的时候，李先念请他吃饭，我给他们当的翻译。李送了一把从日军缴获的很高

---

① 该校于1946年3月正式开学，郑位三兼任校长，刘子久任副校长，李昌任教育长。学员三百余人，多为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青年。在中原包围日紧的情况下，学校于5月底结束。

② 中原突围时，三十二小组的美方代表是白罗素中校，不清楚中间是否还换过人。

级的手枪给美国上校，他如获至宝。随后，李转达了毛主席的话，希望他带给美国方面。毛主席说，共产党将在五年之内掌握全国政权，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希望与美国建立正常友好的关系，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已经打了一百年仗，把一切都毁坏了，一切都需要重新建设。建设需要贷款，根据我们的估计，到时只有美国有能力给我们贷款。我们付得起正常的利息。第二，我们在掌权之后，不能仅仅依靠苏联。苏联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共产党，我们是同志，但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我们愿意与苏联、与美国、与西方同时交往。如果说第一点比较平常的话，第二点真使我十分震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共与苏共有所不同，而且不忌讳说出来。后来我在张家口听蔡树藩将军对美国领事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可见是党内的统一政策。此时，中共对美国释放友好信号非常明确，忽视这个信号铸成了美国的大错。

再次见到李先念是在延安。大概 1947 年初，有一天我去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对面过来一个人，一看，正是李先念。我不知道他已经到延安了。[①] 我们看到对方，两个人都跑起来，非常亲热地握手。他对我说，你帮了我们大忙，你当时说的话，我们有些同志不信，但我信，事实证明你说得对。后来，我到李先念家里（好像是在南坪）参加他和杨新的婚礼。在宣化店时他并没有介绍他当时的妻子尚晓平，不过从张家口到延安的路上，我和尚曾经同行。

我们在延安见过几次面，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新四军的朋友。有一次，他说，正在准备南下，并且说，以后他可能会做汉口市的市长，

① 李先念回延安的时间是1946年10月下旬。（见《李先念传（1909—1949）》，第670页。）

到时候，我可以到汉口去找爱人，他会把最漂亮的姑娘介绍给我。

再见面，就已经是50年代的北京了，李先念当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我们有时去给他拜年。

1985年，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应邀访美时，我到白宫参加了欢迎仪式，后来去他下榻的酒店看望他。通往他房间的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布满了美国的安保人员，不过房间里只有他一人。我问他，李师长，当年在大别山区，你想到过有一天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访问美国，而我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欢迎你吗？他笑了，说当时最多想到当汉口市市长。他还说，国事访问不是个事，你想看的人家不给你看，人家给你看的你又不感兴趣，没有意思。他仍然显得很疲倦。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后来他听说我在写书，曾说等书出版时给我写个序言，可惜我的书出版时，他已经不在了。

六、刘少奇

刚到延安不久，我就认识了刘少奇。我认识他在苏菲、马海德给我介绍王光美之前。他对我说，你的中文不错，不过还不够，中文有许多成语，含义丰富，你要学习成语。他还建议我看三本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这三本古典小说会给我提供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语言知识。我听了他的话。后来因患肺病，只能半天工作，稍后更进医院养病，得空我就读这些古典小说，还开始学成语，所以我现在说话还能不时带出成语，这得感谢刘少奇。

与刘少奇的直接交往虽不多，可他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中共领袖之一，这是因为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可以说，我的前半生与这本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它的认识可谓一波三折，而且，它成为我漫长的监禁岁月中为数有限的精神营养之一。我在宣化店就读了这本小书，当时我不太同意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尤其是关于党员和党组织关系部分。书中说，党员具有他个人的利益，而且这种个人利益在某些时候可能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对立，这时候，要求党员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不能牺牲党的利益（不论在任何形式的掩盖与借口之下）来服从个人。而我认为，共产党员不存在与党组织不同的个人利益。当时我很年轻，充满理想主义的情怀。我不是说过吗，我在美国搞劳工运动时，我妈说，就算共产主义是好的，为什么要牺牲我的儿子？我的老师也说，为了某种事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合理的想法。但我从来没感到自己在作出牺牲，相反，我很快乐，完全没有觉得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会有矛盾冲突。我请教郑位三政委，在延安还曾当面请教过作者，仍然似是而非。第一次坐牢期间，我又读了这本书，这时就觉得他讲得很对，对这本书很欣赏，因为我当时已经深深地感觉到，共产党员确实有不同于党组织整体利益的个人利益。譬如，为了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广播电台需要保密，不允许个人（尤其是像我这样显眼的外国人）在任何形式的掩盖与借口之下（譬如辅导妻子学外语）随便在周围活动，夫妻只能一周一见；从我的个人利益讲，却忍受不了与妻子新婚离别的煎熬。同时，我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虽然行为上不能完全做到）：只要是党的纪律，你同意不同意都得遵守，就像“文革”中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增加理解”。所以说，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接


一定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国科学技术界
彻底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手

首都科学技术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集会狠批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李敦白参加了这次“黑修养”批判会。(1967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受了《修养》的基本观点，更重要的是，它对我认识个人与整体事业的关系，树立革命的不朽观，从而战胜监禁生活的孤独绝望，并在监狱中完成向真正的“自由人”的蜕变，提供了有力的精神力量。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和修改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鼓吹“文化革命”就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看了这篇社论，我又觉得《修养》所说的“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的论证有问题。刘少奇在书中说，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问题是，党是通过个人实现其领导的，谁能代表全党、整体、长远？领导人和权威可能是错误的，服从党的纪律，不是要求你服从错误领导，如果是错误的东西，你就不应该服从。这样一来，就又否定了《修养》。“文革”时批“黑修养”，我到许多单位作过报告，连军事院校都去。此时批判的角度与延安时期不同，但

仍然围绕个人利益和党的整体利益这个主题展开。这时主要是批“奴隶主义”。《修养》中说共产党员要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纪律，我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奴隶主义。我发挥道：凡是有奴隶的地方，必然有奴隶主，往下看是奴隶，往上看就是奴隶主，最上面的就是最大的奴隶主。我的意思是说刘少奇，但后来别人硬说我指的是毛泽东。这下祸就大了。

现在看，我觉得《修养》很适合革命年代，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绝对的纪律和服从，但它不适合建设时期，现在应该鼓励大家提不同的意见。发明创造少，跟不让人畅所欲言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刘少奇跟那些部队的首长很不一样。我认识很多部队的首长，只要跟他们交了朋友，就什么话都谈，很热情。刘的性格比较冷，不很容易交朋友。

七、王光美

我在北平军调部就见过王光美，她是叶剑英的秘书。在延安的时候，马海德、苏菲夫妇在他们家里请我们俩人吃饭，想介绍我俩处对象。下一个周六，我请王光美在一个小面馆吃回锅肉，再下一个周六她回请，还是吃回锅肉。延安也没多少选择。我们俩都是单身，但好像都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就说开了，觉得还是做朋友好。我那时候在翻译《小二黑结婚》等小说，好像请她看过，请她提意见。舞会上也碰到过。但没有详谈过，交往很有限。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正直，我对她印象很好。


刘少奇与王光美婚后合影。

在西柏坡也偶尔见到，那时她已经跟刘少奇结婚。一天清早，我到外面散步，看到他们夫妇两人也在散步，刘少奇走在前面，踱着方步，王光美在他靠后两步、靠左一步的地方乖乖跟着。这个画面在我脑中烙印很深，我不由得想，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理论上无疑是平等主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恐怕谁都难以真正做到男女平等；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也是孔孟之徒。

1949 年之后没怎么见到王光美。1967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批斗她的那次大会，我去参加了。周总理叫我不要去，江青叫我去，我听了江青的。我当时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周总理当然拥护革命，但属于老一辈，不如江青先进。没听周总理的话，去参加了这个批斗会，让我后悔一辈子。不过我在会上并没有怎么批判王光美，我只讲了五分钟，批了蒋南翔，蒯大富问我为什么只批“死老虎”不批“活老虎”。事实上我并不是有意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回避会议主题，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清华原校长蒋南翔何许人也。

我被抓起来后，莫名其妙地把我和王光美搞成一个特务集团。我的专案组隔一天审她，她的专案组隔一天审我。通过几次审讯，我勾

勒出了“案件”的大致线索：斯诺代表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CIA成员，他走后，我成了这个组织的首领；我发展了王光美，王光美又发展了刘少奇。这些事情，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当时不算离奇，比这荒诞的事情多了。

她的专案组成员是些高级军官，年岁较长，还比较理性，我的专案组都是年轻人，提的问题特别离谱。譬如说，问我为什么两次吃回锅肉，是什么暗号？这让我如何回答？都面对面谈话了，还需要什么暗号！没道理。他们不断纠缠这两次回锅肉的事。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吃回锅肉的事，可能是我自己交代的吧。他们还指控我在纽扣里装了个小照相机参加陈毅的批斗会，然后把资料传给美国的电视台，说三天之后，全美国都播放了这些照片。我们家老三后来说，她听到这个传闻后不禁失笑，她说：我爸爸的手特别笨，连个普通的照相机都不会用，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技术用纽扣相机这种东西。

王光美是1978年底出狱的，比我晚。后来我听说，她曾对秦城监狱的负责人说：我的领导都放出去了，为什么我还被关着呀？1979年的三八节，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个大型招待会，这是王光美“文革”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我们家老二小东跑过去跟她说：“王阿姨，您和我爸爸以前是一个‘组织’的。”她笑了。

我们后来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曾给她带过信，说我们是不是见面聊一聊。她说再等一段时间吧。这一等，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八、邓小平

我在延安和西柏坡都没见过邓小平，后来跟他的直接接触也不多。我第一次注意邓小平，是 1956 年八大前后，他发表了一些关于党内民主的谈话，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我觉得谈得很好。我还听过一个传达，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高级的民主，但实际上我们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反右”的时候，他协助毛泽东主管运动，我的印象中，他对知识分子跟别人并没有两样。但当时我不觉得不对，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确实应该改造。

1956 年“大鸣大放”的时候，有个英共派驻北京的记者引人注目，他家有个小楼，经常邀请一些机关的人聚会。他邀请的人一般喜欢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追求西式民主，他们在一起喝酒，跳舞，讲怪话，骂共产党，屋里还挂一条横幅，上书“第一百零一花”。我们电台也有人去。去的这些人其实是不错的，我担心他们糊里糊涂出事。这个记者也邀请过我。我写了一个报告，说这个记者会把机关里一些不谨慎的人套上，做一些以后让自己后悔的事，这件事值得注意。我跟那个记者本人也谈了。因为这件事，邓小平在一个中央文件中表扬了我，说某某某同志外事工作很努力，有成绩，做得好。后来“反右”就提出来百花齐放是指鲜花，不包括毒草。这话是有针对性的。

60 年代，斯里兰卡专家来了，邓小平请了少数左派专家吃饭，他讲了话，没什么特别的，态度很和蔼。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来华，跟邓小平会谈，主要听邓介绍中国的情况，作为兄弟党的交流。我跟这位总书记是好朋友，事后他跟我抱怨，对会谈不满意，说以前跟周总理谈，谈得很深入，听后很有收获；邓则什么都不跟他谈，他觉得

没有收益。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看到一些材料，说毛对邓提出批评，而这些批评看上去只是一些闲话，如说邓开会的时候坐得离他远远的，“躲着我”，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意思。1966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邓小平，他一个人坐在休息区喝汽水，情绪低落，我想过去跟他拉拉话，但他显然不愿意谈话，我只好走开了。以后没再见过他。

我从监狱出来后，通过邓林给邓小平写过信。邓林是通过新华社老同事的女儿认识的，我们之间没谈过政治。听邓林说，她父亲是个公私严格分明的人，他一个人吃中央为领导同志提供的伙食，不跟全家人分享。邓林的小儿子只有五六岁，说爷爷对他要求很严格，他今天晚上吃不完的菜，爷爷明天一定得让他吃完。我的信是讲外国专家的问题。我说，外国专家的贡献很大，但如果禁止他们与中国人交朋友，他们就不会把所有能量都发挥出来，效果不好。我还说，新华社领导对外国专家严格保密，什么都不让他们知道，我提了意见，另一位资深的美国专家艾琳也提了意见，都没有用。他们声称是为了保守国家机密，但我觉得，他们所谓保守机密，其实是怕外国人看到他们的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怕他们提意见、批评。我还说，过去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一个秘密没守住，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党组织的毁灭，现在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不会因为一个秘密泄露而垮台，相反，如果跟外界关系搞不好，问题就可能很严重。我在信中没有提个人的事。我当时刚从牢里放出来，心有余悸，所以我是鼓起勇气才写了这封信，但他显然不以为然。邓林下次来的时候说：关你那么久，还不老实。她没有说这是谁的话。

我们回美国的时候，赶上了中美关系的好时光，这要归功于邓小平，他 1979 年初对美国的访问十分成功，他的工作非常出色，给美国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事实上也为我顺利回归美国社会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当时（1979、1980 年）的看法是，邓小平背弃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很不满意。现在看来，大致上他是对的，遗憾的是没有能够把精神生活扭转过来，让物质和精神同时强大。但是也许不可能吧，我不知道，难以评论。他是毛泽东之后影响中国历史最大的人，从某些方面讲我觉得他跟毛泽东一样重要。他打开了市场，让中国作为平等国家参加了国际事务。他还做了件非常英明的事，一上台就规定，除了刑事犯罪，对“文革”中欺侮过你的人不报复，他自己就做到了这一点，这在中国历史上少见。这个方针是比较成功的，虽然派别情绪仍然有，但毕竟没闹出什么大事。而且他让干部放心，以后不搞运动，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做法都是很有谋略的。他在外交方面同样深谋远虑，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备。我听伍德柯克（Leonard Freel Woodcock）说过一件事，中美建交谈判谈到最后，在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上一直达不成协议，陷入僵局，天都快亮了，邓小平问他：怎么办？伍德柯克说，是否可以就已经同意的东西签订协议，邓只说了一个字：“行。”

九、任弼时

任弼时是延安的“五大书记”之一，我只有过一次接触，但印象

很深。有一天，我跟小廖一起到飞机场接什么人，他也在，看到我后跟小廖说，你们的外国人怎么穿得像个瘪三似的，你给他弄身好点的衣服吧。其实我当时穿的是普通八路军战士的服装，可能他觉得外国朋友应该穿得更像样点吧。后来给我做了呢子的干部服。

我一向不太注意穿着，到上海时，还穿着美军的旧军服，只是把领章肩章撕掉。徐迈进对我说：当官像官，当兵像兵。他自己就穿得很像样。他叫裁缝给我做了套西装，但实在不合身，我也没穿。

十、廖承志

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社长原来都由博古担任，他牺牲于 1946 年 4 月 8 日的空难，是“四八烈士”之一。同年 5 月，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改组，两社均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在内部组织机构方面，两社合设社长一人、总编辑一人，副总编辑二人，秘书长一人，实行社长负责制。当时决定由余光生代理社长，兼任总编辑。同年 7 月，廖承志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所以，我一加入新华社，就在廖承志的领导之下。他 1946 年 1 月才从重庆的监狱出来，我见到他时，他走路脚还有点拐，听说是戴脚镣戴的。他跟我说，坐牢时蒋介石曾召见过他，劝他说，你父亲是国民党的元老，你应该回到国民党来。他回答说，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我爸爸是不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新华社上上下下都叫他小廖，个别叫廖公。他的警卫员叫他“肥仔”，通知见面就说“肥仔叫你去”，当他面也这么叫。当时单位都不

兴叫职务，如副总编辑陈克寒，就叫“克寒”或者“陈克寒”。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廖承志的爱开玩笑。1947 年我们在太行山整风的时候，他作了动员报告，说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但请你们别提“不要开玩笑”这一条，因为我知道我没办法改正。他跟谁都开玩笑，包括毛主席，就是在他妈妈面前很老实，不敢开玩笑。

我们见面不久，他就给我起了外号：“小洋鬼子”。

但他工作上非常严格，扣政策扣得很紧，发稿很严格。我们的稿子都由他把关。他的英文、日文都很好，可能还会俄文。他讲中文的时候，中间老插着“stake,stake,stake”，如，“今天……stake,stake……中央来了一个通知”，很奇怪。可能是“这个，这个”，反正我老听成“stake，stake”。

从延安撤退的路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的医务所所长实际上只是个半瓶醋的大夫，是小廖家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有一次，我们所住村庄的一个妇女干部生病发烧，到医务所看病，医生说是妇科炎症，需要消炎。医务所只有少量的磺胺药，所长不肯给，说只有首长才能用这个药。小廖把他臭骂了一顿，说你不能做个医生，做个人行不行，人病了就得吃药，分什么首长不首长！所长只好给药。

小廖是个感情深挚的人。他的妻子阿普是个宝贝，看上去很娇嫩，小廖对她关爱备至。我们撤退时路过“四八烈士”飞机失事地点附近的薛家圪台，开了一个追悼会，由王若飞还是哪位烈士的一个亲戚主祭，小廖讲话，他几度哽咽，泣不成声。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悲痛成这个样子，要知道，他平时是个成天嘻嘻哈哈的乐天派。太行山整风的时候，有人给英文广播组的主编沈建图提了意见。沈是新加坡华侨，有人怀疑他。我听到小廖很大声地说：“我一旦了

解一个人，就绝对不会怀疑他！”

小廖对人很关心，好像对每一个相识的人都很关切。吃完饭在外面溜达，看到熟人就问长问短。大家对他印象也都很好。他对我特别好。延安遭轰炸的时候，我吓破了胆，到处躲藏，他跟我说，你不要走开，就跟着我，我现在不敢相信你。我跟着他坐了几天车，后来我说，我的好朋友彭迪、钱行都有肺病，我得照顾他们。我们三人还有英语组的秘书、一个年轻女孩胡晓为组织了一个“模拟家庭”，彭迪、钱行是妈妈爸爸，我是儿子，胡是女儿。我们有一个“三用脸盆”，即晚上用来接尿（天气实在太冷），早上用草灰擦一擦洗脸，再擦一擦打饭，到太行山后我也终于传染上了肺病。

我跟魏琳结婚时，小廖画了一张大漫画送给我们，两边写一副对联：“洋人何必忧天，有情必成眷属”，他知道我曾经为情所困，非常苦恼。

我们讨论过一些大的问题。在太行山的时候，有一次我问他，按照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的理论，新疆、西藏这些地方应该民族独立，而且我知道毛主席在1943年前后讲过，抗战胜利后，这些地方，包括台湾，都会独立，现在怎么不提了？他说，如果这些地方宣布独立，马上会被周围的帝国主义国家吃掉，然后又利用它们反华，不提独立，正是为了保护它们。还有一次，是在1948年底，毛主席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辞中，提出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我跟小廖提意见，说“专政”这个词不好听，在国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希特勒的dictatorship，他们不会理解这是在充分保证人民民主前提下的专政。争了一会，他有点急了，说，外国人怎么想，我很少关心。把我的嘴给堵了。所以说，他为人非常灵活，但扣政策又扣

得很紧。

我第一次被捕之前，小廖给我看了一封刘少奇签名的信，信中说让我与中央领导同志（指师哲）一起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他把我送到门口，搂住我，说，小洋鬼子，你可别像刘备进荆州那样。我出狱之后，大概过了两年，1957 年吧，有一天他在西单看到我，叫我上车，说，你呀，不要老躲在电台，你得出来参加一些活动。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见到小廖，他当时是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随后，他带我参加接待墨西哥前总统卡迪南斯的招待会。我问他，不要像“刘备进荆州”那样，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意思是说不要垮了。①

此后，他又安排我参加了一些活动，对我恢复社会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从此摆脱坐牢的阴影，开始社会工作和政治生活的活跃时期。后来好像比较少见到他了。

十一、陆定一

我到延安的第一天，去舞会见毛主席以前，有人先把我带到杨家岭陈伯达和陆定一的窑洞，分别见了他们俩。陆定一特别直爽，我一说我们美国南方共产党属地下党，他便说，你们的地下党简直是小儿科，肯定特务很多，然后跟我讲中国地下党的情况，怎么联络，怎么

① 《三国演义》中刘备（蜀国）与荆州的故事甚多，最著名者为“刘备借荆州”和关羽“大意失荆州”，前者产生了歇后语“有借无还”。笔者猜度，廖承志所言即为“刘备借荆州”，意为一去不还。

保密，后来还给我看了文件，有关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其活动的规定，很详细很具体很严密，确实不是我们那样的“地下党”可以比拟的。比如说，在国统区城市活动的共产党员，一旦发现被跟踪，必须马上离开那个城市。陆定一特别强调“连家都不回，牙刷都不拿”。这样，一个党员的组织关系就容易被切断，断了之后找回来很费劲，审核十分严格。和我一起去延安的孟用潜就是在上海丢了组织关系，到延安去找回来的。陆定一还跟我讲，20 年代末美共分裂时，把官司打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支持福斯特，他当时在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是个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

1947 年初陆定一发表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文章对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矛盾进行了分析，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实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的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也不是在苏美之间。更具体地说，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人民与美国反动派的矛盾，是英美矛盾和中美矛盾。听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写的。在文章发表前的周末，陆定一到舞会上找毛主席——他自己从来不跳舞——请教什么问题，我听见毛主席说“恐怕这样讲比较妥当吧”。

解放后我们见过几次，谈得不多，但我知道他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的工作。我出狱之后到广播事业局工作，听说是陆定一批示让我看内部文件，一般党内文件看副处级的，涉及外事活动看司局级的，这对我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重要外宾到访前，中央或相关部门会发相应的通报，给接待活动“定调”，采取什么态度，怎么接待，

对方可能提出什么问题，如何应对，等等，而且往往设定“最佳”、“最差”、“中间”三种预案，看内部文件，就能获知相应的对策。1965年“反右倾”时，我几乎成为运动对象，实际上已经上报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开始批判。怎么回事呢？我曾在支部会议上提出，“党不应该监视群众，相反，群众应该监视党”。我在美国参加革命后，领导工人和黑人进行斗争，民主是我们的有力武器，当时又从毛主席著作中受到启发，就提出了上述意见。虽然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但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更早一点，我给梅益局长写过信，提出广播电台的上层建筑不符合经济基础——懂得对外宣传的人没有审稿发稿的权力，而有这种权力的却是外行，因此，我们的宣传效果很差，并常常引起反感和误解。梅局长把我这封私人信件传给党委成员看，并把此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安排了对我的批斗会。“斗争”三天之后，中宣部的陆定一部长打电话来，命令停止斗争会，并向我道歉。

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在80年代后期，他身体不好，住在北京医院，我去看他，谈了很久，谈得很透彻。他主张共产党应进行民主改革，如果不讲民主，则前途堪忧。他讲得非常好。

这是一个非常可敬的人。

十二、聂荣臻

我对聂老印象很好。我在张家口见到他，觉得他和李先念、王震这些将军有一个很不相同的地方，他特别注意军容军纪，士兵必须系风纪扣，有专人巡察，这是在中原解放区未见的情形。聂司令把我留

下来做“架桥工程师”，后来朱总司令发电报调我到延安新华社，我去跟他告别。这时聂的司令部已经搬到郊区，他正患重感冒，鼻子肿着，脸通红，捧一个巨大的茶缸喝水。他说，我们打了败仗，要撤退。他指的是打大同未打下来，傅作义袭击张家口。他给我开了介绍信。我在张家口的时候，隔壁房间住着傅作义派来的周参谋，与蔡树藩谈联合反蒋。一边谈合作一边袭击，真可谓兵不厌诈。

1947 年我们从延安向太行山转移途中，在河北的河间县住了一宿，我在一个小巷子里迎面碰上朱德和聂荣臻，他们告诉我，正准备打石家庄。晚上一起吃饭，聂指着我向小廖“表功”：你看，我把他留下来，不错吧。

50 年代在北戴河休假时，在海滩上见过聂荣臻一次，没详细谈。此后就没见过。因为他负责尖端武器，不大见人。我觉得这个人脑子非常厉害，而且很严肃。他在张家口要求军容整齐，在当时很是少见。张家口是中共占领的第一个重要城市，进了城市，军容整齐、军纪严明，才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他是非常有见地的。

十三、贺龙

赴延安途中，我们在晋西北贺龙的总部所在地兴县住过几天。那天我们走到一处只有几个破房子的地方，我问老乡兴县县城怎么走，他说这就是兴县县城。贺龙他们都住在城外的窑洞里。他特别喜欢看京戏，而且一边看一边发表有趣的评论，把大家逗得大笑。一个戏里，有个老头在想什么问题，团团转，很紧张的样子，贺龙就说：你

看，思想斗争就是这么艰苦。60年代初期，在北京饭店的舞会上我们还见过一次面。

十四、彭真

五六十年代彭真是北京市长，到机场接贵宾时常碰到他。第一次见面，我从监狱出来不久，他说，我当时看过你的材料，感到很对不起你。他1948年兼任中组部部长，与我的案件应该有些关系吧，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他的态度很坦诚。后来他对我一直很亲切，作风民主。我对他印象特别好。

十五、张体学

1946年我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到宣化店送粮时见过张体学。在中原突围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张体学，当时只有三十来岁。他后来跟我讲，他是河南光山人，出生贫苦，1932年红军经过他的家乡，他跟着陈锡联当了“小鬼”，当时只有十七岁。张国焘搞清洗的时候，他的连长被杀，张国焘让他当连长，他不当。张国焘说，你没有问题，我们知道你很忠实。张体学说，我也知道我很忠实，但我坚决不当连长。就这样，他未被清洗。

张体学在中原突围中承担掩护主力的职责。他率领鄂东第二旅的部分人马到宣化店接防，唱“空城计”，掩护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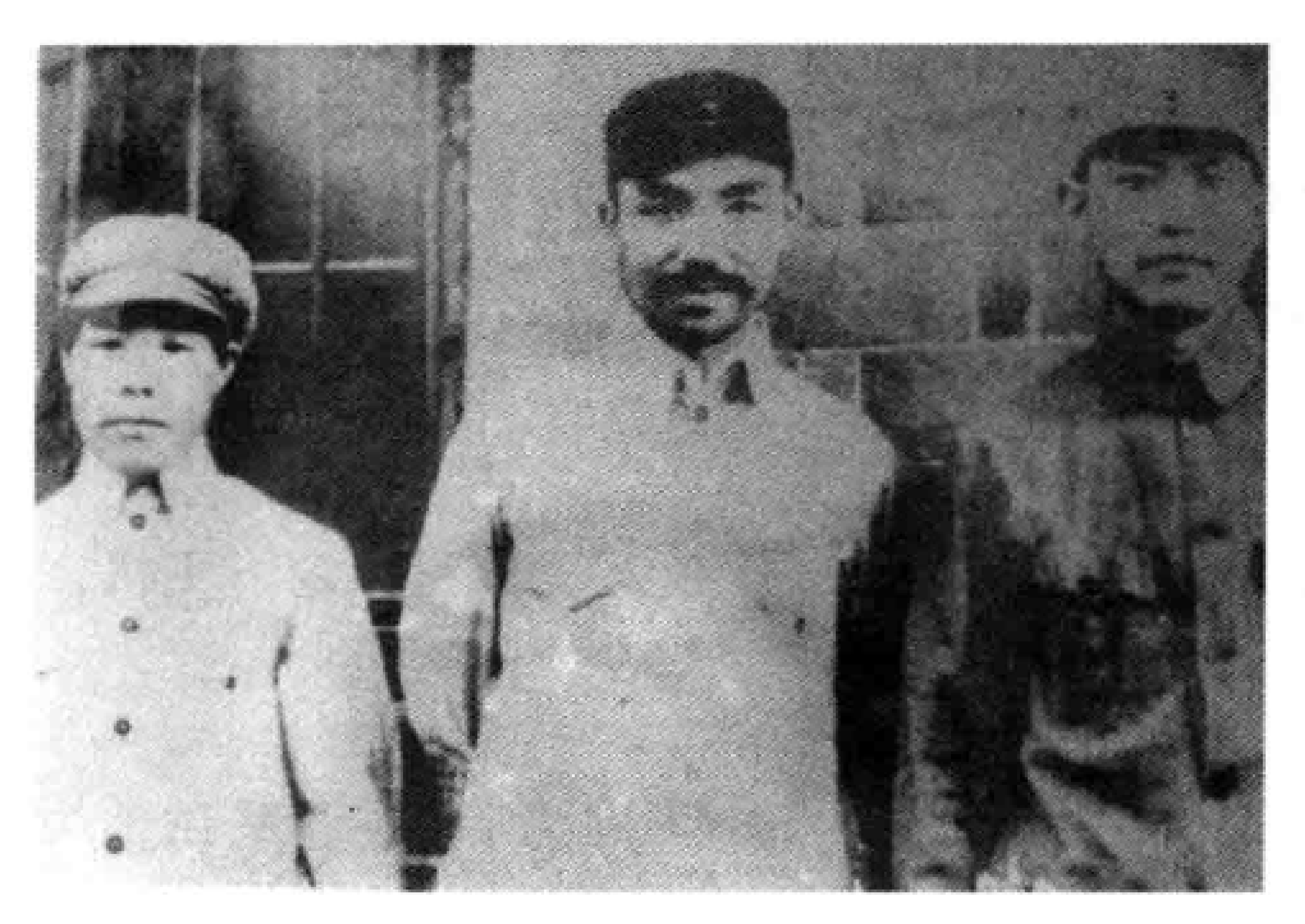
悄西移。主力突围后，张体学率部向东突围，进入大别山区，展开游击战。经过几个月的缠斗，部队基本上被打光，到冬天，张体学身边只剩下二三十个人。最后，按照南京中共办事处的指示，张体学仅带一人化装成商人到达南京，经上海赴北平，再转延安。他到延安是冬季，我已先到延安，那天刚好到飞机场接什么人，看到他走下飞机，认出了他。

他在湖北当省长的时候，可能是1959年，我到省政府采访他。他亲自为我开门，很诙谐地对我说："你知道，我这个省长是没有文化的。我要是有文化，就不会革命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到延安之后的故事。他从延安机场直接去了毛主席的窑洞，说：主席，我有罪，我打了败仗，我的部队被消灭了。毛主席说：不错，你是打了败仗，但你们牵制了大量敌人，给大局赢得了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整编了野战军，有了这两个准备，我们就能打胜仗。他原来很沮丧，听毛主席这么一说，很受鼓舞。

我对张体学印象特别深，我觉得他是一个赤胆忠心、智勇双全的人，是红军和老解放军的一个典范，很单纯，很朴实，非常勇敢，也很聪明，想法很巧妙。"文革"第一年，我就保了两个人，一个是王震，另一个就是张体学，别人谁也不敢保。说这两个人反对毛主席，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我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

十六、陈少敏

我到汉口德明饭店去找王震时，第一次见到陈少敏大姐。这是个


中原局领导人陈少敏(左)、郑位三(中)、李先念(右)。

非常好的人，当时担任中原局组织部长，是当地重要领导人之一。她是个山东人，小个子，原来是纺织女工，参加革命后领导过游击队，脾气耿直，枪法精准，老百姓叫她“双枪女将军”。那些大首长，都有点大男子主义，老是拿她开玩笑，王震总叫她“陈小姐”。陈少敏能应付他们，一点不示弱。在延安我再次碰到她，问她“身体怎么样”，她大声说：“我很好，就是三个老毛病，心脏病，胃病，肺病。”

解放后陈少敏担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郝建秀就是她培养的。她好像住在西单附近的绒线胡同，住一间大房子，一边是办公桌椅，另一边是床铺。我们去看她，她说：我也搞不明白，我是在睡房里办公呢，还是在办公室里睡觉。她是中央委员，相应级别的干部有的已经比较阔气了，但她仍然非常朴素。她就一个人过，没听说过她的丈夫儿女。[①]1966年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又见到陈大姐，神色憔悴，还柱了个拐杖，她表示没什么，“文化革命”么，任何人都要经受考验。

我听说，196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把

① 陈少敏有过两次婚姻。她的第一任丈夫任国桢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北平市委书记等职务，1931年牺牲，两人的遗腹女幼年夭亡。第二任丈夫是曾任湘鄂赣省委书记的涂正坤，两人1937年在延安结婚。婚后不久，涂正坤突然接到在长征途中遇敌人包围生死不明的原来的妻子的来信，陈少敏毅然与其分手，此后一直独身。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陈少敏是唯一一位没有举手赞成的人，因此受到迫害。她说我有这个权利。

十七、师哲

师哲抓捕我之前，我早就认识他，在延安见过几次面。但我不知道他负责保安工作，感觉上就是一个和和气气的老干部。1955 年我出狱前凌云来跟我谈话时，提到师哲，说师哲同志说了，有的人经受得住严酷的考验，回到安适的环境中后，却容易出问题。这是对我的提醒吧。出狱不久去甘家口的一个什么单位听报告，出来时迎面碰上师哲，看得出，他有点紧张，我很高兴地跟他打招呼。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了会儿，他问我，心里面是否对自己的遭遇感到不高兴。我连说没有没有。我确实没有怪他，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没有向我道歉，或者说别的什么。我一直把他看作老布尔什维克，或许是因为他身上留有比较明显的苏联痕迹。

十八、温济泽

我和温济泽是在延安认识的，当时他是口语广播部主编，这个部门负责给播音员准备稿子。1930 年代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抓起来，在牢里冻掉了半个耳朵。他对谁都好，不分等级，从来不整人。我们在延安就是好朋友，经常在彭迪、钱行的窑洞聊天，

于光远、陈龙等人也常在一起。延安没什么市场，我们有时从老百姓那儿买来一只鸡，放在铁桶里炖，几个人老往里加汤，炖好了就在一起吃。

解放以后，温济泽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主管国际部。一般人都喜欢他，没有听说过有谁对他不满意，群众基础非常好，但梅益不怎么喜欢他，好像觉得受到威胁。“反右”开始的时候，先是整风，我给他提了很多意见，如这个工作不深入，那项工作没抓紧之类。我们是好朋友，我认为有义务帮助他改进工作。“反右”运动中，他和邹晓青、张纪明这两个国际部的负责人成了重点对象，被打成“温邹张反党小集团”，温济泽被发配到资料室。他身体不好，但仍很乐观，就在资料室做普通的资料员，从来不发牢骚，还在报上发了许多科普文章。“文革”结束后，温济泽是第一个被改正的“右派”，他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担任副院长、院长。梅益后来也调到社科院，担任副院长兼党组第一书记。

十九、丁一岚

丁一岚是我特别好、觉得特别可靠的朋友，她一直非常关心我。我们在张家口相识，她当时是张家口电台播音组组长。当时张家口电台除中文广播外，开始英语广播，我带了两个学生，他们是刚从重庆来的大学生，女生魏琳后来成了我的妻子，男生口音较重，后来调离了。当时英语口播并没有独立的部门，也在丁一岚的领导下，而且我还参加党支部的学习会，这样就相熟了。丁一岚当时才二十多岁，外

表端庄，工作扎实，温柔亲切，贤惠能干，整天笑眯眯的，很容易让人亲近。她的丈夫是《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我也见过他。当时宣传机构都在张家口郊区的东三坡，电台和报纸都在那。张家口被傅作义占领后，丁一岚随晋察冀中央局转移到阜平。我们从延安撤离到涉县后，她们前来会合，加入新华总社，这才又再次见到她。

有较多的交往，是我从监狱出来之后。丁一岚当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首都部主任，这是一个大部门。我出狱不久，因为外国专家数量增多，电台专门成立了专家工作室，由丁一岚任主任。① 当时她已不再亲自播音。她做领导工作的能力很强，特别善于和人沟通，很能干，而且是个“老同志”，在电台很有影响。当时电台有各国的专家，有意大利的，智利的，秘鲁的，荷兰的，印度的，还有非洲几个国家的，他们的风俗习惯、性格脾气各不相同，会提出许多稀奇古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丁一岚就需要出面安抚，解决问题。她有能力解决得合情合理，让外国专家心悦诚服。她穿戴朴素，平易近人，别人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找她谈。她本人不会讲外语，即使能讲，谁也不可能讲这么多国家的语言。她的部门有一帮助手帮她工作，如果碰到谁都不会的语言，再从各部门临时抽人。总之，她的诚恳和协调能力给外国专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我出狱一段时间后，小廖让我多参加外事活动，这就跟丁一岚的工作发生了交叉。我们常在一起谈工作，做安排，有时候我也给她当翻译，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她鼓励我多参加外事活动，多做电台专家

---

① 据公开资料，丁一岚解放初期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部主任、总编辑室主任等职。

的工作。我确实这样做了。我开始差不多每天中午去友谊宾馆，跟这国那国专家一起吃饭，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党员，是消息来源，可以跟他们讲政策，这就成了核心人物。后来我又帮斯特朗翻译和发行《中国通讯》，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每天中午，经常包括周末，时常还有晚上，都要工作，连家里都有意见了。丁一岚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单位有什么问题就帮我解决，让我有时间和精力多做外面的事。

我跟王玉琳结婚时，很多人反对，如梅益说你们俩的文化差异那么大，你要谈莎士比亚，她要谈京剧，怎么办？其实这从来都不是问题，文化不同，正可以互补。新华社的吴冷西说，王玉琳好像是个多愁善病的人。这印象却完全不对，或者说刚好相反。但丁一岚支持，温济泽也支持。后来玉琳和丁一岚也成为好朋友，王玉琳碰到什么事，会找丁一岚谈。工作关系接近后，两个家庭也开始来往，我们常去她家吃饭，欣赏邓拓的收藏。邓拓是个温文尔雅、非常有修养的人。他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会在墙上挂一幅画，坐在对面，神游画中，平静下来之后就能入眠。他的藏品很丰富，有不少宋元明清名画家的作品，最宝贵的是苏东坡的一幅竹石图。他很爱他的收藏，但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如果需要走，我站起来就走。直到现在，他说“站起来就走”时的神态好像还在我眼前。我相信他做得到。

我跟丁一岚聊起我在监狱里学了些古文，没想到，她马上给我请了老师，每周三次教我学古文。这个老师是她的手下，中文系毕业。老师教我读《诗经》，我到现在还会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还特别喜欢“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这一首，到美国后还常拿它骂资本家。除了《诗经》，我还学了《论语》和一点《孟子》，后来“文革”

来了，这些东西不合时宜，老师又是“保皇派”，古文课就停下来了。丁一岚给我安排的这项学习让我终身受益。

大概是在1958年，广播局处级以上干部集中学政治经济学，半天脱产在大会议室学习，听报告，听传达，分组讨论，时间挺长，好像有一两个月。我们学了毛主席的“评斯大林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主席批得特别精辟，非常了不起。他说，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矛盾，依我看，社会主义社会是最有矛盾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制度，它跟所有的旧势力都会产生矛盾。另外，毛提出用人民战争的办法自下而上地搞经济建设。他说，苏联是先搞城市工业化，然后推广到农村，我们相反，我们要先让农村工业化，以农村包围城市，实现全国工业化。在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他的思路与革命年代一样。他还对各国共产党进行评论，他认为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根本不是共产党，对苏共也批得很多，我不记得他肯定了哪一个。这些内容都不许记录，谁要是泄露，立即开除党籍。这次学政治经济学，我跟丁一岚在一块，不过她很少发言。

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中，丁一岚成为重要的批判对象。她曾在支部会上批评毛主席发动的“大跃进”，说毛好像脑袋膨胀了，脱离实际。她是个非常直率的人，又是党内会议，鼓励大家提意见，结果却遭到严厉批判。看得出来，那段时间她的情绪很低落。

“文革”刚揭开序幕，邓拓就自杀了。我听说，他的自杀是与丁一岚商量好的，他们长时间地拥抱告别。邓拓有严重的心脏病，又是毛主席点名的黑帮，自认为很难挨过去，就选择了自杀。这在当时不难理解。“文革”开始的第一个星期，我们电台就有四个人自杀。丁一岚在单位也遭受了批斗，后来好像被弄到南口劳动。“文革”结束

后，才又经常去看她。这时她已退休。

丁一岚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从来没有一点歪的，但又很和蔼，总是一声不响地把工作做了，如给我请古文老师。她手下的人都觉得可以放手干，她一定会支持。她为人非常谦和，完全没有高干夫人的派头，没有我高你低的思想，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人。

二十、于光远

在延安的时候，于光远住我隔壁的窑洞，一直到后来，我们都特别要好。这是个才子，我非常佩服他。他在延安附近做了很多社会调查，聊起天来内容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跟他聊天。我们都叫他“小于”，其实他比我们大不少，大概因为他性格活泼的缘故。80 年代后期，我回北京时常去看他，向他请教问题。有一次问关于“自由化”的问题，他说了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还给我们看了他的记事本。从参加工作起，他就有两个本子，把每天看到的有意思的事情记录下来，一本专记好事，一本专记坏事。他，汪道涵，还有中国派到世界银行的董事、后来担任建行高级顾问的许乃炯，都是党内的民主派，对美国很了解。我跟他们都很熟，他们三个人的关系也很好。

二十一、丁玲

我 1946 年在张家口的时候就认识丁玲了，她，萧军，艾青，萧

三，好像还有贺敬之，我们常在一起谈天。对她的第一印象是聪明、泼辣。当时看过《我在霞村的时候》，并不喜欢，小说的基调比较悲观，好像无所谓好坏的样子。但对她这个人的印象很不错。

我有几张与丁玲一起照的照片，是“文革”结束出狱之后照的，照片中，我和丁玲两人正在捧腹大笑，玉琳和孩子们围在旁边。我们跟美国的朋友讲，我们正在谈论坐牢的事情，他们不能理解，谈冤狱怎么还能笑得这么开心。我们发现，我们在秦城监狱有几个相同的看守，我们对付看守的办法竟然也有一致的地方，所以觉得特别好笑。

《纽约时报》有一个年轻的记者，是个加拿大华裔，想见丁玲，采访她。我问了丁玲，她说可以，我就把这个记者带到她家去了。记者就问问题，然后拼命记到本子上。丁玲把他手中的笔和本子都拿走了，说：孩子，你采访我，不需要记笔记，你就跟我待两天，看我怎么烧饭，怎么活动，怎么见人，然后你就写。结果，记者就按这个方法把文章写出来了，还挺不错。

二十二、周扬

从张家口去延安的路上，有两天跟周扬一起走，他去广灵，当时华北联大刚从张家口迁往那儿，校长成仿吾，周扬是副校长。我在广灵住了一宿，跟学生座谈了一次。周扬拼命留我，说我可以担任副校长或者外语系主任。但朱总司令已经亲自发了电报到张家口，把我调到延安新华社。周扬个性比较张扬，气势很盛。我对他的感觉是：我就是权威，你得听我的。

在秦城监狱，我听到周扬的声音，他老给哨兵讲党史，很大声，不让他讲也讲。大声骂小哨兵：小混蛋，你懂什么！仍然个性鲜明。

二十三、新华社的“怪”专家

延安新华社有两个“怪专家”，印象很深。一个叫“阿胖”，真名倒忘了，是个金融专家，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都问他。演《四大家族》的时候他演孔祥熙。延安找个“阿胖”不易。还有位研究员是个聋哑人，叫陈实，与他交流，可以在纸上写字给他，也可以用手指在空中写，他看得懂。那些电务处的人也很好玩，不想让外人知道的事情就用汉字代码表达，如 1123，4356 之类，别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二十四、陶铸

我到中原解放区时，就知道陶铸，他开创了鄂中根据地，五师的人都很佩服他，叫他“陶先生”。

1966 年 12 月 28 日，江青召见我们，说要到广播局发动群众，让我们准备。她说党委书记丁莱夫“不是我们的人”。陶铸得到消息，先她一步到电台来了，开全局大会。我先讲话，然后陶铸讲话。他讲话很精彩，责令丁莱夫脱产反省。他的讲话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录音

了，他要求洗掉，说不洗掉他就不走。结果洗掉了。第二天一大早，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说“洗掉了可以，赖掉了不行”。那时候小才子真多，很会编，还引了唐朝哪个诗人的诗讽刺他。陶铸很快就被打倒了。

二十五、冀朝鼎

我和冀朝鼎认识，是通过柯弗兰、艾德勒，他们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是老战友。1960 年前后，我和爱泼斯坦、柯弗兰、艾德勒等几个人参加中联部组织的一个学习小组，常一起参加活动，有时出去吃饭，在某个场合就认识了冀朝鼎，章汉夫也是这样认识的。

冀老是 1927 年入党的老党员，但他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连他的弟弟冀朝铸都曾认为他不是跟共产党走的。冀老和孔祥熙都是山西人，冀的父亲还是孔的老师。冀老战时从美国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家，和他同住的还有时任美国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的艾德勒。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聘他回国的陈光甫[①]斥责他“不做工作”。冀老是经济学专才，深得孔祥熙和宋子文信任，先后担任平准基金会秘

① 陈光甫（1881—1976），江苏镇江人，中国知名银行家。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为蒋介石筹募军饷，同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28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1936年3月，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1937年，任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194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并主管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1950年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易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注册。1976年卒于台北。

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拥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以至于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将冀指为“祸国”的罪魁之一。

冀老长期在美国留学，1929 年起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他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他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艾德勒。1939 年陈光甫在美国为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招兵买马时，艾德勒向他介绍了冀朝鼎。在重庆，冀老是孔祥熙身边的红人，艾德勒是美国驻华使馆的经济参赞，柯弗兰在美国财政部负责援华事宜，三人联合，确实对国民党的财政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1950 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时，艾德勒和柯弗兰受到传讯，就跑到了英国——艾德勒本来就是英国人，然后通过中国驻英代办处到了中国。冀老跟我聊起过这些事，他还说，曾有人向孔祥熙告发他是共产党，孔有天晚上把他叫去，拿着手枪，逼问他是否共产党，他仰天大笑，说，你还会相信这些话吗？机智大胆地化解了此事。

认识冀老后，我们就常和他以及他在妇联工作的爱人罗书素一起吃饭，熟了起来。冀老是个鉴赏家，尤其喜爱古代家具。有次他带我们去家里，把他收藏的家具介绍给我们听。他家到处都是明代家具，连床底下都塞得满满的。他让我们也买，说不能让这些东西都被外国大使馆的人带到国外去。我们受他的影响，都开始买明代家具，柯弗兰家不久也装满了家具，我和艾德勒也都买了不少。

我买这些家具，原来是出于保护中国古代文化的目的，结果爱上了这些精美的东西，尤其是明代家具，线条简洁，造型朴素，却有难以形容的美感。这就越买越多。

真正跟冀老熟悉，是一起给“毛选”英文版定稿的时候。这个小组的组长是孟用潜，国内专家有冀朝鼎、唐明照、徐永煐、裘克安、钱钟书，北外的陈振球是秘书，负责行政和记录，后来冀老的弟弟冀朝铸也来了，陈翰笙是最后来的。冀老每天到会，他是意译派，我是直译派，我们常常争吵，有时一天只能定稿一两句话。争得面红耳赤时，冀老就摸出一个刻着“戒骄”二字的绿玉坠子，平息自己的情绪。

冀老为人热情，爱说爱笑，对古典文学有很高的修养，会写诗，爱书法，还给我写过条幅。他特别爱山西，尤其是他的家乡汾阳，经常夸他的老家如何如何好。在翻译毛选期间，我们有时外出休息，去过上海、广东等地。在广州的一个寺庙（好像是光孝寺），挂着一块“西山胜景”匾额，我故意念成“景胜山西”逗他，把他逗乐了。

冀老是贸促会副主席。1963 年出访阿尔及利亚前夕，他在贸促会的办公室突发脑溢血晕倒，第二天就去世了。我一开始就跟冀老说过，我力所能及地收藏家具，最后将捐给故宫，他去世两年后，我就把家具捐了，只留下一张有裂痕的矮几，故宫不要，现在还在我们西雅图的家里。当时王玉琳在北外读书，周末回家，突然发现家里漂亮的古董家具统统不见了，换上了单位统一配发的简单家具，气得不得了。她怪我没跟她商量，我说她同意过的，她说她没同意马上、全部送走，这成了到现在还说不清的一桩疑案，也是我们结婚五十六年来争吵最严重的一次。

冀老是个十分可爱的人，工作认真，个性随和，爱好广泛，谈吐风趣，我非常怀念他。

二十六、陈翰笙

我们在《毛选》翻译组工作的时候，陈翰笙也是很有特点的一个人。他是老革命、老左派，但好像对毛著本来的意思没有多大兴趣，所以提的意见常常比较离奇，起的作用不大。但大家都很喜欢他，重视他。

二十七、孟用潜

从张家口去延安路上，我和孟用潜在一起。后来才知道，抗战后他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①] 因为丢了党的关系，去延安恢复组织关系。我们一路走一路谈。他是个很好的老同志，说话很谨慎。我记得到延安时，他听到我和一个人说英文，说，哈，没想到你会说英文。我有时候叫他“孟老”，有时叫他“老孟”，他问我到底是孟老还是老孟，我说你还是老孟。

我第一次从监狱出来，想去国际关系研究所看英文的书报，广播事业局党委和中联部都帮我联系了，都不行，因为这个研究所属外交部。有一次碰到老孟，跟他说了这个事，他说没有关系，你就去嘛。他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就这样，我每个星期有一天到国际关系研究所，看美国报刊，也看一些书，这对我的工作很重要。后来唐明照告诉我，老孟是中国党内最资深的美国经济专家。他的英文名C.Y.W.MENG，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知道他。徐永煐的英文名字

---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孟用潜的秘密身份是中共中央上海局调查研究部副部长。

叫 Y.Y.XU，他写的文章在美国也很有影响。我记得在斯坦福上学时，徐永煐写了长文介绍山东八路军的部队和解放区，发表在某个刊物上，我看后第一次对八路军和解放区有所了解。徐脾气很倔，他和唐明照是好朋友，但两个人都好争论，翻译“毛著”的时候，这两个人一争就是大半天。

二十八、钱钟书

我在《毛选》定稿小组与钱钟书共事过，但对他印象不深。我知道他是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人物，当初看到关于他的报道，心里还有点疑惑：这是我认识的那个钱钟书吗？他懂古英语，说话文绉绉的，像个老学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个外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背后讽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格格不入。他的意见也不太受重视，我们觉得他对政治没有领会，他的语言天才在翻译政治作品上用不上。我们都叫他“钱教授”，好像与他都没有私人交往。有些活动，如外出到上海、广东，还有去毛主席那里，他都没有参加。[①] 那个时候因为政治的原因看不起人，现在当然知道是非常错误的，而这显然并不是他的耻辱。

我总说，我一生看错过三个人，就是钱钟书、李慎之和杨宪益。

---

① 钱的学生黄雨石回忆：“钱先生不看电影不看戏，似乎除了读书，没有其他爱好或任何消遣的玩意儿。中南海的宴会请帖，他从来未去参加。他总把时间腾出来用在读书上，从不肯轻易浪费一点点。”（转见杨绛、吴学昭《钱钟书翻译〈毛泽东选集〉趣事》，《党建》2009年第6期，第64页。）

二十九、郭沫若

我于1945年11月调到上海，12月初曾回昆明数日，期间参加了一个追悼会，应该是“一二·一”[1]烈士追悼会，地下党的李国华陪我去的。现场挂满了挽联，其中有郭沫若写的，李国华说，看，郭沫若的字多漂亮啊。我问他写的是什么，他说我也看不懂。这个追悼会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前面挂着一条横幅：“你要哭吗？你要恨！”[2]

我认识郭老是在50年代，他当时是中国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即“和大”的主席。外国朋友如斯特朗、斯诺到北京，他都要设宴欢迎。在这些场合，他讲的都是些客套，如“越过千山万水来到中国”之类，没听他讲过认真的话。“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别人问他意见，他说我的意见就是以毛主席的意见为意见。他原来是很厉害的，我在国统区认识的那些知识青年都特别佩服他。我看过他的《十批判书》，他对孔子是比较肯定的，我觉得有道理。他跟我们讲过一件事，说抗战后期他在重庆的时候，曾给毛主席捎过信，要求加入共产党，毛主席给他回信，说你是一个一流的民主人士，如果入党，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还是留在党外作用大。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让大家读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让大家警惕

①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当局为镇压风起云涌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组织大批特务和军人携带凶器，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联大附中、南菁中学等学校，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共产党员）被手榴弹炸死在联大新校舍门前，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潘琰（女、共产党员）、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张华昌被炸身亡，另重伤二十五人，轻伤三十多人，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12月2日，四位烈士遗体入殓，在联大图书馆设灵堂，供人凭吊。

② 郭沫若年谱中没有郭当时曾到昆明的记载。他的挽联如何出现在现场，不详。

胜利之后的骄傲情绪和随之产生的腐败，我也读了。

郭老被捧得这么高，又没有什么实权，自己也有点忘乎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一直在想，一个人怎样才能在高位上保持清醒？

三十、杨宪益

我跟杨宪益夫妇接触很少，只去过他们家一次。他们有一所独立的房子。杨宪益是牛津大学毕业回来的，他太太又是英国人，因此不被信任，甚至被怀疑为英国特务。就柯鲁克和他们好，因此还被牵连。他们夫妻受到排挤，心情苦闷，两人都爱喝苏格兰酒，总是酩酊大醉，但喝醉了还能讲话。跟时代不合拍，喝酒聊以自慰。夫妻俩翻译了《红楼梦》等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对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我一直没有认识到他们的价值。我说过，我看错了一些人，其中包括杨宪益夫妇。

三十一、江青

我在上海的时候看过江青演的一部电影，忘了叫什么名字，好像不怎么样，但后来作为政治演员，她的演技很棒。

延安时期一直到“文革”前，我对江青的印象都比较不错，觉得这个人贤惠得体，不多说话，不突出自己，没觉得她有什么政治兴趣或政治头脑。延安时期，我们谈话不多，好像没有谈过什么重要的

话，我也没看过她演戏。一起跳舞时她抱怨过身体不好，心脏不好，胃不好。她在延安搞了实验电影，请我去看，但我没去，也不记得看过她们拍的电影。1946年的除夕，我和新华社的几个领导一起到枣园去给毛主席拜年。见毛主席有两个门房，第一个是李克农，他打电话给第二个门房江青，他说：新华社的同志来给毛主席拜年，里头有李敦白，我们李家有外国人了，你们江家有吗？不知对方讲了什么，李克农又说：你赶快让他们进去，你要不让他们进去，你们家里要死人的。这是他的原话。李克农是个非常爱开玩笑的人，按延安的标准是个胖子，成天乐呵呵的，随时都在开玩笑。我们经过江青那儿，见到了主席。


人民日报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观看《智取威虎山》

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样板戏"热。(196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60年代，我们有几次跟主席谈话，江青都未参加，她出现的时候，主席就说：江青同志来请我们吃饭了。饭桌上她也不参加政治性谈话，只是尽女主人的本分。

江青开始搞样板戏的时候，电台有一次把样板戏的唱片送给养病中的陈云听，送回来的时候，陈写了个条子，说革命样板戏很好，但传统戏更好。我们家的人倒都很喜欢样板戏，经常唱，我觉得样板戏去掉了京戏里面那些啰里啰嗦的东西，很好听。孩子们到现在还老说些戏里的话，如：大队长说了，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我特别欣

赏《智取威虎山》，前几天还在说黑话：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

1966年12月18号工人体育场支持越南南方解放阵线大会上我给江青递条子，请她支持广播局的“文化大革命”，她请我到人民大会堂见面。这次见面，我发现她已经完全变了，完全不是原来那个端庄贤淑的夫人了，变得非常偏激、厉害、霸道。当时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也在场，但根本没有发言权，都是江青指手画脚地在那儿说。在两个小时内，她就把三个部队的首长打成了候补反革命，我记得其中一位是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江青说，我怀疑你把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都镇压下去了，让他反省，第二天上午八点半之前把检讨送到她办公室。这位老将军脸色煞白，一声不吭。江青根本不容分说，张牙舞爪的。她几天前去过广播学院，门卫不让她进，吵起来了。此时她问在场的广播学院红卫兵领袖，学校的大门是否还关着，听说仍然关着，她说：我在中南海有一支干部队伍，如果他们还不开门，我要领着我的队伍把学校的门墙都砸烂。她还说，我们要把全国所有官僚机构的大门都砸个稀巴烂。这个话太厉害，我们回去都不敢传达。我跟玉琳说，她就像狄更斯《双城记》里那个老是织着毛衣的充满仇恨的老太太。以后几次见面，也都是这种印象，飞扬跋扈，只有她给别人下命令，没有听别人意见的。但我当时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觉得她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那股劲，当时都不提倡讲道理。就是觉得变化太大。她对我倒很热情，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般不让外国人参加，但李敦白同志例外，他是一位老同志。人民大会堂见面的那次，李讷也在场，让我说服她妈妈让她参加串联，还给我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江青让我提两个广播局可靠的造反派领导，我提了，后来我们这一派就上台了。1967 年 1 月，江青到电台来开群众大会，会前在贵宾室接见造反派头头，我也去了。我跟她说，不应该再支持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就是我参加的老造反派），他们也不配以毛泽东思想命名。她问为什么，我说，他们镇压反对派，也镇压自己一派中的反对者，态度很粗暴。正说话间，年轻的播音员李涓进来了，很激动，哭哭啼啼的，她说的意思和我一样。在大会上，江青劝大家要团结，不要内斗，说有些同志很粗暴，这是不对的。但事后并没有处理台上的造反派，还继续支持他们。后来我听说，调查我的间谍案正是从那年春天开始的，也许我的话违逆了她的旨意吧。

同年三月，中央文革派联络员张根生（音）找我，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发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不行，决定让他们走极端，自己走向反面，然后撤换他们。他还说，中央文革信任我，先给我打个招呼，让我不要批评他们，就让他们犯错误。我没有泄露谈话内容，但也没听招呼。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是我的战友，他们有错误，我就要批评，所以继续对王自强等头头提意见，和他们辩论。结果 3 月份真的把他们撤了，把我扶上去。那时候感觉非常好，觉得中国正在变成一个革命的民主国家。

江青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正好在我对面的牢房，她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

现在有人说，江青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所以政治上变坏。我觉得，不管什么原因，坏首先还是她自己坏。

三十二、张春桥

我是在张家口认识张春桥的，他当时是《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辑，有时也审我们广播的英文稿子。他有这个能力。

再见到他，是我在石家庄白求恩医院养肺病的时候，那时他是《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刘少奇不是让我读三本古典小说吗？当时我已经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找不到《水浒传》，我骑马到石家庄找张春桥。他有一套，送给我了。他说，这是中国了不起的好书，生动地描写了农民起义，梁山好汉就是中国农民的罗宾汉。后来我在秦城监狱看到张春桥的大文章，里面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任何赞扬《水浒传》的人毫无例外都是投降主义。我马上想起当年他的称赞。

解放后，我没有与张春桥直接接触过，我本来都忘了这个人。1966年11月，广播学院的红卫兵到电台来造反。中央文革下了指示，党委收集的所有关于造反派的材料都要还给本人，但电台没有还，红卫兵就来电台要求把材料还给他们。我正好从友谊宾馆开会回来，看到门外站了一排哨兵，而以前只有一两个，他们对面是五六个学生，领头的是女生曹慧如。学生要进去，哨兵不让进，学生往前走几步，哨兵就拿枪指着他们。曹慧如口齿伶俐，责问：你的枪口冲谁？你应该冲敌人，为什么冲学生？哨兵有些不好意思，略一退缩，几个学生轰地一下冲了进去。我心说这些人真棒，便跟着他们上了楼。他们要进档案室拿材料，有一个警卫用双手撑住门框，不让他们进，曹慧如扑上去狠狠咬了他的胳膊一口，他一痛就撒手了，学生们一拥而入。正在这时，副局长、党委政治部主任李哲夫（当时为驻广播学院工作

组组长）赶了上来，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总编室，宣布了两条，第一，命令丁莱夫把所有材料马上封存，谁也不许动；第二，第二天早上开全局大会，由李哲夫公开向学生道歉，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张春桥还说，李敦白同志我们认识他，是好的，是共产主义战士。我这才想起来，原来这个张春桥就是石家庄借书给我的那个，之前看到过中央文革有个张春桥，但没想到是同一个人。

第二天早上在广播剧场开大会，曹慧如主持，李哲夫给他们道歉，说我们是老兵，遇到了新问题，脑子没跟上。曹慧如说，如果你们昨天这么老实，就不会出事了。过了一会，两派人吵起来了。一派是丁莱夫组织的“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队”，他们是“保皇派”；另一派是“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造反派。两派好像要打起来。我有些担心，剧场里如果打斗起来，人员不好撤离，会出大事。我就走到台上，问曹慧如能不能让我讲几句，她同意了，我拿起话筒劝大家，说学生是我们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孩子，他们也是遵照中央的指示，请大家不要吵了。平静下来后，我又宣传了一番大民主。我不知道他们把我的讲话录了音，会后传到好多地方，我一下子成了“文革”红人。西安的红卫兵，重庆的红卫兵，还有别的地方的红卫兵，都给我打电话，问我两派打架怎么办的问题。

三十三、陈伯达

我觉得这个人糊里糊涂的。他的文章，看上去没问题，真要翻译它，就觉得逻辑很成问题。他喜欢用一些夸张的大词。我积极参加“文

革”，他对我说，巴黎公社的时候就欢迎外国人参加。他的话很难懂，开会讲话都要翻译，到电台讲话也要翻译。这个人还很傲慢。在太行山的时候，有一次他到新华社和小廖他们谈话，一般编辑招呼他都不理睬。

三十四、王洪文

我到上海去时认识了王洪文。我觉得这个人没什么头脑，在公开场合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现在我们还开这个玩笑。我在秦城常听到江青的声音，此外，也听到过王洪文的声音。有一次放风，他大叫：“小弟弟，小弟弟，哥哥在想你呀！”不知道叫的什么人。警卫大声训斥他“不许说话”，他不管。

三十五、王力

中央文革的那些人，当时讲话就是法律。王力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派联络员找我，让我不要试图教育那些造反派，结果我不听。他们是要暗算人的，先让别人犯错误，然后把他们拉下来。

1967 年 7 月，王力到武汉处理问题，压制被武汉军区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狮”，把它定性为“保守组织”，招致该组织的不满，他们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还打了他。王力回北京后曾到电台做报告。他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陈躲在京西宾馆，中

央文革的人一间房一间房地搜查，没找到他。毛主席保陈，说“还我长城”。王力很快就倒台了。他想动解放军的老将军，当然没有好下场。

三十六、蒯大富

蒯大富有个姓李的朋友，好像是1967年1月的时候，他把蒯大富带来见我，说，你年纪大一些，又是延安来的，我们担心老蒯头脑膨胀，请你好好教训他，不要让他太膨胀。实际上我一个劲地鼓励他，并没有教训他。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蒯大富是清华的学生，他爱提意见，“文革”初曾被工作组关起来，让他反省。他“解放”后组织了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长得瘦瘦的，戴眼镜，看上去就是个一般的学生，实际上很厉害。我问过他和其他几个学生造反派头头，“文革”结束后准备干什么，他们说要去美国看看。我觉得这些人心里还是比较纯朴的，毛主席号召推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他们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被审判的时候，法官问他，你承认不承认当年积极反对刘少奇？他说我承认，那你当年反对不反对？我觉得，直到现在，他对共产党、对国家还是很积极，并没有怀恨在心。《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晚年很痛苦，我和蒯大富以及另外几个人曾一起去劝他，不要有那么多怨恨，但没有用。我觉得这些人还是有骨头的。这些人无疑犯了罪，他们后来认为当时想法是好的，但是做错了。

三十七、聂元梓

从“第一张大字报”才知道聂元梓其人。“文革”时开大会，我有时坐在她旁边。我问她贴大字报前是否跟江青或什么人通过气，她说没有，是她个人的行为。我看不见得。

“文革”前，聂曾与邓小平“顶牛”。大概是1964年，各大院校在六国饭店开会，邓小平讲了话，她不同意，顶起来了。这成为她造反的本钱。

聂元梓几次请我到北大去讲话，主要是批刘少奇，批“黑修养”。

蒯大富他们这些年轻的造反派并不信任聂元梓，蒯说过，聂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造反。我觉得，同是“文革”造反派，聂元梓与蒯大富这些人不同：蒯等人当年很年轻，血气方刚，头脑发热，偏激，就犯错误、犯罪了；聂不是这样，她很冷静，很冷酷。我当时就不喜欢她。我曾陪斯特朗采访过她。老太太问起老教授受批斗的事情，聂说，为了培养年轻人的阶级斗争观念，必须批斗这些人。老太太又问是不是批斗完了还让他们教书，聂说不，要让一代一代的学生接着斗，培养一代一代学生的阶级觉悟。我觉得这个人太残忍，简直没有人性。

三十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个真正的英雄人物，这一点从外表和性格上就可以看出来。她身材高大，脾气火爆，有英雄气质，怎么想就

怎么写。她不是个别人让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包括七十二岁回到中国之后。

我在北卡上大学的时候，就看过斯特朗的文章，她是个左派作家，当时主要写苏联的情况。在斯坦福受训时，学校曾请她给我们上课，她给我们讲中国的情况。她讲得很策略，说中国革命主要是土地革命、民主革命，不要怕中国搞共产主义。她从国家关系着眼，说，美国应该跟中国的革命者搞好关系，这样才能抵御苏联的影响。我当时特别迷信苏联，觉得她不应该这样看待苏联。

此后，我们就有些个人交往，我到过她的寓所，离斯坦福不很远的一个小镇。她对我说，你学中文很好，我以后还要回中国，你可以给我做翻译。她到过中国多次，但不会讲中文。她会俄文，与师哲这些人谈话就用俄语。

朱老总把我调到延安，目的之一是帮斯特朗工作。我到延安后，半天在新华社总社工作，半天到斯特朗那儿工作，我们一起翻译文学作品，我也陪她采访，给她做翻译。我们还有两件共同的工作。我到延安之前，斯特朗就向毛主席提出，她想写《毛泽东传》，毛答应了，并告诉他的同事、朋友、亲戚，若斯特朗采访，就放开谈，这让斯特朗特别高兴。我到延安之后，就跟她一起干，帮她翻译采访资料。另一件事，是我们准备一起写一本中国革命史，写给美国人看。

斯特朗跟中央领导的个人关系都很好，他们都很信任她、尊重她、爱护她。有一天，老太太从美军招待所住处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看她。她显得有点诚惶诚恐，像个犯错的孩子，见到我就说：周恩来责备了我。原来，老太太好几天没有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打牌，生气了，自己从美军招待所走到枣园，并闯进了政治局会议的会场。警卫

都认识她，并没有拦她。周恩来一看见她，站起来生气地说：我一个礼拜已经见了你三次，太多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让她赶快回去。她又一个人乖乖地走了回去。在延安，好像没有人这样责备过她。

斯特朗大概是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队刚开始轰炸延安的时候走的。她不愿意离开，又哭又闹。有一天，朱老总亲自做她的工作，我做翻译。斯特朗说，她知道延安要撤退，但她可以到别的解放区，哪个地方保守得住，她就去那儿。朱老总说，哪个城市我们都没有把握守住，或许哈尔滨可以守住，但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是保守某个地方。朱老总劝她离开，说我们需要你到外面做宣传工作。他还说，李敦白同志可以留在这儿，他年轻，我们上山打游击，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他可以不断给你送信息、送材料，这样你同样可以写作。当时斯特朗六十二岁，很胖，身体不大好，双手已经开始钙化。她很妒忌我，但无计可施。她对两本正在收集资料的书耿耿于怀。朱老总说，你走后，李敦白可以继续做这两项工作。她只好答应，同时警告我说：我走后，你一定要继续做，不能我一走你就忘了，就不管我了。我说一定一定。她还对我“行贿”，弄来了一大盒美国巧克力给我。

她走的时候，大轰炸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天，我和后来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的林青一块带她到蓝家坪中央医院检查身体，出来的时候，国民党轰炸机正在上空盘旋，医院门前是一大块空地，我们急忙拉她到防空洞躲避，她不走，跳着脚骂：fool，笨蛋，要是我在这儿被美国炸弹炸死了，会是了不起的新闻！到这时候，她还想着新闻。她一点都不怕。

我跟斯特朗的关系一直很好，不过1958年她回中国后更好。我

知道她要到中国的消息之后，就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请求不告诉她我坐牢的情况，我说老太太受的苦够多了，她对中国希望最大，不要让她难受。她到中国的第一天，我和玉琳去北京饭店跟她一起晚餐，我一进门，她就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你真了不起。周恩来也在场，他对我说，我们不可能做了对不起朋友的事，而不告诉别的朋友。从此以后，她对我特别亲热，真跟儿子差不多。中联部因此把我当作她的“救火员”使用，有一次叫我坐飞机赶到广东从化，说斯特朗在那儿发脾气，别人对付不了。

斯特朗的主要工作是编写《中国通讯》。当时的官方外宣比较生硬，斯特朗于1962年创办《中国通讯》，向国外介绍中国情况，回应外界的一些疑问，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友谊。最初，这份通讯只打印数份寄赠亲友，随着影响扩大，成为每期六七页的印刷品。《中国通讯》的内容由斯特朗本人决定，以介绍中国情况为主。她介绍中国的模范人物，好像介绍过郝建秀。她访问西藏之后，专门写了一本书，在通讯上也发表过相关内容。她还批评苏联对中国不公。这些文章都由斯特朗一人撰写，尺度很宽，好像中联部的唐明照会看一下，但不是审稿，恐怕也不会改动什么。我和艾培都参加了《中国通讯》的工作，他主要是帮助编辑，我则受中宣部委托组织各国专家进行翻译和发行。记得它后来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印地文等多种语言，也有中文，阅读对象是海外华侨。我组织在北京的左派专家——不限于宣传机关的专家，更多的是在高校工作的专家——翻译，然后寄给各国左派及主张和平的宗教组织，再由他们翻印分送。如原来有个在北京工作的比利时专家，回去后就在那里翻印分发《中国通讯》。外国专家都很愿意参加这项工作，他们有点参

加革命的感觉。这份刊物，不仅把北京的专家结成一个网络，而且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亲华人士和亲华组织的关系网，在中苏对立的情形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斯特朗写《中国通讯》的消息来源，除了中联部机关，还有些个人常给她提供情况，如中联部的唐明照经常跟她谈。她很喜欢唐明照。唐在纽约生活过多年，身上有些美国影子，我们开玩笑叫他“美国政客”，他非常会做工作，但原则性强，五六十年代他是中联部副秘书长，我们的外事工作主要由他指挥。中央首长中，陈毅、彭德怀都跟斯特朗很熟，会给她提供情况，解答疑问。1962 年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访问金门，台湾海峡两岸局势顿趋紧张，《人民日报》发表严重抗议，抗议美国军舰侵犯中国领海。斯特朗很焦急，担心发生原子战争。彭老总告诉她，我们中国人的心是热的，头脑则是冷静的，你看，我们宣布的领海是距海岸线十二海里，美国人只承认三海里，但它也并不到三海里来，它只到八海里处，所以，不会打起来。

除了写《中国通讯》，斯特朗还做了其他许多工作。她有一个亲戚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会长，还有个亲戚是美国公谊会的一个重要人物，她经常给他们写信，宣传中国。中联部有人跟我讲，我们想让老太太宣传什么，就对她讲这是保密的；告诉她要保密，她一定会捅出去。她有新闻人的天性。我多次听她跟中联部的人讲，不要跟我讲什么秘密，我记不清。

她的文章也在美国发表。有六七家美国比较独立的报纸会发表她的文章，如《旧金山纪事报》、《圣路易邮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另外还有个左派联合社，她也通过他们发表文章。

我最后和斯特朗相处的日子，是“文革”初期。她认为“文革”

很了不起。我带她访问了聂元梓，聂讲的一些可怕的话我没翻译。还陪她到清华采访了红卫兵，她觉得这些小青年担负起了革命的使命，很了不起。

我每周二去她那儿吃午饭，同时给她介绍情况。我被软禁后，仍保持这个习惯，怕她闹。我没有透露任何情况，她一点也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问题。后来她闹心脏病，可能跟我突然消失有关系，她认为我是最忠实的共产主义者，连我都被抓起来了，恐怕打击很大。后来唐明照也被打倒了。我想她最后的日子不好过。她 1970 年去世。

三十九、马海德

马海德家是信基督教的黎巴嫩人，他父亲那一代移民到美国北卡州。他本人不信教。他跟我讲过，刚到延安的时候，他称自己是伊斯兰教徒，那是为了做少数民族的工作。他是阿拉伯人，不是苏联档案指称的犹太人。他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就入了中国国籍，是卫生部的高级干部。

马海德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我们美国南方人以好客、好交朋友、开放豪爽闻名，还有个专门的说法，叫 Southern Hospitality，南方好客之道。美国北方人可能在一起住二十年都不认识邻居，但南方人不同。如我小时候，任何乞丐上门，我们家都要在厨房给他吃一顿饭；朋友来访，到吃饭时间一定要留朋友吃饭。北方不一样，他可能请你，也可能不请你。马海德脾气非常随和，特别容易交朋友。他的朋友上至毛泽东，下至一般的卫生员。他待人的态度都一样，不分

高低。比如有一次我们在友谊宾馆吃饭，有个餐厅服务员走过来说，马大夫，我有点事想请教您，他马上起身把服务员带到一边，详细询问。所以他普遍地受人爱戴。

我跟马海德很有渊源。我们上的是同一个大学，北卡大学，他比我大许多，是我的学长；我还在他家乡的小镇做过劳工运动，住那“三班倒”的宿舍。当然我们在美国并不认识。认识马大夫，是我1946年7月到北平军调部找叶剑英的时候，当时马大夫在中共代表团。熟悉起来，是在延安，我常到他们家串门，所以他和苏菲才会张罗给我介绍对象。延安有两个出名的调皮鬼，一个是马海德的儿子幼马，另一个是杨尚昆的儿子，他们住隔壁。

马海德是1936年跟斯诺一起去的陕北，那时毛泽东他们还在保安。后来斯诺离开，马海德则留了下来。斯诺跟马海德是完全不同的人，马海德很开朗，斯诺则是一个经常动摇和踌躇的人。解放后，中国一再邀请他，但他一直不敢来。1960年他第一次回到中国，我跟他在新侨饭店吃了一顿饭，我问他为什么一直犹豫不定。他说，我上一次从中国回到美国后，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重新成为美国人，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重复这个过程了。他跟美国官方一直保持联系。1960年来中国前，美国国务卿腊思克（David Dean Rusk）让斯诺代他个人看看美国在中国的三个财产，就是洛克菲勒家族捐助的协和医院、燕京大学，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斯诺评论说，你看，他们一直以为这还是美国的财产。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在美国争议也比较多。我猜想，他可能是美共的一个秘密党员。斯特朗就是美共秘密党员，只跟总书记直接联系。斯诺原来是美国大刊物《星期六晚报》的高级编辑，因为对中国太友好，被撤职了，后来搬到日内瓦居住。他对中国一直友

好，对中国革命有功，我想他起的作用超过任何外国人。他写的《西行漫记》，在美国起的作用大，在中国起的作用更大。

苏联把我们这些美国人统统看成美国特务，我遭了多年牢狱之灾，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这“三S”都是特嫌。马海德、艾黎也受怀疑，“反右”时我看过他们的档案。还不仅仅是受怀疑，实际上行动也受到一定限制。我曾经劝过马海德，让他注意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要小心自己的声望。他看着我说：我有什么声望？

马海德在延安就入党了，但好像没参加多少政治生活。1960年斯诺来中国，周总理设了个小宴会欢迎他，原来并未邀请马海德，我给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打电话，说他们是很好的老朋友，不请马海德怎么行。外交部的人答应请他，我告诉了老马，他说，那我得看到正式邀请才能去。后来确实请了他。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参加外事活动。原来好像没这个人似的。

“文革”时，他们机关的造反派准备整他，标语、口号、大字报都准备好了。叶帅知道后发了话，才没有斗他。这是马海德自己跟我讲的。

在公开场合，马海德和艾黎不会说中国的一个不字，外报说他们是百分之三百的中国喉舌。但是，马海德如果有意见，在内部会说出来，而且会坚持。譬如，我记得“文革”前好几次跟他一起去上海参加活动，上海建设中不注意废物废水废气处理，他很严正地向上海市领导提了意见，他说，如果你们现在只顾发展，不注意保护环境，将来会不可收拾，到时候后悔就晚了。

我觉得马海德很诚恳，不但热爱中国，而且热爱人。他是一个非常质朴、和蔼的人，他在中国的朋友恐怕超过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他走到哪里都有大批的朋友。我觉得毛主席很喜欢他，我们在一起谈

话，他对马海德总是特别亲热，爱跟他开玩笑，叫他“蒙古大夫”。毛还说，西医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到“文革”以后，我和马海德成了对立面。我没有恨他，但他恨我。原因是“文革”期间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他劝我不要卷入，不要参加中国的内部斗争，我没有听他的话。他比我聪明。第一次坐牢出来，他对我特别热情；第二次坐牢出来，他不跟我说话，德国大夫米勒等人也都不跟我说话。我几次找他，说你对，我不对，我应该听你的。他当面表示，这些已经过去了，算了。但过后仍然冷淡，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如果有人请他吃饭，让我作陪，他就不同意。他和艾黎都不赞成造反派，他们在内部一直讲刘少奇的好话，认为批判刘少奇是不对的。艾黎说他搞“工合”时，刘少奇最支持他的工作。他们是跟“文革”唱反调的，而我是个最积极的造反派，所以是不可原谅的。当然他们并不在公开场合讲这些话。

马海德对中国也有失望，他以为打仗的时候支持共产党，胜利了就应该搞共产主义。他想过共产主义的日子，没有搞共产主义觉得有些失望。

四十、爱泼斯坦

艾培（爱泼斯坦的中文名）一岁左右就来中国，他们家是波兰的犹太人，移民到天津。艾培在天津上美国学校，他的母语是俄文和英文，中文也不错，很流利，但外国调子很明显，原来不会阅读，后来学会了。马海德也不会阅读，口音也很重，他是陕北口音。

跟爱泼斯坦认识是在1955年我出狱以后。他当时在《中国建设》杂志社，跟宋庆龄关系很近，是那家杂志的重要人物。我们一起帮斯特朗编辑发行《中国通讯》，当时是很接近的朋友。爱泼斯坦还帮外交部做好多事，外交部有什么英语方面的问题都找他。他也参加了《毛选》的翻译定稿工作。

我们到美国定居后，每次回北京都去看艾培。第一次回来时，我曾跟他说，你要是回美国的话，可以做很多事，帮助美国了解中国，起很大的作用。他说，我是一个受雇佣的宣传家，我没办法走。1985、1986年的时候，美国有个教授拍了一个艾培的纪录片，也采访了我，拍完后他请我们一起吃饭。艾培表示，他不好在公开场合和我一起出现。听到这话，我很受刺激，此后就再没去看他。这应该跟我后来离开中国有关。外国专家普遍对我有意见，他们主要是反对我离开中国，觉得离开就是背叛。如柯鲁克的夫人伊丽莎白就反应激烈，她是个很好的人，我想，找她谈谈也是可以谈通的，但一直没找她。不能过分关注别人的看法，重要的是做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艾培是个很好的人，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也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一生都在为进步事业而努力。他是犹太人，特别关心犹太人的地位。他一直对苏联意见很大，就是因为苏联迫害犹太人、歧视犹太人。

四十一、寒春、阳早

寒春、阳早，都是很好的人，很朴素，品质优美，但是思想比较

偏。他们原来在西安郊区的农场工作，我和爱泼斯坦觉得他们太孤单了，提议把他们调到北京，结果他们俩对我们意见可大了，根本不愿意来。给他们配了汽车，他们不坐，骑自行车，汽车在旁边空驶。他们都是同情革命的，但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一来，找到了“革命”的感觉，他们写了大字报，被毛主席表扬了，了不起了。“文革”之后，思想上就一直放不下这个光荣的革命年代，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好的，毛主席是没有错误的。寒春有一次问我，如果毛主席错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对？他的哥哥韩丁出了书（《翻身》），我在东交民巷碰到寒春，说这本书不错，她说，什么？这是本坏书，他说毛主席也有错。过了一会又说，其实我没看过这本书。两个人都左得要命，脑子很闭塞。他们长期在农场，很努力。他们在西安的时候就申请入党，后来说是因为我出了问题，就没让他们入党。

美国有种人，很聪明，人也很好，他们参加了共产党，但见识不广，很容易陷入自己设置的框框，我们把这些人叫作“乡村知识分子”。

四十二、马尼娅

马尼娅是新华社的美国专家。她原来是俄国的犹太人，后来到了美国，在纺织厂做工人。她是美共早期的重要党员，美共的历史上恐怕也得有她。她在美国积极组织劳工运动，美国政府要治她的罪，因此逃到苏联，在共产国际担任国际联络工作。二战期间，她曾经两次跳伞到德国军队的后方，与当地共产党的游击队取得联系，然后再独自从捷克摸回苏联。这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中苏起争端后，她对

赫鲁晓夫不满，支持中国，要求调到中国工作。

记得有一次我跟她去北京火车站，大概是接什么人，当时从莫斯科到北京每周有一趟车。车到后，下来一个警官模样的苏联人，高大威武，马尼娅走上前去，叽里咕噜说了一串俄语，对方态度傲慢地回复了一串俄语，然后马尼娅再说一串，那个警官突然一个立正，向她敬礼。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跟他打听行车日程，他说我不是站在这儿回答你的问题的，她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务人员都得为人民服务，他们有义务回答公民的任何问题，结果把他吓住了。

马尼娅后来得了肺癌，住在北京肿瘤医院，生命垂危。我和艾培去看她，医生嘱咐我们不要跟她谈政治，不要让她激动。我们心想，不对，如果说有什么话题能让她感兴趣的话，那一定是政治，就跟她说了苏共二十二大对阿尔巴尼亚进行猛烈攻击，以及决定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做出强烈反应，并提前离会回国等事，结果，老太太把吊针一拨，骂道：他妈的，这些混蛋，我不死了，我要跟他们斗！她真是个好样的。

马尼娅特别爱我和玉琳，她把自己积存的钱给了我们一千元，我们用这些钱全部买了古董家具。

四十三、舒子章

朱利安·舒曼（Julian Sehuman）即舒子章在中国不大有名，他是一位在中国工作多年、经历复杂的外国专家，品德优良，为人直率，

热爱中国。

舒子章早在1947年就来到中国，在上海的英文报《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记者生涯。1950—1953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担任编辑，1953年下半年回美国。他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同情左派，对中国友好，因此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迫害，而且没法找到工作。1963年舒子章再次来北京，成为《北京周报》的外国专家。他跟《北京周报》的领导关系很好，中联部也很欣赏他。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被抓起来后，在北京的美国人中只有两个人支持我，一个是舒子章，另一个是新华社的艾琳。“文革”时，他同情造反派，但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他也不大爱抛头露面。他们夫妻俩有段时间回美国，办了一个旅行社，有一次带一个律师旅行团到杭州，团里两个律师调戏中方女陪同，他和儿子出面阻止。回到美国后，那两个律师就起诉他，说他未遵守合同。打官司不会输，不过他们在上法院前就已经破产了。后来中国方面请他回来，参加了创办英文《中国日报》的工作。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了，时代变了，这些曾经是头等宝贝的外国专家的地位一下子跌下来，而带着资金来的资本家大受重视。他觉得很失落，很痛苦。他1995年在北京去世，去世前不久我到协和医院看他。他有严重心脏病，加上中风，双脚已经萎缩得很小，他又老想拔掉管子自杀，因此双手被绑在床上，不断地流泪。这是我看到的最悲惨的情景之一。

我在美国南方参加共产党时有一个好朋友，二战时我到中国，他到欧洲参战，最后一两个月被德军俘虏，战后释放回美国。我以前说过，陆定一听说我们是地下党觉得很可笑，确实不那么“地下”，FBI对他的历史很清楚，他到哪儿工作，FBI的人随后就找来，搞得没人

敢雇用他。他是个工程师，特别聪明，最后只好办了一个公司，自己做老板，让别人没法开除。我回美国时，他到机场接我，他跟我道歉，说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我没办法，我的唯一活路是做资本家。他用他的钱做了不少好事。当时新华社有个驻联合国代表团，我介绍他去见面，领导出来迎接，对他说：我们知道你，你很有钱。我听了这话，感觉变化真是不小。

四十四、朱镕基

朱镕基是个个性鲜明极有魄力的人，他认为对的事情，敢于破格，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还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套话，没有官腔，没有口号，特别实在。

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朱镕基的了，1987 年他去上海当市长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请他吃饭谈事，至今印象深刻。我们找他主要是这么一件事：我们的客户、美国保险集团 AIG 在上海和一家展览公司合作投资波特曼酒店，AIG 首期投资四千万美元，后来又有增资，此外，日本公司也有投资。合同规定，双方的合作期限是十年，之后由中方收回。可是，十年之内，美方连收回成本也实现不了，盈利更无从谈起。我们跟中方公司谈判了几次，谈不好。朱镕基和经叔平两人来吃饭，我跟他讲了这件事，并说，现在外国的大资本刚刚进来，如果一开始就让人吃大亏，以后谁还敢来？他说没有问题，我到上海就把合同延长到十八年。后来他果然做到了。那次他还谈到，上海要多建几个五星级酒店，欢迎美国、日本财团投资。我说建那么多高档酒店，

要花很多钱，到时没人住怎么办？他说你放心，酒店盖起来，我保证客满。他的判断很正确，后来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我们还建议，是否可以邀请一些有想法、有能力的外商给上海市政府当顾问，这对沟通中外关系、发展经济有利。后来好像确实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AIG 的老板格林伯格也在其中。

朱镕基当上海市长的时候，见过几次面，印象最深的一次也是有事请他帮忙解决。我们有一个朋友，早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 CIA 的研究部门工作，这时在麻省理工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同时办了一家咨询公司。他为了丰富讲课资料，到上海一些工厂参观访问，碰到了麻烦。当时我们住在上海另一家酒店，他打电话来，说中国安全部门的人找他，询问了一些问题，并让他先不要离开上海，他们还会来找他。对方态度比较客气，也不是审问，但他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很着急。后来搞清，问题不是出在他的 CIA 背景方面，这个人很诚实，早就主动说了这个情况；问题出在他访问工厂时的一些提问上，当时许多工厂以编号命名，七九八厂、五一二厂之类，他便问这些编号是什么意思，安全部门的人怀疑他想刺探军事秘密。我给朱市长写了信，说这个人我们了解，他访问工厂就是为了讲课和学术研究，这对中国也有益处，何况这个人是真正支持中国的人，“六四”以后美国那么多人攻击中国，许多友好人士不敢说话，他却站出来为中国辩护。朱市长收到我的信后，马上让安全部门的人不要找他的麻烦。处理这样的事，不但需要胆识，而且要有担当，不是一般官僚做得到的。

“六四”之后，中美高层互访中断，因此，1990 年 7 月朱镕基率领的中国市长代表团访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代表团到加州时，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开招待会，也邀请了我们。会场入口处，众多加州

重要人物排队入场，朱市长逐一握手致意。我听到我们前面的几位大老板都说了同样的话：朱市长，你记得我吗？我们在东京（或其他地方）见过面。轮到我们时，朱市长抢先说：你记得我吗？我是朱镕基。

我们陪葛培理牧师第二次来中国时，先去了南京，参观了印刷《圣经》的工厂，然后到北京。朱镕基当时任副总理，接见了我们。葛培理把从南京带来的中文《圣经》送给他。朱说，我家里有英文版的，有时翻翻看看，我认为人类一切优秀文学作品都应该学习。葛培理说，我们基督教有十诫，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不可对父母不孝等等，我认为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可以用毛泽东的十句话，也可以用其他的，让大家都知道。朱镕基表示很赞赏这个意见。谈得很愉快。他还把他的个人传真号给了我，说有事找他的话可以直接联系。

1999 年，朱镕基总理应邀访美，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举行欢迎宴会，来宾众多，朱总理站在门口一个个握手迎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克林顿问他对美国的这种迎宾礼节怎么看，朱总理说他认为这种礼节很好，可以与每位来宾接触，不过，你若问我个人的感受，我这个年纪的人站这么长时间，真是累死了。美国记者特别喜欢他这种直率的风格。后来他到芝加哥，市长举行欢迎午餐会，我们在场，市长的哥哥是当时的美国商业部部长，也从华盛顿赶来参加。朱总理在致辞时说，我要自告奋勇地给市长阁下提点忠告，听说你想到华盛顿去，我请你比较一下你们兄弟二位的头顶，令兄已经秃顶，你却头发浓密，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的好。我自己如果能够不做总理而回去做上海市长的话，那就谢天谢地了。他的一番话把听众逗乐了，大家都很欣赏他的坦率和没有官腔套话。

第六部分 | 归去来兮

1977 年底获释后，很长一段时间感觉迷迷糊糊，医生给我打维生素 B12，有些作用，但主要还是靠工作，沉下心来工作，也就慢慢恢复了。这是“工作疗法”。出狱后我没有回广播事业局，我到了新华社。基本工作一样，改改稿子，上点新闻学的课，翻译一些大文章，还有就是给领导做顾问，出些点子。

自从我到延安之后，一直到第二次出狱，从来没有想过要回美国，我想我会终老中国，把我的热情，我的才情，我的深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国，没想到，1980 年初我就回美国定居了。



1978 年出狱后的全家照。前排：李敦白、王玉琳；后排：桑妮（十七岁）、东妮（十八岁）、燕妮（十九岁）、晓明（十一岁）。

一、是回去的时候了

从1945年来中国，到1980年回美国，中间整整隔了三十五年。多少岁月过去，多少人事变幻，我在中国有过贡献，受过迫害，出来了，解放了，应该可以安享晚年，而我在美国什么都没有。他乡已成故乡，故乡却早变他乡，怎么又动了归去的念头呢？这其中有几重原因。

关于李敦白同志的平反结论

李敦白，男，一九二一年生，美国籍，原任中央广播事业局专家。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被错误关押审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释放出狱。

李敦白同志一九四五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李敦白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诬陷为“特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长期关入监狱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原待遇，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其家属王玉琳同志及子女受株连被隔离，也一并予以平反。

撤销公安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对李敦白同志的审查结论和处理决定》和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关于李敦白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本结论向李敦白同志所在单位群众公开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1982年公安部给李敦白的平反结论。

首先是我对当时金钱至上的现实不能适应。与社会隔离了十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

最早的惊讶，来自辅导别人学习竟然要收钱。我们家老二正在学世界语，有个朋友是世界语专家，他有时晚上来家里辅导孩子学习。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要钱，把我吓一跳，我以前辅导过多少人学英语，从来没有收钱的事，如果要钱，别人准把你当神经病。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发现，这是普遍的现象，什么事都要钱。

1978年春节，又发生了一件事。宾馆进了一批高档酒供应外国专家，却被服务人员偷偷卖掉，这要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卖一瓶都不可能。我们单位的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就因为收了人家一只鸡几条鱼被撤职，送到乡下去了。非常严格。

我还发现，友谊宾馆有一个楼专门提供给外地的公司、机关做联络场所，请客送礼，走后门，是个“贪污楼”。

这些事情，让我很震动。坐牢时，我设想最坏的情况，是我为社会主义坐了多年牢，出来却发现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当时我觉得，这种想法恐怕要变成现实。

还有这么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多次到丰泽园饭庄吃饭，招待亲朋好友，消费款只付一个零头。这件事，现在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同寻常，我本人把这种行为视作贪污。丰泽园饭庄的一位年轻厨师给中纪委写信反映这一情况，中纪委通报批评王磊，表扬年轻厨师，《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此事公之于众，点名批评了王部长，并配发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文章见报当天，王磊即向中纪委作了书面检查，承认错误，愿意补足少付钱款，还请求党纪处分。这是一件及时端正党风的好事，但公开批评部长的做法引起了《中国青年报》主管部门团中央以及商业部的上级部门国务院某些领导的不满，最后甚至惊动了邓小平，报社和记者均受到压力。听说王部长原已提出辞职，最后不了了之。

我出狱后住在友谊宾馆，孩子们的同学和玉琳的亲戚（几个青年工人）常来串门，我们家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聚会的中心，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聚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主讨论会，讨论又自然而然地

涉及西单民主墙。他们到友谊宾馆来，在门口都有登记，我怕对他们不利。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样一件事。1980 年 1 月 21 日，这个日子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有些问题，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报纸就是宣传党的政策。我当时在新华社，还能看一些文件，看完这个文件，我就对玉琳说，看来我们该走了。很快，3 月 17 日，我们就离开了中国。

我后来常回忆思考这段历史，觉得自己不一定对。我也听中国的朋友讲，不讨论姓社姓资对改革开放起了保护作用，应当肯定。不过，我认为“不争论”即使在当时可以理解，时至今日，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坚持了。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它的理想、目标、途径都与我年轻时代所追求的不一样了；在这个拐弯处，我选择了回到我的出发点，而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顺流而下。

我对新时代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不过，有一件事不曾改变，也不会改变。从斯坦福大学受训开始，我就无比热爱中国，想在沟通中美两国关系方面有所贡献，也就是聂荣臻司令员在张家口对我说的“架桥”。我大半辈子都在中国做这个桥梁工程师，现在看来我在这边已经无能为力，那就试试到另一边，继续架设这座桥梁。

二、从此岸到彼岸

一说回去，回去的问题就摆到了眼前。首先，我的护照已经在赴延安途中丢失。我把护照放在一个小布包里，把布包拴在马鞍上，不知它失落在晋西北的哪一个角落。在中国这么些年，从来没有回美国的念头，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家，所以也一直没把这当回事。我去了秀水街的美国大使馆，签证领事塔斯克说，按照规定，我得问你一些问题。他问我，来中国之前，是否跟美国政府发生过法律上的问题？我说有。他问什么问题？我说跟你们伍德柯克大使参加同一个工会，被抓住坐过牢——伍德柯克大使当过汽车工会主席。他又问到护照。他问你原来的美国护照呢？我答丢了。他再问你是否做了认真的努力寻找？还没等我回答，他自己"扑哧"一声笑了。大使馆发电报给美国国务院，请示是否可以给我发护照，领事给我看了回电，说某某人既然没有犯下足以导致其丧失美国公民身份的错误，可以给其发护照。

王玉琳申请签证和后来办绿卡、加入美国籍则有许多故事。签证申请表上，有一个问题是，是否参加了或者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任何团体，她问我怎么填，我说你就写 Yes。她去面试时很好玩，有个留大胡子的签证官员问她：你是否一定会回到中国，不会留在美国？然后捂住自己的耳朵说"不要告诉我，不要告诉我"。他是例行公事。第一次签证是去探亲，确实没有想留在美国，当她打算在美国留下来时，她写的那个 Yes 就成大问题了。后来美国国务院的人跟我说，你们真独特，我问什么独特，他说即使是中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团，也没有人填 Yes，或者不填，或者填 No。可我觉

得讲假话会有预料不到的麻烦，而且我们一贯不讲假话。但讲真话确实也惹了不小的麻烦。根据美国的法律，凡参加过国外共产党组织的人，终身不允许获得美国国籍。我们请了一个著名的移民律师，也是个左派，他说，美国还有这么一条法律，只要你在公共场合三次公开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就可以得到豁免。你登报也可以，在餐馆这样的场合大声说也可以。王玉琳一听，说，去你的，我才不会这么干。后来我们开始办旅游时，有位团友是咖啡公司的老板，很富，他是纽约州一位著名的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的支持者，就给参议员打电话介绍玉琳的情况。你知道，玉琳是个热心肠，她带团旅游，什么事都管，美国人大概从小到大没有人这么照顾过他们，都很喜欢她，叫她“玉琳妈妈”。那个参议员就给移民局的副局长写了一封信，称玉琳王是人类自由的真正的战士，应该给她办绿卡。下个礼拜，她的绿卡就申请下来了。参议员有权每年特批两个人的绿卡。

按照规定，领取绿卡前得去警察局留指纹。我给纽约市一个区的警察局打电话，他们说，我得先去邮局，把二十六美元的手续费汇给他们，他们不接受现金，也不接受支票。我们到邮局办了汇款，随后去警察局，一个胖胖的爱尔兰族警察接待。聊天中，他问玉琳，你对美国的感觉如何。玉琳说，我觉得，美国有些事挺好，我很喜欢，有超市，有高速公路，也很自由，但有些事我不喜欢。他问什么事，她说，纽约犯罪这么多，有些流氓在街上公开抢老头老太太的钱，把人打倒在地，却治不了他们，即使抓住，法院或者直接放了，或者只关几天，要在中国，严重的话就枪毙了。押完指纹，警察把二十六块钱的汇票还给我，说，这么好的夫人，你请她吃顿饭吧。原来说到他心里去了，他也痛恨治不了那些罪犯。



全家移居美国。左起：王玉琳，女儿东妮、燕妮、桑妮，儿子晓明，李敦白。



1981 年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60 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在北京。左起：燕妮、李敦白、华莱士、玉琳、东妮、桑妮、晓明。

就这样很快拿到了绿卡，按照法律，从拿到绿卡到申请美国护照，中间需要间隔五年，特殊情况可以申请提前。1983 年我们到电脑天地工作后，老板证明他的职员因工作关系需要经常来往中美，玉琳很顺利地拿到了护照。

虽然离开了三十五年，回去之后倒没有多少不适应，没有受到“文化冲击”，这要归功于我一直从事宣传翻译工作，一直读美国的报刊，所以对美国的情况并不陌生。美国人一般也没有把我当作“逆子”看待，他们最关心、最感兴趣的是，我是怎么活过来的。一个人被单独监禁十六年，还能正常，对他们来说不可思议。不久前，《华盛顿邮报》还约请我写文章，谈我被单独监禁的情况，目的是为了推动废除美国的单独监禁制度。从 1981 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不断地在公司、大学做讲演，听众一直关心我的个人经历，对中国的兴趣则随时间而转移，现在最关心的是怎样在中国投资，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还有人权问题。美国媒体对我们也很友好，我们回美国的第二天，美国电视网的早间新闻就播出了对我们的采访，《纽约时报》发表了一整版的报道，题目叫作《儿子回家，带回亲家的消息》，基调友好。我跟王玉琳说，在美国，他们（即《纽约时报》）说你好，你就好，他们说你坏，你就坏。事实也是如此，《纽约时报》定了调之后，其他媒体基本上都是正面报道。我的回忆录出版后，几乎所有报纸都发表了书评，据我所知，除两家报纸外，其余都是称赞的。读者来信也很宽容友好。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譬如有个人给报社写信，说下次关住这个家伙就别再让他出来，或者把他埋到地底下。编辑说这是个欧洲移民。美国国务院中国处也找我去谈话了，他们问的都是很一般的问题，看得出来，他们很小心地避免提出可能敏感的

问题。顺便说一句，我觉得美国国务院里面，中国处的人员素质最高。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总是爱中国，或者爱其某一个方面，大陆或台湾，古代或现代，不像研究苏联的人，结果是恨这个国家。CIA和FBI都没有找过我，我猜测，大概他们以为我是中国的人，为了培养跟中国的关系，他们就不麻烦我了。他们不找我是很特别的。我们有个朋友，1978 年经过香港到大陆来，香港的 FBI 到旅馆找他，让他注意中国的情况，他不愿意，他们就说，起码，你帮我们数一下火车的车厢，即一列火车有多少节车厢。那时连这样的“情报”也要实地收集。

我一生被“特务”、“间谍”的阴影缠绕。1979 年我刚回美国时，住在纽约我姐姐家里，有一个同乡记者，他跟情报部门很熟，对我说，你们说话小心点，FBI 窃听你们的电话。我说，你告诉他们，如果有什么地方没有听明白，让他们告诉我，我给他们重复一遍。我才不管它窃听不窃听。

我讲一个更大的笑话。我们现在冬天在阿里桑那度过，我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午餐会，里面的人一般都很右，有大公司的一把手，有情报机关的二把手、三把手，都退休了，大家在那里避寒。我发现这些人，至少有部分人，认为我本来是他们的人。因为我是随美军去的中国，后来又在中国长期坐牢，他们以为我一定是美国特务。前不久，其中有一个人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刚从华盛顿回来，参加 OSS 的一个纪念会，说“我们谈到你的经历，我们都很尊敬你”。我说你们尊敬我什么？他说我们吃一次午餐吧。那就一起吃饭，他说：我们都很佩服你，在中国干了这么久。我说，我告诉你，我从来不是 OSS，也不是 CIA。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是单干。他不相

信。既然说服不了他，只好随他去。玉琳开玩笑说，那好，你跟他们要十六年的工资吧。

所以，你看，俄国人说我是美国特务，中国也两次把我打成美国特务，美国人呢，有人认为我是中国特务，有人认为我是美国卧底。其实我这个人连打扑克都不行，好牌坏牌都写在脸上。人的命运，真是奇特得很。

说远了。总之，精神方面或者说文化冲击方面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真正严重的问题是谋生。我二十四岁离开美国，此前除了上学，就是从事劳工运动，从来没有“工作”过；在中国，我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单位人”，什么都由组织管，坐牢就更把一切交给国家了。想不到的是，从五十九岁开始，我得为自己的生计操心。

我的老家已经沧桑巨变。我父亲在我来中国前就已经去世，1979年我们回美国探亲，母亲还来得及与我们见上一面，她当年就去世了。我还有个姐姐，住在纽约，她有忧郁症。姐夫原来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是个传统的美国男人，跟传统的中国男人一样，打老婆。我们在姐姐家住了一段时间，不能长住。投奔谁呢？只好投奔我的南方革命老战友。他们待我们非常亲热，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让我们住在家里，提供汽车，还给生活费。但投亲靠友非长久之计，我们得靠自己才能在美国立足。

对于到美国以后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我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不过有一个大致的方向。王震不是说让我们找财团吗？我觉得美国的资本家需要中国的市场，我们则有中国的经验，有中国的人脉关系，不会做生意没关系，他们迟早会找上门来，我们只要等待机会。事实上

也是这样，我们在美国发展很顺利，不久就认识了基辛格，认识了华莱士。而且我发现，最好的事情是我坐过牢，因为坐过牢，谁都对你好奇，你想见谁都没问题，因为别人也正想看看你这个怪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坐牢倒成了我的“无形资本”。

我在美国的第一件事情是写书，写我在中国的经历。1979 年回美探亲时，纽约有位名记者设宴招待我们，还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出版经纪人，第二天我就签了合同，对方预付了二万七千美元。我就住在波士顿附近的一个战友家，买了个苹果机开始写作，一直写了九个月。写完之后，我们自己就不满意，觉得讲得不透，只好把书稿收回，退回定金。那笔钱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钱，当时生活的压力很大。此路不通，那只能想别的辙，做过多种事情之后，慢慢地，我们摸索出了自己的道路。

三、协助华莱士访华

1981 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华莱士①到中国采访，这是美国电视记者第一次到中国做节目。他请我陪同来华。我提议聘请我为顾问，他说：我们 CBS 什么高级顾问都有，不需要再

① 迈克·华莱士（Mike Willace，1918—2012）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节目《60分钟》的创始人员，之后担任该节目的主持人长达近四十年之久。他曾经采访过全球无数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各界名流，并以其辛辣、强硬的主持风格和近乎“审讯”的采访方式被全世界观众所熟知。由于擅长追踪式新闻报道以及揭露社会问题的深刻性，华莱士在世界传媒界被同行称为“新闻怪杰”。华莱士1986年和2000年曾分别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进行过专访，其中对邓小平的采访曾由李敦白先生牵线搭桥。

请什么顾问。那好，只算是华莱士的翻译吧。一行连我五人，华莱士，一个摄影，一个音响，一个制片人。我们绕道香港，第一站到南京。南京有一个解放军的师，专供人参观，在去酒店的途中，我们在路边看到一个大广告牌，这个师的文工团当天晚上有演出。华莱士说，好，我们第一个就拍演出。当天晚上，华莱士未去现场，他们也没让我一起去。过了一会，三个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问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文工团的领导说，只能拍五分钟，而且只能拍他们自己选定的五分钟，要八万美元。中国人刚学会要钱，要得挺狠。我说别着急，我去跟他们谈。这就去了剧场，我对那个年轻的指导员说：这个《60 分钟》节目每期有八千万观众，它一播，你们在美国就出名了，现在不是已经有些演出团体到美国演出了吗？说不定这是你们的机会。然后回酒店对华莱士说，你们去吧，爱拍多久就拍多久，全部拍也没关系，演得不好的地方还可以让他们重演，而且一分钱不要。结果，当天晚上，华莱士就打电话到纽约，建议 CBS 聘请我为顾问。我们还到那个师的师部作了访问，与老师长、老政委以及战士谈了话，看他们练兵、用餐。华莱士对他的制片人说，我发现这些赤色分子还挺可爱。来中国前，他们定下的采访基调是报道中国威胁，此后就把原来的文案推翻，最终的报道很友好，题目叫“在今天的中国，发财是光荣的”。

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外交部派了一个人陪同，这个人很讲道理，实际上没有对采访加以限制，很自由，可以随便在街上采访，没有事先安排。在北京街头，华莱士采访一个工人，其中问到北京的电视播出多长时间，工人好像回答两小时。华莱士说，哦，我们美国的电视二十四小时播出，而且有很多台。那工人就说，我们的电视，两小时

也差不多了。在广东中山县，华莱士在路上采访了一个骑着雅马哈摩托车的青年，问他每个月赚多少钱，他回答了一个很小的数目，华莱士问那怎么买得起这辆摩托车，年轻人说爸爸出一点，爷爷出一点，外公也出一点，总之是全家人凑的钱。华莱士说，我看，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这期节目在美国一播出，引起轰动。华莱士的采访都是我做的翻译，因此我也跟着出名了，许多人写信来，表示称赞，其中有几任美国总统的属灵顾问葛培理牧师。我先插进来讲讲这位了不起的宗教领袖。

四、葛培理牧师

1981 年我陪华莱士访问中国，节目播出后，新教牧师葛培理（Billy Graham）夫妇给我写信，说很欣赏这个节目，希望我以后继续给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他们认为这很有价值。后来我们成了特别亲密的朋友。葛培理牧师 1918 年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曾到一百八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布道，先后与自杜鲁门以来的十二位美国总统保持良好的关系，担任过多位美国总统的精神顾问。这是一个非常受尊崇的人，年年是《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有人称他是新教的“教皇”，但我认为这个称呼不合适。

葛培理非常有名，可以说，在美国没有比他更有名的人了。李先念访问美国那次，白宫举行招待会，那些大人物都得排队接受安检，我跟葛培理夫人一走近，警卫马上说请进请进，根本不必检查。但他

始终非常谦虚，非常朴素，非常真诚。我们听过他在一个可以容纳六七万人的大体育场布道，他反复强调一点：你们不要以为布道者与上帝更接近，事实上布道者是这么一种人，他像是一个找到了一小块面包的乞丐，告诉其他人怎么找到面包。跟虚夸的传教士完全不一样。

葛培理反对正规的大教堂，他觉得什么地方都可以祝祷，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修教堂。1988 年葛培理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之前，我们到他家里，与他周围的人一起讨论并最终决定他是否访问中国的问题。葛培理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山区，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住房，吃得很简单，也没有佣人。他如果想发财很容易，信徒捐款数量很大，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管理这些捐款，用于慈善事业，自己只拿一份数量不大的薪水。

那次，《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也来了，还有国务院的人在场。大多数人反对他到访中国。《时代周刊》的人说，你到北京，共产党会让你给二百个人说教，这二百个人里面，百分之九十是警察。葛培理说：哈，警察，我特别愿意给他们讲。这些人说了中国许多坏话，说共产党会利用你把他们的假基督教合法化。葛培理的岳父是一位传教士医生，曾在中国传教，他在江苏农村建了一个小医院，做了很多好事。葛的妻子十五岁之前生活在中国，很爱中国，她说，如果上帝等世界十全十美时才想起派他儿子下来的话，他也就不用派了。这就封了反对者的嘴。后来他们又说，你到中国不要讲耶稣，那些人都是无神论者，你讲耶稣他们会生气。他没说话。休息的时候，他走过来问我们俩，是否到中国就不能讲耶稣。我说，你到中国不讲耶稣，他们会怀疑自己请错了人。他们当然知道葛培理是干什么的。

来了之后，效果非常好。当天晚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章文晋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宴会开始前，章文晋说，我们先静默一分钟，让我们的基督教朋友可以祷告。第二天洛德大使宴请，章文晋和统战部前副部长江平都出席了，谈得非常好，我做的翻译。江平讲中国的宗教自由，他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一个教训，你压制宗教，就是给上帝培养信徒，所以我们现在不压制宗教自由。章文晋祝酒时说，我觉得，今天，耶稣的精神和马克思的精神都伴随着我们的会谈。

我们在北京还见到了李鹏总理。李鹏接见时，葛培理提出让我给他做翻译，但中方不同意，说他们自己有翻译，英文很棒，可以为双方翻译。葛培理很会办交涉，他说那真不错，不过我的北卡口音很重，除了李敦白，别人恐怕听不懂。最后就让我去了。我们进了中南海，李鹏出来迎接。他跟我握手，说，你们家在“文革”中也受了冲击，家里人都好吗？我说：很好。我还说，我们李家终于出了总理。他听后哈哈大笑，显然很欣赏我的话。葛培理提议，可以介绍中国人学习《圣经》，不是作为宗教来学习，而是研究《圣经》出现之后两千年，为什么这么多人信它，它有什么魅力。李鹏看着我，好像在说“瞧你给我带来的是什么人？”没吭声。

葛培理在中国十个教堂讲教。在上海，他对我们说想去看王明道牧师[1]，但他十分尊重主人，说，如果主人不高兴，他就不去了。当时

---

① 王明道（1900—1991），生于北京，原名王永盛，1920年改名为王明道。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基督教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主张基要派神学，重视《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生活，反对自由派神学。从1927年起，他自资发行《灵食季刊》共二十八年，发表过很多有影响的文章。1933年起，他在北京建立并引领基督徒会堂共二十二年。因为反对自由派神学和三自教会，王明道于1955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80年被释放，但未获平反。

王出狱不久，而且这个人始终未获平反。外交部有位官员陪同我们，他很开明，说，葛牧师在他自己的时间里可以去任何地方，条件是不要问我的意见。他只要求把访问地点及线路告诉他，以便做好安全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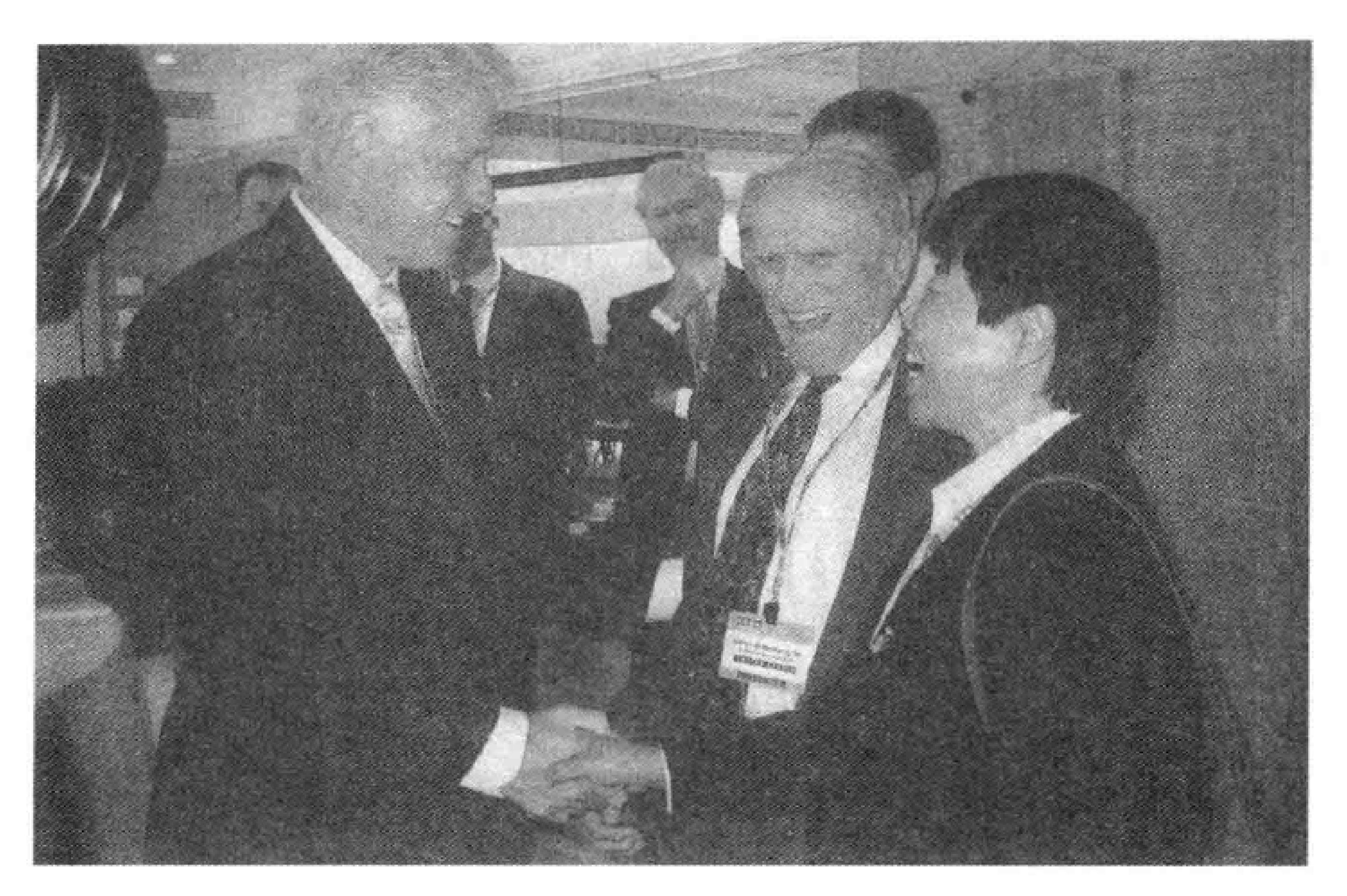
这次到访中国之后，葛培理说，我犯的错误大了，早在30年代，我就宣传共产主义是魔王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我根本不了解共产主义。此后，葛培理在美国积极宣传中国，成为中国坚定的朋友。他一共访问过中国三次。“六四”之后中美关系隔绝，他跟我说，请你告诉中国朋友，如果我到中国去能起作用，我马上去北京。

葛培理现在九十多岁了，一身病，但仍然很活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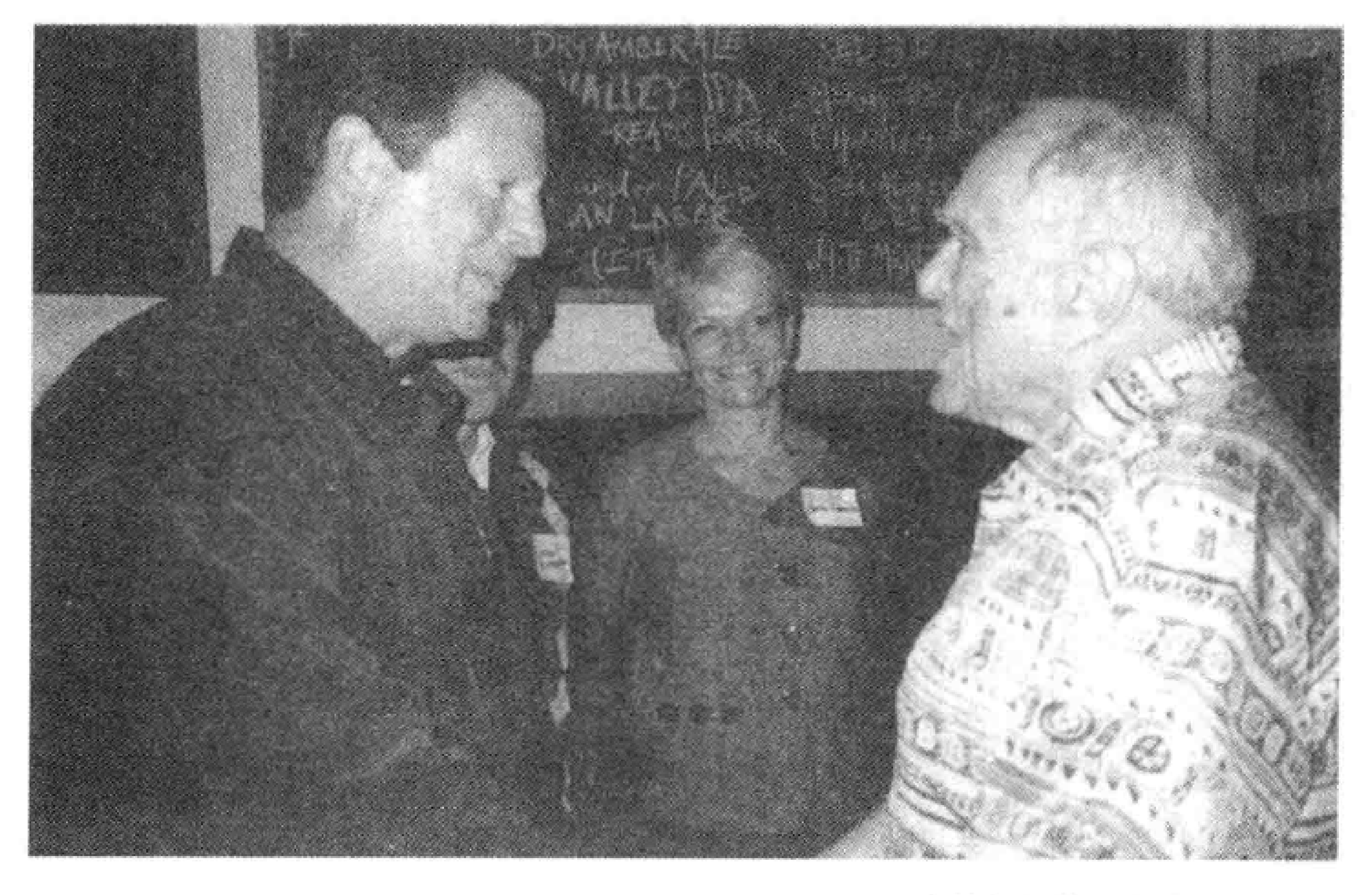
我常想，不知葛培理怎么能够保持自己的本色。我经常联想起郭沫若。

五、“通往中国之路”

由华莱士，又带出了别的机会。离开北京前，华莱士对我说，他要向他所在的讲演社（Lecture Bureau）的老板推荐我，让他给我安排讲演，这样我就有稳定收入了。我当时想，这是件好事，可这个人这么忙，回去后不一定会记得这事。过了一两个星期，那个讲演社的老板就打电话来了，先让我寄简历给他，后来又约面谈。一见面，他手里拿着我的简历，说，老实说，像你这种人的简历，平常我连看都不会看，但是，华莱士在一个星期内两次给我打电话，让我见你，我就好奇了。要知道，他做我们的客户已经十几年了，我们多次给他寄这



李敦白夫妇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李敦白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个人那个人的资料，请他评估，他根本就不搭理。当天就跟讲演社签了合同，接着就到许多大学、公司讲演。基辛格、华莱士这些名人讲一次可赚几万，我没那么值钱，只有几千，那也很不错。这就算有点钱了。由讲演，又生出了另外的机遇，留待以后再谈。

不过演讲的收入并不稳定，不能根本解决生存问题。当时中国刚开放，对美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许多人想亲眼看看中国，旅游市场火热，我们适逢其时，就一头撞了进去。

1982 年，我们找到一个左派人士办的旅游公司，叫特别旅行社（Special Tours），由于我的中国经历、中国人脉和中文能力，我一下子成了这个公司的副总裁。这个公司专门组织到中国的旅游，团友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如医生、教授、画家等。老板是个老海员，原来是海员工会的。我在那儿只做了一年，因为老板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他用我的名义给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写了一封信，让中国不要跟资产阶级的旅游公司打交道，所有的生意都给他。他事后才告诉我，我当然立即辞职。随后我们就自己搞了一个旅游公司，名称是“通往中国之路”（Pathways to China），其实只是一个中介，并没有正式注册公司。我们给大旅游公司组织客源，从中提成。这个生意很来钱。介绍一个客人给旅游公司，我们得一百五十美元；如果介绍一群人，人数多到可以单独组团，每人二百五十元；如果我们自己带团，每人四百五十元。组团很容易，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感兴趣，我的母校北卡大学一下子组了好几个团。就是累。我们自己带团，一年带十个左右的团。自己带团，一是从经济上考虑，二是我们喜欢来中国，而且那些团友也十分有趣。有一次，我带一个团到西安参观，有位团友是加州的草莓大王，给他摘草莓的都是些拉美人，受左派工会领导。西安

旅游局招待大家吃饭，很热情，大家都很开心。这个草莓大王站起来祝酒，说，我一生没有见过共产党，现在见了，觉得挺不错。他的夫人在旁边嘀咕：没见过共产党，你以为谁给你摘的草莓！我和玉琳分别带团，旅游城市主要是北京、西安、上海，有时候去南京、成都、桂林、昆明、香港，我带的一个团还坐过从成都到昆明的火车。这些美国人到中国来都很开心，通过旅游对中国有初步的了解，我们也觉得很高兴，就是太累。有一次我在上海得了肺炎，吃药总不见好，只好把我送到香港住院。正好这个时候，加州电脑公司的老板找上门来。

后来玉琳还曾应聘到一家香港旅行社工作，担任驻美总经理。

六、你们最需要的是：我！

讲演社曾安排我到旧金山讲演，听众里面有一个人，是电脑天地（Computer Land）的老板，这家公司当时销售电脑排名世界第一位，老板是位亿万富翁。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绍，我们也相互留了联系方式。过后我也就忘了，不可能跟一位亿万富翁打什么交道。不想，一年之后，大概是1983年8月，他打电话来了，说中国电子工业部的一个代表团将访问他的公司，他没有中文翻译，当地只有一个日本人做中文翻译，不过，由这个日本人翻译，他又觉得不放心。他想请我做翻译和顾问，就几天。好，没问题。

回美国之后，我给一些公司老板做过咨询，但我从来不会要钱，我姐夫骂我笨蛋，说他们要利用你的知识赚大钱。我觉得，人家找你坐下来谈谈，怎么能要钱呢？就像一个骑惯自行车的人突然改骑平

板车不会拐弯那样，我就是不会开口谈钱。这一次，我说要钱给你们看，跟老板说每天五百美元，这对我是个大数字，实际上并不多。老板说没问题，我就去了。

会谈在旧金山一家大酒店举行，中国代表团和美国公司要员相对而坐。中方共十一人，团长是电子工业部的副部长李瑞，二把手是王震的儿子王之。一开始，双方先介绍己方成员，介绍完毕，老板对我说，你跟他们说你的中文名字。我有点犹豫，因为当时我在中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没想到，我一说我的中文名字叫李敦白，李瑞马上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我身边，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这次到美国，如果别的什么事都没有办成，仅仅认识了这个人，那也够意思了。他还说，1946年在张家口的时候他就听说过我，当时他在附近的农村，很想认识我，但没有机会。

谈判是王之做的翻译。李瑞提了一个建议，电子工业部和电脑天地合作，在中国各大城市开设电脑销售机构。老板没有任何反应。当天晚上，老板宴请各地分公司的经理，也请我去了。他问我，你觉得今天下午的谈判怎么样。我说，我认为，这是在浪费你的钱，也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他问为什么，我说，中国部长提出了非常积极的建议，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机会，但是你没有半点反应。他惊讶，建议，什么建议？我就把李瑞的建议重复了一遍，他马上说，你立即给中国部长打电话，说我明天早上就会有积极的回应。结果，第二天就签了合同。

原来他没有听懂王之的翻译。有一种翻译，每一个词都翻译出来了，而总的意思却没有出来。我长期在中国，听得懂王之的翻译，而且压根没意识到老板会听不懂。这叫作习焉不察吧。

谈判完成，要回纽约了。老板问我，要实现这个合同，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老板说好好，我让我的国际总裁跟你谈具体条件。我想这下子王玉琳会满意了，我终于敢开口说了。我要了年薪十万，外加工作经费，签了终身合同，职位是公司的副董事长。不久，我们全家搬到加州，从此再无钱的忧虑。

我到加州后，电脑天地的老板请玉琳也到公司工作。但她这时在香港旅行社当驻美经理，不愿离开，表示谢绝。老板很聪明，继续动员她：玉琳，我的目的是让中国所有人都拥有电脑，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这么好的事，你还不愿意干吗？她一听这话，马上就答应了。她成了电脑天地驻中国首席代表，在北京民族饭店租了几间房，带人在中国推销电脑。那年圣诞节前两天，我们正等她回家过节，她打电话来了，说她手下的人一个电脑没卖出去，她很生气，准备自己去推销，圣诞节就不回美国了。我和孩子们都很失望，但只好由她。她设法把电脑推销给机关、学校，数量庞大。结果，她成了下一年度全球电脑销售状元，上了《福布斯》杂志的一个专栏“造成新闻的人物”，可恨的是写成了我的名字，我告诉编辑是王玉琳卖的，跟我没关系，他们不加理会，大概觉得这是个中国人，还是个女人，不想把这个荣誉给她吧。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七、“李敦白有限公司”

1985年我们离开了电脑天地。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国内有人劝我们，说你们给国内引进电脑很好，但现在中国需要很多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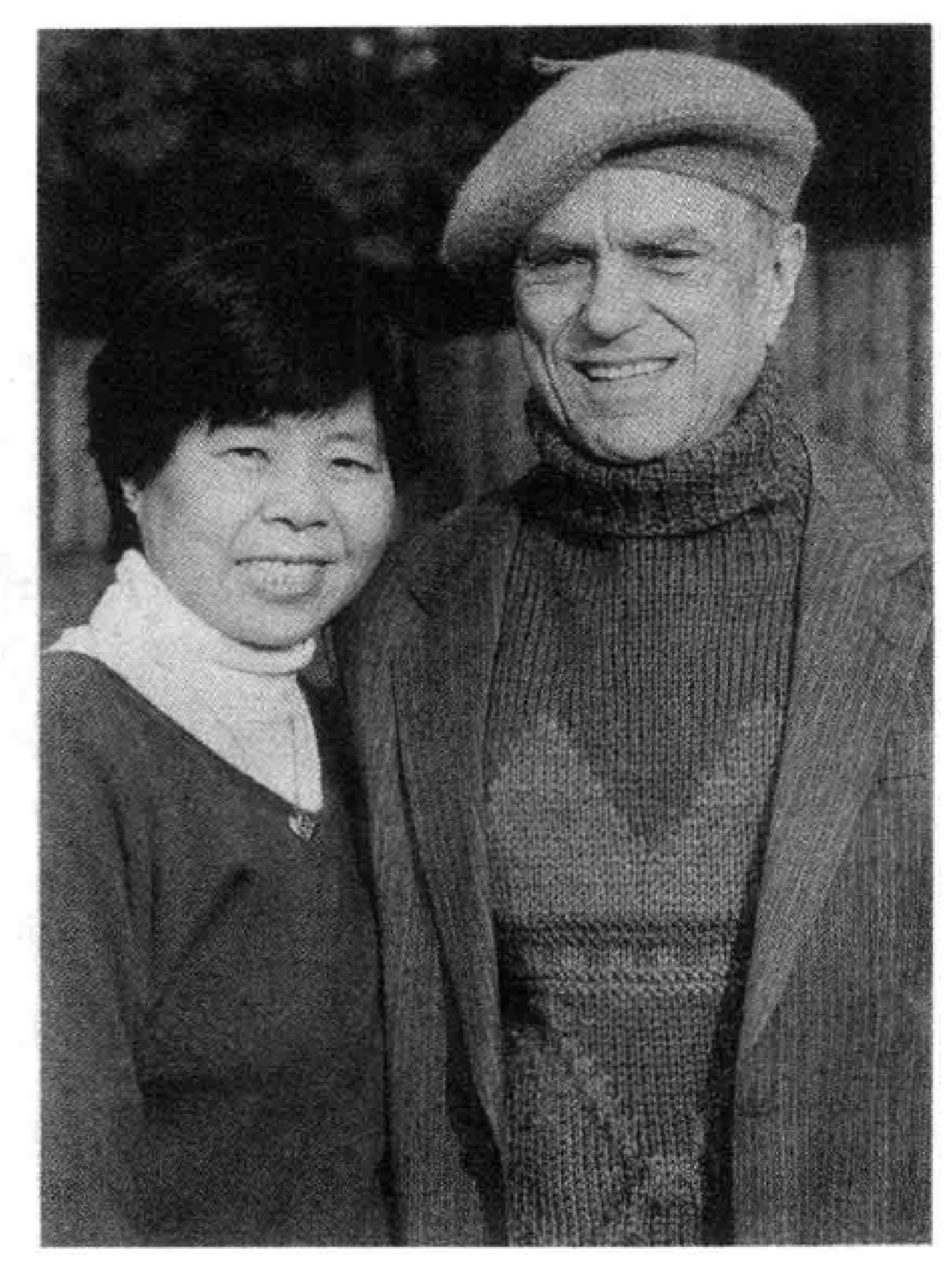
西，希望你们不要限于电脑。第二，电脑天地与中国签订的合同欠实在，执行中问题很多。这个合同的内容是电脑天地和电子部下面的公司合资，在全国各地开设销售电脑的商店。电脑从美国进口，主要是IBM。这事怎么落实呢？这些电子家伙来了，谁教人使用，有问题谁维修，都需要安排，把电脑引进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卖出去那么简单。当时没几个人懂电脑。几年前邓小平访美时，参观了IBM总部，达成协议，IBM公司给每一位中央委员送了电脑——当时只有台式电脑，并且派了两百个电脑专家到北京，负责安装、维修，还派工程师和翻译上门指导使用。这些人包了长城饭店两层楼，财大气粗，他们一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生活成本一下子上升许多，大家都骂IBM。但当时的中央领导都是些老同志，根本学不会，这些铁块不久就成了孙子们的玩具。由此可见，电脑天地与电子工业部签订合同时的环境，对一下子铺开电脑销售是不适宜的。第三，电脑天地本身出了问题。老板做事主观，惹了官司，公司的电脑业务垮台。我们刚好在此前就离开了，后来老板还请我们做他旗下其他公司顾问，到现在还有来往。

离开公司之前，玉琳给中国办了件大好事。公司积压了大量电脑，她建议赠送给中国一部分，后来落实了三个单位：北京九十六中学、残联下属的康华公司以及上海的一个学校，各赠送一百二十台电脑和一百二十台打印机，并开设培训班，教给他们电脑操作和维修技术，为中国电脑行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离开电脑天地后，我们加入了一个顾问公司，承担中国分公司业务，介绍投资公司到中国，干了一年半。1989年，我们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李敦白有限公司”，为中美经济来往提供中介服务，把美国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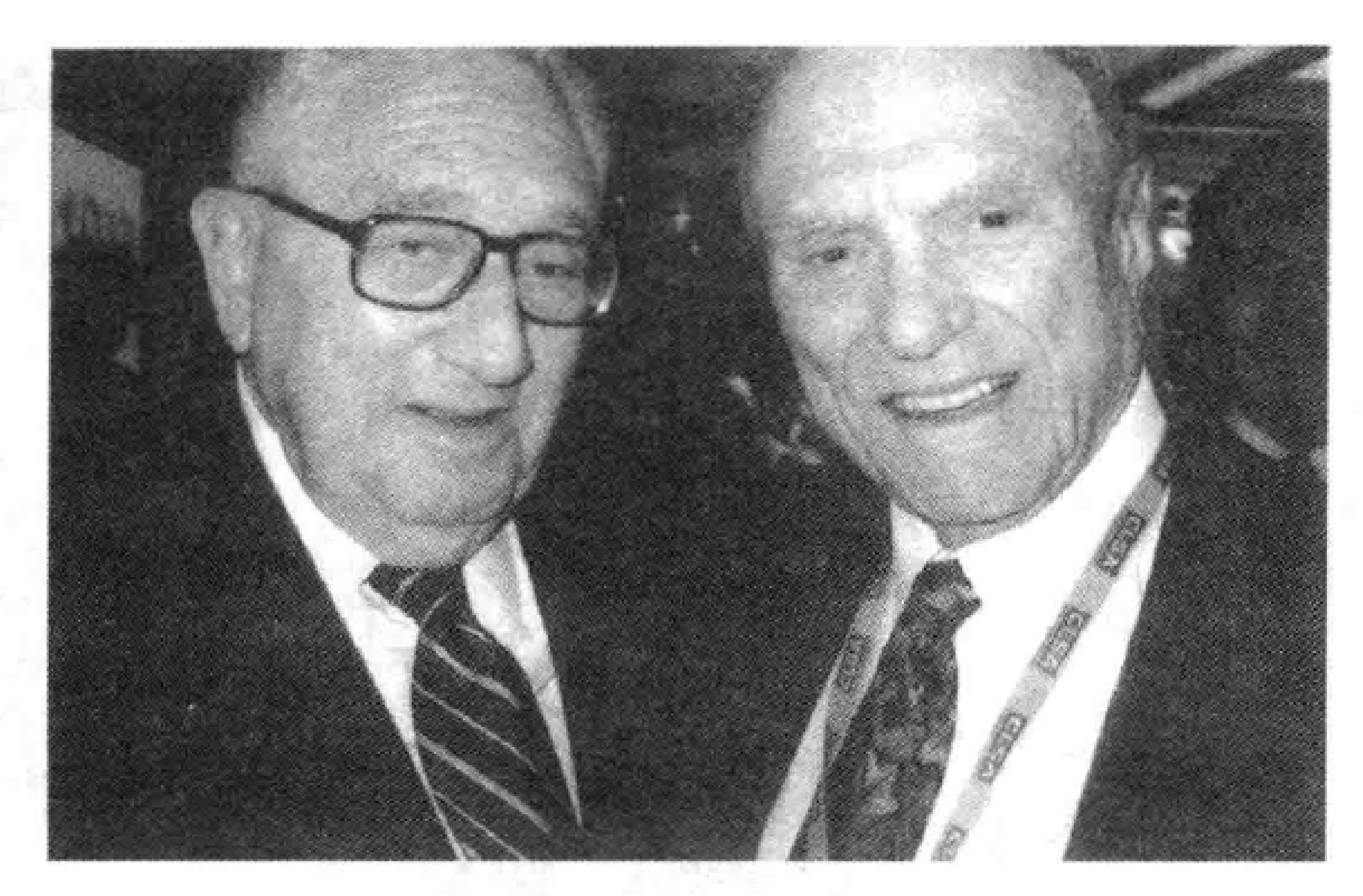
本介绍到中国投资，同时为中国公司提供美国市场和合作方的情况。

中国开放市场初期，中外情况隔膜，互信不足，问题很多。我举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两个美国公司与中国签了四十亿美元的合同，连方毅副总理都签字批准了。中方合作者委托我们查一下这两个公司的情况。这在美国很容易，只要查它的交税记录就可以了。一查，好嘛，一个公司全部职员只有一个人，就是它的董事长，另一个比它大一倍，董事长之外还有个秘书。完全没有交税记录，因为压根没赚过钱。



1989年，李敦白与王玉琳创办了自己的"李敦白有限公司"。

美国公司到中国投资面临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相关法律和规范以及商业道德还在逐步形成之中。我们亲历的事情就有不少。美国的一个大电信公司GTE（通用电话电子公司），基辛格是它的董事，基辛格把他们带到中国来，跟铁道部专管铁道沿线通讯的电信部门谈判。签约后，GTE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根据合约，辽宁省的六个城市将在六个月之内覆盖手机信号，全部投资由该公司承担，首次投资八百万美元。这



李敦白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洛。

个消息也登报了。六个月之后，什么动静也没有，人家把这些钱放在北京，做自己的投资。两年之后，GTE 的副董事长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就是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我说，我们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你跟土匪签了约。这个局长很糟糕，我们认识他。他曾经想跟我们的一个客户谈生意，他提出给我们夫妻一部分钱，让我们拉着这个客户，我们才不上这个当。GTE 副董事长又说：谈判的时候，我有点怀疑这些人，但基辛格向我们保证，说中国人不会骗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家，基辛格在中国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但说到做买卖的话，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言权。结果就把钱给丢了。还有 Levi's，即以牛仔裤闻名的李维斯公司，他们跟纺织部谈了一年半，不得要领，后来请我们。我说，纺织部根本不管服装的事，你们找错人了。公司的人说，不会不会，我们一直在跟他们谈。我们便一起到纺织部，负责的副部长兼总工程师一见我们，马上就坐下来谈。他说了实话：其实我们没有服装业，服装归轻工部管，但是我们想开始做这个行业，想找一个名牌来合作，一直哄他们。

所以，跨国生意很容易上当受骗。根本问题是你得了解跟你打交道的人。在美国企业界，天天讲三C，就是character，品质，competence，能力，connection，关系。第一个就是品质，如果这个人是个骗子，你跟他谈什么！你得查他以前是不是守信誉，讲道理。在美国，查一个公司的历史记录还比较容易，只要打电话委托一个律师事务所，很快能查清楚，中国不一样，你只能依靠朋友，通过一个可靠的朋友，请他介绍他信任的朋友，所以connection特别重要。但也正因为如此，说容易也很容易。我们很重视客户的选择，做咨询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失败的案例，除非相关公司因自身的原因出了问题。

我们办公司有一个原则：对美国公司要钱，对大公司尽量多要钱，一些刚刚创业的公司，如果老板人好，项目也好，就少收钱，或者不收钱；对中国方面，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部门，从来不收钱。因为我们依靠中方才能办事，没有中国的帮助也赚不了钱。

我们的公司，确实非常“有限”，只有我们两个人，办公地点就在家里，不需要“全日制工作”，我们也没有网站，没有任何宣传资料，就凭“三C”运作，可以说比较成功。

1993年，在做公司的同时，我又应聘到我的母校北卡大学教书，历史系，而且是正教授，讲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有一年还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当时中国学生只有从台湾来的，没有大陆学生，他们反映，对大陆的情况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1997年，我从北卡大学辞职，搬到西雅图定居，但还经常到北卡大学做讲座，同时在华盛顿大学等处讲课，讲演社也仍安排我的讲演。现在已经不做公司了，虽然还以个人身份给一些老朋友做咨询，但基本上进入颐养天年、反刍人生的阶段。

第七部分 如是我思

虽说退休，我的日程仍然很满。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桥”，是我一辈子的使命。我经常到美国各地演讲，讲中国的发展，讲中国的政策，尽我所能，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消除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误解。我和玉琳现在仍经常往来中美之间，我们到中国，总是积极找相关部门和个人，反映中美关系和对外宣传中存在的问题，讨论改进之道。我也经常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中美两国在其中担当的角色。至于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未来走向，更是时时萦绕在脑海的问题。我愿把我的一些想法讲出来，跟大家讨论。

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我对中国革命的看法经历过几个阶段的变化，晚年对指导革命的理论也有些新的想法。

前面讲过，我青年时代在美共党内组织劳工运动时，就从零散渠道得知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认为，中国革命以土地改革为中心，满足小生产者的愿望，不像苏联革命那么彻底，而我们都奉苏联

革命为正宗。到中国之后，经过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接触，当然也因为对中国现实逐渐有所了解，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到延安的时候，我对中国共产党已经服了，很服气，对它的领袖人物很敬重。当然，还谈不上深入了解。当时还有一个疑问，延安的报纸宣传苏联的内容很少，不像我们美共的党报，一大半内容都是讲苏联。我问过梅益，他简单地说，我们对苏联并不是很了解。我怀疑中国共产党不够马列。

在延安学习机会不多，战争环境么，主要是对付眼前的困难。但也读了一些东西。毛泽东的著作读了几篇，特别佩服的是《论持久战》，不但让我对作者的洞见能力五体投地，而且成为我以后分析问题的指针、模板，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第一次坐牢的六年中，我给自己确立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够标准的中国共产党人，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思想上革命化、纯洁化、科学化。出狱之初，我是十分教条的。当时广播事业局对职工进行业余教育，需要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项任务。我用的教材，跟我在美国教工人时一模一样，就是列昂捷夫写的那一本。

思想上开始有所独立，是1960年参加毛泽东著作英译定稿小组之后。我自己也没想到，这项本来是为了介绍、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不需要自己独立思考的工作，倒成为我产生独立性的根由。因为要翻译，对毛泽东的著作不但要系统地读，而且要深入理解；再者，一起工作的同事，如冀朝鼎、唐明照、徐永煐、陈翰笙等人，都是理论水平高而且思想开放的，我们就有许多深入的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争论。这些争论对我的启发极大。在钻研和争论中，我特别注意到毛

主席讲的，共产党人时刻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能盲从这个观点，我认识到，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就是因为他的独立性，他的不盲从。独立思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点和要点。

这点思想上的觉悟影响到我的行为，不过影响的程度很有限。当时不断进行政治运动。我出狱不久，就是“反右”。“反右”我跟得很紧，思想上教条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怕，我怕别人对我有怀疑，虽然他们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但内心深处我还有恐惧。我们英语组有五个人，我是唯一的党员，直到“文革”前我都是实际上的负责人，我们的大部主任说，“我签字，你负责”。“反右”时我很积极，但到“文革”前搞“四清”时，党委让我下去搞运动，我就借口还得继续《毛选》翻译工作拒绝了。实际上是对运动烦了。

“文革”初期，我非常兴奋，非常积极，觉得大民主的时代来临了。我参加的造反派在1966年的最后一天夺权成功，成为广播事业局的当权派。我们承诺要办一个红彤彤的革命的广播局，但事实上，造反派完全没有管理的经验，面对这个七千多人的大机关，简直束手无策，连工作用车都派不出去。本派里面没有掌权的人先起了意见，觉得还不如原来的领导，新造反派随之酝酿产生。当权派一看，好，有人反对我们的领导，我们的革命政权正受到威胁，非常害怕，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措施，甚至撬开反对者的抽屉，偷看他们的日记信件，安插“间谍”，开大会把他们拉上去质问。原来宣称的民主再也不要了。

这跟我的理想完全不合。有一次我正好碰上这样的一个大会，就上台对负责人说，你没有权力强迫别人回答问题，他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我对自己所属的造反派产生了反感，而那些头头也对我不

高兴了，我受到围攻。几分钟之内，我就从一个广播电台最受欢迎的人，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想不到，第二天，我被宣布为负责电台整顿的三人小组的领导。不过我没有当这个头，在三人小组的第一次会上，我就请求让另一位成员——他是个记者——担任实际领导，但群众都以为我是领导。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自己毕竟是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也并不真正懂得，由我担任主要领导不合适。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整风团结各派，但我马上就发现苗头不对，实际上是要消灭对方。我提了意见，他们不听。我就打电话给中央文革的王力，告他们，说他们做得不对，镇压对方。王力的答复是，行了，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找我了，你们的问题自己解决。这个时候，我应该马上辞职，应该不干，但我没有，我还是当了这个名义上的负责人，结果他们仍然利用我做挡箭牌，来镇压对方。这以后，他们搞他们的一套，我搞我的一套，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认识到整个“文革”有什么问题，没那么聪明。我还是迷信毛主席，觉得他有办法，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也相信江青，认为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事后想，我当时之所以这么“左”，有两个特别的原因。第一，我是个美国人，我被允许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我不能成为中共身上的一个弱点，不能让坏势力通过我这个渠道进入党内。所以特别偏左。如果我不是美国人，可能不会那么左。第二，我觉得什么都能批判，但有些出发点不能批判，连疑问都不行，疑问就意味着需要辩解，这是我不能允许的。就像宗教徒不能质疑神的存在一样。

在潜意识中，我已经产生了一些怀疑。大概是我被关进秦城的第

二年，从报纸上看到印度克拉拉邦的共产党当选，突然觉得心里一阵寒意，闪过这样的念头：共产党掌权，是不是又要搞阶级斗争，又要冤枉许多人。这是我第一次对共产党产生怀疑。

比较彻底地认识清楚，是第二次从监狱出来之后。我想了一两年，得出一些结论。

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思考。首先，我觉得列宁跟马克思有很大的区别，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了，变成俄罗斯的东西了。我想他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人。但是在民族化过程中，他丢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他彻底修改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只在几个地方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另外在几封通信中提过。但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指在革命夺权的过程中要镇压持枪的敌人，绝对没有想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个专政的社会，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相反，他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讲，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宣布民主，他设想的社会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民主多了，因为社会主义不受金钱的控制。列宁由于当年政局的需要，提出另外一种专政的理论，后来在斯大林那儿发展到整个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专政的社会。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普遍的专政，是杀鸡给猴看，对少数人专政，让多数人老实。斯大林是通过秘密警察实现专政，毛主席不搞这套，他通过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制约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但效果一样，就是接受专政思想，否定民主。所谓民主集中制，实际上从来都不是民主集中。当然，开始时用意是好的，效果大部分也是好的，只要把新中国和旧中国比较一下，一下子就可以看出高下。但是，不仅专政

的手段有问题，即使用意本身，也慢慢在变化，尤其是一些境界和水平不那么高的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逐渐被做官当老爷的思想取代，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牢不可破，甚至遗传到下一代。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社会主义有国有制，而国有制是一些官僚机构通过强制性计划控制整个企业。马克思想的是工人管理、民主管理，不但要有政治民主，而且要有经济民主。后来苏联走了相反的道路，彻底控制所有企业，限制下面求发展的积极性、创造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完成计划，最好是超额完成计划，就可以被提拔、受奖励，谁都不愿意担风险用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创造新的经济。所以，“文革”中学生提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不比资本主义国家民主？二是为什么经济上创造精神、进取精神不如资本主义国家？

我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理论有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又导致了理想和现实的背离。我在美国讲，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思想是有效的，但我不是马列主义者。我不赞成列宁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恩格斯提出两点：一是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用科学的世界观分析社会问题。他是很彻底的唯物论者，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他不提，具体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第二个是剩余价值论。这两点到现在还很重要。但他好像没有想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有剩余价值，实际上也有剥削。控制某一行业的官僚集团不可能把创造出来的全部价值都分配给工人。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反杜林论》，有幽默感），说，我们知道辩证法的三条规律是对的，但是没想到这是永恒不变的。

我觉得马克思的理论中也有过时的，不对的，这不奇怪。譬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有的时候固然是，但总的趋势不是，总趋势还是提高的。另外还有被忽略的两点。恩格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具体的本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共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各国之间的具体特点比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制度之间的区别还要重要。这是提醒大家注意，不要一概而论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认为任何国家制度只要还能发展生产，就不会被推翻，连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也不会起来推翻它。我们对这个观点注意得不够。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话经常被忽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的基础，而不是倒过来。“文革”的时候我非常高兴，跟柯弗兰他们说，现在好了，原来强调个人服从集体，现在是强调集体为个人发展服务。

二、我看毛泽东

现在在世的人中，直接接触过毛泽东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媒体找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毛泽东，但他们又经常扭曲我的话。我觉得现在还难以对他作全面准确的评价，像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恐怕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相对合理的判断。

前面说过，我在北卡做劳工运动时，在工会的墙上看到过毛泽东的照片。到昆明之后，给我们做饭的中国厨师热衷于讲“朱毛”的英雄故事，他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地下党乔先生一家到过延安，

乔太太说延安有托儿所，教育孩子的条件很好；他们还说毛主席在学英文。在上海，宋庆龄没有提过毛，但廖梦醒也说了毛在学英文的事。

我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在舞会上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第一印象，就是觉得他与他的肖像一模一样，我甚至有点恍惚，还以为是在看他的肖像。他对我说：我们欢迎一位美国同志参加我们的工作。他的个子比较大，肩膀略有偏斜，讲话和动作都比较慢，个性其实有些拘谨。他领着我，跟坐在四周的人一个个握手，分别寒暄两句。好像也不是有架子，但确实很有威严感。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朱德进来了，毛从座位上站起来欢迎他，说“总司令来了”，很有礼貌。

我对他的一个最突出的印象，一直到1949年前都没有改变，就是这个人非常虚心好学。我当时二十五岁，什么都不是，但他在听我说话时，聚精会神，好像我是世界第一的权威，好像除我之外整个世界都不再存在。他讲话也很谦虚。当时我并不觉得毛主席可怕，相反，觉得他善良，和蔼，我也没见毛周围的人怕他。不过1949年我被关起来之后，有段时间神经错乱，幻觉中出现的毛泽东很可怕。

毛主席显然对美国非常有兴趣。他喜欢美国，这一点我能明显感觉得到。我们第一次在舞会上见面时，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我让我的秘书和你联系，请你到我那儿去，跟我谈谈美国的情况，谈个一两天。我问谈哪方面内容，他说什么都谈。稍后我去拜访他，谈了许多话，我还记得以下内容。他说，我认为美国的统治者现在缺乏信心，但我的同事中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我说我认为美国的统治阶级也不一致，有些是好战分子，但不

是多数。他喜欢翻阅美国的流行杂志，看看里面的照片，问一问。有一次看到一个卖头痛药的广告，问图上那个愁眉苦脸的老板怎么回事。毛虽然长期学习英语，其实没有学进去，一直到“文革”初期，他见到我只会说 Li-tten-berg，没有说过其他英语。别说英语，连普通话也讲不好，口音很重。对于战后美国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的意见分歧。毛认为，美国会发生深重的经济危机，这时革命就可能起来。我说我的看法不一样，经济危机下工人会受苦，他们不希望有危机，也不一定有危机就有革命。他不同意。我想这不是他擅长的领域。

在延安和在太行山，见毛主席很容易，有时在街上就碰到了。他带一个警卫员，但不让他靠近，只远远地跟着。在西柏坡的时候，有天大清早，我看到毛主席在田野散步，他的警卫员拿着他的军大衣跟在后面。天气很冷，我说你应该给他披上，他说他不让。地里有几个农民干活，毛主席蹲下来跟他们拉话，看得出他们都很高兴，不知农民如何听得懂他的话，他们一定有沟通的办法吧。农民应该知道他是谁，虽然他们都有化名，毛叫李得胜，周叫胡必成，刘叫校长，小廖叫三零二，是他牢房的号码。警卫员还说主席有两个礼拜没有好好睡觉了。我知道睡眠不好是他的严重问题，吃大量安眠药也不管用。也是在西柏坡，有一次舞会上，他斜躺在椅子上，我过去问候他：主席，身体怎么样？他说，我的身体处于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当时正在批评无纪律无政府思想和行为。

毛泽东智慧超人，思想深邃，对大问题作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别人万想也想不到的。譬如，大跃进时期他讲提高钢铁产量，说，大家都说要增加钢铁，请问你们是真的想还是假的想？如果真

想，那就要发展农业，只有农业发展了，才有可能增加钢铁产量，没有粮食，这就是假话。一般人想发展钢铁，只会想到设法提高钢铁产量本身，不会想到粮食。一般人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毛泽东的思想往往深入一层。我认为这是一种天才。

他还有一种特别的才华，能够把深邃的思想转化为一般人听得懂而且喜闻乐见的语言，语言艺术极其高超。我刚到延安的时候，就很惊讶于他能把问题概括这么精辟，同时又能用小孩都能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如讲统一战线策略，只“有理有利有节”六个字就完整表达了，谁都记得住，具体做法上又有“三奏”：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整风方针是治病救人、和风细雨——虽然可能演变为暴风骤雨。解放后“反右”时说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简直过耳不忘。1964 年，他跟我们几个美国人谈王明的错误——当时把所有苏区的错误都说成“王明的错误”，不提别人——说王明有三个错误：第一，他不知道人要吃饭，把红军带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去，老百姓把粮食都藏起来了，战士没有饭吃，怎么能够打仗；第二，他不知道走路要靠脚，日夜强行军，打仗时，人也疲倦了，脚也破了；第三，他不懂得炮子（子弹）要打死人，说公道话，这个道理他懂得一半，他只知道红军的炮子可以打死敌人，不知道敌人的炮子可以打死红军，搞阵地战，让战士送死。他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把当时的军事错误勾勒出来了，任何人都听得懂，而且印象深刻。他讲话很有意思，想一句，讲一句，然后哈哈哈哈笑，笑起来像个孩子，脸上每一块肌肉都在动，十分开心。他还说，有人说，到全世界都建成共产主义，就再没有矛盾，再没有革命，你们信吗？反正我不信。要我说，即使一万年之后，全世界都建成了共产主义，

还会有革命。他停下来，看着大家，然后说：不然我们都失业了，没事干了，然后哈哈大笑。每次说出别人意想不到的话，他都有点得意，笑得很开心。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那次他还带了康生来，介绍说，赫鲁晓夫天天说我们中共光说空话，这位就是我们的空话部部长。康生说到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前夕讲的一席话：有人说，为了保证我安全回延安，对国民党要缓和，我认为正好相反，你们要狠狠地打，只有打得好，我才能安全回来。

毛对苏联有保留，延安时期所谓“言必称希腊”，希腊就是苏联。50年代我出狱后，上班第一天梅益就对我说：你是中共党员，跟任何外国专家包括苏联专家有严格的界线，他们要参加我们的党委会，我们不允许。其实是毛主席不允许。50年代，我几次听毛主席讲过这样的话：中国革命有两个好处，第一，我们不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我们不是伟大列宁的故乡。他是讽刺苏联，他们老拿这两句话压人。赫鲁晓夫来北京时，跟毛主席说，欧洲兄弟国家都欢迎我们参加他们的党委会。毛主席说，我们知道你们跟欧洲兄弟国家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同意这样的关系。非常严格。“大跃进”的时候，有些技术创造不让苏联专家知道，这也引起赫鲁晓夫生气。我想，中共跟苏联的关系，有点类似抗战时期与蒋介石的关系，有合作，有依赖，但不是一味顺从。

我觉得毛主席从小有很强烈的英雄主义思想。我听过他的一个报告，很认真地讨论中国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到时候我们不宣布，“不要图虚名而惹实祸”。其实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还远得很哪。

1957年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赫鲁晓夫曾提出取消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类提法，别的国家都赞同，毛主席却发表长篇大论，坚决反对，他说我们这些绿叶，总要扶持一朵红花。1959 年我翻译了毛主席亲自审定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表面看是骂铁托，实际上是骂赫鲁晓夫，他很擅长指桑骂槐。

1965 年 11 月底，我们到上海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做寿，毛主席请我们吃中饭。饭前，他跟我们座谈。他举起手中的工字牌小雪茄，问大家他可不可以吸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又问：你们谁吸烟，谁不吸烟？这样吧，凡举手者为吸烟人，不举手者为不吸烟人。结果只有寥寥几个人举起了手。毛说：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少数派。我们听后不觉得有什么，但在座的吴冷西、王力、姚溱等几个宣传口的人脸都白了。毛主席又谈到，当年 2 月，苏联总理柯西金率领代表团访问越南和朝鲜时，曾在北京停留，他与中共领导人会面时提出两党和解，停止争论。毛对此作了评论，说明为什么不能停止辩论的道理。吃饭的时候又提到这个话题，毛说，我们说过要辩论一万年，既然讲出去了，就不能变。我坐在毛主席对面，就问：主席，如果他们表现好，是不是可以减一年，缩短为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他刚好用筷子夹了一块酱菜，一听这话，将筷子停在空中，严肃地说：不行，讲了一万年就是一万年，减一年都不行。饭后，毛主席还想抽抽烟，聊会儿天，但廖承志在一旁老催他，应该是另有活动。毛主席有点生气，说，我想抽完这根烟，小廖就不让，算了！说着站起身来。小廖就在那儿缩头耸肩，装出害怕的样子，其实他谁也不怕，除了他的妈妈何香凝。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毛有点发脾气。

1967 年五一节大游行，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到毛主席走到休息

区，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想过去与他拉拉话。我眼睛不好，直走到两三米远的地方，才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很苦，像要哭出来的样子，便没有走近。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担忧“文革”失控吧。

我不知道他晚年的情况，因为我在牢里。

毛无疑拥有非常高超的政治手段。1957 年初，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在全国宣教工作会议上也讲了话，后一个会议我参加了。他讲了六条区分是非的标准，又说，这只是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不是罪与非罪的标准，你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在他的鼓励下，许多人开始鸣放。记不清是罗隆基还是章伯钧到我们电台来讲话，讲话先得把稿子印出来，结果，印刷工人拒绝排印这篇稿子，认为它是反动的，梅益亲自做了工作后才得以排印。我给我的丈母娘念了一些批评共产党的话，说妈妈您觉得怎么样，她说：“放狗屁，混蛋，地主，这些人的心就是黑的！”人民大学的葛佩琦教授说，如果共产党不改正错误，匈牙利事件中共产党员被吊死街头的惨剧会在中国重演。许多工人和郊区的农民拥到他家抗议，公安局派了警察保护他。由此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的观念相距很远，而毛主席深得普通大众的心理。大鸣大放到 1957 年 6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形势急转直下，各单位组织辩论会，而所谓辩论会，已不允许一方说话，起码在我们电台是这样。“反右”猛烈展开。我们英语组本来没有右派，党支部书记说，必须划出右派，否则，没有活靶子，教育不了知识分子，我们就把唯一的党员发展对象划为右派。这是个加拿大归侨，说话很直。这时毛说他以往的讲话是“引蛇出洞”，早就料到这些人会反党。但我看不见得，

我觉得他是怕别人批评他上当了，我认为他本来没有想到大鸣大放会招致这么强烈的批评。他还说，我们原来只是讲鸣放，资产阶级右派改成大鸣大放，那好，我们就来大鸣大放；我们原来讲鸣放只在学术界、文艺界，他们把它扩大到政治领域，那好啊，我们就来斗政治。他真是一个大师，善于应对各种挑战。

他还有个问题，就是容易犯狂热病，一下子脑袋发热，想一步登天。人民公社吃“大食堂”，放开肚子吃，几个月就把粮食吃光了，老百姓表面上说好，心里发愁得很。有的地方还发牙膏牙刷小毛巾。脑袋发热，“还是人民公社好”，表扬做得过火的地方，造成那么大的灾难。谁要是表示怀疑，就得受处分。我在新华社的老朋友石西民当时在上海市委当宣传部长，他到上海郊区调研，说形势没有那么好，问题很多，结果受到处分。我到天津郊区一个模范村参观，那块麦田，麦子密密麻麻，根本晒不进阳光，孩子们拉一根绳子，来回摆动麦子。当时我也很傻，根本没有怀疑。虽然我没有农业经验，看那样子就不正常，就应该怀疑。可见大多数人都跟着头脑发热。

那毛主席本人是否相信这些奇迹呢？也许有些也相信吧，不过我觉得他基本上是抱着“试验”的心态来看待这些牵涉亿万人口的巨大社会运动的。有一件事在我心里分量很重。1958年，斯特朗回到北京，当时大跃进正搞得热火朝天，老太太很激动，想马上写一本书介绍中国的大跃进。毛主席劝她不要写，说我们还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能够走多远，让她五年以后再写。这件事情表明，他本人并没有被热火朝天的景象迷惑，他很冷静地认识到这是一个试验。他一次一次地发动大的运动，几亿人口都陷在里面，事实上他自己都没有把握能得到什么效果。

毛主席当然也有常人之情。小廖跟我讲过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两件事。一件是，廖对土改有意见，有一次去跟毛主席讲了。毛先说了自己的意见，然后说：你可以反驳我，看我哪条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要因为我是主席，你就不敢批评。另一件是，晋西北兴县的开明绅士刘少白[①]在土改中遭到群众批斗，毛主席看到相关材料后流泪了，说，都说我们共产党势力大，可我们连朋友都保护不了。可见他也有正常人的感情，关键是捉摸不定。

无论党内外，国内外，对毛泽东的评价都有很大分歧，这可以理解。历史学家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现在还做不到，一是资料条件不允许，二是他跟罗斯福一样，特别鬼，他讲的不一定是他做的。另外，有不少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很重的打击，心里的伤痛不能痊愈。我在毛泽东时代也受过严重迫害，光坐牢就坐了十六年，但我对他不恨，相反，我心里仍然有爱，我爱戴毛主席的思想感情还是不

① 刘少白（1883—1968），名象庚，字少白，山西兴县人。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他和李鼎铭两人成为中共历史上最著名的“开明绅士”，但事实上，刘少白早在1937年就经王若飞、安子文介绍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抗战期间，刘少白按照党的指示，倾其全家积蓄，创办兴县农民银行（后改为西北农民银行），并发行货币，对发展根据地经济、支持一二〇师军需、解决人民生活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刘少白曾三赴延安，数次与毛泽东接谈。他还把自己和两个胞弟的众多子女引上革命道路，其中四人十岁左右就被送到延安上学。1946年老区土改开始后，刘少白把全家的土地献给政府。但在随后的土改乱象中，刘少白的胞弟被打死，本人也被五花大绑从兴县县城押到老家接受数千人批斗，当场宣布撤销其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职务，并被监禁四十多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指示赶快纠正。刘少白的党员身份在1948年底被确认。1949年后，刘少白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参见陶然：《毛泽东和开明绅士刘少白》，《中华魂》2007年第1期。）

低的，认为他虽然后来犯了错误，之前也不是圣贤，但他仍然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我觉得，毛主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国要翻身、要强大，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是伟大的，不是东亚病夫。我觉得这个思想是根本的。而他自己要起到一个英雄、领袖的作用。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思想。他为什么接受马列？因为他觉得列宁的一套思想可以为中国所用，后来他读《哲学笔记》，苏联专家也给他介绍一些列宁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唯物辩证法和中国最好的传统也是可以接得上的，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辩证法的成分，要发扬光大。他发动农民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同盟军，广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土地革命为基础，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军事革命，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坚定的中国。这个功绩是磨灭不了的。有人说毛泽东是中国的华盛顿，也可以这么说。

毛泽东还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恢复了中国的民气。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做中国人不算一件特别好的事，不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马上抬起头了，挺起胸了，宿命论受到了很大打击，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使人精神振奋，这其中，毛泽东个人起的作用很大。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世界的格局也因此而改变。

我还觉得毛泽东是个天才的哲学家，毛的哲学思想非常了不起。举个例子，八年的抗日战争，才打了十个月，他就写出了一本基本上是战争总结的《论持久战》。很了不起。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是不是有第二篇这样的文章。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最欣赏他的哲学思考。他谈的和写的是一样的，一句一句，条理清晰。我觉得他在认识论领域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例如，他说，只有你亲身体会到的，在实践中

领会、吸收了的知识，才是你真正掌握的知识，光听别人讲，或者只凭读书，不能获得真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但中间也有矛盾，你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有些大的原则，只能接受，无法检验，像无产阶级专政，用什么实践证明它是真理呢？他讲的矛盾论可能有的地方难免机械，但大体上可以说，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想用科学思想方法教育全体干部和人民的领袖，没有别人。不教给他们迷信，教他们科学，这是很了不起的。后来讲的“活学活用”，你说一点没有起到提高人们思想水平的作用？恐怕还是起了作用。反正我觉得有作用。我自己有体会，我在北卡上大学的时候，负责两个学习小组，一个教授组，一个勤杂工组，我觉得勤杂工领会哲学比教授容易，因为教授有一套套的先入之见。我认为，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宝贵的民族财富，即使现在也应该学习。他讲实事求是，讲一分为二，讲量变质变，讲得多么生动，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他这样想拿科学思想来教育大家？当然，掌权以后，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脱节了，矛盾论上了天，完全跟实践脱节，他分析矛盾，一大套一大套的理论，漂漂亮亮，但不再根据中国的现实。所以，我认为他失去了他主要的本领，就是分析现实的矛盾，然后教育大家、领导大家来解决问题的本领。

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经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条。

第一条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条非常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解放前后是两样的。三七开，还是七三开，我不懂这个，我觉得主要是前后开。不是说前期没有错误，哪个人不犯错误？1947 年大反攻的时候，我在新华社翻译中央通过的《新区土改四十条》。第四十条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我看不懂，请教了一位中国同志（很可能

是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家吴江，有一段时间，我常在新华社资料室看到他），大概意思是，如果县里、区里、村里的同志，有人不同意我们中央的规定，想破坏它，最有效的破坏办法，是一字不改，把这些条条在你们的村里落实，而不考虑变通办理，这样自然行不通。当时就是这样实事求是。

第二条是运用辩证法，利用矛盾，解决问题。譬如，对方是一个反动军官，但总能找到某一个点，可以做他的工作。可以把他上大学的女儿找回来，做爸爸的工作，可以做他的秘书的工作，或者派人给他当秘书，慢慢做他的工作。也不一定能让他站在我们一边，但可以使他软化，增加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不要铁板一块，把这些人都看成不可救药的，不可理喻的，要做他的工作。总之，辩证地看人，辩证地看事。

第三条是群众路线。我记得合作社运动起来后，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发到每一个村庄，让大家讨论，汇拢意见修改后，再次进行讨论。最后一发表，效率很高，合作化一下子就普及了，而且很成功，农业生产很快就提高了。

当然毛泽东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他不断发动巨大的社会实验，影响几亿人口的生活，许多人牺牲了。我想他的本意并不想要那么大的牺牲，相反，他想的是，我这样搞，中国可以很快提高，大家生活可以变得很好，但是实际效果不行。问题是他发起这些运动的时候，他自己知道结果是不明确的，不知道后果会怎样。我觉得，一个领导人没有权力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复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试验。这也坐大了民粹主义，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部队、警察都不要干预，造成很大的混乱。

我觉得，毛主席的问题，当然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制度的问题，如果有个合理的制度，真正能够起到监督作用，就不会走极端，不会出那么大的问题。错了也主要是制度的错，没有制约，别人管不了他，如果一开始就建立了好的制度，他的“实验”就难以进行，也不至于犯下那么大的错。

“文革”之所以发生，从毛泽东方面看，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方面，他看到斯大林被批判，看到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很震动。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对中央内部反对冒进，也就是事实上批判他，很反感，很生气。他曾对周恩来说，我再也不要听到“冒进”这两个字。他想重新创造按自己面貌改造过的共产党，对当时的共产党不满意。“文革”开始时实际上是造共产党的反。你是党员就参加不了造反派，除非有人保你。1967 年 3 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开会决定，全党都停止开会。实际上冻结了党，党被放一边了。政治局的职责由“中央文革”承担，实际上把党取消了。但他毕竟在掌权方面很聪明，军队不让动。后来王力要搞陈再道，他就写了“还我长城”。

除了毛泽东个人的原因，“文革”的发生还有别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广大青年被压制。我在成都采访过一个炼钢厂的女青年，她是炉长，北师大毕业，她和她的未婚夫从小的理想就是当老师。但是党和国家需要她去成都炼钢，她很高兴地接受了，爱人还在北京。她接受了，承担了，突然毛主席宣布，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迫，说你们应该追求自己的梦想。她的气愤“砰”的一声就爆发了，原来我追求个人愿望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革命的。这是很强的力量，毛泽东没有想过这个后果。

怎么才能避免的“文革”再次发生？我觉得有两条。第一，应该

坚持真正的集体领导、民主领导，彼此之间，上下之间，有真正的民主开放。第二，不要压制群众、压抑群众，这很危险。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也不可能绝对控制。我认为薄熙来搞的那套根本是假的，他不是个左派的思想家，他是个野心家。问题是为什么能让他爬得那么高。这个就很危险。

邓小平讲过，对“文革”不能一分为二。但既然“文革”已经发生了，还是应该研究它的正负面。应该承认，第一，那是一个伟大的民主生活的演习，那么多的人参加了，自己选领导，自己办报，自己成立政治组织。这是一次失败的演习，但到底是个演习，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从政治动员的广度与深度上讲，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觉得对民族历史的发展，长远看总会有作用，因为尝到了那个滋味。最大的问题是思想的解放。过去，领导说什么都是个服从，说一不二。“文革”后，就开始想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要执行，这在以前是没有的。经过这一段，人们开始动脑子了，能够批判地看待各种言论和问题了，懂得问“为什么”了，解放了思想。

而且，如果没有“文革”，能想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吗？将来会有的，但是会有这么快吗？改革开放是因为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人们看到改革的地方粮食增产，生产发展，后来总结经验，改革就向前推进了。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文革”，大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不愿意乱，希望稳定，这就是好处。

三、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共产党，不管是俄国的还是中国的，闹革命的时候，什么资本都没有，没有钱，没有媒体，只能让民众相信我是你的人，我代表你的利益，我帮你挑水、扫地、割草，通过实际的服务，让你相信我，支持我。我依靠你的支持，革命成功了。但是我成功了之后，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军队、警察、媒体，我不再需要你支持，相反，宪法规定你必须支持我。干部的想法也随之变了，从依靠人民打江山，到管理人民坐江山。这个变化非常深刻，但我想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以为还是原来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党，实际上已经变了。

我认为俄国变得更快，因为十月革命跟中国革命不一样。十月革命基本上是个政变。当时国家破败，军队破败，只有少数人掌握政权，没有能力阻止革命。夺权后，马上开始内战，抵抗反动派军事干涉，镇压反革命，对付外国势力等等，所以很快成为一个警察国家。而且，列宁他们都不相信农民，认为农民是反动的，对富农采取普遍镇压，杀鸡儆猴。列宁本人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他当年写的文章，说要把反对征粮的富农头领吊死，而且要吊得高高的，让远处的人也能够看到。依靠恐怖手段进行统治，实行公开的“红色恐怖”，以对付“白色恐怖”。当时大概觉得没有别的办法。斯大林更厉害，所以列宁都不敢让斯大林接班。俄罗斯是个很落后的国家，而且残破了，大概觉得除了用武力来压制敌人、管理群众，没有别的办法。列宁第一个用恐怖手段来解决党内的斗争，对付党内反对派。这个传统建立起来就麻烦了。有人说毛泽东手下死的人比斯大林和希特勒手下死的人还多，这我没有统计，但有一个根本区别，毛泽东从来没有下令处决

这些人，斯大林、希特勒都是下令处死他们。这个区别很大。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可能比较对，实际上中国现在搞的有点像新经济政策。但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机械的，认为凡资本家都不能信任，不能使用。新经济政策发挥了资本家及各种经理人才、技术专家的积极性，但一旦经济恢复了、发展了，就马上停止了新经济政策。所以这些人都走到了反面，列宁就是这样，斯大林更不用说。据说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家乡的时候，他说党的工作就是筹钱，他的专业是劫银行。土匪味很重。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想把共产党和苏联弄垮，相反，他想挽救共产党。但是当时苏联经济已经不行了。他是在失败的环境里开放政治，在经济没有改革的时候开放政治，人们买不到面包，就开始攻击政府。所以中国没走这条路、先改革经济是对的。

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像苏联这样的剧变？苏联当年是经济下降，生活困难，在那种情况之下发生剧变的。中国只要继续发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突变。

但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变化。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一直到回美国之前，觉得一生中最光荣最愉快的事，就是我是一个中共党员，觉得了不起。因为跟那些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都联系在一起了。那时候知识分子、干部入党难上加难。对现在的共产党，我有两个看法。第一，这个党跟以前的党已经不一样了。名称和组织机构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不同了。当时业余时间帮同志学外语，不管党员非党员，敢要钱吗？要钱不要脸得很。现在不要钱反而不正常。我们有的美国客户讲，我是因为爱中国才来投资，我不要钱，不要利润。我们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人家以为你是骗子，不

正常。在经济建设上、财经管理上非常能干，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么能干的领导班子，虽然漏洞很多，但跟别的国家比，高明得很，不然早垮台了。尽管在选择的时候受到人事关系影响很大，但你还是得能干。但政治上是个保守党，并不是促进社会上、政治上的进步。但没有第二种力量，只有它。最近披露了不少高级干部或其家属的经济问题，但我觉得这还不是根本问题，因为看一个干部是不是好干部，能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光凭是不是廉洁来评价。有的人廉洁奉公，可能也不行，有的人有贪污，但能力强，政绩好。所以不能光依这个评价。问题是，如果高层领导不能廉洁奉公的话，对老百姓、对干部就没有号召力。让干部看焦裕禄的电影，他们说让我们学焦裕禄，你们学谁？这是一个严重的危机，如果上面的领导不能廉洁，怎么行？我总想着整风，没有阶级斗争的整风，没有抓特务的整风，大家都上学习班，总结经验。我想党内健康力量总是占多数。

第二，政治上，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不然就违反《共产党宣言》了。但我觉得事情也并不那么简单。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并非真正想搞社会主义，他们是利用工人支持与执政党竞争。英国工党上台后，搞什么社会主义？它实行铁路、矿山国有化，也没管理好，后来就下台了。我觉得，中国要搞民主社会主义，不一定根据他们的理论来搞，而是从现有制度出发，逐步走民主道路。

四、中美关系

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看法：战争结束

后，美国需要国际朋友，中国是个大国，又处在日本和苏联之间，而且很愿意跟美国交朋友；中国缺少的是资金，是技术，是人才，所有这些，美国多的是。所以，中美两国存在极大的相互需要和互补关系，可惜，中国内战一起，美国选择支持蒋介石，就失去了历史机遇。这是美国政府的特大失误。当然中国判断美国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对。1955 年我从监狱出来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中美之间开始有一些试探性的接触。毛主席有一个说法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说，上甘岭战役中，美国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武器，在那么个小范围的战场上，尚且打不败志愿军，说它想消灭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分析得很对。

我到昆明后，在军法赔偿处工作，整天处理美军给平民造成损害的赔偿案件。前面讲过，美军的军纪很差，所谓赔偿，也非常不像话。但这些并不没有影响昆明老百姓对美军的热情友好，走在街上，到处有人竖起大拇指，说“老美顶好”。那些坏事、怪事不一定传得那么广吧，而且在刚刚结束的二战中美国站到中国一边，给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持，昆明又是威震四海的飞虎队的基地，民众的好感是十分明显的。上海就不一样了，与昆明人相比，上海人比较谨慎。

解放后，反美宣传很厉害，尤其在抗美援朝等特殊时期。不过，这并不影响在华美国专家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上，反美越厉害，对中国同情的美国人越宝贝。记得有一次，好像是 1960 年，我和美国记者、作家菲历克斯·格林（Felix Greene，他对中国友好，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到天安门拍照，当时天安门广场正在举行反英示威，同时也反美，他要到城楼底下拍照，我们从游行队伍中穿过。有个小头目问我们是谁，在干什么，我介绍说这是位友好的美国作家，他喊了

几声，人群分开一条小道，两边的人鼓掌让我们通过。

我觉得，中美之间尽管问题很多，不管怎么说，近年来两国一代代政府都推进了中美关系，到现在，有将近三十个部门每年定期会谈交流，最高级别像美国国务卿、财政部长和中国副总理的战略会谈，这些会谈交流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我不是很懂外交，可我想，国家之间不能像两个小孩吵架似的，你对我不好，我就拿着玩具回家了。不能因为一些令自己不快的小事情影响重要国际关系，这没有道理。以前周总理、陈毅外长办外交，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如果用得好，中国感染人、影响人的威力是非常大的；用得不好，硬要大国的面子，就会让人没法了解你。本来是很可爱的，你非不让人爱。越有问题，越需要沟通。中国也需要慎重择交，美国有句老话，我姥姥常说：你跟狗一起躺下来，身上就会有跳蚤。

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许多人认同美国的文化和制度，喜欢美国，极端的把移民美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反美的气氛又很深厚，对美国的态度似乎成为是否爱国的标准。美国也一样，对中国充满矛盾。一方面，很怕中国竞争，尤其担心知识产权被偷。我前几天刚给《华盛顿邮报》写了篇文章谈这个问题，说美国人之所以对知识产权问题特别敏感，是因为19世纪美国地位的上升很大程度上靠从英国偷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但凡出现一点放缓的迹象，就怕得要命，因为全球的资本主义都靠中国经济支撑，中国经济要是垮了，那不得了。但一般来说，美国人对中国、对中国人普遍有好感，我们到处去讲话，宣传中国，为中国辩护，基本上不会遇到恶劣的反应。

中美两国各有历史地形成的社会制度，可以而且应该取长补短、

和平共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说，中国的制度，我们美国人是不会采用的，但应该承认，中国的制度对中国人的好处，比美国的制度对美国人的好处要大得多。我觉得他说得对。美国人民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信仰等方面的自由，这是很好的。比较而言，这些自由在中国限制更大，或者说更有限，从这一点来讲，美国的制度显得好多了。但是，分析一下就知道，这些自由在美国同样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是通过金钱来限制的，只不过一般美国人不知道罢了。譬如说，看起来美国人民有选举总统的权力，但是，他只能在两个大党的候选人中间选择，另外组织第三个大党，理论上可以，按照具体法律不行。这些候选人要竞选总统，非有大笔金钱不可，得几十亿美元。你用了支持你的人的钱，上台以后的政策就得代表他的利益，所以在你当总统前，实际上已经被一些人买下了。你以为你选了代表你的总统，实际上只是在两个资本集团之间作了选择，跟你个人利益的关系不大。举个例子。我们南卡有个参议员叫霍林斯[1]，我小时候就认识他，他代表美国大纺织集团的利益，与中国竞争非常激烈，是个著名的反华派。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曾提出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批准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他坚决反对。我和玉琳在华盛顿的一家小法国餐馆请李肇星夫妇和霍林斯夫妇晚餐。给双方介绍后，霍林斯开口就说：大使先生，我得坦率地告诉你，即使我同意这个提案，我也不可能投赞成票，如果我投了赞成票，他们就会取消我的投票权。他说得很清

① 欧内斯特·霍林斯（Ernest F. Hollings），1922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南卡州第77任副州长（1955—1959）、第106任州长（1959—1963），1966年至2005年连续担任民主党参议员，任期长达三十八年多，是美国历史上任期第八长的参议员。

楚，投票并不一定代表他自己的主张。李肇星表示理解。结果发现，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相当一致，包括双边贸易，两国关系，甚至包括降低对华出售高科技产品门槛。所以，总有一些地方会有共识，也总有一些地方不能达成共识，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关键要学会求同存异，而不是忽略共识，夸大分歧。

对两国关系未来的看法，我觉得邓小平说得很对，中美两国不会成为夫妻，也不会成为仇人。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互利的方面超过竞争的方面，双方不会破裂。但会时常吵架，贸易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投资条件的问题，等等，不断会有争论。那就吵吧，没关系，吵的过程中取得折中，把双方的关系发展下去。基辛格每次上电视都说，冲突不是选择。连小小的阿富汗，进去尚且出不来，别说中国了。想冲突的人，两国都有，但不是主流。

五、宣传形象，关键得有“形象”

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宣传做得很差。我一直在相关部门工作，深有体会，也深为关切，经常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每次回国，都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提供建议。但我也高兴地看到，对外宣传在最近几年有明显的进步。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形成一套对外宣传的策略，我们只讲我们想讲的话，对方接不接受不管。建国前后，万事丛集，也确实分不出身来好好思考这些事。我曾经跟小廖提过意见，说不要老用“美帝国主义”这样的词，普通美国人还以为是骂他。一般人没有这样的分辨能

力，能够搞明白“美帝国主义”是指华盛顿、华尔街的那帮人。这个意见，长期没有被接受，因为“外宣”的对象本来就不包括普通民众。有一年，一位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来访，是位女士，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忘了哪位首长问她，听了我们的广播没有，她说听了，又问她觉得怎么样，有什么改进意见，她说她非常欣赏，十全十美，作用很大，不需要任何改进。再问普遍老百姓觉得如何，她说，哦，他们不会听的，即使听，他们也不明白。瞧，好像我们的广播专门针对她那样的共产党领导人，与普通民众无关。这也确实是我们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对听众不在意，听众来信的回复，从来都是电台署名，而不是某个活生生的人署名，让人感觉，他在和一个机关打交道。对外广播的内容，基本上是翻译对内广播的稿子，只作些润色和微调。我后来对我的工作产生厌倦，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看，似乎对外宣传陷入了一种僵局，不得不做，又没有什么作用。好像反而作为个人的作用更明显，与来访的外国人接触，介绍情况，能使他们对中国产生良好的印象。

现在的对外广播、电视、报纸当然改进了许多，中央电视台开通了北美频道，我觉得很不错，有点像CNN，比较客观，没有那些套词。我觉得这是个大进步。

最近中国花了大量的钱在国外宣传中国形象。我觉得，问题是你得注意形象本身，如果形象本身有问题，怎么宣传也还是有问题。所以，形象本身才是实质。关键得看你做得怎么样，你对你的国民怎么样，而不在于宣传。

六、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有许多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人类现在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人类能不能成功地通过这个考验？是否仅仅依靠新技术的发展就能提供幸福的生活？那可不一定。我常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段话，真正人类的生活，是在争取衣食住的斗争的彼岸。我觉得这应该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从这点讲我完全是个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宣言》中讲的那种共产主义。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人类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个定义也不错，就是说共产主义将是人类普遍自觉的一个社会。

人类到底能不能克服目前面临的挑战？人们普遍认为贫富悬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其实穷富悬殊虽严重，但全世界贫困线以下（人均每天 1.25 美元以下）的人口若干年前占将近一半，现在少多了，主要是在中国减少了，减了几亿。从这方面看，有一些进步。但因为社会制度没有变，又发生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污染、新的传染病、气候变化等等问题，这些都是挑战。这些挑战会迫使人类结合起来共同对付。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必须一起面对这些挑战。像毁灭性武器，主要的威胁是恐怖集团。我觉得大国之间的战争不会再发生，特别是中国跟美国的战争不会发生，哪个国家领导都不会选择自杀。通过小国的战争当然不会消失。所以我基本上是乐观的。美国很多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对现有政治制度不满，而进步的改革力量又很小，很软弱。“占领运动”处于低潮，还要发展，那还有点希望。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削弱大金融资本在政治舞台的力量，有一个比较开

放、比较民主的政治。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新的制度？恐怕还比较遥远。

相比之下，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然也面临着重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改变发展模式的问题。这个问题谈了十年，有一点进展，但根本上没变。进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很多，但仍依靠资本市场。我看了最近的报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准备向民营工商业开放关键经济领域，让国家银行给他们贷款。如果真要改变发展模式，不开展民主恐怕做不到，需要用民主的压力对付那些大集团，还有干部中不愿意改的惰性，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虽然面临重大挑战，我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希望。我非常相信中国人民会克服自己的问题。中国人民历来都创造了摆脱危机的方法，现在余地更大，知识更丰富，经验更充分，一定会有办法。人类的前途，最大的希望还是在中国。美国有什么前途？他们自己都不这么想。西方国家，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光明的前途，有什么未来，老百姓只要混得过去，不比现在更坏，就算满足。

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我有以下想法。

首先，不怕慢，就怕站。

中国的未来，还得靠党内党外进行争民主、讲公道的斗争，才能慢慢改变。如果坐等矛盾积累，什么时候经济走下坡路，那就危险了。但是革命的办法不好，应该“和平演变”。慢慢改，但是不改不行，所谓“不怕慢，就怕站”。如果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党内党外长期地争公道，讲民主，讲廉洁奉公，那是能够改变现实的，没这个斗争变不了，而且有可能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祸害，因为可以非常便利地在这个旗号下煽动拉拢一些老百姓，一些头脑空空的年轻人。中国应该卸下一些包袱，如长年说受西方国家欺负、受日本欺负，这些东西

应该放一边。这些话现在只能做保护落后的借口，而且很容易作为民族主义分子进行煽动的借口。今天的日本人根本不是过去的那些人。中国人民的任务很重，中国坏了世界也就坏了，中国好了人类就有前途。

至于近期能做的事，我觉得如果在以下两个方面能够开放的话，会大大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一是只要不触犯法律，媒体可以随便批评监督。有的人总怕乱，其实不会乱。你看现在这么多的网站，这么多博客、微博，有些人很极端，有些很坏，但也没有乱。第二是要保护揭发坏人坏事的人。这方面中国政府有规定，但事实上保护不力，往往被揭发的人倒了，揭发的人也倒霉了。如果做到这两条，坏人坏事就能够得到揭发，而人们心中的想法也能够抒发和讨论，我觉得有利于进步。这个要求也不大高。

其次，对民主的看法。

毛主席实际上很欣赏美国，他在长沙上学时就对美国感兴趣，老师教他的也是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思想，后来碰到实际问题解决不了，才接受了列宁的思想。我觉得毛一生想把中国建成一个活泼的民主社会，可以鸣放，可以提意见，但是每一次他试图造成这样的形势，结果都失败。因为舆论一开放，批评就来了，批评来了他就坐不住了。他又想活泼，又要听话，要的是在他框子里的活泼。我一直觉得，他的民主就是，你有权开会对我的政策为什么是正确的进行民主讨论，你可以对我的政策考虑不周的地方进行补充，也可以揭发我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地方，但是，你要是反对我的政策，那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那是反革命。他想证明中国人跟俄国人不一样，俄国人是粗暴的，中国人是文明的，是能够搞民主

的。但他的试验都没有成功。我到延安的时候，广播报纸正在宣传“张永泰道路”，这是为配合当时的和平土改政策而进行的宣传，带动了一些地主主动献地，自食其力。我们撤离延安前，和平土改政策已被放弃，这固然是中共革命整体目标调整的结果，不过，我觉得和平土改实际上行不通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张永泰与另一个新富农的典型吴满有都投降了国民党，这说明，让地主心甘情愿出让土地是困难的，而一旦碰到困难，事情就可能向相反方向发展。1956 年的鸣放和“文革”初期派工作组都是这样，一旦被认为失控，不是设法调整，而是加以整肃。

像我这个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种惊天动地的场面，是很难得的，那个时候所受的教育真是深刻。我从小在美国参加共产党，凡是听到有人讲，某个国家某个地方现在不能一下子实行民主，因为没有准备，我都认为是替帝国主义辩护。“文革”时我领会到，其实这话没错。没有一个好的领导，不经过一定的体验、教育，民主很快就会变成独裁。我认为，如果现在中国搞多党制，效果不会好。“文革”就是教训。群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效果不好。群众没有民主管理的经验，在能够民主管理的时候，很快就搞成独裁。都知道多数说了算是民主，但不知道保护少数的权利，不让少数说话。中国不能完全像西方那样，我不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多党制，如果放开党禁，我预料第一个出现的，会是民粹主义的党，它会攻击共产党的开放政策是出卖民族利益，那会很糟。

我脑子里有一个幻想，总想着过去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用于现在，我也知道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但好像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幻想。我想，现在只能创造一个新的、合理的、和谐的制度。

至于这个制度究竟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如果把不学西方民主作为一个棍子打人当然不对，但美国式的选举制度肯定不适合中国。别说中国，这套制度在美国也不怎么样。在美国选举中，最关键的靠两条，一是你得有很多钱，二是你上电视形象还可以，能说会道。没有这两条，再有思想有能力也不行。在反封建的时候，民主是最先进的。现在呢，台湾选举选出陈水扁，美国国会的信任率只有百分之二三十。中国应该探索自己的选择领导人的制度，把公正的、道德高尚的、有能力的人选拔出来。

英国大宪章颁布到现在已经八百年了，西方国家才有那么一点民主，中国这样一个老而大的国家，要一下子实现理想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要是党内能够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时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参与，让官员的地位与他对国家的贡献相匹配，而不是一旦上台没有大地震就动不了他，那就好了。不过，不管怎么牢骚满腹，中国还是充满了强劲的前进的势头，这是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都依靠中国共产党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呢。

第三，对腐败的看法。

中国无疑有严重的腐败问题，但也不必看得那么可怕。我最近在看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历史，英国政府有几百年时间腐败得不得了。议会通过法律，给每个士兵发几个先令军饷，全被军官贪污，士兵吃得很差；议会知道后，增加了几先令，又被贪污了。但是英国也没有垮台。

我有个想法，也许不科学。在世界的大民族中，只有一个生存了几千年，而且在同一块地盘，用同一语言，很多想法甚至连风俗习惯都一样，这就是汉族，就是中国。其他一个都没有。中国是一个大

熔炉。每次遇到大危机时，中国都可以做一些检讨，进行一些批评分析，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七、我的选择，是我一生的幸运

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幸运。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使在监狱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哎呀，我要是不来中国该多好。

这种想法的基础，是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的进步力量，从思想方法，到实际政策，都对历史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三十一二岁，现在呢，加倍还超过了。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过去有许多属于绝对贫困，近三十年来，几亿人口解决温饱问题。这是世界历史的奇迹，而这些奇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这个事实没有人否认得了。有人说这跟中国共产党没关系，它是中国老百姓努力的结果。当然是老百姓努力的结果，但领导不好，努力不了，努力了也没用。

当然中国也带着许多落后性。我特别喜欢打一个比方，我小的时候，在家乡的博物馆看到一种非常漂亮的蛇，它每年都要蜕皮，慢慢地从旧皮中爬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是看它的前半部分，很鲜艳，很漂亮，这是它的新皮；但如果看它的后半部分，就会发现很灰暗，很丑陋，那是它的旧皮。中国也是这样，只能慢慢地从旧皮中爬出来，没有别的办法。中国的事情，着急不行。我们都见过，有的东西变化很快，实际上不是好事，也不是真变，像“大跃进”。我觉得

这个政权，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与它相比，任何国家都比不了它。大的事实摆在那儿，不是理论。

你问我，当年参加革命时的理想实现了吗？我的回答是，没实现，因为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且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向资本主义的一个过渡，是速度很快的强行军式的一个过渡。所谓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摸索通往真正社会主义的途径。是否真的在摸索？有的人应该是，但有些人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没有动机。

那么，究竟是理想出了问题，还是实践出了问题？我觉得原来的理想也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讲了，要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济的发展，二是人们觉悟水平的提高。马克思不是说过吗，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我们原来以为只要夺取了政权，就一切都好办了，实际上不好办，社会财富的剩余只有这么多，总会有类似资本家的人占有这些剩余。中国革命解决了土地问题，获得了独立，但民主、自由、反独裁没有解决，那一套换成了这一套，这一套比那一套好，但还是没有跳出那框框。

既然原来的理想也有问题，那么，实践做出调整，这些调整虽然与原来的理想有偏离，但不是不好的，历史的拐弯是可以接受的，也只能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当然，像“文化大革命”走了大弯路，本来可以不走。但历史就是这样发生了，只能按实际情况应付，好在中国的领导人还能够应付。我在美国老讲这个话：中国不是理想的国家，它既不是理想的好，也不是理想的坏。但好的方面是主要的。

前一两年，我接受过国内一家网站的采访，他们问我是不是后悔

当初的选择。我说一点也不后悔，我打了个比方，说我当初登上的那条船，它的目的地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自然没有错；后来它去向另一个目标，这却不是我能控制的。

现在有人认为革命白革了，我不这样认为。还有人觉得国民党时期比现在好，那是他不知道那时候的情况，就我看到的国统区而言，那简直烂透了，那个腐败跟现在的腐败也不一样。有人问如果蒋介石在内战中打胜了，是否会更好？我觉得没有这个选项。我在上海曾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说，我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不过大概这个国家正需要共产主义。

叙述我参加中国革命经历的影片《革命者》今年（2012年）5月在美国上映，非常受欢迎，场场爆满，好多人买不到票。观众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关心中国的人士，纽约有位九十多岁的老革命来观影，但也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观众对我很尊重，认为我又勇敢，又坚持原则，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影片结束后，往往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这完全是个纪录片，制作人员花了五年时间，采访了二三十个小时，就我一个人坐在那儿讲，中间插入一些宣传画。我自己对影片并不满意。他们编好后没有让我们看，而且每次放映前都宣布没有先给我们看，好像他们的职业道德要求这么讲。影片有两个严重的问题，扭曲了我的原意。一个是影片完全讲中国的过去，一句没有讲现在的中国，而我参与的那段历史，曾经出现过许多问题，如“反右”，“大跃进”，“文革”，如果不讲当代中国，给人负面印象就会比较强烈。我在采访中谈了当代中国。我觉得只要指出以下两个事实就足够了，第一，中国的人均寿命比我刚到这个国家时增加了一倍以上；第二，中国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吃穿住问题，虽然水平还不高，仍然有相

当比例的贫困人口。第二个问题是，访问人几次问我有没有后悔，我说，只有一件令我后悔的事，那就是，我不应该参与中国的内部斗争，与此相关联，当我知道被江青一伙利用后，应当及时退身，但当时被冲昏头脑，放不下，未及时离开漩涡中心。我在访问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我只是到中国教英语，做语言方面的工作，而不参与政治，也许我的作用会更大，或者说危害会更小。但影片呈现的结果，好像我对自己的选择完全后悔了。所以我每次都得去现场，放映结束后给观众讲话，一是补充中国后来发生的事，二是表示：我能参加中国革命，感觉非常自豪，我丝毫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人是会犯错误的，除非你什么事都不干，这跟动机没有关系。当时选择了，参加了，有些事做错了，但当时认为是对的，也没办法按事后的认识来判断。有些事，是傻的，但不是坏的。1977 年我出狱的时候，做的结论中有一句话，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政治错误，我爱人很生气，不服，给胡耀邦写信申诉，后来重新做了结论，去掉了这句话，对我的贡献非常肯定。其实我无所谓，说我在“文革”中犯了政治错误，这是事实，谁在“文革”中不犯错误就怪了。我跑了许多地方，如波士顿、纽约、北卡、洛杉矶等地，去参加影展，去向观众说明。好在，就我所知，这个电影并没有使观众对中国产生恶感，他们没有因为历史上的问题而对现实中国质疑。

最后，我想再次表达我对中国的感情。

第一次从监狱出来后，我就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周总理跟我谈，他说批准你入籍很容易，但我请你自己考虑，是多一个中国的中国革命派好呢？还是多一个美国的中国革命派好？这情景类似当年毛主席在重庆回应郭沫若的入党要求。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话，当然是做一

个美国的中国革命派影响大。在中国的时候，差不多觉得自己就是中国人。我说中国都是说“我们”，想中国也是想“我们”，而不是“你们”。现在呢，我说中国是“我们”，说美国也是“我们”。但我心里有个想法很明确，那就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我能对中国提供更大的帮助。我一直说，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李敦白先生印象记

一

李敦白先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不敢称他为“老人”，因为他对“年龄歧视”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和反弹。两年前第一次在西雅图见到他，他开着一辆凌志从离市区几十公里的“狐狸岛”到华盛顿大学接我们，再开车十来公里到一家餐馆用餐。当时不知道他的年龄，心想，这老先生看上去怎么也七八十岁了，还能开个车到处跑，真神！听到赞扬，他不无自得地说了一件



李敦白先生与他这部口述历史的采访和撰写者、《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徐秀丽研究员。

事：国内某省一位高官到西雅图公干，他到机场迎接，这位官员看到车旁并无司机，便问“谁开车”，李应声说“我”，对方脸色都变了，建议让自己的秘书开车，李先生答曰：“那怎么行，这是我的车！”

开始进行“李敦白口述历史”访谈工作是在2012年5月。商量工作日程时，李先生对我提出的紧密时间安排毫无异议，一旁的夫人王玉琳老师看不下去，出声道：“都九十一岁了，悠着点。”李先生马上说：“我抗议，我才九十岁。”“8月份不就九十一岁了，还差这三个月！”“那也还不到！”有王老师的“前车之鉴”，按说我不该犯类似错误，不过，考虑到出版周期，对他的年龄打了点“提前量”。他在审阅初稿时，看到“二十四岁来中国……现在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叙述，提出“严正抗议”，郑重声明“本人年方九十一”。

开始遭遇无处不在的“李氏幽默”时，我有点发懵。第一天工作，一见面，他就说房间订小了（行政套间），见我不好意思，补充道：“如果要住一营兵，就不够大了。”晚餐时，夫人来电话，他又说，“她们把我的房间订错了”，王老师一定在问他所以，只听他说，“她们以为西哈努克亲王来访呢”。以他的身份，住的地方确实不大，他的玩笑是为了消除我们的顾虑，营造舒畅自在的工作氛围，其体贴周到令人感动。

工作间隙，站在窗口看风景。李先生道：“这都是你的山河啊！”“哦？”“秀丽的山河嘛！”

到后来，对他的玩笑已经产生默契。一天下午，比约定时间提前十几分钟敲了他的门，随后发现差错，遂道歉，他问：“你要退出去吗？”即做退出状，以应和他的高超沟通技巧。有一次聊天，他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中医“针麻”技术，说他曾参观过手术中

的情形，一位病人的颅骨被打开，护士却在喂他吃桔子，同一手术室中还有其他开刀的病人。参观结束后，院长问他，“你看到有人紧张吗？”“有。”“谁？”这一次，我和他异口同声地说：“我！”

二

李敦白先生有一颗年轻而勇敢的心，也有与之紧密配合的超级好头脑和超级好身体。虽然我们之间有四十年以上的年龄差距，但基本没有代沟。之所以说“基本没有”，是因为存在着某些“反向代沟”，尤其是在新潮产品的应用方面。他随身携带Ipad，Iphone，笔记做在Ipad上，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查什么词语，随时“谷歌一下”或“百度一下”。说到美国的“占领运动”，他马上调出自己拍摄的相应视频。去年上半年用的是Iphone4s，下半年换成了Iphone5，因为“更先进”。

他的身体超乎寻常的好。由于他在北京的时间有限，访谈工作的主体部分在八天之内完成，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人（不管多大年龄）能以这个速度完成这项牵涉众多重大问题和重要人物、内涵极为丰富的工作。陪一位年龄超过九十的先生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不免随时小心，因为毕竟没有类似的经验。刚开始时，还有点“小瞧”他。一天晚饭后，我们陪他散步，时不时地问他“还走得动吗”？他大概听烦了，说，“在西雅图，我们每天快走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啊？您还能快走？”他不吭声，迈开大步，“噌噌噌”地往前走，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的我们，笑得直不起腰来。

不久前，刚准备外出度假的李先生不幸摔断了坐骨，疼痛非常，但他把这件事当作生活提出的挑战，他的姿态是：勇敢迎战。他在邮

件中说："在医院，每日是个斗争，为尽早康复而奋斗。主要内容，是克服疼痛来锻炼胫骨，一步一步恢复运动功能。我们俩长期过着安稳的生活，没有什么严峻的挑战。这会儿好了，有了挑战。我们对挑战说，别想欺负我们年纪大，你找错了对手，我们会战胜你！你想用疼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白费！经历了这次考验，我们会更聚精会神地建造促进中美友好了解的大桥，跨过天沟，把两国人民连在一起，为解决人类的共同任务而奋斗。""经过这次大震荡并大痛，我重新体会到'把坏事变成好事'的重要实际意义。我身体确实正在炼成比过去强。这正是我从中国学来的一部分生活道理。幸哉！幸哉！"他"估计一个月以后，我就会走路不用拐杖。"对于这样一位老先生——真是词穷，终于还是用了这个"老"字——不服真不行。

他有超好的记忆力。如果说，随口念出"硕鼠硕鼠，勿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并不让人惊讶的话，完整流畅地背诵白居易的《买花》就令人叹服了，笔者本人就只记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两句。在讲到1940年代由刘良模指挥的纽约华人洗衣所合唱团时，他还说得出几首曲目，发现我们不知道其中的《锄头歌》，便唱了起来："手把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五千年古国要出头，锄头底下有自由……"，而且说，电影《寒夜》中树生和文宣在江南水乡油菜花田间教小朋友唱的，正是《锄头歌》。果然。

他描述的细节超乎寻常地准确。著名播音员丁一岚是他的同事和好朋友，两家常有走动。他说起丁的丈夫邓拓喜欢收藏字画，受失眠困扰时，爱挂一张画在面前，神游其中，往往能够平静入睡。我问，您记得有什么画吗？他说，有一幅苏东坡的画，最为邓氏所珍爱。后来检视邓拓捐赠书画册页，果然有苏东坡的《竹石图》。他说，1949

年初他以“间谍罪”被捕，关在离西柏坡不远一个当地发音为“怀社”的村子，查平山县地图，滹沱河以南确实有叫做“回舍”的村庄。

他当然有记错或记不起来的时候。面对记忆的挑战，正像面对身体的挑战，他有股不服输的劲头。他曾说，他在昆明闻一多追悼会上看过郭沫若的挽联。闻一多被暗杀，时在1946年7月15日，这时李敦白先生大概已到张家口参加中国革命，自然不可能在昆明。他回忆，他是1945年11月调到上海的，12月初曾回昆明数日。根据这一线索，我提醒他可能是“一二・一”烈士追悼会，他一扫愁眉苦脸，说，“哎呀，太阳出来了，真舒服！”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劝他先不管了，或许以后会想起，他说“不行”，非弄个水落石出，固执得可爱。

三

李敦白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和重要见证者，他对历史抱有非常真诚、谦逊而豁达的态度。

他从不讳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严厉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他认为，1949年他被牵连进“斯特朗间谍案”，坐了六年牢，当然完全是冤枉的，但是，他认为自己的背景，以及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导致误解的缘由之一。他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曾经是一个美国军人，主动积极地接近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地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带延安，与中共高层亲密接触，而中共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自己所讲述的，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既然如此，他被怀疑，不是很正常吗？何况，他还有不少在坚强的中共党员面前相形见绌的弱点。延安

的大轰炸，让他吓破了胆。他惊恐万状，好像身不由己，一有风吹草动就拼命跑，到处躲，经常不跟队伍一起走。到达太行山后，他与爱慕已久的姑娘魏琳结婚，沉浸在巨大的新婚快乐中，为了个人幸福，甚至置组织纪律于不顾。新华社各部门分散在西柏坡周围的十多个村子里，他所在的东柏坡离播音室所在的沙河村大概有四五里路，按规定，已婚夫妇周末才能团聚，而他无法忍受新婚的别离，每天都到播音员妻子那儿去过夜。电台的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说播音室是个严格保密的地方，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尤其像他这样外貌惹眼的外国人，在周围来来去去，危险万分。而且，这是组织纪律，谁都得遵守。但他借口需要在晚上辅导魏琳英语，照去不误。事后检讨，他觉得自己让党失望了。

他把自己作为整个伟大事业中的一员放大，同时又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错误作为个案缩小，以此疏解长期单独监禁导致的心理问题。他把自己受冤枉作为一个特别的个案来处理，他说，这个个案错了，但他们的事业没有错；他们对他这个人搞错了，但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犯点错误不可避免，这个错误犯在他的身上，让他痛苦，让他受难，确实倒霉，但是，既然这些错误在发生，为什么就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呢？他既然自认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那不是意味着分享他们的光荣，同时分担他们的苦难吗？如果他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高尚的。这种把自己作为整个事业一员的想法不但安慰了他，而且鼓舞了他，让他在缩小自己的同时，又把自己放大了，放大到能够包容那些迫害他的人。

他说，能够参加中国革命，是他一生的幸运，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但是，确实有一件事情让他追悔莫及，那就是，他在“文革”

中积极造反，一度成为中央广播事业局三人领导小组的召集人。他多次说，不应该参加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他毕竟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事情懂得多少？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极“左”言行，认真清理思想根源。他对自己，真是毫不留情。他说，如果不讲实话，又何必留下历史？

李敦白先生对中国革命无疑有大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当数1946年他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到被围困在湖北省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的李先念王震部送粮时，从与周恩来一起实地调停国共军事冲突的美方上校处，获悉了重要军事情报，并向李先念“告密”，在中原突围大局中起了积极作用。对于这件事，李先念到晚年还念念不忘。李敦白先生自己的态度则很谦逊，他对相关叙述加了好几个“一点”，如提供了“一点”情况，起到了“一点”作用，尽量淡化自己的角色。

李先生所叙述的历史，有些涉及重大问题，而且缺少旁证。在此情况下，作为历史学著作的“口述历史”，要求口述者尽可能详细地回忆现场细节和周边情况，确保记忆准确，访问人则需要查考档案文献，研究背景资料，使口述内容与历史背景有机融合。在这一过程中，访问者往往反复提问，追踪细枝末节，这对口述者的记忆力和耐心都是极大的考验。李敦白先生充分理解历史学的严肃性，作了最大限度的配合。例如，李先生谈及一件重要史实：1947年，美国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离开延安之前，中共中央委托她（和李先生一起）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翻译成英文，带给东欧各国及法共、意共的共产党领袖，表示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是独立自主，不听外国人的，还明确指出不必带给苏联。这件事，在所有的历史著作中均无记载，而且存在若干疑点：首先，当时中共与欧洲共产党关系并不密切，为何出此举动？第

二，中共的外交政策正在向苏联“一边倒”，为何表露出对苏的戒备？而且既给了东欧党，就不可能瞒过苏联。第三，斯特朗本人始终未说过此事，她也没有直接去东欧。此件事，对中共党史、中苏两党关系史、中共与东欧国家共产党关系史以及国际共运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所以我反复请李敦白先生叙述细节，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宣化店告密”和“斯特朗间谍案”等重要问题上。

我真心认为，李敦白先生是进行口述访谈的最佳对象，不但记忆清晰，叙述连贯，而且对历史抱有极大的宽容之心和尊重之意。

四

李敦白先生是个非常深情的人。他在中国近三十五年，两次坐牢就消磨了十六年光阴，其间苦难，一言难尽。但他早已超脱了个人痛苦，说起不堪的日子，照样谈笑风生。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我只看到他有一次擦眼泪，那是说起他所敬爱的陈毅元帅的时候。他对周恩来也有非常深挚的感情。他说，周恩来是一个政治天才、组织天才、外交天才，他特别善于和人沟通，善于做各种各样的人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他很聪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很诚恳。他说，周恩来是民族英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批判了自己最好的代表人物，那太可惜了。他还说，1973 年三八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了庆祝茶会，周恩来到场讲话，对“文革”以来一些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受到的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表示道歉。当时只有他还被关在牢里，周总理提到他，说李敦白的情况不同，他参与了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

反革命集团。一般认为，这是周对李的否定和抛弃，李却看作对他的保护，因为“参与坏分子破坏活动”的罪名比“美国特务”要轻得多。他说，他对周恩来的爱戴之心，始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李敦白先生无疑是个“爱妻号”男人。我曾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呢，还是个美国人？他答：我想中国、说中国是“我们”，想美国、说美国也是“我们”，我是个中国的美国人。确实，从他的言行，很难判断他的国籍，唯独在“爱妻”这一点上，他是十足的美国派。当然不是说中国男人不爱妻子，而是说中国男人很少像他这样“表达”。



2012年，李敦白先生在北京接受访谈。

他说，有一种狗，只跟一个主人，别人怎么引诱它，都不会变心，这种狗，美国人称one man dog，他说自己就是一只one man dog。他说，他的妻子王玉琳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这个天使被化装成一个女人，一个中国女人，而且化装得并不怎么好，却具有高洁的灵魂和神奇的力量。他说，年轻的时候，并不觉得王玉琳有多美，跟她结婚，很大

程度上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她出身工人家庭，她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她是梅益局长的机要秘书，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可以帮助他不犯政治错误。到后来，他却越来越感觉到妻子的美丽，喜欢静悄悄地看她。他说，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有把两人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他说，我这个人对我的妻子有点“疯”，有点crazy。他还说，甚至他对客户的选择，都有一条秘而不宣的标准：如果客户只重视他，不重视他的妻子，他就不把这个客户看得很重要；如果客户很重视王玉琳，他会比重视自己更慎重地对待他……他认为，他们俩能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拥有亲密的夫妻关系。

他的深情，让我的年轻同事颇为动容。

与李敦白先生一起工作的日子，面对的是波澜壮阔同时也是波谲云诡的中国现当代史，主人公的命运跌宕起伏，加上时间安排紧凑，我一天都没有睡过好觉。尽管如此，相伴这位胸怀开阔，思想丰富，个性风趣，语言幽默的老先生，这段时间成为我生命中非常愉快、十分值得珍惜的日子。

徐秀丽

2013 年 8 月

后记

李敦白先生的一生，是十分漫长、丰富、曲折、传奇的一生。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5 年来中国前的二十四年；1945 年 9 月至 1980 年 3 月在中国生活、工作、坐牢的约三十五年；1980 年回美国重新创业至今的三十余年。他一生的青壮年时代在中国度过，他一生的主要业绩在中国创造，他一生的巨大幸福和刻骨痛苦也在中国遭逢。所以，他总是觉得无法简单地按国籍身份将自己定义为“美国人”，而说自己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1993 年，李敦白先生出版了他的回忆录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尽管存在一些硬伤，这是一部严肃认真的作品，不讳饰，不躲避，坦诚勇敢，直面历史。但该书的叙述仅限于在中国的三十五年。这一段，固然是李敦白先生生命中最重要的段落，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前期在美国组织工人运动、后期在经济领域创业并积极沟通中美关系无足轻重，没有这两段，不仅无法贯通地观察研究一个革命者的一生，更重要的是，将失去体现于李先生身上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现当代史）丰富性和复杂性。何况，即使是这中间一段，回忆录呈现的内容也有缺失，主要有三点：第一，李敦白先生亲身经历并深度参与了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事业，与中共高层及众多社会知名人士有广泛接触和私人交往，全面了

解和解读他所交往的重要人物，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整个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理解，可以修正、补充、丰富中国现当代史（尤其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叙述。在他的回忆录中，人物回忆方面的内容穿插在他的个人经历中，未加展开。而在本书中，他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回忆是篇幅最大的部分。第二，回忆录写作的时候，李先生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对其自身经历和中国革命史以及相关理论进行反思，所以，只叙述经历，未展现思考。而在本书中，他对中国革命及其指导理论、中国革命史、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是重要构成部分。第三，十六年牢狱生活对于李先生本人人生观、生命观的影响，以及他本人极为重视的在心理建设方面的经验，在本次访谈中第一次得以系统化。回忆录的中文版（译名为《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对原著存在的问题未加订正，又做了许多不当删节，以至于在历史学界未得到认真的对待。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给李敦白先生做一部完整的口述史，不但不是多余的，毋宁说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李先生回忆录叙述比较详细的部分，本书仅作必要勾勒，所以，两本书重复的比例很小。

李敦白先生博闻强记，风趣幽默，对其经历娓娓道来，证诸文献，基本可靠。当然，毋庸讳言，个人记忆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而对于超出个人经验的内容，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准确把握，因此，与文献资料互证成为口述史工作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笔者行文时注意到了口述内容和文献资料的区分。文献对口述的修正，得到李先生认可的，已经融化在口述之中；凡口述与文献不一致，或口述资料未能获得文献证明而李先生相信自己记忆无误的，用注释的方法引述相关资料并说明笔者的意见。从文本的连贯性、丰富性出发，撰

写人需要补充一定的背景性资料，限于体例，这些补充往往也需要转化为访谈人的口述。这部分文责应该完全由笔者承担，但事实上也难以一一指出，好在这样的补充不算很多，较为重要的一处是“外国专家”一节，此节内容多为笔者根据资料添加。

有些内容，在定稿时做了删除，希望以后有机会出版增补本，全面反映访谈情况。

笔者自知，尽管在核对史实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因涉及的事件和人物众多，一定会留下差错，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准备和写作、定稿过程中，笔者得到诸多师友的大力支持，以下各位，我想特别表示感谢：我的年轻同事潘晓霞担任项目助理工作，她负责全部录音、录像以及音像资料的初步整理工作，并提供了若干注释。没有她的帮助，我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难度都将大大增加。黄道炫、李金铮两位近代史专家审阅了初稿，提出了非常详细和极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已经采纳。李玉贞、章百家、沈志华、闻黎明、彭卫诸位先进或提供资料，或解答疑问，使文稿的“遗留问题”得以尽量减少。包雅钧先生特地到宣化店考察地形地貌及中原军区各机关分布，并代为拍摄照片和搜集图书资料。众多师友的倾力相助，不仅使书稿的学术性得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而且给笔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鼓舞，让我得以情绪饱满地完成此项工作。

当然，我最应当感谢的是李敦白先生本人。李先生几无保留地让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经验，他的智慧豁达，他的虚心好学，他的宽容友爱，他的不服老的劲头，他对生命的乐观执着，都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我生命中的正能量。在书稿出版之前，获悉李先生刚刚获得美国华盛顿州中国委员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在颁奖仪式上

发表了一个“四分钟讲演”，要言不烦地对中美关系提出三点看法，博得满堂掌声：中美两国真正相互需要，世界真正需要中美两国合作；只有在对方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国不可能按美国的愿望行事，反之亦然。这位九十二岁的先生依然身体健康，思想活跃，关怀广泛。祝愿他健康长寿，创造新的奇迹。

徐秀丽

2013 年 11 月